

# 汉语概说

〔美〕罗杰瑞 著  
张惠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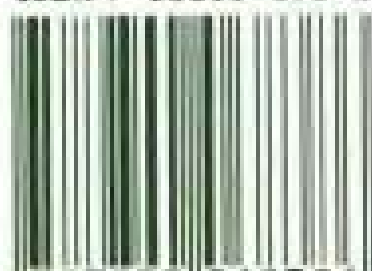


语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顾士熙 项梦冰  
封面设计：刘瑞禧



ISBN 7-80006-838-2



9 787800 068386 >

ISBN 7-80006-838-2/H · 177

定价：9.20 元

HANYU GAISHUO

# 汉语概说

〔美〕罗杰瑞 著

张惠英 译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概说/(美)罗杰瑞著;张惠英译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5.1

ISBN 7-80006-838-2/H·177

I. 汉…

II. ①罗…②张…

III. 汉语-概说

VI. H1

HANYU GAISHUO

汉语概说

〔美〕罗杰瑞 著 张惠英 译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125印张 202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9.20元

## 中 译 本 序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教授的 *Chinese* 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张惠英先生译成中文，名为《汉语概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罗杰瑞教授的名字，中国的语言研究者都很熟悉。他长期从事汉语方言研究，对于汉语方言，特别是闽方言的熟悉程度，毫不亚于中国的本地学者，在方言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更显示出罗杰瑞教授不仅对汉语方言，而且对汉语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把这样一位博学的汉学家所写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汉语概说》一书涉及汉语的各个方面：汉语的历史、汉语的现状、汉语的方言，以及汉语的音韵、汉语的文字、汉语的语法。当然，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由于作者对汉语的深入研究和谨严的学风，西方的读者会从中得到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的全面而准确的知识。但是，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也是大有益处的。因为书中介绍的不是一般的汉语基础知识，而是汉语研究的情况。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的那样：“在写本书时，我一直记着一般语言学家和汉语研究专家，希望他们在看本书时有所获益。”所以，这本书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也是有启发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在介绍中国学者在汉语研究方面的成果的同时，介绍了很多国外学者对汉语的研究，如高本汉(B. Karlgren)、蒲立本(E. Pulleyblank)、金守拙(G. Kennedy)、马提索夫(J. Matisoff)、梅祖麟(Tsu-Lin Mei)、雅洪托夫(S. Yokhontov)、古立维奇(I. Gurevich)、藤堂明保、太田辰夫、桥本万太郎等。

这对于开阔我们的眼界，是大有好处的。同时，作者本人也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见解，如要把汉语的历史和现状、普通话和方言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要把汉语和四邻的语言联系起来研究，等等。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方面，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想法。汉语方言是作者研究得最深入的领域，在这方面的精辟见解，就不必一一缕述了。

由罗杰瑞教授这本书，我想到了一个有关汉语研究的问题。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在汉语研究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理应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但研究汉语的不仅是说汉语的人，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在从事汉语研究，而且有的研究得很成功。过去，我们对国外的汉语研究了解得不够；由于不了解，就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自大，往往觉得对汉语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们本族人，而对国外的汉语研究不予重视。这就会妨碍我们吸取国外的汉语研究成果。当然，国内的汉语研究和国外的汉语研究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我们不应该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应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才能使我们自己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罗杰瑞教授的这本书，我最早是从朱德熙先生那里知道的。在此书出版后不久，朱先生就对我说：“这本书写得不错，值得一读。”1989年5月，梅祖麟教授来华，把这本书送给了我，使我有机会把它读了一遍。读后觉得确实写得很好，因此想把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当我把这个意图向罗杰瑞教授说了以后，才知道张惠英先生早已把此书译完了。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当这个中译本出版时，作者和译者要我写几句话。我遵嘱写了如上一些，谨以此祝贺这个中译本的出版。

蒋绍愚

1992年6月于北大畅春园

## 原 序

目前世界上很少语言像汉语那样，它的文献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而不中断；也很少像汉语那样，具有那么多种方言，说汉语方言的人口，要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多得多。这种时间、空间上的广阔领域，对汉语研究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是别的语言所不能相比的。我在本书中，尝试在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方面做概括性的叙述。由于篇幅和个人背景的限制，各章详略有所不同；尽管在这方面有种种不足之处，我希望本书可作为一种比较确实的导论，来介绍汉语的研究。在写本书时，我一直记着普通语言学专家和汉语研究专家，我希望他们在看本书时有所获益。

本书于1979年开始动笔，大部分完成于1980和1981两年，当时我有幸得到两种基金会资助，一是美国学术协会中国文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基金，一是古根汉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基金。我对这两个基金会及时的资助表示深挚的谢意。

在写作过程中，一些同行及朋友阅读了部分手稿，并且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康乃尔大学的梅祖麟教授、北京大学的裘锡圭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王士元教授的意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张惠英女士对第三至第五章提供了相当有用的意见，我也在此表示感谢。我还谢谢黎明光同学帮助编排参考文献。最后我要衷心感谢亨特森（Engenie Henderson）教授，她仔细阅读了全部稿子，同时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正是她的不时鼓励，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不用说，书中的任何观点以及缺点和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 目 录

中译本序	蒋绍愚	( 1 )
原序	罗杰瑞	( 3 )
第一章 导论		( 1 )
1.1 汉语的广泛含义		( 1 )
1.2 汉语的邻近语言		( 5 )
1.3 汉语的类型特征		( 8 )
1.4 汉语的归属		( 12 )
1.5 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联系		( 16 )
第二章 汉语历史音韵学		( 23 )
2.1 汉语的分期		( 23 )
2.2 中古汉语史料:《切韵》		( 23 )
2.3 宋代的韵图		( 26 )
2.4 中古音的构拟方法		( 31 )
2.5 上古音的构拟		( 38 )
2.6 早期官话		( 44 )
2.7 声调的演变		( 48 )
第三章 汉字		( 54 )
3.1 汉字的初始		( 54 )
3.2 秦朝的文字统一		( 58 )
3.3 古代汉字的不同类型及其名称		( 59 )
3.4 汉代文字的发展		( 61 )
3.5 汉以后文字的发展		( 63 )
3.6 汉字的字数		( 64 )
3.7 汉字的适应性		( 67 )



3.8	汉字最近的发展 .....	( 73 )
<b>第四章</b>	<b>古代书面语 .....</b>	<b>( 77 )</b>
4.1	古代书面汉语 .....	( 77 )
4.2	语素和词 .....	( 78 )
4.3	词类 .....	( 81 )
4.4	古代汉语的句子 .....	( 87 )
4.5	一些语法用字 .....	( 89 )
4.6	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修饰语 .....	( 93 )
4.7	名词和动词的修饰语 .....	( 94 )
4.8	名词化 .....	( 94 )
4.9	并列结构 .....	( 95 )
4.10	后代的文言文 .....	( 96 )
<b>第五章</b>	<b>白话作品的兴起和发展 .....</b>	<b>(100)</b>
5.1	研究早期白话的资料 .....	(100)
5.2	名词、量词和方位词 .....	(101)
5.3	代词 .....	(106)
5.4	谓词 .....	(110)
5.5	词序的改变 .....	(116)
<b>第六章</b>	<b>现代普通话 (I) .....</b>	<b>(121)</b>
6.1	现代普通话的形成 .....	(121)
6.2	名称问题 .....	(123)
6.3	普通话语音 .....	(125)
6.4	声母 .....	(126)
6.5	韵母 .....	(127)
6.6	声调 .....	(131)
6.7	重音和语调 .....	(132)
6.8	形态音位学(Morphophonemics)(即连读 音变) .....	(134)
<b>第七章</b>	<b>现代普通话 (II) .....</b>	<b>(137)</b>

7.1	中国的语法研究 .....	(137)
7.2	语素 .....	(138)
7.3	词 .....	(139)
7.4	词类 .....	(141)
7.5	语法范畴的表现 .....	(148)
7.6	汉语句子 .....	(148)
7.7	传统的汉语字典 .....	(151)
7.8	双语字典的兴起 .....	(153)
7.9	中国现代的字典 .....	(156)
第八章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各种方言 .....	(161)
8.1	汉语方言的划分 .....	(161)
8.2	方言演变的历史因素 .....	(163)
8.3	汉语方言间的差别程度 .....	(165)
8.4	方言地理 .....	(166)
8.5	方言的界线 .....	(167)
8.6	北方方言 .....	(168)
8.7	中部方言 .....	(174)
8.8	吴语 .....	(175)
8.9	赣语 .....	(180)
8.10	湘语 .....	(182)
第九章	南方方言 .....	(186)
9.1	南方方言的共同特征 .....	(186)
9.2	粤语 .....	(189)
9.3	客家话 .....	(195)
9.4	闽语 .....	(200)
9.5	闽语和客家话 .....	(210)
9.6	方言划分上的困难 .....	(212)
第十章	语言和社会 .....	(216)
10.1	汉语的各种等级 .....	(216)

10.2	口语书面语的分歧(Diglossia)、双方言 (Bidialectalism)、双语言(Bilingualism).....	(219)
10.3	语言政策 .....	(221)
10.4	现状和展望 .....	(223)
参考文献.....		(225)
译后记.....		(247)

# 第一章 导 论

## 1.1 汉语的广泛含义

世界上很少语言像汉语那样含义广泛。一说汉语，就会想到古代的甲骨文，那是古代圣哲的书面语言，还有唐诗宋词的语言和古典小说中的早期白话；以及现今的标准语和各种方言；而且还有其他没有提到的名义。当你要指的是某个时期的汉语时，这就会产生某种的不便，假如要避免歧义，你就得使用某种复杂的名称——古汉语、文言、中古汉语、早期白话，如果是指现代的方言，还得使用地理名称，如上海方言、福州方言等。在这本书中，我们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汉语，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希望能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区所用的语言都统称为汉语呢？不管怎么说，现代的汉语方言，更像是一个语系；公元前 1000 年的汉语，和现代的标准语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法语之间的差别一样。一般都以为，之所以统称为汉语，是因为从公元前 3000 年一直延续至今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统一体，即使在过去政治分裂的时期，那种文化上一统的单一帝国理想，从没被忘却过。汉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一直是这个文化统一体的最有力的标志。由于汉字不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方言的具体读音，使人感到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就更便于汉语作为政治、文化统一的标志。而过去各朝各代一直使用的书面语言即文言文，变化也极小，这更加强了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种看法。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显然对口语不感兴趣，尤其是语言变化特别显著的地方，这就不

难明白，为什么他们把从语言学的角度那么不同的语言形式看作是同一种语言。西方人称述汉语时，就简单地沿用中国人的说法。

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延续问题，可能没有大疑问，但对现代中国，在这辽阔的境内，又能否看到这同样程度的文化聚合呢？实际上，中国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北京人能听懂的广东话，一点不比英国人对奥地利土话的理解多。尽管如此，广东人总觉得和北京人在文化传统上关系紧密，而英国人对奥地利的文化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情况，可从历史方面来解释，广东和北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属于同一个政体，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相反英国和奥地利，从罗马帝国以来，并没有在政治上统一在一起；而且，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后，英国和奥地利在中世纪时还存在的语言、文化、宗教上的联系也中断了。很可能，由于政治、宗教、文学的目的，废除了中世纪时用作共同书面语的拉丁语，改用不同的地方语言，是造成今天欧洲不同的文化实体的最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没经过这样性质的分裂；到了本世纪，中国开始废弃通用的文言文时，也没有同时废弃这个国家的语言统一体，他们用首都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新的统一的标准语来代替旧的文言文。

还有一个因素也可看作汉语一直作为语言统一体的原因。在欧洲，至少从10世纪末以来，以地方口语为主的书面语言大量出现，接着，很多这种早期书面语言，就成了当代几种最主要语言的基础。在中国没有看到类似欧洲的情形。在唐代（公元618～907）开始出现的白话文学语言，是以北方口语为基础，到了宋（公元960～1279）、元（公元1271～1368）的白话文学中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还没有看到，以非标准方言特别是那些变异最大的东南方言为基础的书面语言，有类似的发展。因此，一般说来，汉语方言缺少历史的根基来成为一种文学语言，并和全国通用的共同语竞争。相反的，现在的书面标准语，则是宋元时期白话文

学语言的继续与直接发展。

这并不是说，非标准的汉语方言从不用来写作；用方言写作的文学是有的。但方言文学作品，一向不被中国文人学士重视。好像也没有看到，在行政和商业的文献中，是用非标准的方言来写的。即使在中国不统一的时期，也没有要确立以某个地方方言为基础的地区的书面语言这种企图。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写地方方言，这是为了向中国的老百姓传道时便于听懂。有些用罗马字写的方言，特别如厦门话，在基督教徒中很受欢迎，但现在已很少用了。

从实用的角度看，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只有两种书面语言，一种是以东周到汉这个时期的古代散文为基础的古典文学语言，一种是从唐朝开始的白话文学语言。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白话的文学语言，都有足够的威望来阻挡方言书面语的发展。

这含义广泛的汉语，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对中国语言学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拿如何正确划分方言之间的界线来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口语中渗透有书面语言的成分，书面文献也流露出当代白话的影响。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一种北京话、书面语言的借词以及其他方言用语的混合物。中国人当然也清楚现代以口语为基础的普通话与较早的书面语言之间的差别，但他们可能不像少数外国观察者那样敏感到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中国的大学生多数能读唐诗，并能领略到唐诗的美，但英语国家的大学生，很少能读懂 *Beowulf* 或至乔叟的作品。

要研究汉语的某个时期或地区的特点，就至少必须熟悉其他时期或地区的汉语的某些特点。譬如研究方言时，就需要对普通话有较好的了解，有时甚至需要对某省或某地区的代表方言有所了解；缺少这些知识，要分清哪些是这个方言特有的，哪些是从普通话中借来的，就会感到很困难。对于早期文献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复杂情形，研究者需要分清传统书面语和新出现的口语。要辨别这些复杂的情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要研究汉语，

就会不断碰到这种复杂的问题。

汉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2000 年中期的商朝（公元前 16～前 11 世纪）。那时留下来的文献就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辞。这种卜辞一般都很短，很公式化，令人疑惑的是，这种简短的书面形式居然和后来周朝的丰富记载紧密相联（Zhou 1956:129）。周朝（公元前 11～前 3 世纪）的语言以钟鼎文的形式保留下来，所作记载内容丰富，所用语言毫无疑问是以后各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的方言之祖宗。

在远古时期，汉语是在比今天小得多的范围内使用。当时的中心是黄河流域的大平原，到了周朝，汉语显然已扩散到边远的地区了。以后的几个世纪，说汉语的人一直向外扩展，渐渐压倒并同化了邻近的民族，最后占领了如今天那样的广阔领域。

像《论语》、《孟子》这两种众所周知的周朝文献，很可能和当时文人的语言没多大差别。那种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严格区别大概是后来才产生的。从汉朝（公元前 206～220）开始，书面语和口语出现分歧，但这种分歧当时还不会很大。在书面语言形成以后，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别就以正比的形式向前发展。到了清代（公元 1644～1911）这种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距离确实已经很大了。

由于书面语言成型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口语，要追溯以后几个世纪口语的发展就有困难。口语成分确实也出现在典籍中，但在文学作品中，一般只是一种零散的流露。口语成分主要出现在流传广泛的佛教故事和轶闻笔记、民歌形式等之中。成熟的白话文学到宋代才出现，并一直发展到现代，中国绝大多数有名的小说都是用早期白话写的。

中国的方言肯定自古就有，但有关的书面记载很少。杨雄（公元前 53～公元 18）的《方言》是方言用词的早期记载，可惜汉字没法让我们对当时的语音有个明确概念。除了《方言》，其他有关方言的资料就很少，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无论是概

论，还是具体的说明。明朝（公元1368~1644）末年，有了几本方言字典，但主要用于注明书面读音，很少提供方言用词的资料，对句法的研究则毫无用处。这种字典的用处不大，就因为其作者缺少语言学的修养。对汉语方言的科学研究，直到本世纪初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赵元任的著作才开始。高本汉对汉语方言的兴趣，只在于方言反映了他称为中古汉语(Ancient Chinese)的读音；赵元任的兴趣则在方言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赵元任亲自进行了对吴语的科学研究，并计划对全国方言进行调查，由于30年代的中日战争，他的计划只完成了几处而已。尽管如此，高本汉和赵元任的研究，为以后的方言调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很多未完成的计划后来由他们的学生完成了。

中国自古缺少方言文献，由这点可以看出，在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有一种通用的共同语，书面语言不用说就是这种共同语。即使是口语，从很多迹象看也有这样一种共同语。因为，在帝国强大、官僚集中制的那些鼎盛时代，政府为了办理事务，必然有一种和书面语相应的共同口语。现在的普通话就来源于这种共同语，它开始于辽（公元916~1125）、金（公元1115~1234）、元（公元1271~1368）这些外族统治的朝代，而这几朝的首都，都在现在的北京地区。

本书中，我们准备从历史的、当代的各个方面来观察汉语。我相信，无论对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无论对普通话还是方言，要正确了解它，就必须参考汉语这个总体。例如要全面理解现代的普通话和方言，就必须对汉语的历史进行考察。同样，对古代典籍中汉语的研究，也只有借助于现代口语的考察，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 1.2 汉语的邻近语言

下面，我们要考察一下汉语周围的一些语言。我们限于那些和汉语邻接的语言，所以，印度和伊朗那儿的印欧语系我们就不



予讨论了。

汉语北接阿尔泰语系的多种语言。阿尔泰语系由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组成，有些人认为（如 Miller 1971），日语和朝鲜语也属这个语系。所有这些语言，都是不同于汉语类型的无声调、多音节的语言。这些语言语法上的共同特征是有一套后缀。古突厥语、古蒙语、古通古斯语都有不同程度的元音和谐现象，日语和朝鲜语也有这样的遗迹。整个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词序都是“主语—宾语—谓语”，因而在翻译时，只要对译词儿，常常不需要变换词序。有关突厥语、蒙语、通古斯语的比较研究已作得很有成绩（Ramstedt 1952, 1957; Poppe 1960）。少数欧洲的突厥语学者对阿尔泰语系的这些说法持怀疑态度，但在蒙古语、通古斯语的专家中，这种阿尔泰语言间的亲属关系是一向被接受的。

汉语的西部西南境是复杂多样的藏缅语系。这个语系由如果不是几百种、至少是几十种语言组成，其中很多语言只用于一些小的部族。用以命名的藏语和缅甸语有长期的书写传统，而其他多数语言过去未有文字，直到今天才有所设计。虽然这些语言同属一系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但有关这些语言的比较研究还刚刚开始。整个藏缅语系的比较研究还很不够，只有几种语言的比较研究进展较快（Matisoff 1970, 1972）。

多数藏缅语专家和汉语学者都认为，汉语和藏缅语是远房亲属关系。下面我们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汉语的南邻是几个不同种族的的不同语言。苗、瑶族属于最靠北的，现在主要分布于湖南的西部、南部，广东、广西的北部，还有云南、四川的少数地区。湖北的西南角、海南岛也能发现零星的苗族人。越南、老挝、泰国境内的苗、瑶族人是最近去的移民。

尽管多数苗瑶语方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存在什么问题，而更广范围的苗、瑶语之间的亲属关系则仍然是有争议的。这方面的比较研究（Chang 1947, 1953, 1966; Downer 1963, 1967; Haud-

ricourt 1954c, 1966; Purnell 1970) 无疑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狭义的泰语, 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关系紧密的一组语言和方言。很可能, 东南亚语言中, 泰语系的比较研究做得最好。李方桂的权威著作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1977) 是这方面讨论的难得的佳作。对于泰语和侗水、Bê 语以及更远的还不太了解的仡佬、拉珈、黎语也有亲属关系这一点, 好像还有一些疑问; 还不太清楚的中越边境地区的拉提拉瓜语和泰语显然也有某种关系。

1942 年, 白保罗 (Paul Benedict) 提出, 泰语和他所谓的卡傣 (包括所有泰语的远亲语言: 黎语、拉瓜、仡佬等语) 从渊源看和南洋诸岛的语言有关系, 当时广泛认为汉泰语的亲属关系, 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借以立论的根据有些很有启发性, 但他的理论还远没有得到普遍的哪怕是一般的接受, 特别是在汉语和泰语学者中还不易被接受。现在, 泰语和南洋诸岛语言的比较研究既然已远远超过 40 年代, 那这个问题就有必要重新进行细致的和系统的探讨。

南亚语系语言的使用地区很广: 印度西北部几种门达语, 阿萨姆邦的卡希, 缅甸的崩龙—佤语和孟语, 印度支那的孟高棉语, 越南的越南语和猛语。现在, 只有其中三种语言佤、布朗、崩龙分布在中国境内的云南省, 沿着中缅边界线一带。下面, 还要提出一些证据, 来说明南亚语言曾经在中国广泛散布, 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汉语的发展有过影响。

南洋诸岛语系分布范围很广, 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语言、萨摩亚和夏威夷的语言, 台湾山区的一些部族讲的语言也属这个语系。说南洋诸岛语系曾在中国大陆使用的说法也有过 (Solheim 1964), 但这种说法总是基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讨论, 语言学上不能证实。

### 1.3 汉语的类型特征

不同语言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词汇和形态的比较可以决定它们是否有共同的来源，为了证明这种亲属关系，就要看词汇上经常出现的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另外一种比较法，是从语音上、形态上、句法上来划分它们的类型，这样做时，同一组类型的语言常会显示出不同的遗传关系。例如，现代汉语和特里奎语（一种墨西哥印第安语）从类型上说都是声调语言，但这两种语言不可能有什么遗传的亲属关系。

在这一节中，主要看看汉语和东亚语言的一般的类型特点。汉语和其他邻近的语言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这部分地是由于历史上的长期接触、互相影响而致，还不能因此而断定它们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亲属关系。

东亚的很多语言，包括汉语，都是单音节语。这是说，这些语言中能表示意义的单位多数是单音节形式。实际上，没有哪个语言，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节的，只是从类型上看，多数表意单位是单音节的。拿汉语来说，各个阶段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形。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多音节词，但这些词是由一串单音节的表意单位组成，如“电话”的“电”、“话”都分别表示一定意义。真正的多音节词如“蜘蛛”、“搭拉”（掉下，宕下）、“疙瘩”，毕竟只是少数。

汉语和其他邻近的语言是声调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调型；这种调型可以是平的，也有不平的（升的、降的、升降的）。声调也是一种音位，和辅音、元音一样，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阴平调是高平调，阳平是高升调，上声是降升调，去声是高降调。例如：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八	拔	把	坝
西	席	洗	戏
溜	留	柳	六

汉语方言及亚洲的其他声调语言，有不同的声调数目，复杂的有七八个声调，有四五个声调的被认为是相当简单的声调系统，少数汉语方言只有3个声调。

中国和东南亚的语言不仅都是声调语言，而且互相有很多相似之处。Gordon Downer (1933) 已指出，汉语、苗瑶语、泰语的声调系统已变得很相像。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越猛语(Thompson 1976)、彝语(Matisoff 1972)。在那个语族中，原来只有几个声调（一般4个）的，后来渐渐增多，主要是受浊音声母，乃至送气音、喉音声母的影响而致。下面我们会谈到，汉语方言中如何产生同样的这种情况。至少从《切韵》(公元601年)开始

（而中古汉语的构拟主要根据《切韵》），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而在公元前1000年的上古汉语中，有很多证据说明那时有复辅音声母，很可能，在少数情况下，还有复辅音韵尾。这种复辅音声母的简化甚至失落，好像已成了影响东亚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语言的一个趋势。孟高棉语、泰语、苗瑶语、彝语都表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当然，也有几种语言还保留有一些复辅音声母。汉语总的来说在这一方面走得最远。很可能，中国北部汉语和阿尔泰语的长期接触，影响了汉语的这种趋势，因为据已经搞清的情况看，阿尔泰语从没有这样的复辅音声母(Poppe 1960)。

从传统的类型学看，汉语一直被认为是孤立型或分析型的突出代表。这是说，汉语的词多数由表意的成分连接而成，语法关系则由词序或独立的语助词来表达，而不是通过词干本身的变化或各种词缀来表达。这种说法是符合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汉语实际的。现代汉语方言中已出现了一些起着语法限定作用的准词缀，但语法关系仍主要通过词序和语助词来表达。汉语和具有复杂后缀的阿尔泰语系不同，是分析型的，这一点和东南亚的语言，特别是苗瑶语、泰语、彝语、越猛语很相似。即使是孟高棉语，也只有很简单的词缀系统，至少可看作是不太突出的分析型语言。

汉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量词和数词、指示词的连用。数词、指示词不能直接和名词连用，现代汉语只能说“三个人”，不能说“三人”。数词、指示词在和量词连用时，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词序，但须连用这总的原则是一致的。日语、朝鲜语中也用量词，这是受汉语的影响而致，即使如此，这两种语言有时候也可以不用量词，并非非用不可。就是在汉语，量词和数词、指示词的连用，也是后来才有的现象，古代汉语中，数词、指示词可直接冠于名词之前。可惜我们对其他语言中量词的这种用法，只了解其现状，不太清楚它们的历史演变。

词序是语言分类时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谓、宾的次序问题对任何语言都是一个基本特征。东亚的语言只有两种，一是宾语在动词前，一是宾语在动词后。阿尔泰语系和多数藏缅语系语言，是SOV的次序，汉语、泰语、苗瑶语、越猛语，孟高棉语都是SVO的次序。从地理上看，中国北部、西部、西南部的语言是SOV次序，中国南部、东南部的语言是SVO次序。这很自然地使人想到，很可能，从遗传的角度看，汉语属于藏缅语系的SOV语言，早在史前时期，受SVO语言的影响，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重要句法特点，是形容词（包括所有的修饰词）和所修饰名词的次序问题。汉语和阿尔泰语系都把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而其他东亚语言则把形容词置于修饰的名词之后。

上述关于语言、形态、句法方面7个问题的讨论，东亚18种语言的不同表现<sup>①</sup>，都列于表I。这18种语言按其亲属关系的远近来排列。从表中可看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常常属于不同的类型，例如越南语，它和高棉语同属东南亚语言，和汉语都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但越南语和汉语在类型上更相似，相反和高棉语的相似程度不如汉语。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就是现代汉语是东亚语言中，唯一的一个把形容词及其他修饰语置于名词之前的声调语言。从地理上看，汉语处于北方无声调、多音节的阿尔泰语系及东南亚有声调、单

音节语言之间；而从类型学看，汉语又正好处于两种类型语言的中间地带。汉语中形容词名词的次序是所有阿尔泰语系的类型特点，而有声调，则是东南亚语言的一大特点。只有对这种聚合情形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考虑这种现象造成的原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地理上的邻近，常常导致某种类型特点的产生或消失。过去，汉语总是被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好像它从来不会受邻近语言的影响。我想，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对头的。在考察了汉语的亲属关系以后，我们就可谈得更深些了。

表 I 亚洲语言的类型特点

	单音节	有声调	单辅音	分析型	量词	形名序	主动宾
现代汉语	+	+	+	+	+	+	+
古代汉语	+	?	-	+	-	+	+
泰(逻罗)	+	+	-	+	+	-	+
黎	+	+	-	+	+	-	+
越南	+	+	+	+	+	-	+
高棉	-	-	-	+	+	-	+
苗	+	+	-	+	+	-	+
瑶	+	+	-	+	+	-	+
书面藏	+	-	-	-	-	-	-
彝	+	+	+	+	+	-	-
景颇	-	+	-	+	-	-	-
马来	-	-	+	-	-	-	+
鲁凯(台湾)	-	-	+	-	-	+	-
蒙古	-	-	+	-	-	+	-
满	-	-	+	-	-	+	-
维吾尔	-	-	+	-	-	+	-
朝鲜	-	-	+	-	-	+	-
日本	-	-	+	-	-	+	-

## 1.4 汉语的归属

从类型上看，汉语好像和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单音节声调语言有紧密的关系，但它的祖籍当在别的地方。19世纪以来，汉语和藏缅语系的某种亲属关系已得到公认，这种假设基于汉语、藏语、缅语及其他几种藏缅系语言之间少量的同源现象。这些同源的典型例子见表Ⅱ。汉语的中古音、上古音用李方桂所拟(1971)；藏语、缅语读音是据标准的转写；加上博多和独龙的读音，是要说明这些同根的语言在较远的藏缅系语言的口语中是如何反映的。②

表Ⅱ所列词例，足以说明汉语和藏缅系这些语言有同源关系。这些词都是日常用语，在文化上也有其独立性，不像是互相借用的结果。它们在语义上的联系也是很清楚明了的，这些词例在语音上的对应也是有规则的，在“我你五鱼无”五个词中，上古汉语、藏语、缅语、独龙语的对应是 a-a-a-a；在“森名年结二”中是 i-i-a-i；在“日犬”中是 i-i-e-i；在“蜉九”中是 ə-u-ui-ə，在“无目”中是 m-m-m-m；在“我五”中是 ŋ-ŋ-ŋ-ŋ；在“你二日年耳乳”中是 n-n-n-n；在“犬苦”中是 kh-kh-kh-kh；在“三森杀”中是 s-s-s-s。

汉语、藏语、缅语的亲属关系是无容置疑的，但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还很差。汉语和藏缅语的语音对应还没有搞得很详细，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起步。这并不是说这项比较研究就没法做，实际上，要确立汉藏语之间更明确的亲属关系，唯一的路径，是辨认出更多的同源词。这好像是双向并行的街道：语音对应规律基于同源词的分析，而同源词反过来又主要是在语音对应规则的基础上，加以辨别和判断，究竟是或不是同源词。汉藏语的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还属初级阶段，两组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则，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确实可靠的同源词，还不能加以总的、全面的叙述。现在的任务，必须发现更多的有联

表 II 汉藏语比较

	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	书面藏语	书面缅语	博多	独龙
我	nguc	ngag	nga	ṇa	aṇ	ṇà
你	ńzjwo:	njag	—	naṇ	nəṇ	nǎ
无	mju	mjag	ma	ma'	—	mà
二	ńzji-	njid	gnyis	hnac	nəy	ǎ-ni
三	sam	səm	gsum	súm	tam	ǎ-sə'm
五	nguo:	ngag	lnga	ṇâ	ba	pəṇ-ṇà
六	ljuk	ljəkw	drug	khrok	—	khlu
九	kəu:	kəgw	dgu	kûi	—	də-gə
日	ńzjet	njit	nyi-ma	ne	—	nì
森	sjen	sjin	shing	sac	—	—
年	nien	nin	-ning	hnac	—	ṇiṇ
名	mjang	mjing	ming	a-maṇ	muṇ	—
目	mjuk	mjəkw	mig	myak	megón	miè
耳	ńzi:	njəg	rna-ba	na	na:-	ǎ-nà
乳	ńzju:	njug	numa	nui	—	nuṇ
接	tsiet	tsit	tshigs	ə-chac	—	tsi
鱼	ngjwo	ngiag	nya	ṇâ	ná	ṇa
犬	khiwen	khwin	khyi	khwe	—	də-gəi
蜉	bjəu	bjəgw	'bu	pûi	—	bè(蛇)
苦	khuo:	khag	kha	kha	ká	kha(鹹)
凉	ljang	gljang	grang	—	gazaṇ	glaṇ
杀	ṣat	srat	bsat	sat	—	sat
死	si:	sjid	shi-ba	se	təy	qi
毒	duok	dəkw	dug	tok	—	—

系的词汇，而这个工作无论汉语还是藏缅语，两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难，要深入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困难必须要加以克服。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历史语言学者感到遗憾的是，汉字并不确切表明读音，古代汉语读音的构拟，是在现代方言及某些古代文献特别是韵书和诗集的基础上艰难地进行的。关于构拟的进展情况将在第二章详细叙述。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进行汉藏语比较时，我们论及的汉语多少是基于推测的构拟，公元前1000年的上古汉语更是如此。从其本质上看，所有语言的构拟，都需要不断的修正。所以，在汉藏语比较时，多数困难是来自我们必须采用的那种不太合适的构拟的古音。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上古音复辅音声母问题；一般都承认，在汉代以前（公元前2世纪之前），汉语有复辅音声母，但对这些复辅音的具体性质，就有很不同的意见。还有一个问题是上古音的元音体系，有的只拟有2个元音，有的多至14个元音，各种体系，互不相同。从现有的各种不同的构拟看，还有很多没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很可能上古音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构拟。尽管有这些不明确的地方，但我们对上古音毕竟还有不少确定的了解，只要我们审慎地去对待，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中，还是可以而且应该使用这些已经明确的关于上古音的知识。

关于中古汉语，我们有可靠得多的根据，在6世纪韵书的基础上构拟的中古音，已看出有了很大的演变，和现代比较保守的南方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已没有太多的差别。中古音已没有复辅音声母，元音系统和上古音也有很大不同。一般人总认为，进行汉藏语的比较，要用一致同意的上古音的构拟，但是，需要记住的是，上古音的构拟是以中古音及现代方言为基础的。现代的方言词，特别是闽语词，在汉藏语比较时会经常用到。要注意别过分信赖那种不联系后代方言的上古音构拟。

汉藏语言划分多数根据 Paul Benedict 的观点 (1972)。他把这个语系大体上分成汉语和藏克伦语，藏克伦语又进一步分为克伦语和藏缅语。先不说克伦语，这个划分本身表明，藏缅语互相之间的关系，要比和汉语的关系紧密得多。在 Benedict 的“一览

表”所提供的证据能说明这总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汉语和藏缅语言没有特别紧密的亲属关系。实际上，多数汉藏语比较学者至少是含蓄地认为，藏语（特别是古代的书面语）是汉语最嫡亲的亲属。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藏语的词汇是整个藏缅语系中记载得最全，而且是最古老的书面记载。缅语在这方面仅次于藏语。这也许可证明，汉语和藏语在词汇上确实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在藏缅语方面也碰到一些困难。藏缅语是一个极其复杂多样的语系。只有少数语言有历史的记载，即使那些一直有文字记载的，到现在我们也常只见到一些不完全的零散的材料，虽然近几十年，大家对这些语言发生了兴趣，但对多数语言研究得很不够。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也不太清楚。Benedict对藏缅语的划分已被广泛接受，分成7组：

- |              |          |
|--------------|----------|
| 1. 藏卡脑里      | 2. 巴兴—瓦尤 |
| 3. 阿博尔—米里—巴他 | 4. 比克钦   |
| 5. 缅彝        | 6. 博多—珈罗 |
| 7. 枯奇—那迦     |          |

在上述7个组中，Benedict认为1，5，7三个组是超级组，包括有多种不同的语言，其他组比较小，像第4组只有一种景颇语。到今为止，大家都认为树形图没法确切表明这些语言之间的内部关系（Matisoff 1978）。显然，藏缅语对于比较语言学家来说，是一种庞大的种类不同的、记录不全的、内部关系不清的语系。因此，要求清楚地说明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关系就是不现实的。当然，说汉藏缅的比较研究在未弄清藏缅语里里外外所有情形之前就没法搞，这也是一利错误。比较语言学的历史表明，大规模的全面的比较常先于较低一层语言关系的具体勾划。

现在，汉语、藏缅语的研究形势喜人。新的资料不断发表，这些语言在历史和构造方面的分析研究因此而更为精确。所以有理由希望不久的将来，上述提到的困难能加以克服，汉藏语言学历史的概貌就可以看得比现在要清晰得多。

## 1.5 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联系

中国不是一个孤岛，周围从来就有非中国人，确切地说是有非汉人。非汉人就是不说汉语的别的种族。即使现在有些散居的种族如满族，他们也说汉语，但我们知道，他们在过去不说汉语。虽然汉语有很多非汉语邻居，但汉语作为一个语言、种族的整体，对外来的文化、语言的影响，有一种强烈的排斥趋势。相反，很多邻国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这么一对照，中国似乎像一个不可渗透的核心，只往外输出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但事实上，在少数情况下也有外来文化的流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在东亚的文化上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杰出代表。它不仅是这个地区第一个有文字的国家，而且向几个周围的民族提供书写的体系。中国边缘地区的语言都有很多汉语借词，而汉语看起来不受外界影响似的。如果因此而认为汉语从来不受周围语言的影响，那是错的。有一点可以看出，公元前2000年中叶之前，中国的文化优势可以肯定不如后来那么突出，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在史前时期，还可能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汉语吸收了外来成分。有人认为，中国后来在东亚居文化盟主地位，所以除了最小的地方就不可能在文化、语言方面受外来影响。这种观点，显然阻碍了对汉语所受外来影响的认真研究。

汉藏语系中讲汉语的祖先在很早时期肯定和讲不同的无亲属关系语言的人民有接触。可惜我们不清楚最早的汉藏语祖先何时迁到黄河流域，也不知道他们到达那里时遇到的是哪类居民。我们可以推测，作为汉语祖先的汉藏语方言，在很多方面，受那个时期相遇的语言的影响。汉语和藏缅语之间在类型上的不同，可能就因为这种早期的语言接触。只有少数汉语词见于汉藏语言这个事实，可能意味着汉语相当大量的词汇是外来词。有些词已看不出来源于汉藏语系，可能来自那些现已消失的语言；这样我

们就无法对这些词进行语源研究。而另外一些词，就是从汉语边界地区的语言中借入，这些语言的子孙至今还活着。下面，我就举些这样的古老借词来加以说明。

汉语称狗有两个词，一是“犬”(中古音 *khiwen*;) 一是“狗”(中古音 *kəu*;)。在口语中，一般都不说“犬”了，只有福建东北部有些方言还说<sup>⑨</sup>。因为“犬”有很清楚的汉藏语来源(见表 II)，我们可以假定汉语称狗本来是说“犬”。从书面看，“狗”早在《孟子》那时已出现，但在汉朝以前，“犬”是基本词汇。古注疏家想从语义上区分这两个词，但他们的解释一般很少根据语言事实。我假定，“狗”是从现在的苗瑶语祖先那儿来的早期借词。H. Purnell (1970) 构拟了原始苗瑶语的“狗”为 *\*klu²B*。Gordon Downer (1973) 已经指出了瑶语“狗”字读音和汉语之间的相似性，但他认为瑶语的“狗”是从汉语借入。而 Haudricourt (1966) 已指出，“狗”字的苗瑶语读音显然和孟语口语 *kla* 及书面孟语 *kluiw* 有关。由此可以看出，Downer 的说法可疑，倒是可以说明汉语的“狗”是从苗瑶语祖先那儿来的早期借词。后来“狗”和“犬”的用法相竞争，“狗”终于赢得了现在作为共同语的地位，“犬”则用于很小的一个范围。

还有一个非汉藏语源的动物名词是“虎”。“虎”的中古拟音是 *xuo*;)，上古音是 *\*xla[g]*。南亚语如现代孟语称虎为 *kla²*，书面孟语是 *kla*，门达里语是 *kula*，这几种语言“虎”字的读音和汉语音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Pinnow 1959:142)。因为汉语“虎”很早就有文字记载，所以一定是从史前时期就借入的。

上面两个词和中国的南邻有关。下面讨论的“獐”(中古音 *duk*，上古音 *\*duk*) 可以追溯到北部的阿尔泰语。称獐的蒙古音是 *tugui*，满语 *tukšan*，鄂温克语 *tukučōn*，拉穆特语 *tu-* 或 *tuyu-* 指生小獐。从阿尔泰语系普遍的读音看，可以排除从汉语借入这些语言的可能。而且，这些北方民族的生活主要围绕放牧这样那样的动物，因此假定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的汉人向以畜牧为

生的北方民族借入这个词就更合理些。汉语的丰富词汇中一些关于牲畜、牧养的词来自阿尔泰语系，是完全有可能的。

古代语言之间互相接触的情况，也可以用地名学加以说明。这样的研究在中国还不多，地名至少可以提供我们关于古代中国人种组成的一点信息。扬子江在古代只叫“江”（中古音 *kang*，上古音 *\*krung*），后来，“江”用来指一般的河流。“江”这个词显然和南亚语有关，如越南语称江为 *sông* (<*\*krong*)，书面孟语是 *krug*，布娄语是 *kroung*，卡土语是 *karung*。这个现象很重要，因为它说明，在最古时期，说南亚语言的人就居住在中国的东南部。这从一些和南亚语肯定有关的闽语词也能得到证实。现在的闽语区，汉以前属于越国的领域；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指出，越国就是讲南亚语的人。闽语称巫为“童”也说明来自南亚语，如福州音 *təiŋ²*，建瓯 *toŋ³*，厦门 *taŋ²*，原始闽语可以考虑作 *\*dəŋ*（或 *\*doŋ*）。与此同源的越南语 *?doŋ²*（和鬼神通话），书面孟语 *doŋ*（鬼神附身时的舞蹈，Shorto 1962），三达里语 *dōŋ*（和婚姻有关的舞蹈），索拉语 *toŋ-*（跳舞）都无疑说明闽语和南亚语早期的关系(Norman and Mei 1976)。

还有一些词可以肯定是非汉语词，但要明确指出它的语源又有一定困难。汉语“象”（中古音 *zjaŋ²*），显然和原始泰语 *\*jaŋC* 有关(Li 1977:168) 但有关的读音还见于孟语口语 *coiŋ*，缅甸语 *chaŋ*，还有彝语和克伦语也有这样的读音(Benedict 1972)。这样，如果说“象”来自这些语言的话，到底哪个语言是发源地，就很难说了。也有可能，“象”来自一种现已消失了的东南亚语言的祖先，就像英语 *opossum*，（负鼠，一种袋鼠，但育儿袋不完全，体长约 26 厘米，尾长约 30 厘米）这个词，就来自已消失的一种美洲印第安语。关于象牙，汉语作“牙”（中古音 *ŋa*，上古音 *\*ŋra[g]*），也有类似的难以判断的情况。“牙”显然和东南亚语如原始泰语 *\*ŋa*(Li 1977:204)、越南语 *ngà*、巴那尔语 *ngəla* 有关，都指象牙。这个词又是出现在两种不同的语系，很难断定到

底是从哪一种语言借入汉语的。Benedict(1975:412)想把“象”和构拟的原始南海诸岛语指象牙的 \*gadiŋ 联系起来，也不能令人信服。

上述讨论的汉语中的几个借词都是很早就有的，有些属于史前时期。汉语虽然没有大量地产生借词，但一直有借词出现。后来的借词很多属于物质文明的某些产品名字。有些从印度、伊朗来的借词，Friederich Hirth(1911)和 Berthold Laufer(1919)都已经指出。我们在这里引用几例加以说明。

葡萄(中古音 buo dāu, 上古音 ba[g] da[g]w), Laufer(1919)认为这个词来自假设的古伊朗语 \*budāwa, 这 and 现代波斯语的 bāda(葡萄酒)有关联。实际上，根据最近的上古音构拟，把“葡萄”的原型拟作 \*bādāwa 来得更好，更接近。

茉莉(中古音 m[u]ât li-), 梵文 mallika。

旃檀(中古音 tsjān dān), 梵文 candana。现代汉语中，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节已失落，而变成“檀香”了。

公元4世纪以后，中国北部边界地区为阿尔泰语系的人所管辖，而且几次入侵并占领了大片土地。人们可能会想，北部中国有几个世纪被阿尔泰语系的人所统治，有可能大量的阿尔泰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实际上，这个时期汉语中的阿尔泰借词却惊人地少。很可能，在阿尔泰语系的人统治的几个朝代，借词在当时是不少，而当这些朝代被推翻、中国人又恢复了统治的时候，这些借词随着就消失了。在元曲中，我们能发现很多蒙古借词(Zhū 1956)，当时这些借词都能听懂，但没有一个词能流传至今。清朝时，一定数量的满语词进入北京方言，只有少数至今还用，如“萨其马”，就是满语 sacima。另如 wādan 挖单，就是满语的 wadan，有一种特别强的地方味儿，很可能最终会注定消失。

很可能，阿尔泰语在汉语的语法里比在汉语的词汇留下了更多的印迹。例如，北京话及某些北方话中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排除式及包括式的区别，大概由于阿尔泰的影响。古汉语中没有这样

的区别，这种区别出现于阿尔泰语系的人统治中国北部的时候。元朝时，蒙语和满语都有排除式、包括式的区别。还有，北方话中 SOV 句型的发展，也可能受只有这种词序的阿尔泰语的影响而致。

总的说来，汉语和日语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汉语对借入外来语有很强的抵制性。多数现代术语都造新词或据义翻译，如“电视、激光、共产党”等。“铁路”是据法语意译而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关于现代技术及西方政治、经济的用词，先定型于日语，后来再进入汉语，日语借用汉字，读音则据1000年前从汉语借入的后来作为日语本土的发音体系（Wang 1957: 528 ff）。而汉语从日语借入这些新名词时，就完全用汉语原有的读音，从日语借入的词如：

日语	汉语
kakumei	gémìng (革命)
bunka	wénhuà (文化)
shakai	shèhuì (社会)
kagaku	kēxué (科学)
keitō	xìtǒng (系统)

虽然有些合成词在古代文献中已出现，日语是用它们来翻译新的西方概念，“革命、文化、社会”这几个词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他日语这类新词都是用汉字的意思来造新词，如“系统、科学”。这种造新词的方法，像英语用希腊、拉丁文的表意成分来造新的术语一样。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语和汉语越来越分道扬镳了。日语增加了借入外来词的趋势，汉语则开始自造新词，不受日语所影响。

汉语也确有一定数量的英语借词，如“马达”(motor)、“雷达”(radar)、“模特儿”(model)、“磅”(pound)、“休克”(shock)，“打”(dozen)等。有时候，一开始用外来音译词，而一旦有了更合适的意译词后，音译词就消失不用了。如早期的“德律风”

(telephone), 后来就被汉语意译新词“电话”所替代了。

我们说汉语对外来词表现了极大的抵制性, 并不是说汉语周围沿中国边界的那些语言也有这种抵制性。几乎所有周围的这些语言, 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这些借词分别表示不同层次, 就是说, 这些借词是在不同的时期借入, 反映了不同时期汉语的不同特点。这些材料对汉语音韵史的研究非常重要, 但多数还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借词。像中国边境的周围语言一样, 它们从过去不同时期的汉语口语中借入一个一个单词; 此外, 除了这种单条词语的借入, 这三种语言都借用了整个汉语的书面语言, 从文字到读音。在读音方面, 这三个国家都用自己的语言习惯来描摹所借入的那个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汉语,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 随着这三种语言本身的发展, 这些汉语借音也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三种汉语的域外“方言”常用来表示汉字在早期的读音, 为中古汉语的构拟提供资料, 这一点在第二章还会谈到。

几百年来, 日语、朝鲜语、越南语都用汉语书面语来作为书面表达的主要工具。这些国家的文人学士, 由于每天接触书面汉语,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语言, 我们说是很大程度, 大概一点也没夸大其词。日语、朝鲜语、越南语, 即使在今天还充满了汉语的成分, 并继续吸取他们语言中丰富的汉语贮藏来创造新词。在远东地区, 汉语起着类似拉丁语、希腊语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像欧洲的拉丁语一样, 即使别的语言已长期不用它作为书面语言了, 但其影响却依然存在, 汉语在文化领域对远东别的语言的影响, 也是这样。



## 阅 读 材 料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是过时了的但还是较好的对汉藏语系的全面概述。)

Bodman, Nicholas C. 1980. *Prot-Chinese and Prot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 Frans Van Coetsam and Linda R. Waugh. Leiden: E. J. Brill. (该文是论述汉语和藏缅语关系的著作中最好最详细的一篇, 方法严密、成体系。)

### 第一章 注 释

- ① 关于这些语言的资料来自: 泰语(Yates and Tryon 1970), 黎语(欧阳和郑 1980), 越南语(Thompson 1965), 高棉语(Jacob 1968), 苗语(苗语调查组 1962), 书面藏语(Jäschke 1954), 彝语(陈 1963), 景颇语(刘 1964), 马来语(Lewis 1947), 鲁凯(Li 1973), 蒙古语(道布 1964), 维吾尔语(朱 1964), 朝鲜语(Park 1968)。其他语言资料据作者个人的了解。
- ② 本书所用汉语中古音引自李方桂(1971)对高本汉拟音的修正, 此外, 非特征的发音符号省略了。上古音据李方桂所拟(1971, 1976)。书面藏语引自 Jäschke(1881)。书面缅语引自 Benedict(1976)。博多音引自 Bhat(1968)。独龙音引自罗(1942)。
- ③ 除了另加注明的以外, 现代普通话词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用的共同语。

## 第二章 汉语历史音韵学

### 2.1 汉语的分期

伟大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在他的不朽著作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 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 中, 把汉语音韵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原始汉语: 最早的书而记载以前的时期

上古汉语: 《诗经》时期 (公元前 1000 年)

中古汉语: 公元 7 世纪的《切韵》时期

近古汉语: 宋代的韵图

早期官话: 明代的《洪武正韵》

当代的中国语言学家, 大概只有少数会完全赞同高本汉的分期。原始汉语这一段, 对限于汉语资料的历史语言学家来说, 由于无资料可凭, 就不算作汉语历史的一个部分。现在西方学者改用 Old Chinese (上古汉语) 和 Middle Chinese (中古汉语)。只有少数学者认为高本汉的宋代韵图那一段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 因为从宋代直到明初的语言最好是看作早期官话的初始阶段。明朝及清初这一段可以看作是中期官话, 19 至 20 世纪当是现代官话。这个修正了的分期也不过是个便于说明的大纲而已。还有, 各个时期, 可能太长了些, 特别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 有些语言学家也提出了修正意见<sup>①</sup>

### 2.2 中古汉语史料: 《切韵》

在这一章, 我只谈大家熟悉的三个音韵史时期: 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早期官话。因为整个汉语音韵史都以代表中古语音的

《切韵》为轴心，所以我们也从这份最重要的史料开始讨论。

《切韵》由陆法言等人于公元601年编成。按声调和韵目排列。关于《切韵》的音系基础，大家已讨论得很多了。在讨论之前，须要指出的是，《切韵》（和所有其他早期的字典）不是当时口语或方言的实际记录，而更像是诵读文献的指南，所以只考虑汉字的读音，这样，若把它看作当时某个地方实际语音的反映，将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因为，要在这韵书所载的几千字中，要分清哪些是口语、哪些是甚至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书面语，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就在《切韵》时代就像现在一样，有很多文白异读现象。清楚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明白，所谓《切韵》音系的基础，实际上就是指哪个地方的书面读音。

高本汉认为，《切韵》代表的是隋代首都长安的方言（1954：212），其他人则认为《切韵》是不同方言读音的混合，而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方言。现在，多数人接受周祖谟的观点。周祖谟认为（1966），《切韵》音系不代表某个地区的发音，而是折衷南北朝后期（公元6世纪）北方和南方的读音。其中，金陵方言是其主要基础，因为金陵在隋朝统一中国（公元581年）以前一直是南朝的首都，无疑是中国文化中心。代表北方文化的读音很可能来自当时北朝的首都邺下的方言。

陆法言的序言告诉我们，那次讨论读音标准的会议是在隋初的长安，他们八人中，有三个南方人，他们当然会以金陵话作为标准音。另有五个人或者在邺下长大，或者小时候住过那儿。序言中说的“南北是非”，肯定就指金陵和邺下读书音的不同，而不是泛指南方和北方。因为当时参加讨论的八个人中，没有一个在长安住过几年，所以《切韵》不太可能反映当时长安的方言。

据陆法言的序言，《切韵》的读音标准主要定于颜之推、萧该两人，而这两人都是南方人。因此，尽管对代表北方的邺下音有所折衷，金陵的读音仍是这本韵书的主要根据。这一点，从当时南北朝后期押韵情况也可得到证实。

《切韵》在后来影响极大，它的成功大概就是因为它基于广泛的方言基础并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读音标准。它很快就压倒以前的韵书，《切韵》序中提到的六种韵书，没有一本完整地保留下来。唐朝时，《切韵》被当作规范的读音标准；而一旦获得了这种地位，就进一步被修订和扩大。这些扩大的不同版本的编者，都细心地保留了陆法言《切韵》的音类，因此尽管陆氏《切韵》的原版失传了，但其中所包含的《切韵》音系，仍然在后来的修订本中保留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修订本是宋朝的《广韵》，公元1011年由陈彭年负责总编而成。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广韵》完整地保留了陆法言《切韵》的音系。由于完整的王仁昫本《切韵》（《刊谬补缺切韵》）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所以过去所有中古语音的研究都根据《广韵》，而且，《广韵》将继续作为中古语音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讨论《切韵》的结构之前，不妨先看看陆法言和他的同时代人对语音的理解。显然，书面文字是他们的出发点，而一个汉字又代表一个音节。所以音节这个概念不必另外考虑。在《切韵》成书之前一世纪左右，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四声被发现了，这四声就叫做平、上、去、入。声调的叫名下文再讨论。还进一步明确了如何才能押韵，从定义看，押韵的音节必须有同样的主要元音、韵尾辅音或元音韵尾。而具有同样声母的音节叫做双声。但是，既双声又押韵的音节并不就是同音字，这就意味着，在声母和主要元音之间，有时候还有某种成分，用来区别不同的音节，这个成分就是介音。在这样一种初步的音节语音学阶段，显然没有关于辅音或元音音段的概念。而没有这种辅音或元音音段的概念，要进行复杂的语音或音韵的分析就会有困难。

不管怎么说，据已有的语音知识，中国人设计了一种可行的注音方法，那就是选双声的字取其声母，选叠韵而且介音也相同的字作韵母和声调，例如“东”这个字，注音时就用“德”的声母，加上“红”的韵母及平声这个声调，就合成“东”的读音。

这个方法就叫做反切，几百年来汉字都用这个方法注音。

《切韵》及其修订本都分五卷。头两卷平声，三四五卷分别是上声、去声、入声。每个声调下再分好多韵，互相接近的韵常排在一起，每个韵的第一个汉字就是韵目用名。每个韵下都有很多同音的小韵，小韵前用圆点或圆圈来标志。每个小韵的第一个字注明反切，表示整个小韵的音，下面的字不另加注。在较早的修订本中，反切注音时作 X，YZ 反，X 表示要注的字，Y 表示声母，Z 表示韵母和声调。《广韵》中，注为 X，YZ 切。“反”和“切”的本义不太清楚。

用现代术语说，音节的起头部分是声母，其他是韵母，韵母又分韵头（介音）、韵腹、韵尾。中古音 sjang，就由声母 s、介音 i、主要元音 a、韵尾 ng 组成。用《切韵》的语音结构看，反切上字表声母，反切下字表韵母和声调。

由于《切韵》时代还没有把音节分为辅音段和元音段的概念，因此在用反切注音时，表示声母时就不是用同一个反切上字，事实上常用两个或更多的字来表示同一个声母。在正常情况下，越是常见的声母，用来注这个音的汉字就越多。韵母的情况和声母一样。还好，反切法体系中，有足以使某些学者能辨认出是同一声母、同一韵母的某些方法。陈澧于1842年出版的《切韵考》就是第一个用反切系联法来归纳声、韵母的。他的方法后来被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进一步修正，但这种系联法最多只告诉我們有哪些声类和韵类，并用哪些字来代表这些声类和韵类。《切韵》及后来的韵书都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些音类的音值。它们只表明形式，不表明实质，这个实质必须从别的方面加以提供。

### 2.3 宋代的韵图

中古音通过《切韵》的声类、韵类以及相对应的方言读音就可以构拟出来，但实际上其他的史料即宋代的等韵图也用上了。韵图把《切韵》的音节排列在表格中，横向表示声母，竖向表示

韵母和声调。要说在韵图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相当成熟的音韵学思想，由于最早的资料和一个佛教徒有关，因而就认为来自印度，好像还有些令人费解。我们还不确切知道，中国这样的音韵研究到底开始于何时，我们所掌握的最早资料，就是守温和尚的 3 页残卷材料，而关于守温，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周祖谟 (1966: 502) 认为，守温不早于 9 世纪，还有些情况说明他可能是更晚时候的人。后来用的一些音韵学术语，在守温 3 页残卷中也已看到，当然它们不像后来的韵图那样排列成表。

现存最早的韵图是《韵镜》和《七音略》。两种都是宋代所作，结构上也相类似，可能基于同一个雏型。《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反映了韵图在后来的演变情况。高本汉错误地把《切韵指掌图》认作是现存最早的韵图并用来构拟中古音。实际上所有后来的韵图都根据《韵镜》而来。我们下面的讨论也多数用《韵镜》的称述，少数术语用相应的现代语言学的名称。

常用来称呼韵图的“等韵”一词，意思就是分成的等韵类。等韵的本旨，就是借用印度语音学理论的概念，来把《切韵》音韵结构系统化。在这么做的时候，当时标准的书面读音已变了很多，在时间上，已比《切韵》晚了两个世纪左右。从代表的地域看，已从金陵沿着扬子江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 (Pulleyblank 1970)。虽然夸大《切韵》与后来唐代的标准语（这两种是紧密相关的方言）之间的差别固然不对，但两者之间确有很大的不同则是事实。当等韵图的作者着手工作时，他们就面对如何折衷《切韵》音类及当代标准读音之间差距的问题。我们只能假定，等韵图的音类根据是唐代的标准读音，而不是《切韵》音类，因为他们没法知道两百年前的金陵方言究竟是如何一种样子。自然，根据不完全的了解、用较晚的术语，去描写一种方言，肯定有困难。对待韵图就如对待《切韵》，也当持一种很保留的态度，等韵图反映的语音当然主要是晚唐的标准音而不是《切韵》音，但如何去对待它，还需要小心谨慎。我想，如果要构拟唐代后期的语音，光依据

韵图而不参考当时别的资料,显然是不够的。我还怀疑,那么成系统的等韵图的音韵结构在某种情况下易于造成一些人为的区别;而且,长期以来受印度甚至是藏语音韵概念的影响,在韵图的音类区分上未尝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看看韵图的声母和韵母。

《韵镜》序言谓有三十六字母,即三十六个声母。守温残卷列三十字母,这代表较早的30个声母,很可能三十字母是受了藏语的影响,因为古藏文也是30个声母。无论是三十字母,还是三十六字母,都和《切韵》声母的数目不符合。这是韵图和《切韵》之间最明显的不同之一。

声母分清浊两类。清音指不带音声母,分为全清(不送气清音)和次清(送气清音)。浊音分全浊,指浊塞音、浊塞擦音、浊擦音,有些根据表明唐朝后期的全浊声母是送气的或是低沉的塞音,就像现在吴语的某些方言<sup>②</sup>;还有次浊,指浊响音,即鼻音、边音、半元音。

《韵镜》及其他韵图把声母的发音部位分成5类:

(1) 唇音。《切韵》只有双唇音,到了宋代韵图,有些双唇音变为唇齿音了。这是韵图所谓的重唇、轻唇。

(2) 舌音。舌音分为舌头(t th d)和舌上两类。高本汉认为舌上音就是腭化了的舌头音,拟作t' t'h d'h;现在多数学者接受罗常培(1931)的构拟,作卷舌音ʈ ʈh ɖ。

(3) 牙音(即舌根音)。这个“牙”指的是大牙,传统的解释是,舌根是在臼齿的近边长出来的。Roy Miller (1975) 已经指出,这个名称显然是因等韵图作者为了选择代表这类声母的例字才用的。“牙”的中古音是ŋa,声母是舌根鼻音。

(4) 齿音。这个“齿”指的是前面的“齿”,以和后面的“牙”相对。这一类包括几种不同的丝音,分为两种:齿头音代表一般的丝音(ts tsh dz s z);正齿音指舌叶音,据Pulleyblank(1970)则作卷舌音。正齿音实际上是《切韵》舌面音和卷舌音两类声母

的混合。

(5) 喉音。这组包括 4 个声母，对于这组音的构拟一直有争议。高本汉拟为ʔ（影母）、x（晓母）、ɣ（匣母）、θ（喻母）。如果为了更切合“喉音”这名称起见，不妨拟h代表晓母，拟ɦ代表匣母，但这种辩论并不重要。

韵图对声母的处理，看出是把这些辅音作为分离的语音单位、可以从音节的其他部分分隔出来的；而且，尽管韵图是在印度语音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而对韵母却没有作同样的分析处理，在韵母的分类上，总把韵母算作一个整体，不作音段分析。结果是，很难说明到底有多少元音音位。由于韵母分类的含混不清，引来了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且一直是中古音研究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方面。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接着再看韵图所反映的韵类。

韵图对四个声调的划分，是完整地来自《切韵》系统而来的。然后进一步把各个韵分成“内转”和“外转”两种。看起来，“内转”和“外转”的称呼可能来自印度语音学术语 ābhyantara（内）和 bāhya（外）；“内”指声音在口内，“外”指声音在口外（Allen 1953:22）。用于元音，低元音 a 是“外”，因为 a 是中性元音，不需在口内特别费劲（Allen 1953:59）。在中国语言学家中一般都同意“外转”指低或开的元音，“内转”指高或紧的元音；这种解释大体上和印度的概念相近。Pulleyblank (1970) 甚至提出，等韵图基于 a 和 ə 的两分法的对立，“外转”韵以 a 为主要元音，“内转”韵以 ə 为主要元音。在后来的《四声等子》中，所有的韵归作十六摄，无论是内转韵的摄还是外转韵的摄，每摄都有同样的辅音韵尾或元音韵尾。

另一个两分法是“开”与“合”。高本汉指出，开合的对立，就是指音节中圆唇介音的有无，这种说法不算错，但多少会引起误解。上面已指出，等韵图作者在分析韵母时还不懂区分音段，介音是音段的范畴，他们不可能注意到介音问题。所以最好把开合的区分看作是音节开头时的一种特征。在多数方言中，有圆唇介



音 -u-, -y- 的音节, 在发声母时都可以看到嘴唇是圆着的。我想, 人们在发 kan (看)、kwan (宽) 这类声音时, 嘴唇的形状不同, 一下就能看出来, 这就是“开、合”分别的根基所在。

等韵图中的“等”很难解释清楚, 高本汉译为 *division*, 其他人译作 *grade*。《韵镜》中每个声调都分作四个等。有的韵只有一个等, 有的韵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等。一般都认为, 三等字有个腭化介音, 一等字没有任何介音。其他有关等的说法就很不同。M. Z. Volpicelli (1893) 认为四个等代表四个主要元音; S. H. Schaank (1897—1898)、Pulleyblank (1971) 都认为四个等代表主要元音前的四个不同介音。高本汉的意见介于两者之间。上述不同的说法, 以《韵镜》“外转二十五开”效摄见母字为例, 列如表 I:

表 I 四等

等	例字	Volpicelli	Schaank	Karlgren	Pulleyblank
I	高	kou	kau	kâu	kau
II	交	kau	kyau	kau	kjau
III	骄	keu	kyiau	kiäü	kiau
IV	驍	kiu	kiau	kieu	kjiau

对四个等的构拟主要看你如何理解这韵图。Volpicelli 和 Schaank 只根据 18 世纪《康熙字典》前头所附的韵图来构拟中古音, 他们完全忽视《切韵》的音类。高本汉把韵图当作理解《切韵》的关键。后来 Pulleyblank 认为, 韵图实际上并不代表《切韵》音系, 而是表现了要以唐朝后期读音为标准音的意图, 这种意图很明确, 很成系统。把韵图看作理解《切韵》的关键, 意味着除了韵图, 就不能解释清楚《切韵》的音类, 这种看法有时会导致对《切韵》音类的错误理解。而按 Pulleyblank 及其他相类的看法, 就可以完全脱离韵图的束缚, 只据《切韵》本身来构拟《切韵》音系。在我看来, 这些宋代韵图的性质还不太清楚, 因此很难无保

留地接受某种说法。尽管如此，在构拟中古音时，韵图仍然有它重要的作用。

## 2.4 中古音的构拟方法

高本汉在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1954) 一书中简要地说明了构拟中古音的方法。高本汉认为中古音就是现存的《切韵》修订本中反映的语音。《切韵》音类多数情况下可用韵图来说明，尽管他也承认《切韵指掌图》根据的是较晚时期的语音，但仍认为它对理解《切韵》有帮助，因为它总比现代方言更接近《切韵》。除了韵图，汉语的域外借音 (Sinoxenic, 是 Samuel Martin 首先使用，专指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读音) 对中古音的构拟也有重要作用。在日本、朝鲜、越南三个国家中，他们都用汉字，有几个世纪之久，并用他们各自特有的方法来读汉字。高本汉也承认，这些域外借音在有些方面有讹误，但在构拟中古音时也至关重要。第三个重要方面当然是中国本土的方言。

构拟中古音的整个过程当然是非常地复杂的，但一些简单的例子也足以说明这种构拟的原则。从《广韵》反切的系联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声母是用 tā (他)、tuō (拖)、tǔ (土)、tù (吐)、tōng (通)、tiān (天)、tāi (胎)、tāng (汤) 八个反切上字代表，这正好和韵图中的“透”母相对应，透母则是一个“舌头”音。“舌头”音中的每个声母在《广韵》中都各自有一套反切上字。而要明确这些声母的具体音值，只有通过比较实际方言和域外借音中的读音。“舌头”音声母的几个常用字的汉语方言读音及域外借音列如表 II。可以看到这些字多数读舌尖塞音、舌面音或鼻音。从这些字的读音看，“泥”母一定是个鼻音。“端、透”母是舌尖（或舌面）清塞音；只有日语汉音把“端、透”两母混为一读，其他方言都是“端”母不送气，“透”母送气。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古音“端、透”的不同就在于送气与不送气之分。“端、透”

表 II 古舌头音声母的今读

	北京	苏州	厦门	广州	汉音	越南	朝鲜
端: 多	tuo <sup>1</sup>	tu <sup>1</sup>	to <sup>1</sup>	to <sup>1</sup>	ta	?da <sup>1</sup>	ta
刀	tau <sup>1</sup>	tæ <sup>1</sup>	to <sup>1</sup>	tou <sup>1</sup>	to	?dao <sup>1</sup>	to
短	tuan <sup>3</sup>	tø <sup>3</sup>	tuan <sup>3</sup>	tyr <sup>3</sup>	tan	?doan <sup>3</sup>	tān
透: 他	t'a <sup>1</sup>	t'b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tha <sup>1</sup>	t'a
天	t'ien <sup>1</sup>	t'ir <sup>1</sup>	t'ien <sup>1</sup>	t'in <sup>1</sup>	ten	thien <sup>1</sup>	ch'ŏn
铁	t'ie <sup>3</sup>	t'ie? <sup>7</sup>	t'iet <sup>7</sup>	t'it <sup>7</sup>	tetsu	thiet <sup>7</sup>	ch'ŏl
定: 弟	ti <sup>5</sup>	di <sup>6</sup>	ti <sup>6</sup>	tai <sup>6</sup>	tei	?de <sup>6</sup>	che
头	t'ou <sup>2</sup>	dy <sup>2</sup>	t'o <sup>2</sup>	t'au <sup>2</sup>	tō	?dau <sup>2</sup>	tu
豆	tou <sup>5</sup>	dy <sup>6</sup>	to <sup>6</sup>	tau <sup>6</sup>	tō	?dao <sup>6</sup>	tu
泥: 内	nei <sup>5</sup>	ne <sup>6</sup>	lui <sup>6</sup>	noi <sup>6</sup>	dai	noi <sup>6</sup>	nae
年	nien <sup>2</sup>	nir <sup>2</sup>	lian <sup>2</sup>	nin <sup>2</sup>	nen	nien <sup>2</sup>	yŏn
农	nuŋ <sup>2</sup>	noŋ <sup>2</sup>	loŋ <sup>2</sup>	nuŋ <sup>2</sup>	nōn	oŋ <sup>2</sup>	nong

与“定”母有清浊对立的读音的只有苏州一处，至少暂时可认为中古音的“定”母是一种舌尖浊塞音。高本汉认为，“定”母及其他全浊声母是送气浊音，现在多数人认为，当时《切韵》的浊音是不送气浊塞音。当韵图中一组声母构拟出来以后，所谓全清、次清、全浊、次浊这些名目的意思也就清楚了，而且也都适用于别组声母。如果只孤立地从韵图看，从《切韵》本身看，这些音类就变得非常抽象，而一比较方言音和域外借音，事情就变得简单明了了。

由高本汉构拟、李方桂(1971)修改的中古音声母见表 III。

韵母的构拟是用同样的方法，韵图的韵类也须和实际的方言读音相对照，然后确定构拟的音值。从韵类看，韵图不能完全区分《切韵》的韵类，所以即使韵图的韵母全部构拟出来了，还必须考虑《切韵》中还有些韵母也需要构拟出来，才能把中古音的全部韵母构拟完。上文已谈到，最难对付的是关于“等”的概念。

表 III 中古音声母

双唇音	p	ph	b	m			
舌尖音	t	th	d	n	l		
舌尖丝音	tɕ	tɕh	dz			ʂ	ʐ
卷舌音	ʈ	ʈh	d				
卷舌丝音	ts	tsh	dʒ			s	ʒ
舌面丝音	tɕ	tɕh	dʒ	nʒ		ʂ	ʐ
舌根音	k	kh	g	ng		x	
喉音	·(ʔ)						jʊ

现把《韵镜》第二十五图四个等的例字的今读音列如表 IV（表中 I, II, III 等的例字是平声字，IV 等的例字用去声字，因为那个平声字不常用，故改为去声的常用字“叫”）。表中“高交骄叫”四个字代表四个等，它们的声母和韵尾都相同，所以，这“等”的区别就在于介音或主要元音，或者同时是介音、主要元音都有不同。

用表 IV 作例，我们可看出高本汉构拟这四个等的想法：(1) 韵尾都是 u。(2) I, II 等的主要元音是 a。(3) 四个等的区别不仅在于介音 i 的有无，还有主要元音的不同（如厦门、广州、越南借音）。(4) I 等没腭化现象，主要元音可假定为后低元音 a [ɑ]。(5) II 等韵前面的舌根音，在有些方言中腭化了，有些方言不腭化。如果主要元音是前元音而不带 i 介音，就很可能是这个情形。

表 IV 四等例字今读

		北京	苏州	厦门	广州	汉音	越南	朝鲜
I 等	高	kau	kæ	ko	kou	kau	cao	ko
II 等	交	tɕiau	kæ	kau	kaau	kau	giao	kyo
III 等	骄	tɕiau	tɕiæ	kiau	kiu	keu	kieu	kyo
IV 等	叫	tɕiau	tɕiæ	kiau	kiu	keu	kieu	kyo

所以这个前元音像是 **a** [a]。(6) Ⅲ, Ⅳ 等都有一个腭化介音, 从日语汉音、越南借音看, 主要元音当是一个央元音。(7) 最难的问题是, 如何分别 Ⅲ 等和 Ⅳ 等。Ⅲ, Ⅳ 等例字在今方言中都混读为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高本汉援引朝鲜借音 (表 Ⅳ 未包括), 例如“见”, Ⅳ 等字, 朝鲜借音读 **kyŏn** [kʲən]。而 Ⅲ 等的“建”, 朝鲜借音读 **kŏn** [kən]。基于这样的情况, 高本汉提出, Ⅳ 等韵有个长的元音介音 **i**, 而 Ⅲ 等韵则有一个较短的辅音性的介音 **i**。这元音介音 **i** 在朝鲜借音中有些时候保留下来了, 而那个 Ⅲ 等韵中的辅音性介音 **i** 则失落了。最后, 由于《切韵》的三四等韵是不同的两个韵, 所以就要用主要元音的不同来区别这两个韵。高本汉提议四等韵有个较强的腭化元音 **e** [e] 作为主要元音, 和那个腭化介音 **i** 相配; 这样, 三等韵就有不那么腭化的主要元音 **ä** [ɛ] 去配那个较弱的腭化介音 **i**。这么分析的结果, 效摄见母四等例字的中古音构拟就如下:

等	Ⅰ	Ⅱ	Ⅲ	Ⅳ
拟音	kâu	kau	kjäu	kieu

解决了这个“等”的性质, 对构拟《切韵》韵母会是个极大的帮助, 但至今还没有方法来解决它。把《切韵》韵母分成等还不难, 但有些时候《切韵指掌图》把《切韵》中不同的韵混同为一, 说明这些韵已经合并, 找不到根据把它们区别开。对这种问题, 高本汉一般在他用以构拟的一两个方言或域外借音中, 能找到一点可以加以区别的特征来。有两个韵之、脂他没法区别, 就构拟了两个不同的 **i**, 李方桂(1971)提出改为 **i** 和 **ĩ** 的对立, 以与上古音的不同来源相当。同样, 高本汉把另两个韵佳、夬都拟作 **ai**, 李方桂改作 **ai** 对 **aĩ**。

高本汉拟的中古元音体系非常复杂, 有 16 个元音, 4 个介音 (其中有两个可作元音韵尾)。这四个介音是 **i**, **ĩ**, **u**, **w**, **i** 和 **ĩ** 的区别上文已谈了, **u** 和 **w** 用于台口韵。由于他的转写体系和

现代语音学家所用符号不同（高氏主要用 J.A. Lundell 的瑞典方言字母），我们逐一加以简单说明，国际音标则用音标括号标出。

(1) i, 前高不圆唇元音 [i]: (j)i, (j)wi. 上文已指出，这代表两个不同的韵。高氏用 j 作唇音、舌根音、喉音声母后的介音，其他声母后则省略 j 介音。

(2) e, 前半高不圆唇元音 [e]: iei, iwei, ieu, iem, iep, ien, iwen, iet, iwet, ieng, iweng, iet, iwek.

(3) ě, 是短的 [e]: iěu, iěn, iwěn, iět, iwět.

(4) ɛ, 这也是 [e]，高氏用以表示滑移的作用，在 i 之前或后作为韵母的主要元音。(j)ɛi, (j)wei, (j)ie, (j)wie.

(5) ä, 前半低不圆唇元音 [ɛ]: iäi, iwäi, iäu, iäm, iäp, iän, iwän, iät, iwät, iäng iwäng, iäk.

(6) ɛ, 前半低不圆唇元音 [æ] (低于 e): iɛn, iɛt, ɛng, weng, ɛk, wek.

(7) a, 前低不圆唇元音 [a]: a, wa, ia, ai, ai, wai, wai. au, am, ap, an, wan, at, wat, iang, iwang. iak, iwak.

(8) ǎ, 是短的 [a]: ǎi, wǎi, ǎm, ǎp, ǎn, wǎn, ǎt, wǎt.

(9) ə, 不圆唇央元音 [ə]: iəm, iep, ən, uən, uet, iən, iuən, iət, iuet, əng, wəng, iəng.

(10) ɐ, 短的 [ə] (不作主要元音): ɐu, iɐu. 这些韵母中，u 是主要元音。

(11) ɐ, 半低不圆唇央元音 [ɐ]: iɐi, iwɐi, iɐm, iwɐm. iɐp, iwɐp. iɐn, iwɐn, iɐt, iwɐt, ɐng, wɐng, iɐng, iwɐng. ɐk, wɐk. iɐk.

(12) u, 后高圆唇元音 [u]: iu, ung, iung, uk, iuk.

(13) o, 后半高圆唇元音 [o]: uo, iwo, uong, iwong,

uok, iwok。

(14) â, 后半低圆唇元音 [ɔ]: âng, âk。

(15) â, 后低不圆唇元音 [ɑ]: â, uâ, iâ, iwâ, âi, uâi, âu, âm, âp, ân, uân, ât, uât, âng, wâng, âk, wâk。

(16) â, 短的 [ɑ]: âi, uâi, âm, âp。

四个介音如下:

(1) i, 短的辅音性腭化介音 [j]。李方桂就用 [j] 作这个介音, 下文还沿用这个 [j]。

(2) i, 比 [j] 长的元音性腭化介音, 也可作元音韵尾。

(3) w, 短的元唇后元音 [w], 用作合口介音。

(4) u, 圆唇后元音, 比 [w] 长, 更元音化, 用作合口介音。

对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元音系统, 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性意见。赵元任对其中对立的成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有的被接受了。Samuel Martin (1953) 作了一个高氏构拟音的音位分析, 把元音数目减至 7 个。Martin 把高氏构拟及赵元任的修正意见, 作为中古音的有根据的拟音, 从音位分析出发, 加以音位化, 使我们对中古音的认识有所进步。李荣(1952)、董同龢(1954)进一步对高氏构拟进行检验并提出修正。Tōdō Akiyasu (1957) 根据上述几种意见及日本学者的看法, 又进一步加以修正。1962 年, Edwin Pulleyblank 作为研究上古音的第一步, 提出了他对中古音的构拟。尽管这些修正和高氏所拟, 在解释上或总体上, 有很多方法上不同, 但从高氏看来, 这些意见和高氏所拟如有不同的话, 也是分歧不大。这些不同, 是由于技术上的改进, 如更深入的分析资料, 就会揭示比高氏提出的更多的特征; 而且对于那些难于区别的韵的有关资料到后来也能看得多了一些了; 那些佛教用语的中文译写和藏文、婆罗米字母 (Brahmi)、维吾尔文等拼音译语的对照, 也对后来的构拟带来方便。使用这些材料并不是对高本汉的方法提出怀疑, 至今公开出版的修改意见, 实际上都可看作高

本汉及其前辈那种传统方法的进一步运用的结果。

Pulleyblank (1970)、Miller (1975)两人对这个传统的方法提出了很多问题。Pulleyblank 第一个反对直接根据韵图来构拟《切韵》，理由是这最早的韵图也已在两百年以后，根据的又是另一个地区的方言标准。根据他的意见，韵图的音应该先独立地构拟出来，然后再用它和其他有关材料一起构拟《切韵》音。Miller 的意见更激进，他认为这种传统方法是这儿拣点儿那儿拣点儿的折衷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一些因素和直觉的甚至武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他觉得，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术语多选例字作名目，看不到这一点，就常用哲学的或神秘的猜测把它搞复杂。他认为，1975年之前的各种构拟，其多数价值不大。虽然在很多细节方面我不完全赞同 Miller 的批评，但在清醒地去重新考虑古音的构拟这一点上，我想他的意见是有用的。高本汉的方法看起来已经得到了很充分的运用，如要再一步使用这种方法就会无休止地纠缠于一些老问题而不见得有什么真知灼见。如要把汉语历史语言学从学究式讨论中解救出来，在方法上加以重新估计是必要的。尽管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我还是愿意提供一些看法：

《切韵》本身可作为中古音的主要资料，是其他各种资料的核心。尽管有人不同意，我但高氏的构拟基本上是韵图的音类。《切韵》是基本资料，韵图是根据后来别地方言对《切韵》所作的解释。我们没有必要非接受韵图的解释不可。韵图比起现代方言、域外借音、古代译语并无更大的价值。其价值在于它是《切韵》早期分支，但它的含意并不太明确，因而对它的解释当然只是推测而已。中国本土的方言比域外借音更重要，域外借音只是邻国所用的交际媒介，服从于他国语言内部发展的历史规律。域外借音只有在经过进一步研究以后才可用来解释早期的汉语。汉语方言是中古汉语的直接后代，应该作为构拟古音的主要依据。其他邻近语言如越南语、泰语、苗瑶语及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词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古代佛教及其他方面的译语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最



后，在方法上要更自觉和严谨，清楚认识我们所做的事，所要达到的目的。

汉语历史语言学中另一需要注意的方面，是要注意各个时期书面成分和口语成分之间的不同。口语读音可一直追溯到原始汉语时期，书面用语有些已不复用于口语，但在书面还用到，有时重新进入口语。这种历史上的书面成分和口语成分的不同，和现在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是两回事。在汉语历史上，某个词曾是书面用语。后来也有可能变成口语词，就像英语中，某些原是书面语的拉丁词，现在用作口语。《切韵》中多数词不是当时口语的实际反映，而是文献中流传下来的读书音。当然，其中有些读书音和当时的口语音有相合的情况，但《切韵》没有指明哪些是相合的，哪些有异读。汉语的历史音韵学迄今为止一直是研究编在传统字典中的书面用语在各个时期的演变。其实，另外一种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从现在的方言出发，构拟它的早期读音。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把一些词的古今演变勾勒清楚，并可避免过去构拟中的人为的不自然性。这样做，还可以把保留在书面文献中的某些口语语源考证出来，这种考源工作还做得很少。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对汉语史中的纯书面文献有更好的认识，使用起来就会有所保留。

## 2.5 上古音的构拟

上古音的构拟，依据几种不同的资料，不像中古音主要解释《切韵》。大约400年前，明末的福建学者陈第(1541—1617)已经开始了上古音的研究。在陈第之前，中国学者缺乏关于语言演变的概念，当他们看到不同时期押韵不一致时，他们就或者认为是古人押韵标准不严，或者认为是押韵标准有所变化，而不知道是语言本身的变化。只有陈第看到了语言演变这一点。他概括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代诗人的语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内部一致的体

系，只要方法严谨这个古代诗词就能用于研究古代音韵。

《诗经》是古代最重要的诗集，是公元前6世纪时的无名氏所作。所收入诗的时期很不同，早晚相差有500年之久的。尽管时期不同，但《诗经》押韵体系基本一致。《诗经》韵与《切韵》相比，显然有很多不同。清朝学者开始研究古音时，就把《诗经》韵和《切韵》相比，以此来决定《诗经》的押韵体系。他们把诗中通押的字归为一个韵部。《诗经》的一个韵部和《切韵》中的几个韵相对，或者反过来《切韵》的一个韵分属《诗经》的几个韵部。例如《切韵》唐阳韵属《诗经》阳部韵，而《切韵》支韵就分属《诗经》几个韵部。

清朝有很多著名学者，都用陈第的原则，对《诗经》韵部进行严整的分析。顾炎武(1613—1682)、江永(1681—1726)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古音研究奠定了基础。顾炎武提出，古音一个韵部可能由《切韵》的几个韵组成，《切韵》麻韵字就分属古音鱼部和歌部。他还看到，《切韵》中的入声字，在《诗经》中可以和舒声字相押。江永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分出了更多的《诗经》韵部。

清朝最伟大的古音学家当然是段玉裁(1735—1815)。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古音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段氏之前，人们研究古音只限于根据《诗经》。段氏第一个看到字形对公元前1000年的古音的研究的重要作用。汉代《说文解字》所载的字，80%以上是形声字，可以据此进行语音分析。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举例如表Ⅶ，所标音为中古音。

段玉裁观察到，同声旁的字，一般说来，在《诗经》中就能押韵。这是当时一个最大的发现，因为原来只能据《诗经》中用来押韵的字归纳韵部，而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字归并到所属的韵部。段氏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第一个把声音相近的韵部排列在一起，声音的相近主要从押韵时混押的现象及某些声旁所表示的例外读音来判断。与段氏同时的另外两个朴学家是孔广森(1782—1786)

表 V 形声字

形声字	形旁	声旁
狐 ywa	犭	瓜 kwa
楓 pjung	木	風 pjung
伯 pok	亻	白 bok
湖 yuo	氵	胡 yuo
紡 phjwang	糸	方 pjwang
雞 kiei	隹	奚 yiei

和王念孙(1744—1832),对古音韵部提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清代古音学集大成者当推江有诰,江有诰别的方面不大为人所知,死于1851年。江氏的古韵分部,经后代学者略加补充,就是现代学者据以构拟上古音的基础。

清代朴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古韵分部感兴趣,只有钱大昕(1727—1786),对上古音的声母有两大发现,即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除了钱大昕对声母的两大发现以外,20世纪学者对上古音声母的构拟都据高本汉的分析。古韵部的分别和声母没有什么关系,分析声母的唯一依据就是形声字。高本汉1923年出版的 *Analytic Dictionary* (分解字典) 就用形声字材料假设古音声母。高本汉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原则,那就是同声旁的字,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这一点后来的学者也都赞同。当这个原则解释不了某些声母的复杂情况时,高本汉就提出是复辅音声母的问题。这样一推理,高本汉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即中古音虽只有单辅音声母,而上古音则有复辅音声母。现在,谁也不怀疑上古有复辅音声母,而如何确切构拟,却仍有争议。

上古音的全面构拟始于高本汉,以其确定的形式载于1940年发表的 *Grammata Serica*。如同中古音一样,上古音的韵部和声母,是抽象的分类,而无具体音值。高本汉构拟时别无办法,只好用上古音和他构拟的中古音相比较,这样,上古音是基于中古

音构拟之上的一种构拟，是一种二重的抽象。这种高度的假设性，自然会引来这样那样的批评。其中最早也是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董同龢，他把批评意见及自己的构拟都发表于1948年的《上古音韵表稿》中，董氏之后，王力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构拟，载于1958年的《汉语史稿》中。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一位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Sergei Yakhontov)对上古音的构拟发表了几篇很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几乎同时，Edwin Pulleyblank(1962 a, 1962 b)以其对上古音的新的难以驳倒的意见和方法，进入了这个领域。到此为止，可以说，高本汉的上古音构拟已经行不通了。

李方桂1971年的《上古音研究》是当今最全面、最新、内部一致的上古音构拟。他虽然没像高本汉一样出版一本Grammata Serica那样的上古音字典，但李氏的构拟非常系统和全面，只要熟悉他的体系，就能以此构拟出其他他没列举到的汉字。无论蒲立本还是雅洪托夫，都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完备状态，别人要运用蒲立本或雅洪托夫的体系，都感到有很大困难。

现在我们把李方桂1971年发表1976修订的《上古音研究》简单地介绍一下，他构拟的上古音声母比中古音声母要简单得多，见表Ⅵ。

表Ⅵ 上古音声母

p	ph	b	m	
t	th	d	n	
ʈ	tʂ	dz		s
k	kh	g	ng	h
kw	khw	gw	ngw	hw

李方桂在构拟上古音声母时，根据高本汉同声旁的字发音部位相同的原则，在有些情况下就必须构拟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指同一个声旁，可以有不同的谐声的情况，见表Ⅶ。

表 VII 上古音声母的演变

	中古音	上古音
1. 龍	ljwong	*ljung
聾	lung	*lung
龐	hŋg	*brung
寵	tshjwong	*hljung
2. 余	jiwo	*rag
途	duo	*dag
除	djwo	*drjag
徐	zjwo	*rjag

表 VII 中两类例子，第 1 类词上古音都有同一个发音部位的 l 或 r，第 2 类词上古音都有同一个发音部位的 d 或 r。中古音声母的复杂现象，都是由于介音的作用造成。李方桂拟了 3 个介音。腭化介音 j，卷舌介音 r，还有一个 l。j 使前面的舌尖音腭化：\*tj>tś, \*dj>ǰ。\*rj 这个复合的介音，则可引起舌根音、喉音的腭化：\*krj>tś, \*hrj>ś, 等等。介音 r 的作用很多，一方面造成中古音中两套卷舌音声母：\*tr>tʃ, \*tshr>tʃ 等，另一方面还影响元音的发展，见下文，介音 l 在中古音中失落，对声母、韵母都没留下什么影响：\*klau>kau。

除了三个介音外，李氏还构拟了两个辅音前缀 h 与 s。严格地说，h 只用来表示后面的鼻音或边音是清音；s 可出现在几乎所有辅音的前面，中古音中还保留着：smang>sāng, \*shwit>siwet。由 h 和鼻音、边音组成的复辅音，其演变是：\*hm>x, \*hn>th, hng>x。

李氏上古音体系中辅音韵尾很多。中古音中 6 个辅音韵尾 -p -t -k -m -n -ng 李氏认为在上古音中也有。除了这些，李氏还拟了圆唇舌根辅音韵尾；根据高本汉的方法，也拟了一套浊辅音韵尾，因为中古音中很多开音节字，在上古音中和闭音节字相谐

声；中古音中有时遇到的开音节字和闭音节字押韵的情况，在《诗经》中也可看到。最后，李氏还提出，歌部字有个 -r 韵尾。这样构拟的结果，上古音中就没有开音节韵了，但李氏认为，这是对有关资料作全面分析后的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由于声母、介音、辅音韵尾构拟得比较复杂，李氏就可以把他的元音系统简化，他拟了 4 个元音：i, u, ə, a。每个韵部有一个元音和韵尾辅音。鼻音结尾的阳声韵只有一个韵尾辅音韵尾；非鼻音结尾的阴声韵，一般同时有一个清辅音韵尾和一个浊辅音韵尾。传统的 22 个韵部及李氏的拟音见表 VII。

表 VII 上古音韵部

1 之 ək, əg	13 蒸 əng
2 幽 əkw, əgw	14 中 əngw
3 宵 akw, agw	.....
4 侯 uk, ug	15 東 ung
5 鱼 ak, ag	16 阳 ang
9 支 ik, ig	17 耕 ing
7 歌 ar	——
8 祭 at, ad	18 元 an
9 脂 it, id	19 真 in
10 微 ət əd	20 文 ən
11 缉 əp	21 侵 əm
12 叶 ap	22 谈 am

犹如中古音声母的复杂由介音造成一样，中古音元音的复杂，也由上古音的介音影响而致。介音 j 经常腭化以下的元音：\*djan > ʒjān, \*ljar > liě, \*kjagw > kjäu 等；介音 r 常使后面的元音央化和前化：\*sran > šān, \*krak > kok, \*pruk > pāk 等。介音 l 对元音无所影响：\*klak > kâk。另一个影响到中古音元音的因素，是

圆唇舌根辅音韵尾对央元音韵母的作用： $*kək w > kɯcɿ$ ,  $*tjəŋ w > tɕjəŋ$ 。

李氏所拟上古音中，复辅音声母较多，元音数目较少，这和中古音不同，中古音没有复辅音声母，而有很多不同的元音。这种发展，和第一章中谈到的亚洲单音节声调语言类型的趋向一致。当我们说李方桂及其他人关于上古音的构拟，在总的类型上看是有道理的，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些具体细致的音值等描写，也都是严格可信的。我们不妨说，现有的各种关于上古音的构拟，根据现有的借以构拟的材料看，是一种方便的但是属于高度假设性的音韵说明。判断这样那样的构拟体系，主要看其对有关材料是否是一致的简单的全面分析。总的看来，李方桂的构拟就是现有构拟体系中比较全面一致而且简洁的一种体系。

## 2.6 早期官话

唐期末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宋期的首都开封，位于华北平原，河南省。12世纪到14世纪，中国北部陷于外族统治，先是女真族，后是蒙古族。这两朝阿尔泰君主的首都都在今北京附近。这样，反映这个新的政治现实的共同语便应运而生，这个新的共同语以东北部低地方言为基础，和后唐的西北方言很不同。确实就在外族统治的金、元时期，一种新的几乎全用口语的白话文学兴起了。那时的曲、散曲，押韵都根据口语音，而以前的诗、词押韵则根据以前的读音标准。在14世纪早期，曲作家周德清编了一本曲韵《中原音韵》。周把6000左右字分为19韵，每韵用两个例字命名。每韵再分好多同音字组，但不用过去的反切注音。虽然排列得很简单，但要构拟《中原音韵》音系还是比较好办的，只要通过比较现代的官话方言，偶尔也可参照一下《切韵》，就能办到。实际上很多学者对《中原音韵》作了构拟(Zhào 1936, Lù 1946, Dǒng 1954, Todo 1957, Stimson 1966)。虽然各家构拟不尽一致，但这些只是解释上有所不同。并

无实质性的不同。

从汉语音韵历史看,《中原音韵》反映的是近代的语音,《切韵》时代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演变为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其演变方式也像现代多数北方方言一样,平声读送气,仄声读不送气。还有一点也和北方话一致,即入声已消失。现代北方话和《中原音韵》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大概要算 -m 尾韵和 -n 尾的分合问题,《中原音韵》保留 -m 尾韵,现代北方话 -m 尾、-n 尾合并为 -n 尾韵。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几乎完全撇开了过去的传统。而《切韵》的各种修订本,尽管已不合当时的语音体系,但依然保留《切韵》原本的音系,没作改动。汉语韵书之类著作,一般都落后于口语发展的实际,这种保守性使我们很难确断某些语音变化的时期。《中原音韵》则是一个唯一的例外,周德清基本上没照顾以前韵书、韵图的传统,而是按实际语音确立音类。金、元两朝外族统治就是削弱传统束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开始接受外界的各种新的影响了。从文化上看,那时新的音乐形式、白话文学也出现了,周德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了他的音韵学上的成就。他的超脱传统和当时有利于不拘传统的白话文学兴起的其他社会因素密切相联。

董同龢(1954)构拟的《中原音韵》声母、韵母见表 IX 和表 X:

表 IX 《中原音韵》声母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k	k'	ŋ		x	
ʔ					



表 X 《中原音韵》韵母

i	a		o	ai	ei	au	ou	iu
i	ia	ie	io	iai	iei		iau	iou
u	ua		uo	uai	uei		uau	
		ye						
an	ən		aŋ	əŋ	uŋ	am	əm	
ian	iən	ien	iaŋ	iəŋ	iuŋ	iam	iəm	iem
uan	uən		uaŋ	ueŋ				
	yən	yen		yəŋ				

早期官话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就是八思巴(’Phags-pa)文。这是 1260 年一个叫八思巴的西藏喇嘛,受忽必烈皇帝的旨意,创造一套新的字母来代替蒙古文过去借用的维吾尔字母。八思巴新文字,大部分是藏文字母的直接改写,不只用来拼写蒙古语,也用来写汉语及蒙古帝国的其他语言。不少关于汉语的八思巴文资料流传了下来,主要是一些碑刻,还有几种《百家姓》的不同版本,以及《蒙古字韵》这小册子。龙果夫(Dragunov)、罗常培、蔡美彪、桥本万太郎等人对这些资料作了一番研究(Dragunov 1930, 罗 1963, 罗和蔡 1959)。八思巴文反映的语音很多地方像《中原音韵》,但也有一些不同,令人迷惑不解,那就是《中原音韵》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只有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的对立,而八思巴文在多数情况下保留《切韵》和韵图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而且,当我们用藏文标准转写法来描写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浊音这三套塞音塞擦音时,中古音的那套浊塞音则相对于藏文的不送气清音。这使人一眼就明白,八思巴文首先是为书写蒙文而设计的,其次才用于汉语,中古蒙语只有两套塞音:不送气弱音和送气强音。藏文用 b, d, g 来转写蒙语的不送气弱音这套塞音,用 ph, th, kh 来写蒙语的送气强音那套声母。蒙语这两套声母和《中原音韵》中送气清音及不送气清音两套塞音声母很接

近，所以，用八思巴文写早期官话时，b 用来描写汉语的不送气清塞音 [p]，ph 用来写送气塞音 [p']，迷惑也就自然消失了。

当用八思巴文转写汉语，受韵图音系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为的对立。八思巴文不标汉语声调，这可能使制订者觉得不同的音节太少，为了补救这一点，就恢复韵图中的一些语音区别，而实际口语中，这种区别已不复存在。中古音中的那套浊塞音浊塞擦音，在 13 世纪时的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用藏文转写就是不送气清音 p, t, k, . 除非我们假定，八思巴所记汉语是当时某个方言的忠实代表，或者那些转写者完全明了当时中古音和 7 世纪藏文（那时藏文刚刚确定）的实际读音，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八思巴文的这套浊音字母。由于这种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八思巴文中那套汉语浊音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不反映元朝汉语的实际读音。不管怎么说，虽然八思巴文的汉语资料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如能批判地对待，还是能提供我们关于元朝北方汉语的不少资料。

关于早期官话，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中原音韵》和八思巴文资料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现把两者间的不同列如表 XI③。

表 XI 《中原音韵》和八思巴文中的早期官话

	《中原音韵》	八思巴文		《中原音韵》	八思巴文
百	pai	bay	郑	tʃiən	čiq
家	kia	gya	王	uaŋ	uaŋ
姓	siəŋ	siŋ	冯	fuŋ	huŋ
蒙	muŋ	muŋ	陈	tʃ'ien	čin
古	ku	gu	褚	tʃ'iu	č'eu
文	vən	vun	卫	uei	•ue
赵	tʃiau	čev	蒋	tsiaŋ	jyaŋ
钱	ts'ien	jén	沈	ʃiəm	šim
孙	suən	sun	韩	xan	ran
李	li	li	扬	iaŋ	yaŋ

## 2.7 声调的演变

现代汉语方言都有声调，但不能因此说汉语方言从来都有声调。现代有些有声调的语言如越南语，就是从无声调的语言发展而来。在探讨上古音是否有声调之前，有必要先看一下中古音的情况。

从《切韵》我们可以知道，中古音有4个调类。入声由辅音韵尾 *p*, *t*, *k* 组成。过去一般都认为，《切韵》的平、上、去，像现代方言一样，是由元音韵尾或鼻音韵尾组成，各自有它不同的调型。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就把平上去入这4个名称看作是4个声调的具体描写，并且解释为：平声是横调舒收，上声是升调舒收，去声（可能）是降调舒收，入声促收。对于这种似乎一看就明白的解释，有两个地方不好理解，首先，声调的名目，像音韵学中其他传统术语一样，都以这个类的例字为名目，因此不能把取名用字看作是主要用于具体描写，其次，高本汉关于《切韵》的声母，韵母，都参照汉语方言及域外借音的实际读音，而对于声调的调型，他没法用方言或域外借音来证实，因为域外借音中，除越南语有声调外，日语、朝鲜语都无声调。而从方言的读音看，同一个调类，其调值在各个方言中千差万别。因此，多数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学家都认为，中古音各个调类的演变是非常清楚的，而要确定其调值，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还没有这种技术。人们可以精确地分析古调类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合情况，但没法具体描写它们的实际调值。

在声调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情况是，中古音的4个调类，各分成阴阳两类。阴阳两类的分别是根据声母的作用。浊音声母的调值显然低，清音声母的调值显然高，因此各个调类据声母的清浊各分阴阳两类，原来4个调类就变成8个调类。只要浊音声母没清化，这种阴阳调类的分别就可看作是同音异读。如果浊音已消失，而声调仍分阴阳，那就是音位上的不同了。高本汉看到现代方言的

声调都从 8 个声调演变而来，所以他认为《切韵》时代，4 个声调已各分阴阳，如果是这样，那么《切韵》时代阴调类、阳调类的区别并非音位上的不同，因为当时还有浊音，如果说《切韵》时代是否有阴调类、阳调类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到了晚唐，肯定已经有了这种阴阳调类的分裂，9 世纪的日本和尚安然对一个汉语方言的描写，正好说明这阴阳调类的区别。

阴调类、阳调类的划分完全根据声母的清浊。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现代方言中的响音声母（鼻音、边音、半元音）有时跟浊音跑，有时跟清音声母跑，各个调类都有不同的情况。传统的 8 个声调的名称及其数码代号列如表Ⅱ。

表 Ⅱ 传统的 8 个声调

	平	上	去	入
清音声母	1 阴平	3 阴上	5 阴去	7 阴入
浊音声母	2 阳平	4 阳上	6 阳去	8 阳入

从以后的章节可看到，只有少数方言保留这 8 个声调不变，多数方言已合并了一个或更多的调类，那种一个调类分裂为阴阳两个调类的越来越少了。

阴阳共 8 个声调的情况，产生得比较晚，而《切韵》平上去入 4 个声调的现象就显得比较古老了。尽管有些人可以把入声重新解释为一种非声调特征，但其余平上去 3 个声调没法再削减了。所以中古音有 4 个声调这一点，几乎所有早期的汉语史学者都相信。有些人如 Henri Maspero (1912) 还认为，声调是某些语言的固有的特点，不可能由非声调的因素演变而来，他们推论，有声调语言一般不和无声调的语言有什么关联。

认为声调是一些语言固有的不变的特点这些人，肯定会被 André Haudricourt 的文章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1954 a) 所驳倒。人们都承认，越南语的基本词汇和 孟—高

棉及其他南亚语言有关。孟—高棉语基本上无声调，而越南语像汉语、泰语一样有复杂的声调。这种明显的对立现象使很多人对越南语的渊源捉摸不定：它属于词汇所显示的南亚语系，还是属于汉语、泰语那种有声调语系？如果认为越南语是一种南亚语言，那就要解释如何从一种无声调的原始语言发展为有声调语言。

越南语也有 8 个声调。Maspero 1912 年已指出，越南语的 8 个声调也像汉语那样分成阴阳两类。越南语的 8 个声调及其名称，列如表 Ⅷ。

表 Ⅷ 越南语声调

	A	B	C	D
阴调类	1. ngang	3. súc	5. hỏi	7. súc
阳调类	2. huyền	4. nặng	6. ngã	8. nặng

A, B, C 相当于汉语传统的平、上、去。D 像汉语的入声一样，有辅音韵尾 p, t, c, k, ch (越南语拼写法)。阴调类来自原来的清音声母，阳调类来自原来的浊音声母。后来，清音、浊音合并，产生了现在这样的每个调类分裂为两类的情况。

从来历看，越南语的入声有辅音韵尾。比较越南语和南亚语的同源词，Haudricourt 已注意到，越南语的去声(hỏi-ngã)字常和其他语言中以 -b 或 -s 结尾的词相对：

	越南语	孟	猛
七	bảy	tpah	poh
鼻	mũi	muh	mũh
根	rễ	rəh	ries

Haudricourt 还注意到，越南语的上声(sắc-nặng)字常和其他语言(如克姆、良，这是两种有亲属关系的孟—高棉语)中以喉塞音结尾的词相对：

	越南语	克姆语	良语
葉	lá	hla?	la?
稻	gáo	renko?	ko?
鱼	cá	ka?	—
狗	chó	so?	so?
虱	chí	—	si?

Haudricourt 根据这些对应的证据提出，越南语的去声字原来有 h 韵尾，后来便失落了；越南语的上声字是由喉塞音韵尾 ? 变来。

假如说，像汉语方言一样有整套复杂声调的越南语，是从无声调语言演变而来，那么汉语的声调又是怎么回事呢？Haudricourt 在发表越南语声调文章的同年，就转向汉语的声调问题。他注意到，越南语中早期的汉语借词，汉语是去声字的，就和越南语的去声 (hỏi-ngã) 相对，因此他认为汉语的去声和越南语的去声来源相同，都是因失落 h 韵尾变来，而这个 h 韵尾是从更早的 s 韵尾变来 (Haudricourt 1954 b)。后来雅洪托夫 (Yakhontov 1960, 1965)、蒲立本 (Pulleyblank 1962 b) 都接受了这种观点。蒲立本还补充了一些带 s 尾的外来词汉语转写时的早期例证。我们在第四章中还要谈到，把汉语去声的来源假设为 s 韵尾所造成，这在汉语早期语法中，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Haudricourt 本人并没有从汉语和越南语在声调演变上的类似性这点进一步推论下去，而蒲立本在上文所引文章中还提到，很可能，汉语上古音中的上声，像越南语上声 (sắc-nặng) 一样，也从喉塞音韵尾演变而来。后来梅祖麟 (1970) 以现代方言及早期梵文的汉译为根据，证明上声来自喉塞音韵尾很有可能。

如果上声来自喉塞音韵尾，去声来自 s 韵尾，那么，上古音实际上没有声调。平声是由元音或其他浊音音素为韵尾的没有特别标记的类；入声是由塞音结尾的一个类。这样，上古音的声调就可能根本不是声调，至少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声调，而是 4 个不

同的类别,这种不同是由音节末尾成分的不同发音方法所造成的:

平	上	去	入
pa[g]	pa-ʔ	pa-s	pak
pang	pang-ʔ	pang-s	kap
pan	pan-ʔ	pat-s	pat

我觉得这种声调发生的理论很吸引人,但也得承认,现在这种形式过分地表格化,公式化。拿去声来说,虽说有些词本来有s韵尾,但不见得这类里的词都以s结尾。声调可能有复杂的来源。而且,现有的证据,无论是南亚语言的,还是古代的转写,都没有看到s可以跟在鼻音之后。很可能由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的语言学家,像李方桂(1971)等,还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如果上古音还没有声调,那么汉语声调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呢?蒲立本(1978)认为声调起得很晚,因为直到6世纪s韵尾还在某些韵中存在,而上声的喉塞音韵尾,在现代一些方言中还保留着。尽管《切韵》时代已出现了调值调型这些声调特点,但上声的韵尾ʔ和去声的韵尾h(<s)还保留着。到9世纪,日本和尚安然《悉曇藏》对基于调值调型的声调体系作了清楚的描写,而且已分阴阳两类,很像现代南方方言中那些声调的情况。

## 阅 读 材 料

Chao, Yuen Ren 197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303-322. (该文从音位结构的理论,对中古音的音类作了很好的说明。)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

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该文是对中古音、上古音构拟中所用方法简要说明,有时候有点不好理解。)

Todo, Akiyasu 1957. 中国语音韵论. Tokyo, Konan Shoin.

(该书是对汉语音韵史的简明而全面的叙述。)

Yakhontov, S. E. 1965. *Drevnekitajskij jazyk*. Moscow, Nauka (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上古音的概述, 表达作者本人的一些看法。)

## 第二章 注 释

- ① W. A. C. H. Dobson (1959, 1962) 把上古音分为早期和晚期。Pulleyblank (1970) 把中古音分成早期和晚期。
- ② 这里所用的音韵学术语是现代多数中国语言学家所用的, 但并不完全代表韵图用语。参 Luó (1956: 44)。
- ③ 八思巴文转写法根据 Pope (1957) 的方法。《中原音韵》拟音据董同龢 (1954) 的体系。
- ④ 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 平声不加标记 (入 \*njin), 上声加 x 于词末 (苦 \*khagx), 去声末了加 h (上 \*djangh), 入声有辅音韵尾, 也不加标记。这完全是加以标记而已, 绝不包含有声调来源的意思。



## 第三章 汉 字

### 3.1 汉字的初始<sup>①</sup>

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汉字已是一个发展成熟的书写体系了。有很多那个时期的甲骨文资料，多数是简短的卜辞。同时，还有很多铜器铭文，前者称之为甲骨文，后者称之为金文。这些文字已能记录当时的汉语，比较完整而且意思明确。这种早期文字的成熟性说明，它一定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但现存的公元前14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实在太少，很难据以推测这之前的发展情况<sup>②</sup>。据现有资料看，假定汉字产生于商朝初年甚至夏朝末年，大约公元前17世纪，大概不是没有道理的（裘1978:169）。

汉字一开始基本上是表意的，几乎每一个字都表示一个意思。因为汉语的词汇绝大多数是单音节词，因此从语音上看，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汉字的书写不同于音节文字（如日语的假名），同音的音节表示不同的意义时，就要用不同的字。例如“首”（中古音 $\acute{s}j\epsilon u$ ；上古音 $*hrj\epsilon gwx$ ）和“手”（中古音 $\acute{s}j\epsilon u$ ，上古音 $*hrj\epsilon gwx$ ）从可以追溯到的渊源看，完全同音，但要写成不同的字，因为意思不同<sup>③</sup>。

最早的汉字基本上是象形文字，即用图画的形式来表明某个意思。例见表I。

一个象形文字要表现得越真实，写起来就越难、越需要花时间。所以，一个书写体系要成熟起来并被广泛运用，就需要简化、定型化，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所以，象形文字渐渐失去它的图画性质，从“犬”字的不同写法就可看到这种趋势。

表 I 早期的象形文字



语言中不是所有成分都能用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这种时候,汉字的创造者就要借助于别的方法。一种是用较抽象的办法,例如“上”,先划一条横线,然后一条短的横线在上面,即二就是“上”字。“下”用同样的办法,但是短横线放在下面,即𠂇就是“下”字。这样造字时,笔划就代表着某种意义,但不涉及这个词所代表的声音。这种办法当然不能完全顶用。最后,像所有充分发展了的书写体系一样,要把所要表达的事物的声音也得考虑进去。这就可以用猜字的原则,把某些笔划或字形只当作所要表示的读音,或是作表音的部分。例如“來”字,很难用象形的、会意的方法来表示,于是借用一个同音的或音近的字,这样选中了原来表示麦子意思的这个“來”字。后来,“來”字的本义(麦子)完全消失了,只剩下这个借用的“來”的意思了<sup>①</sup>。作语法成分的字,用象形字根本没法表示,实际上都借用同音字来表示。<sup>②</sup>







除了上述象形、指事这些造字方法以外,早期的汉字还有一些既非代表意思也不代表声音,完全是一种任意的符号,例如

“五”就写作×，“七”写作+。

形声字也早已出现，越到后来，这种造字方法越显得重要。形声字的形旁表意，声旁表音，例如“狼”字，“犬”旁表意，“良”只表声音，绝不表意。很可能，形声字的出现，是为了区别那些相近的容易混淆的字体。很多鸟的名称，加了声旁，就很容易辨认了。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借用同音字的办法用得越来越多，但这样一来，造成歧义和混淆的情况也会增多，为了避免这种歧义或混淆的可能性，就加上个意旁，就成了形声字。例如“其”jī，原来表示“箕”的意思，后来借用为语气助词“其”qí，由于语气助词要常用得多，于是加上“竹”旁专门表示“箕”。这样“箕”、“其”就区分开了<sup>⑤</sup>。在商朝甲骨文中，主要有两类，一类只表意思，不涉及声音；一类已有声音方面的某种考虑了。当然，商朝文字所表达的是商朝用语中的一些词，有它自己的表意、表音的特点。有人认为，汉字是非常典型的直接表达思想而不是表达具体汉语词汇的文字。这种观点显然是没道理的，而且会导致对汉字及所有文字本质的错误理解。为此，最好不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表达的是汉语的词汇，而且汉字主要由形、声两部分构成，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汉字的作用。

商朝的几种造字类型见表Ⅱ。中古音及上古音据李方桂的构拟。

表Ⅱ

- |  |  |
|--|--|
| 1.  (日, n̥zjet/*njit) | 4.  (上, zjang-/*djangh) |
| 2.  (休, xjəu/*xjəgw)  | 5.  (其, gĩ/*gjəg)       |
| 3.  (來, lăi/*ləg)     | 6.  (雞, kiei/*kig)      |













表Ⅱ 所列字例，“日”是象形字，像一个太阳。“休”表示人靠着树，表示休息的意思，是会意字。“來”本指麦子，借用作来

去时来，当时可能声音相同或相近。“上”字比较抽象，一短划在另一横之上，是指事字。“其”字上文已说到，原指簸箕之类，后用作语气助词多了，就另造了“箕”以示区别。“雞”有象形的部分，但“奚”（中古音 yiei，上古音 \*gig）已作为声旁出现了，在此同时，象形部分明显有所简化。

商朝主要是甲骨文，周朝和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主要是金文。这些不同形状、不同用途的铜器上的文字，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几百字。金文的字形、结构很像商朝后期的文字，显然是从商朝演变而来。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直线型，越来越规则化，这从表Ⅲ即可见到。在春秋时期，这种趋势表现得最清楚⑧。

从表Ⅲ例字可以看到，汉字发展成熟时，就变得简单化，并逐渐失去它的象形性质，这是由于社会越复杂，文字的使用越来越重要，而文字用得越普遍，就越需要简化，越需要规则化，早期的圆笔划变成尖角或直线，也是一种明显的趋势。

表Ⅲ 西周、春秋时期汉字的发展

	西周早期	东周晚期	春秋时期
天			
貝			
火			
馬			

春秋之后，文字的使用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文字的简化更加迅速，简直面目一新。汉字向通俗形式的发展（古埃及就把这种文字上的发展进步叫做“通俗文字”）在中国的东部特别显著。西部的秦国，总的趋势是忠实保留早期的象形特点。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2 年），汉字进一步简化，虽然一些复杂的字体同时也能见到。由于政治分裂，各国各地所用文字也都有很多不同。这样，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前夕，汉字在一千多年中已完全脱离了象形文字的初级阶段，也由于政治分裂的离心力量，汉字正经历着一个迅速趋异的过程。

### 3.2 秦朝的文字统一

汉字到了秦朝有个重大的转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两三个世纪，汉字在全国各地发展很快。不只笔划简化，象形的特点不断减少，而且在不同的诸侯国之间，有些字体也明显不同。秦朝在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统一法令的同时，也进行文字的统—，这就是说，用秦国的文字强令全中国使用，这样，其他地区原来一直使用的文字就消失了。所以，秦朝的文字就成了后来汉字的祖先。上文已指出，中国统一之前，秦国的文字比东部其他诸侯国的文字要保守得多，这样，秦始皇用这种保守的文字统一中国的文字，就使汉字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过去的样子。

秦朝的文字，有繁、简两种。繁的那种就是篆书，主要用于印章，从西周后期的金文发展而来，篆书已经变得更加规则、平衡，那种象形的特点已完全消失了。传统的说法是秦朝的宰相李斯（死于公元前 208 年）创造了篆书，但后来的研究表明，篆书的基本笔划在秦朝以前已经出现，要说李斯在统一这种官方所用文字的过程中起有一定的作用，那是完全可能的。

秦朝另一种通俗的字体在汉字发展史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隶书，主要是政府部门各种小吏日常工作所用。这就是原来秦国时期的俗字。隶书在笔划上有较大的演变，比篆书简化得

多。

### 3.3 古代汉字的不同类型及其名称

一直到秦末为止的汉字都被看作古文字。在这段历史时期，古文字经历了多次演变，下面列举并简要说明古文字的几种不同类型。

(1) 商朝文字。商朝文字的代表就是甲骨文。是时代最早的一种汉字，我们就以时代来命名。甲骨文就是刻于兽骨龟甲上的文字，几乎全是卜辞。虽然甲骨文资料多来自商朝，但最近也发现了一些周朝的甲骨文。而金文在商朝末年也已见到，但商朝的金文刻辞都很短，只有几个字。中国学者认为，毛笔在那个时期也已使用，但毛笔所写的资料不易保存，至今只有极少毛笔写的材料流传下来。金文刻辞，在字体上很接近毛笔字。用锐利的工具所刻的甲骨文在字形上显得尖角多些，线条也多些。

(2) 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字。这段时期铜器铭文很多，字数也多，有些多至数百字的。所以金文仍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文字。周初的金文和商朝的很相似。其发展趋势是进一步尖角化、线条化。

和金文相近的另一种文字叫做籀文，也叫大篆。据汉朝的《说文解字》，籀文是姓籀的人所创。关于籀文的起源，现在说法不一，但现代学者倾向于这种说法，即籀文和周朝的金文基本上一样。

(3) 六国文字。六国文字指战国时期东部六国所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关于六国文字的一些资料，最重要的是铜器铭文及竹简、绢帛所写的古籍。《说文解字》除了引用籀文以外，还引用了古文。古文指汉代发现的一些先秦古籍用字，这种字体写的古籍都在秦朝之前，和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的笔划很相近。

(4) 篆书。篆书一般称作小篆，以区别于大篆(即籀文)。篆书是秦朝正式的官方所用文字。《说文解字》的基本字体也是篆

表 IV

	商朝甲骨文	周朝金文	战国刻文	篆书	隶书
1. 子	𠂔	𠂔	𠂔	𠂔	子
2. 雲	𠂔	𠂔	𠂔	雲	雲
3. 水	𠂔	𠂔	𠂔	𠂔	水
4. 年	𠂔	𠂔	𠂔	𠂔	年
5. 丝	𠂔	𠂔	𠂔	𠂔	絲
6. 生	𠂔	𠂔	𠂔	𠂔	生
7. 目	𠂔	𠂔	目	目	目
8. 果	𠂔	𠂔	𠂔	𠂔	果
9. 鼎	𠂔	𠂔	𠂔	𠂔	鼎
10. 鹿	𠂔	𠂔	𠂔	𠂔	鹿
11. 聖	𠂔	𠂔	𠂔	𠂔	聖
12. 買	𠂔	𠂔	𠂔	買	買

书。

关于汉字从开始到汉初的发展演变，我举 12 个例字，分别列出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篆书、隶书五种不同写法，见表 IV⑦。

### 3.4 汉代文字的发展

秦末汉初，古文字实际上已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汉朝，通俗的隶书已成了正式的官方所用字体，除了日常使用外，也用于铭刻。西汉（公元前 206—公元 24 年）的隶书还很像秦朝的隶书，但到了公元前 1 世纪，一种更加规则化的起起伏伏的毛笔字体出现了。这种字体原来主要是政府部门低级官吏所创造、使用，后来很快发展到社会各阶层，并成了汉代标准用字。这种多少有所发展的汉代隶书就是隶书中的古典形式，现代的书法家也还临摹⑧。

从篆书转变到隶书，并成为汉朝各界所用的标准字体，很可能是汉字发展史中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表明从古文字（它尽管有向着更规则化、抽象化发展的趋势，但基本上还保留着象形的基础）向更纯粹的符号性的文字的变化。在隶书这个阶段，象形的特征完全消失了，方便是其根本的原则。圆形的笔划都成了直线型的，以便书写，如“日”字，篆书是圆圈里面横一条短线，隶书是方块里有条短线，看不出原来象形的特点了。偏旁则有所简化并调整，篆书中原来不同的偏旁后来合并为一了，一些常用的偏旁根据整个字体的规划重新有所调整。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删简了好多。汉朝的古典隶书，实际上已朝向楷书演变了，楷书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正式字体。所以，当代人要读懂篆书写的文献需要一番训练和实践；而读懂隶书，则对于具有一般文字知识的人都能做到。

汉朝在文字史上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草书的出现。其实，秦朝一些俗用字，已经写得很快很简化，和后来的草字有共通之处。



而发展比较成熟的真正的草字在公元前 1 世纪才出现，略晚于汉朝的隶书。隶书和草书在汉朝用得很普遍<sup>⑨</sup>，隶书是官方正式用字，草书主要用作辅助的非正式的草稿或信件之类。草书是在早期汉朝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笔划简化了很多，而且随便连在一起，好写得快些。

汉代，还出现了对汉字的系统研究。由于许慎《说文解字》的出现，中国首次对文字的发展和分析形成了系统的详尽的理论。许慎的理论和分析，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即使如此，《说文解字》仍然是一部非凡的杰作，两千年来一直对汉字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其原则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意义重大。

许慎根据当时通用的篆书进行汉字的分析，对更早的籀文或古文，许氏也提出来加以分析。许慎把全部汉字分为两大类，即单体为文，合体为字。《说文解字》这个取名，就是解说单体的文、分析合体的字的意思。“文”不能再分析为更小的成分，“字”则由两个或更多的成分即“文”组成。许氏更进一步把汉字分为 6 类，叫做“六书”<sup>⑩</sup>，其中只有 4 类和汉字的结构有关。指事和象形就指的是“文”，不反映读音。指事字不带图画的性质，是一种抽象的表示法，一般不指具体物体，而指各种关系及抽象的概念，例如一些数目字，位置词（“上、下”等）。这些字数量很少，而且这种造字法很早就停止使用了。象形字是图画文字，多少能看得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这类字数量比指事字多，但这种造字方法也较早就停止使用了。

汉字中绝大多数是合体的字，这种合体的字分为会意和形声两种<sup>⑪</sup>。会意字不表音，一般是把两个成分的意思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字意，例如许慎说的“止戈为武”。会意字数量不少，虽然不像形声字方法能产，但一直用来造新字，直到今天还用。

形声字在许慎时代字数最多，今天也还是形声字数量最多<sup>⑫</sup>。形声字中一个成分表意义，另一个成分表声音，许慎举“河”(\*gar)为例，“水”旁表意义，“可”(\*kharx)表声音，用现代的

本语说，“水”是形旁（义旁），“可”是声旁。声旁并不等同于那个字的读音，两者同音的时候很少，虽然如此，声旁还是对汉代及汉以前的语音提供了很有用的信息（参 2.5 节）。形声字一直是最方便的造字法，两千年来一直如此。

“六书”中的假借、转注严格说来不涉及造字结构。假借指一些字，被后来在意义上并无相关的同音词所借用，上文已谈到“来”字之例。对转注的含义，几百年来一直有争论，关于它的重要性也有不同意见。

《说文解字》共 9353 字（刘 1963），许慎把它们分列在 540 部首之下。部首就是这些字共有的偏旁，一般来说，部首和字的意义有所关联，但也并不都是这样。经过许慎分列 540 部首之后，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汉字并非互相毫无关系的、完全是任意造成的书写符号，而是由数目不大的共同的成分（即偏旁）所构成，而且，汉字一经偏旁部首排列起来，就显得有道理，合逻辑。

许慎认为，每个字都有它的形、声、义，每个字下，他都从这三方面加以解释。例如：“说，释也。从言兑声。”先给篆体字形“说”，接着解释意义“释也”，接着“从言兑声”是说在“言”的部首下，“兑”表声音。从现代的语言看，“兑”和“说”声音上不合，“兑”作声旁很难理解。这是因为两千年来语音变化，掩盖了它们原来读音相近的情况。据李方桂的构拟，“说”是 \*tjuat，“兑”是 \*duadh，可看出它们原来读音相近。偏旁“言”和“兑”则分别在“言”“兑”字下有解释。

### 3.5 汉以后文字的发展

我们现在用的标准字体楷书，在后汉开始定形。楷书向规则和便利又往前进了一大步，把隶书的波浪起伏的笔势变为直线和尖角。楷书在发展过程中，无疑也受当时草书技巧的影响。从汉隶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在后汉已能见到，但只有到了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公元321~379）时代，楷书才算真正成

熟。南北朝时，楷书已代替了隶书，在各个方面都是标准的正式字体。就是这种楷书，一直沿用至今，而且是其他各种字体的基础。

草书开始于公元前 3 世纪，上文已有交代。早期的草书和隶书的演变有紧密关联，后来把这种成熟的草书叫做“章草”（有规则的草书之意）。东汉灭亡以后那个世纪，在楷书流行的同时，古典的草书（后来叫做“今草”）也开始发展起来。草书把原来和隶书相似的笔划都取消了，并进一步简化，很多字已写得和过去完全不同。一般来说，今草比较古的草书更连笔化，更草。这种过分的简笔使人很难看懂，因此减低了它的实用性。这就是为什么另一种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新的字体流行起来的原因。这新的流行字体就是行书，虽然接受了很多草书的特点，但基本上还保持着楷书的字形，这使一般人在起草文稿或书信往来时更实用<sup>⑩</sup>。和行书很相似的字体在后汉已能见到，所以行书和楷书好像是同时并行发展起来的。比较起来，行书不那么固定，有些人写起来更像草书，有些人写起来更像楷书。

到了唐代，楷书和行书都很流行，而小篆和隶书只是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或技巧而存在。上文所讨论的各种字体列如表 V。

### 3.6 汉字的字数

汉朝以后，汉字的字数由于广泛使用文字而大量地增加起来。字数增加的原因很多。在早期，两个或更多的词用同一个字去写的情况是很多的，这些词常是音、义都很相近，写作同一个字常造成混淆。后来这些词就分开写了，加上一些形旁或声旁，例子参 3.1 节。秦统一中国以后，根据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字的原则，新字就增加了不少<sup>⑪</sup>。一般估计，商朝末年，有 4000 至 5000 字在使用，东汉的《说文解字》则有 9353 字，到北宋（公元 960~1127）的《集韵》，已载字 53525 个。怎样来解释这种字数的激增呢？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累积性，在古书

表 V

篆书

秋收冬藏  
閏餘成歲  
律呂

隶书

秋收冬藏  
閏餘成歲  
律呂

楷书

秋收冬藏  
閏餘成歲  
律呂

章草

秋收冬藏  
閏餘成歲  
律呂

草书

秋收冬藏  
閏餘成歲  
律呂

中用的字一直保留下来，并记在字典中，尽管这些词在实际口语中早已停止使用。所以，随着中国文献的增多，字数也就增长。同样，随着文学的发展，新词继续进入共同语言中，有些来自口语，有些方言词、外来词也融合到共同语言。新的人名、地名用字也增加了整个字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一个词，写作不同的字，这些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有时看作异体字），由于不进行严格的规范，得以长期存在使用。现在把不同时期有代表

性的字典中所载的字数列如表 VI<sup>③</sup>。

表 VI 字典所载字数

时间(公元)	朝代	字典	字数
100	东汉	说文解字	9353
6 世纪	梁	玉篇	12158
601	隋	切韵	16917
1011	北宋	广韵	26194
1039	北宋	集韵	53525
1615	明	字彙	33179
1716	清	康熙字典	47035
1916	民国	中华大字典	48000

到此为止，字数最多的是宋朝丁度（公元 990~1053）等人编的《集韵》，很明显，《集韵》包括了大量的异体字，所以字数特别庞大。而现在，即使把异体字都算在内，字数也只在小范围内有所徘徊而已。

看到这么多字数，人们不禁会问，平常日用的汉字到底是多少？显然，没人能记住几万个字，而且也不需要用这么多字去记录可以想像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语言。前面已指出，一个汉字一般代表一个义素。虽然在一个高度发展的文学语言中，词汇的量是非常之大的，但义素（指固有的，并非借入的）数目要少得多，一般只有几千个。这就是说，用来记录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汉语的字数，只要几千个就够了，而不是要几万个。一些数量统计方面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十三经包括了从周朝到初汉这1000年左右的时间，而所用的不同字的字数是 6544（钱 1980）。这个数字还是算得比较高的，因为十三经所包括的时间是那么长，而且一本字书《尔雅》也包括在内，而《尔雅》载有很多冷僻字。《说文解字》有近 1 万字，但这些字那时是否常用是很可疑的。一个普通文化水平的人在今天，到底用多少字，这一点也需要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 60 年代做过这样的研究，一般的大学生，不是中国文学系或中国历史系的学生，只认 3500—4000 字。四卷《毛泽东选集》所用不同字的数目是 2981 字(张 1980:196)。估计印刷厂所贮汉字有 6000 个(Guān 和 Tián 1981)。

还有一个方法，是对一定数量的合成词所用单字作数量统计。Guān 和 Tián 以《现代汉语词典》(参 7.9 节)为准，发现 5 个字以上的合成词中用 1972 个汉字，2 字至 4 字组成的合成词中用 1094 个汉字，加在一起共 3066 个汉字。这个数目大概能代表普通人读现代散文时所需的汉字。少数语法用字、人名、地名、口语词，这些词很常用，但没进入合成词内，所以应该加上这些数目，那就差不多了。这些统计说明，中国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能认、能用 3000 到 4000 字。中国文学、历史专业的人自然要认得多得多，因为他们接触古代文献中很多现在已不用的字，但即使是这类人，是否能认 5000 到 6000 字也很难说。

### 3.7 汉字的适应性

拼音文字很便于拼写各种不同的语言，拉丁字母就用来拼写几百种语言，西里尔(Cyrillic)和阿拉伯字母也用来拼写几十种语言。不拼音的表意文字，看起来只能适用于把它创造出来的那个语言。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和增长速度都说明这种方法对汉字很适用。当你用汉语的形声字来写另一语言的一个不相干的词，那么这字形和词之间就变得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任意的关系，这和用公元前 2000 年时的字来写后来的词语，多少有些类似之处。许多形声字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使后来人感到不太相似，好像也成了一种任意造成的字了。

现在，基本上是那样的一些字，既用来写古代的语言，也用来写以现代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这两种语言在各个方面差别是那样的大，人们不禁会问，这同一些字，怎么能写两种古今不同的语言呢？

在汉语史中，有一点一直未变，那就是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现在语言中的义位，和古代语言中的义位不可能一对一那么整齐。那么，现代语言中的一些词，在古代没有相对应的字可写时又怎么办呢？应该看到，在用传统的字来写现代语言时，多数情况下不是有意识地按计划去办的。这个过程中，多少世纪多少匿名作者，不断地尝试或误用过去的这个那个字来写现代的某个词，直到最后大家一致接受以某个字来写现代某个词。

在这选用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原则。只要有可能，凡来历相同的，都用原来的字写，如现代的“水”，和古代的“水”(\*hrjædx)来历相同，字又现成，所以“水”字古今同用。这种古今来历一致的字占多数，但也有不少常用词，不能沿用过去的字。在没有传统的字可写的时候，有两种办法来造新字：就是用形声和会意的原则造新字。有时候用了意义无关的传统字时，由于古今含意不一而造成混淆。也有时候，新词虽有来历可查，但宁可写一个简单的字来替代。

上述所谈造新字、造简字的例子见表Ⅶ：

表Ⅶ 现代新字举例

现代新字	《广韵》读音
1 筷 kuài	—
2 赶 gǎn	—
3 找 zhǎo	—
4 另 lìng	—
5 别 bié	pjāt
6 不 bù	pjəu
7 吃 (喫) chī	kjət(khiek)
8 喝 (飲) hē	xât(xâp)
9 歪 (𡗗) wāi	— (xwai)
10 余 (𡗗) cuān	— (tshuân)
11 饺 (角) jiǎo	— (kâk)

1. “筷”，古代用“箸”（中古音  $\text{dʒwo}$ ），现代一些保守的南方方言还用“箸”。据明代陆容的研究，“箸”因为和“住”同音，用船的地方忌讳说“住”，所以用了反义的“快”（筷）。现代多数方言都说“筷”，把“竹”字头加在“快”字上就成了专用新字了<sup>⑩</sup>。

2. 趕，在《广韵》《集韵》中都未见，是个新的形声字。

3. 找，明朝才见到。“找”既非形声，也非会意。怎么来的还不清楚。

4. 另，可能是“别”的简化，意思相近。

5. 别，见“4. 另”。

6. 不，是动词、形容词前的否定词。“不”今音  $\text{bù}$ ，和《广韵》的音不合。表Ⅷ所注音当演变为现在的  $\text{fōu}$  或  $\text{fū}$ ，由于“不”在古书中常用，可能是借来写现代相应的否定词  $\text{bù}$ 。现代的  $\text{bù}$  追溯到中古音当是  $*\text{puət}$ ，但韵书中未见。

7. 吃，今音  $\text{chī}$ ，音义都不相对应。“吃”今音当是  $\text{jī}$ ，《广韵》注为口吃的意思。“吃”的现代用法来历不明。虽然很多方言都用“吃”，但早期字书中未见这种用法。括弧中的“喫”虽常用作“吃”的正式字体，与《广韵》所注意思也相合，但和现代  $\text{chī}$  的读音不合。

8. 喝，与《广韵》所注意思不合，应作“飲”，音义都合。“喝”可能受“渴”影响而致，这两个字字形相近。

9. 歪，本字“𡗗”是形声字，后来代之以“歪”，是会意字，人们一看就明白。而原来的“𡗗”大概很少人认识，声旁也用得很少。难怪“歪”能取胜，得到流行。

10. 余，现在是个会意字。原来那个字虽然语源正确，但字形复杂，笔划太多。

11. 饺，现在是形声字。原来“饺子”就是“角子”，形状像“角”。后来语源已不再计较，就需要造一个新字，于是“饺”就出现了。

上述例子说明，汉字体系并非僵死不变的，而是能适应各种



新的形式，事实上它也一直在不断的适应过程中。很可能汉字这种灵活多能的特点，是它得以长久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外国人对这么复杂的汉字居然能长期使用这点是很惊奇的。

除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标准的共同用字之外，还有不少方言用字。这些方言用字只在方言区使用，用来记录方言俗语、方言戏曲、对话等各种地方文学。这些方言用字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和会意字。举例如表Ⅷ。

表Ⅷ 方言字举例

方言字	方言读音	字义
1. 𪛗 (苏州)	fən <sup>1</sup>	不曾
2. 俚 (苏州)	li <sup>1</sup>	他，她
3. 怀 (福州)	h <sup>6</sup>	不
4. 𪛗 (福州)	thaj <sup>2</sup>	宰
5. 唔 (广州)	m <sup>2</sup>	不
6. 𪛗 (广州)	thoŋ <sup>1</sup>	屠杀

苏州话的“𪛗”是“勿”fəŋ<sup>7</sup>和“曾”zən<sup>2</sup>的合音词。“俚”用于单数第三人称。虽然“俚”字书中早已见到，但是“俚俗”的意思，并非单数第三人称。

福州话的“怀”是一个常用否定词。福州话中常用人字旁来造方言字。“怀”看起来既非形声字，也非会意字，也不属于六书中其他造字法。“𪛗”则是典型的形声字。

广州话口字旁常用来造新字，“唔”就是这样一个新字。声旁“吾”读ŋ<sup>2</sup>，声旁和所谐字“唔”读m<sup>2</sup>音不合，可以有如下解释：否定词在广州话中只能读自成音节的m<sup>2</sup>；而且，近来有些读ŋ的自成音节的词有变读m的趋势，如“五”既可读ŋ<sup>4</sup>，也可读m<sup>4</sup>。“𪛗”是一个形声字。

汉字除了可用来造方言字以外，更重要的，它还大量地被朝

鲜、日本、越南所使用。从中世纪起，汉字就是这些国家书写体系的基础。在这三个国家，古代汉语是他们的官方书面用语，尤如拉丁语在以前的欧洲一样。他们用汉字来写书面汉语，当然没有问题，但一旦引入汉字，很自然就要用汉字来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只有三种办法，他们可以用汉字来写自己的语言。一是借用汉字来写他们意义相同的词，如用“水”来写朝鲜语的 mül；二是借用汉字的读音，这样汉字就只是表音节的符号，而不表示意义。例如日语可只借用汉字“己”来表示日语 ko 这个音，而不涉及这个字的意义。三是用形声、会意的原则另造新字。这三种方法在这三个国家中不一定同时但总是都用上了。

借用汉字的字义或字音的方法，在朝鲜、日本用得很普遍。日本借用汉字字音来代表一个音节，最后发展为两个音节的假名，这些假名都用简化的汉字来表示。现代日语书写法是一种混合的体系，用拼音节的假名写语法助词后缀，用汉字来写多数名词、动词。一般来说，汉语借词（得有几千）用汉字写。二次大战后，所用汉字限制在由法律规定的 1850 个字以内。不列入 1850 个字表上的汉字，要用时，也得用假名来写。而且，法定可用的汉字，有些笔划多的，也规定了简化字。

在日语中，用拼音字母或假名来书写并无特别困难，并且这在进一步机器化、计算机化的时代，会赢得便利、速度等好处，但很多日本人仍然把汉字看作他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好像不大可能会废弃汉字，至少在近期还不会(Miller 1967:134)。

汉字在朝鲜、越南虽然曾有几百年作为他们官方文字的历史，但后来的情况就很不相同。朝鲜在 15 世纪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hangŭl(谚文)，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有取代汉字的趋势。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朝鲜也是混合的书写法，朝鲜自己的语言用 hangŭl(谚文)写，汉语借词用汉字写。南朝鲜现在还用这个方法。北朝鲜已完全不用汉字，只用朝鲜拼音字母；就是在南朝鲜，也有尽量用朝鲜文而不用汉字的趋势。所以，汉字是否能在朝鲜长期

法存，还是一个问题。

越南过去也用古代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同时，也创造了一套跟汉字相类的越南文 *chữ nôm* (字喃)，一个字表示一种意思。有时候他们用汉字，音、义都保持不变，但多数情况下是用新造的形声字。所以，汉字在越南文中的借用，没有起很大的作用。17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创造的拼音文字，完全取代了汉字和越南文。现在，没有一个越南人能读他们过去的越南文，只有少数人（华裔越南人除外）能读汉字。越南的拉丁拼音文字在各个方面都是唯一的书写体系(Thompson 1965)。

很可能，汉字将只用于中国和日本，至少从现在来看，在朝鲜、越南都有迹象表明，他们要进行改革，最后完全不用汉字。

### 3.8 汉字最近的发展

汉字一直在演变，在秦汉两代，汉字有了大范围的改进，简直面目一新。而从唐代20到世纪初，官方用的正式文字变化却很小。在明清时代，有一种保守趋势，反对在文字上有所创新，反对简体字或说俗字。尽管如此，在一般人写的帐本、当票、药方、曲本及某些白话文学作品中，却有大量的简体字在流传。一些文人在非正式的私信往来、笔记资料中也用这些简体字。20世纪初的全面改革运动中，汉字的改造和简化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汉字简化，最切实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承认已经广泛使用的简体字为官方正式用字。1935年，民国政府颁布了324个简化字作为正式字体，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第二年就取消了。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文字改革，1956年就公布了515个简化汉字(陈1956)。这里包括了过去几个世纪内流传的简体字，还有一些是新造的简化字。就在前一年，政府还规定，以后书写时，像西文那样从左到右横着写。这样，原来中文从右到左竖着写的习惯格式从此告终；当然，古代的文献，以及现代一些关于历史、考古方面的著作，仍

以传统的格式印行。

1964年，又公布了一批2000字的简化字表，对常用的形旁、声旁进行了简化。这个简化过程虽然不如汉代篆书改为隶书那么快，但确实代表了对汉字进行彻底改革的态度。

简化汉字10例见表Ⅸ。

表Ⅸ 简化字举例

- |             |               |
|-------------|---------------|
| 1. 云（雲） yún | 6. 洁（潔） jié   |
| 2. 礼（禮） lǐ  | 7. 里（裏） lǐ    |
| 3. 后（後） hòu | 8. 扑（撲） pū    |
| 4. 医（醫） yī  | 9. 历（歷） lì    |
| 5. 门（門） mén | 10. 让（讓） ràng |

现在把这些字的简化原则解释如下⑩：

云，本来就是指云彩，由于很早就被借作云说的意思，为了表示区别，加上“雨”字头而作“雲”。现代汉语中，“云”不用作说的意思，可以恢复作为云彩用字。

礼，这个字形早就存在，《说文解字》就说“礼”是“禮”的古文。所以用“礼”来代替那个笔划多的字是合适的。

后，原指皇后的意思，因为“后”与“後”字同音，而且早在《礼记》中，“后”已用作后来的意思了。

医，是早就流传使用的简化字。《说文解字》中有医字，是箭袋的意思。有些人提出，“医”还用作医生针灸器具口袋的意思，但没有证据。

门，是在草书的基础上简化的。很多简化字就是把草书规范化，写作便于印刷的样子。

洁，是一个新造的形声字。水旁加声旁“吉”。“吉”音jí，和“洁”jié的音不太切合，可能是从“结”jié字类推而来。也可能是受方言读音的影响，“吉、结、洁”在有些方言如吴语，完全同

音，于是拿来作声旁。

里，原指路途的距离，是量词，因为和“裏”字同音，而且早在过去的白话小说中也已使用，所以这实际上是承认过去已用的简化字。几里路的“里”和里外的“里”即使在一段文字中同时出现，一般也不发生混淆。

扑，和撲不但本来读音相同，意思也相通，很可能原来就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历，是一个广泛流传的简体字，现在只是加以官方承认就是。历，也是一个形声字，力是表示声音。

让，是一个新的形声字，这个字形有几点值得说明一下。首先，这个言字旁是一个简化的偏旁，是从草体言旁而来。声旁“上”初看起来令人费解，因为“上”是sh声母，“让”是r声母，很可能这个简化字来自吴语地区，吴语“上、让”读音相同，苏州话就都读作zan<sup>6</sup>。尽管“让”原来可能是某个地区的俗字，由于它简便易写，所以也被别的地区所采用，最后得到官方的许可。

现在，我们还看到好多广泛使用的简化字，但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因此是不合法的、不规范的用字。这些字常用于私人信件、街上的招牌、口号及各种手抄的资料。一些常用的非正式的简化字见表X。

表X 非正式的简化字

- |               |                |
|---------------|----------------|
| 1. 𠂔 (餐) cān  | 6. 𪎭 (稻) dào   |
| 2. 𠂔 (展) zhǎn | 7. 袂 (裤) kù    |
| 3. 𠂔 (信) xìn  | 8. 𪎭 (酒) jiǔ   |
| 4. 𠂔 (鞋) xié  | 9. 付 (副) fù    |
| 5. 𠂔 (家) jiā  | 10. 𪎭 (建) jiàn |

## 阅 读 材 料

Boltz, William G. (鲍则嶽) 1986. Early Chinese Writing. *World Archeology* 17, 420-433 (这是一篇介绍汉字起源的好文章。)

陈光尧 1956, 简化汉字字体说明。北京, 中华书局。(该书对现代文字改革的原则作了清楚的说明。)

李孝定 1977, 汉字史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该书对汉字的起源、发展作了总的介绍)

李学勤 1985, 古文字学初阶。北京, 中华书局。(该书对汉字碑刻的研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梁东汉 1959, 汉语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该书对汉字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

## 第三章 注 释

- ① 笔者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对本章汉字发展问题所提供的很多资料。裘先生 1982 年冬在华盛顿大学讲文字课, 并且给了我一份他的讲义。他还抽空读了我这一章的初稿。他的更正和建议对这一章的最后定稿帮助甚大。剩下的缺点、错误, 都是我本人责任。
- ② 最近很多人想把又字的历史推得更早, 证据是那些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标志。但是, 问题在这些标志能真正算作文字吗? (参裘 1978.)
- ③ 没法搞清“首、手”在初造时是否同音。但从可以考证的材料来看一直是同音的。
- ④ 在《诗经》中, “來”仍作麦子用。但后来没见到这个意思。
- ⑤ 后代金文中, 原始的“其”是由声旁 II 组成, 上古音是 \*gjeŋ。现代的“其”是从这形声字发展而来。“其”作为语气助词要比第三人称用法要早 (参 4.3 和 4.5 节)。
- ⑥ 材料引自裘锡圭先生讲义。

- ⑦ 每个时期只给一例，实际上每个时期都有很多不同写法。需要对不同字体有个全面的了解，参高明(1980)。
- ⑧ 在书法上，古典的隶书叫做八分。
- ⑨ 在书法上，早期的草书叫做章草。
- ⑩ 六书的分类其实早于许慎，《说文解字》只是拿它作为分析字形的基础。
- ⑪ 李孝定(1977.41)根据朱骏声的《六书要略》，指出《说文解字》所载汉字 81.2%是形声字，12.3%是会意字。这样 93% 的汉字属于这两类。其他各类象形占 3.9%，指事 1.3%，假借 1.2%，转注 0.07%。
- ⑫ 形声字也常用来指谐声字，参 2.5 节。
- ⑬ 行书很可能发展在楷书之前，并且促进了楷书的发展。行书早在楷书定型时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 ⑭ 说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字，也许说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这是说，在用 一个字来写两个以上不同的词因而有可能引起混淆时，就需要另造新字；或者，一个字的某个意思用得特别多，已到了需要另造一个新字来单独表示这个意思，以免和别的意思相混。
- ⑮ 各种字典的字数引自刘(1963)，赵(1979)，关和田(1981)。
- ⑯ 英语“筷子”是 Chopsticks，来自洋泾浜英语 chop chop(快)。这说明，在 19 世纪，“筷子”和“快”的意思是有联系的。
- ⑰ 参 10.3 节。
- ⑱ 简化字原则的分析据陈光尧(1956)。

## 第四章 古代书面语

### 4.1 古代书面汉语

古代汉语，习惯上就是指春秋战国末期到汉朝末年那段时间的书面语形式。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如《论语》、《孟子》、《左传》、《史记》，一直是后代文人的楷模。这些作品中的语言，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基本的词汇、语法结构上，从总的方面看，还是可以看作同一种语言。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作品，可以看作是远古汉语，和我们这儿讨论的古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别，后代文人一般都不模仿那种文体。

古代汉语的基础当然是那个时期的口语，但作为一种书面语言，跟当时的日常口语肯定有很多不同，犹如今天的书面英语和日常口语有很多不同一样。而且，像大多数书面语一样，都会反映一些当时的方言俗语，但这些方言俗语只是有所反映、有所流露而已，还没到可以看作是完全用另外一种方言的程度。汉代以后的文人，继续模仿这种早期的书面语言，由于当时的口语已变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种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就成了古典文体，或说文言文。文言文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同拉丁文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纯粹作为和当时口语无关的一种书面手段。当然，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也互相影响，就是说，书面语多少总要流露一些口语的用法。所以，汉代以后的文言文，看起来和早期书面语言没什么两样，但从当时口语的流露中，能看出当时的一些时代特点。这一点将在第五章讨论。

有些研究古代汉语的西方早期学者，居然认为古代汉语没有语法。如果真是这样，这一章讨论就可省却了。其中多数人所谓



古汉语没有语法，是指没有形态变化。根据西方的传统教育，把语法等同于词形变化。现在，不会有哪个西方学者会正式声称某个时期的汉语没有语法了。从定义看，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结构规则的符号体系，这个有一定结构规则的符号体系本身就是语法体系。

古代汉语没有词形变化，因此所谓的语法就差不多全是句法。首先把所有的词分成不同的几个类，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对某个词类的语法作用的解释，都要从这些组成成员即具体的词说起，例如，动词后接名词，一般是动宾结构，当然，由于不同的上下文或句法位置，也可能是别的一种结构。在缺乏词形变化的语言中，语法关系就主要靠词序来表现。另外助词、介词、代词、助动词等，也起着重要作用。下面对古代汉语的某些特征略作介绍。

## 4.2 语素和词

古汉语的语素都是单音节的，而且，绝大多数语素也就是一个词。不只表示语法关系的词形变化完全没有，就是表示派生关系的词形变化也极少。从类型上看，古代汉语是孤立语的典型例子。

虽然汉字是一个一个分开的，但派生词还是能找到几个，当然它们都不能大量派生，也许只是更早时期有过派生词的遗迹。

由声调变化造成派生词的情况，Downer (1959)。Chou (1962)，梅(1980)已作了研究。这是指意义相关的一对词，一个词是去声，另一个词是平声，或上声，或入声。第二章谈到，有些学者认为，去声来自 \*s 尾（参 2.7 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表示古代汉语中后缀的不同，而不是声调的变更。派生词之间的关系不完全一致，多数是名-动、动-名不及物动-及物动 这些关系，例见表 I，并附上中古音及李方桂所作上古音的拟音（上古音用 \* 号表示）。

表 I 声调变化造成派生词举例

度 <sub>动</sub> dāk/'dak	度 <sub>名</sub> duo/*dagh
行 <sub>动</sub> yeng/*grang	行 <sub>名</sub> yeng/*grangh
传 <sub>动</sub> dīwǎn/*drjuan	传 <sub>名</sub> dīwǎn-/*drjuanh
量 <sub>动</sub> ljang/*ljang	量 <sub>名</sub> ljang-/*ljangh
上 <sub>动</sub> zjang:/*djangx	上 <sub>位置</sub> zjang-/*djangh
盐 <sub>名</sub> jiām/'ram	盐 <sub>动</sub> jiām-/*ramh
膏 <sub>名</sub> kâu/*kagw	膏 <sub>动</sub> kâu-/*kagwh
田 <sub>名</sub> dien/'din	田(佃) <sub>动</sub> dien-/*dinh
恶 <sub>形</sub> ?âk/*?ak	恶 <sub>动</sub> ?uo-/*?agh
答 <sub>动</sub> tâp/*təp	对 <sub>动</sub> tuâi-/*təbh

还有一种派生法是不送气清音声母和浊音声母之间的交替，常常是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或动名词，例见表 II①。

表 II 发音方法不同造成派生词举例

见 <sub>看见</sub> kien-/*kinh	见 <sub>显现</sub> yien-/*ginh
繫 <sub>繫带子</sub> kiei/*kid	繫 <sub>校繫上</sub> yiei/*gid
背 <sub>名词</sub> puâi-/*pəgh	背 <sub>动词</sub> buâi-/*bəgh
分 <sub>动词</sub> pjuən/'pən	分 <sub>名词</sub> bjuən/*bən
葬 <sub>动词</sub> tsâng/*tsangh	葬 <sub>名词</sub> dzâng-/*dzangh

古代汉语中有一些两个字合成的音节，就是说两个音节合成一个音节，一般是其中的第二个音节读轻声的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否定词“弗”(中古音 pjuət, 上古音 \*pjət)就是“不”(中古音 pjəu, 上古音 \*pjəg)加上单数第三人称“之”(中古音 tsi, 上古音 \*tjəg)。因为在古代汉语否定句中，作为宾语的人称代词总是出现在否定词和动词之间。“弗”字这个意思，在先秦典籍中多数能得到证实，“弗”字后的及物动词后面都不带宾语(丁1935)。

同样,“勿”(中古音 mjuət, 上古音 \*mjət)这个否定词,有些人认为是“毋”(中古音 mju, 上古音 \*mjag)加上“之”的合音。这种说法在商周文字中还不能适用,因为那时“弗、勿”经常出现,还没有根据说里边包含有一个第三人称代词。在先秦以后的文言中,“弗、不”的不同、“勿、毋”的不同,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焉、然”的合音是另外一种情况。“焉”有乾切(中古音 jän, 上古音 \*gwjan)一般都认为是“于”(中古音 ju, 上古音 \*gwjag)加上一个声母是 \*n 的代名词或指示词。同样,“然”(中古音 njän, 上古音 \*njan)是“如”(中古音 njwo, 上古音 \*njag)加上那个有 n\* 声母的代名词或指示词。但是,这有 \*n 声母的代名词或指示词到底是哪个字呢?“弗、勿”的情况比较清楚,韵尾 \*-t, 显然来自“之”(上古音 \*tjæg)的声母,“焉、然”的韵尾 \*-n 就很难说清,因为古代汉语中,常用的第三人称代词或指示词都没有 \*n 声母。所以这两个合音字可能来自方言用词。因为到了后来,汉语中是有“尔”(中古音 njje, 上古音 \*njidx),“那”(中古音 nâ-)这两个词,都用作指示词。古代汉语中“若”(中古音 njak, 上古音 \*njak)有时也用作指代形容词②。

古代汉语中,复合词数量很少,而且结合的程度也不如以后来得紧密。例如“师旅”这个词,就是由“师”和“旅”两个单音词组合而成,表示军队的意思。但“师旅”和现代的“军队”在结合程度上很不同,“军队”不能分开,“军”和“队”都不能单独成词,现代的复合词结合得比古代复合词要紧。汉语到后来复合词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不同音节的数目越来越少,也就是同音词增多,就需要造成复合词来减少混淆;而且,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新词新语,而汉语缺少西方语言那种用词形变化来造成新词的方法,所以这也促进了复合词的发展。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个语言,除了借入外来词以外,很少能大量地增加词汇量,而汉语对外来词从来就有一种消极的抵制的倾

同。

古代汉语中重叠词及部分重叠词很丰富，多是描写用的形容词、副词。重叠词如“巍巍”、“侃侃”、“采采（采采芣苢）”。部分重叠的指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如“逍遥”、“徘徊”是叠韵，“参差”、“踌躇”是双声。多数这类联绵词属形容用法，也有少数是名词或动词，例如“螟蛉”、“蟋蟀”是名词，“匍匐”是动词。

### 4.3 词类

古代汉语由于缺乏词形变化，对区分词类特别不利。还因为一词多能的情况，就是一个名词在某些特定的上下文中可以用作动词，而动词、形容词可以用作名词。这种现象使词类的划分更显得复杂难办。有人可能会认为古代汉语根本没有词类，只能根据它们在句中所起的作用来临时划分。这种态度失于偏颇。比较慎重的态度当是承认词类的存在，但同时看到，多数词由于在句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有不同词性。这样，就可以说，有些词，其基本的作用是名词，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可用作动词、形容词或副词。这样做，也不排除词类划分时的交叉现象，就是说，一些词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词类<sup>③</sup>。例如“石”，是一个名词，如果用作动词，肯定是一种特殊情况。又如“事”，经常用作动词，根据 George Kennedy (1964: 323) 的分析，在《孟子》一书中，“事”用作名词、动词的情况差不多相等。Kennedy 根据这样一些分析统计，认为汉语语法分析必须在不同的前提下进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同前提，他一直没提出，所以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

汉语的词类可以有两种分法，传统的分类是分为虚字和实字。虚字可以叫做语法用字，没有具体意义，只用来表示各种语法关系。代词、指示词、各种助词、介词都属于虚字的范畴。虚字数量不多，有一定限制。相反，实字就有具体意义，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很多，可以到无限制的程度。另外一种分类是分体词和谓词，体词包括名词、代词、指示词、位置词、

时间词。谓词指充当谓语及和谓语相连的成分，如动词、形容词、介词、副词和其他小的词类。

下面简单介绍古代汉语的各个词类，这里对词类的划分也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处理。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词类，都没有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确划分。我们这儿用的可以说是多重标准，来为古代汉语划分词类④。

名词主要用作主语和宾语。顾名思义，名词就是事物的名称，还有人名、地名。名词在某些情况下可用作动词。例如那些与人有关的名词（职务、头衔、亲属称谓等）就常用作动词：

（1）蔡侯淫而不父。

“不父”是不像个父亲的样子。还有工具的名称也可用作动词：

（2）鞭之见血。

这个“鞭”是用鞭去打的意思。还有表示位置的介词“于”字之前的名词，可作不及物动词：

（3）晋师军于虚柳。

这个“军”是驻扎的意思。

代词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个体代词，它们都起有名词的作用，但不能像名词那样前面有修饰语。人称代词种类很多，就是先秦那段时期，人称代词就特别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来自方言的不同说法。最常见的人称代词见表Ⅲ。

古代汉语中，名词和代词都没有单数复数之分。当需要这种区别时，复数就加“侪、辈”等词来表示，例如“吾侪、尔辈”。第一人称代词有两套，A组有\*r声母，B组有\*ng声母。这两套第一人称代词之间，在功用上看不出明显的区别⑤。相反，带\*ng声母的“吾、我”两者之间，在用法上有明显不同。“吾”用作主语和领属格，“我”则用于宾语。“我”用作主语时，总像是一种对比的意思（即强调是“我、我们”而不是别人）⑥。

表Ⅲ 古代汉语的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	A 余 (jiwo/*rag)
	B 吾 (nguo/*ngag)
	我 (ngâ/*ngarx)
第二人称	汝 (ńźjwo:/*njagx)
	尔 (ńźjɛ:/ʔnjidx)
第三人称	其 (gi/*gjəg)
	之 (tši/ʔtjəg)
	焉 (jān/*gwjan)

第二人称之间更不易看出有什么区别。即使在某个作者的个人作品中，也看不出有什么重要的区分。第二人称除了表Ⅲ所列“汝、尔”外，“而（中古音 ńźī，上古音 \*njəg）、若（中古音 ńźjak，上古音 \*njak）”也能见到，也看不出之间有什么用法上的不同。

第三人称代词之间，就有明显的不同分工。“其”用作领属格，表示“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意思；“之”用作宾语，“焉”是“于”和另一带 \*n 声母的指示词或代名词的合音，表示“于之”的意思。严格地说，第三人称没有用作主语的，需要时，在强调或对比的时候，就用指示代词“彼”（中古音 pje:，上古音 \*pjarx）。

在古代汉语及以后各个时期，在某些情况下总要回避用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同辈之间，对下级也可以用。对于尊者、长者，就要用各种尊称，常用“子、君”作敬辞。对自己则用谦称。古汉语中一般官员对君主、上司说话时，就用“臣”自称。

常用的指示代词是“此”（中古音 tshje:，上古音 \*tshjarx）和“彼”。还有一个“是”（中古音 ʒje:，上古音 \*djigx），是一个一般的近指代词。“此”则多数用来指称近处的某个可见的事物（吕

1944, Yakhontov 1963:70)。

古代汉语中，没有英语 Something (某些东西)、nothing (没有东西) 这类不定代词。要表示这种意思时就用“有所”或“无所”。例如：

(4) 吾有所见。

(5) 吾无所言也。

最常用的疑问代词是“何”(中古音 yâ, 上古音 \*gag), “谁”(中古音 zwi, 上古音 \*djəd)。“何”只作谓语,“谁”可作主语,但更多地是用作谓语的一部分。“何”除了用作疑问代词外,也可用作疑问形容词、疑问副词,如“何人”用作形容词,“何畏”、“牛何之”用作副词,疑问代词还有“奚”(中古音 yiei, 上古音 \*gig)、“胡”(中古音 yuo, 上古音 \*gag),“安”(中古音 ?ân, 上古音 \*?an)。“何不”、“胡不”常合音为“曷”(中古音 yâp, 上古音 \*gap)。

古代汉语中的个体代词是“孰”(中古音 zjuk, 上古音 \*djəkʷ), 莫(中古音 mâk, 上古音 \*mak),“各”(中古音 kâk, 上古音 \*kak),“或”(中古音 ywək, 上古音 \*gwək)。“孰、各”既指人也指物,“莫、或”一般指人。个体代词可直接用于动词之前。

位置词指“东、南、西、北、上、下、内、外、前、后、中”等。用于名词后表示位置,如“山上、门内、树下”。用在动词之前表示动作的方向,如“西游”。

时间词指时间的划分以及以今天为准的有关的时间点。如“日、月、今、昔”。有些用法下面再谈。

上面举的都是各种体词,下面谈谓词及与谓词相连的成分。

动词是最典型的谓词,在多数语言中,很容易区别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而在古代汉语中,要想明确地划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是很困难的。人们凭着直觉就会想,“杀、食”是及物动词,“来、哭”是不及物动词。但是当你定个正式标准加以划分的话,如用带不带宾语为准的话,那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两类动

词都能带宾语，包括这个宾语代词“之”。而且，有些名词在某些情况下也能作为及物动词来用。尽管很多问题有待明确，但有些现象还是可以看得比较明白，那就是，及物动词一般带有宾语，不及物动词不带宾语，如果不及物动词而带有宾语，那就可看作是一种意动或使动。如果及物动词而不带宾语，那就或者是包含有代名词宾语，或者是被动意义。见(6)至(10)例。

(6) 老者食肉。

(7) 医来。

(8) 既来之则安之。

(9) 自巧而拙人。

(10) 直木先伐。

例(6)的“食”是及物动词。例(7)的“来”是不及物动词，例(8)的“来之”是使人来，是派生出来的使动用法。例(9)的“巧、拙”原是形容词，在这儿是不及物动词的意动用法，“自巧而拙人”是认为自己聪明而别人愚拙的意思。例(10)是及物动词的被动用法。

形容词在本质上是不及物动词，可以受表程度的定语修饰，也可用于比较式，如“至善”、“高于泰山”。形容词带宾语时，是使动或意动的用法，如例(9)。

助动词是把动词作为它的宾语，多数情况下是表示不同的语态。例见4.4节。

古代汉语中的介词，像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参7.4节）一样，从语源上看都是动词性的，而且多数既是介词，又是主要动词。介词是一个小类，用来表明主要动词和所附名词之间的关系。主要介词及其作用见表IV。

表IV 古代汉语介词

1. 表示位置      於    ?jwo/\*?jag  
                     于    ju/\*gwjag



- |         |   |               |
|---------|---|---------------|
|         | 乎 | yuo/*gwag     |
| 2. 表示起点 | 自 | dzi-/*dzidh   |
|         | 由 | jiəu/*rəgw    |
| 3. 表示捐助 | 为 | jwe-/*g vjarh |
| 4. 表示参与 | 与 | jiwo:/*ragx   |
| 5. 表示工具 | 以 | jii:/*rəgx    |

古汉语中表示位置的三个介词“於、于、乎”可能是同一义素的不同写法。在表示地点处所的词之前，多用“于”，在人名和代词之前，则多用“於”，“乎”只用于动词之后⑦。“於”(或于)的介词结构，可以在动词之前，也可以在动词之后，置于动词之后的较为常见。“於”(或于)的意思可以是“到、朝、比、用、从”等多种用法。“自、由”都表示离去，“自”则常用于动词之后。“为”表示替做、原因、目的。“与”表示一起的意思。“以”是古代汉语中最重要的语法用字之一，除了用作工具格以外，还用作目的、连接及其他语法意义。常见的介词用例如下：

(11) 为小门于大门之侧。

(12) 有朋自远方来。

(13) 为长者折枝。

(14) 吾与回言终日。

(15) 告之以戈。

“以”字结构可以在动词之前，也可用于动词之后。用在动词之后一般强调这种方法或工具，用在动词之前则强调动词本身显得更多些。

代动词可以用来代替某些动词。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代动词是“然”，如“子无然”是你别这样做的意思。相对应的疑问式是“何如”，例如“子将何如”是你将怎么做的意思。

副词在动词之前并修饰动词。有以下几种：“皆、亦、果、固”等。表示程度的副词用来修饰形容词，如“最、尤、弥”。(程度副词发展得较晚，较早的时候，程度常用独立的谓语句形容词或助

词来表示。)时间副词用来表示各种时态,如“方、将、屡”。注意“今、昔”并非副词,而是时间词(即一种体词),因为它们一般用于一个句子的主语之前。各种否定词在句法上看和副词处于同样的位置,可以算作副词的一个类,下文再专门讨论。

助词是出现在句子的首、尾或主谓语之间的不能独立的成分。表示从属的助词“之”是唯一的一个能出现在修饰词和名词之间的助词。助词可表示情态上的细微差别,也用作表示从属及名词化等语法作用。

连词用来连接名词,常用的是“与”和“及”。

古代汉语有一套叹词,用来表示惊奇、失望、高兴等情态。常用的如“嘻、嗟乎、叱嗟”。

#### 4.4 古代汉语的句子

古代汉语基本上是两种句子,一种是名词性的句子(也叫系词句),一种是动词性的句子。名词性的句子中,主语、谓语都是名词、代词或名词词组。动词性的句子中,主语是名词、代词或名词词组,谓语则由动词及其修饰语组成。副词及某些助词可以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在谓语之前,时间词及某些助词如“盖、夫”都可以出现;在谓语之后,很多助词都可以出现。有时,一个形容词性的或名词性的谓语之后,可以接表示强调语气的助词“哉”或“矣”,然后置于主语之前,如例(16):

(16) 君子哉若人。

名词性的句子有分类、等同、说明的作用。常见的形式是“S P 也”,“也”是表明事实的助词,它的否定式是“S 非 F (也)”。如:

(17) 文王我师也。

(18) 子非我。

名词性句子的疑问式有一个句末助词“欤”(中古音 *jiwo*, 上古音 *\*rag*),“欤”被认为是“也”(中古音 *jia:*, 上古音 *\*riagx*)

和疑问助词“乎”(中古音 *yuo*, 上古音 *\*gwag*)的合音。

(19) 是孔丘之徒欤?

带动词“为”的句子也属于名词性句子(或称系词句)。“为”是做的意思,引申为“作为,认为”的意思,常用来指职业或作用,如:

(20) 可以为师矣。

有时“为”已失去词作的意义,完全作为系词:

(21) 子为谁?……为仲由。

动词性句子中的谓语相当复杂。最简单的是由一个动词组成,如“子出”。及物动词只带一个宾语时,很简单,是动宾的词序。带间接宾语,词序就有几种可能。有的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之前,不带有任何明显标志,如:

(22) 公赐之食。

有的把直接宾语用介词“以”置于动词之前,如:

(23) 尧以天下与舜。

有的把间接宾语用介词“於”置于直接宾语后:

(24) 托其妻子於其友。

有时为了特别强调直接宾语,可把它置于动词之前,这时候,代词“之”或“是”就处于直接宾语和动词之间。如:

(25) 我且贤之用。

存在句是特别的一类,它不是名词性的句子,因为有一个动词“有”或相应的否定词“无”。虽然从句法上看,“有、无”可带宾语,包括那个明显的宾语代词“之”,但从语义上看,这些宾语只是准宾语而已,因为不存在真正的动宾关系。这种宾语只是表明存在的人或物罢了<sup>⑧</sup>。存在句有多种,最简单的一种是无主语型:“有人於此”。还有更常见的一种是用位置词置于句首:“山有乔松”。当主语是代词或称人的词时,就表示领属的意思,如“子有车马”。这种领属句是存在句的一个小类,但在结构上,和位置词为首的存在句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是一种互补的分配。所以这

两种句子可同时使用，而不感到有什么矛盾冲突<sup>⑨</sup>。

#### 4.5 一些语法用字

这一节主要讨论否定词、疑问词、语气、时态、语态、时间、地点、情态等问题。

否定词之多，是古代汉语的一个特点。这些否定词有些从更早的时期沿用而来，有些可能来自不同的方言。否定词分 \*p 声母类 \*m 和声母类。择要简介如下。

1. 不（中古音 pjəu，上古音 \*pjəg）。这是动词、形容词的否定词，如“不笑”，“不高”。有人认为，否定表示动作的动词时，“不”用来否定现在和将来，“未”用来否定过去。实际上不完全如此，“不”也可用于否定过去，表示一种慎重的考虑，如：

（26）伯夷不与恶人言。

“未”则只是用来否定过去。

2. 弗（中古音 pjuət，上古音 \*pjət）。上文已指出，“弗”是“不”和“之”的合音，“弗得”是没有得到它的意思。

3. 非（中古音 pjuəi，上古音 \*pjəd）。用作否定的系词，“非马”即不是马。

4. 无（中古音 mju，上古音 \*mjag）。是表存在的动词“有”的否定词，“无马”是没有马。

5. 毋（中古音 mju，上古音 \*mjag）。和“无”同音，也经常写作“无”。用作禁止词，如“毋来”。也可以用来表示不希望、不要的意思，如“欲毋予”（不想给予）。在从属句中，表示不可能的意思，如“可以死，可以毋死”。

6. 勿（中古音 mjuət，上古音 \*mjət）。“勿”和“弗”相似，是“毋”和“之”的合音。“勿取”是别拿它的意思。“弗、勿”合音说，在先秦时期适用，先秦之前或之后，就都不适用。

7. 未（中古音 mjuəi-，上古音 \*mjədh）。一般认为“未”用来否定过去的动作。其实这么说固然符合于多数情况，但还没

把它的基本作用说得很清楚。用“未”和“不”相对比，“不”表示有意不干什么，特别是关于过去发生的动作。相反，“未”只用来客观说明过去没有发生某个动作，而不涉及主语的主观意图（吕 1944: §14.22）。

最简单的命令式就用一个动词如“来！”。为了不显得那么生硬，常加上各种助词，如“矣、哉、乎”。命令词的否定式是禁止词，即上文说过的“毋、勿”，如“毋来”。

疑问句有两类，一种是是非问，一种是特殊问。是非问是用疑问助词置于句末来表示，最常用的疑问助词是“乎、欤、耶”，“乎”最直白，“欤”就不那么生硬，“耶”带点惊奇的意思（刘 1958: 237）。

(27) 若非吾敌人乎？

(28) 非夫子之友耶？

特殊问得用疑问词，不用句末的疑问助词。除了上文指出的以外，还有“焉”（中古音 ?jān, 上古音 \*jan），问怎样、何地、什么。“乌”（中古音 ?ùo, 上古音 \*?ag）问怎样，“幾”（中古音 kjei:, 上古音 \*kjədx）问多少。疑问词作宾语时，必须置于动词之前，例如：

(29) 牛何至？

(30) 不索何获？

句末助词，除了表疑问的以外，还有表示肯定、结尾、建议、惊讶、限定等语气。常见的“也”和“矣”，在很多情况下都可看作是一对反义的句末助词。“也”说明某种事实，带有确定不变的意思；“矣”则相反，表示一种变化的意思，或者是出现了新的情况，或者是表示一种必然的甚至是很快就要出现的变化。所以，“也”表静态，“矣”表动态，如《论语》。（杨伯峻《论语译注》16.11）：

(31)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闻其语矣”表示出现的情况，“未见其人也”说明没有变化的这个事实。这里，可以看到“未”和“也”在意义上的自然联系。“哉”（中古音 tsai, 上古音 \*tsəg）常用于表示赞许，如“美哉”。

“耳”(中古音 *nzi*, 上古音 *\*njegx*) 被认为是“而已”的合音。  
“耳”表示结束、限定的意思, 如:

(32) 尧舜与人同耳。

“耳”在此表示, 话已说完 再讨论下去没用。

“盖、夫”是两个句首助词。“盖”表示建议和不确定, “夫”表示一种明确的主张。

古代汉语像现代汉语一样, 有一套情态助词, 来表示可能、意志、义务等意思。除了“欲”以外, 多数情态助词在单独使用时都是形容词, 如“能、可”。常见的情态助词如:

1. 可 (中古音 *khâ:*, 上古音 *\*kharx*)。表示可能的意思, 直接用在及物动词之前时, 常有一种被动的意思, 如“可杀”。

2. 能 (中古音 *nəng*, 上古音 *\*nəng*)。也表示可能, 如“不能死”。

3. 欲 (中古音 *jiwok*, 上古音 *\*grjuk*)。表示意志, 如“欲食”。

4. 必 (中古音 *pjiet*, 上古音 *\*pjiet*)。表示义务或必须, 如“必索良医”。“必”也可用来表示必然性和确定性, 如“其言必信”。

5. 宜 (中古音 *ngie*, 上古音 *\*ngjar*)。是对所尽职责的缓和说法, 如“宜取”。

其他如“足、肯、忍、敢、请”等, 也是常见的情态助词。

“其”这个情态助词, 不像上面讨论的那些, 从来不作为独立的谓语。由于这种句法上的不独立性, 有些人就把它作为语气助词。但是, 从语义上看, “其”表示某些情态, 当和情态助词属一类。“其”的一个重要用法是表示猜测或推理:

(33) 齐师其遁。

“其”还可用作劝令的意思。

(34) 君其待之。

“其”和句末疑问语气词同用时, 表示反问:

(35) 其能久乎？

施事和动词之间的各种关系，语法上称之为态。古代汉语中，动作本身不标示时、体、态，这些关系是通过助动词、介词及不同的词序来表示的。

及物动词作谓语，但不带宾语，可以看作是一种被动的意思，虽然没有什么明显标志的被动式结构，如。

(36) 昔者龙逢斩。

有时候，动词用作被动态时，就有一个不同的读音，这在古书的注疏中常见，例子见 4.2 节表 II。一般情况下，表示被动时，就在动词前加“见”，有时也用“受”。被动句中出现施事时，就在动词和施事间加上介词“於”<sup>⑩</sup>

(37) 盆成括见杀。

(38) 蔡泽见逐於赵。

在后来的汉语中，“被”用作被动态的标志；公元前 3 至 4 世纪，出现了“为……所……”这样的被动式结构，如：

(39) 为蛇所食。

不及物动词（包括形容词）带有宾语时，可以看作是使动式，如“来之”。又如：

(40) 我能起死人。

(41) 举手出狼。

有些及物动词也可以用作使动式，这些动词一般不用指人的名词作宾语，所以歧义的情况不多。如“食之”，在某些情况下是吃它的意思，有些时候用作使动式，即使之食的意思，但一般不会是吃他（她）的意思。有些动词这么用时，就读去声来加以区别，如“饮”，一般读上声，用作使动时，就读去声。显然，那些用人作宾语的及物动词，当然不能用作使动式。比较合乎逻辑的使动用法，则是用“使、令”这类使动的动词，如“使我速死”。

反身结构是把反身代词“自”（中古音 dzi-，上古音 \*dzjidh）置于动词之前，如“自知”。相互的动作则用“相”（中古音 sjang，

上古音 \*sjaŋ)置于动词之前，如“不相见”。

#### 4.6 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修饰语

古代汉语中的地点状语总是在动词之后，这 and 现代汉语中地点状语置于动词之前的情况正相反。如果动词带宾语，则地点状语就在宾语之后。介词“于”一般用作地点状语的一个标志，但有时也可省略。这种省略“于”的地点状语，在后期的古代汉语中以及以后的文言文中常见。地点状语的各种类型举例如下：

(42) 庞涓死于此树之下。

(43) 褒于道病死。

(44) 此时沛公亦起沛。

例(42) 最常见，例(43) 地点状语在动词之前，例(44) “起沛”是“起于沛”的省略。

时间状语可分几种，一种表示事情发生的时间，一种表示事情延续的时间。表示发生的时间状语一般在动词之前，有时也可在主语之前或之后，视所修饰的范围而定。置于句首的，则修饰整个句子，置于主语之后动词之前的，则只修饰动词结构。时间状语一般没有标志，但有时也用介词“于”。举例如下：

(45) 明日遂行。

(46) 子于是日哭。

(47) 今日我疾作。

表示延续的时间状语置于动词之后，如：

(48) 子来几日矣？

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则置于动词之前，如：

(49) 三日不食。

可以看到，时间状语的位置，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完全一致。地点状语的位置，古今多数情况下有很大不同。



## 4.7 名词和动词的修饰语

古代汉语中，修饰语一般在被修饰语之前。表示从属的名词一般用“之”来标志，但在修饰语是单音节的情况下，“之”就给省略了，如“深水、流水”等。名词可以被形容词、动词及其他名词所修饰，如“高山、飞鸟、石田”等<sup>①</sup>。用“之”作名词修饰语标志的如：

(50) 大小之狱。

(51) 智能之士。

古代汉语中，关系短语也可修饰名词，也用“之”作标志，也可不用“之”。（注意现代汉语中表示名词从属关系的“的”，在关系短语后是不能省略的，参7.5节。）由及物动词组成的如“牛耕田”这个句子就可变成两种短语。

(52) 耕田（之）牛。

这是把原来的主语“牛”变为所修饰的名词。如果把原来的宾语“田”变为所修饰的名词，就要把“所”加于动词之前：

(53) 牛所耕（之）田。

副词修饰语也是置于被修饰语之前。用形容词、名词、位置词、动词作为副词修饰语的用例见(54)至(57)。动词修饰语和被修饰的名词之间要加进“而”（中古音 *ńzi*，上古音 \**njæg*）。

(54) 我明告子。

(55) 豕人立而啼。

(56) 东伐卫。

(57) 哭而送之。

## 4.8 名词化

古代汉语中，动词、动词词组可有几种方法转化为名词。最简单的一种，只要动词处于名词所处的位置，即作为主语或宾语，就很自然地转化为名词。如“好学、求教”，译成英语，就是

不定式或动名词。动词用作主语的如：

(58) 学亦有益乎？

主谓结构之间插入“之”，也可以转化为名词，如“孟子去齐”，可以变成“孟子之去齐”这样的名词性结构，这类名词性结构可以有多种句法功能，表示知觉一类动词的宾语，常用这类名词性结构，如：

(59) 吾知鸟之能飞。

这类名词性结构，如果缺乏可独立使用的第三人称代词时，在用作从属句时就用第三人称领属格，如：

(60) 吾知其能飞。

动词转化为名词，还可用施事化、受事化的方式。动词或动词结构后加上“者”，就成为施事，如“杀者、杀人者”。“者”也可加于形容词后，变成有那种性质的人或事的意思，如“大者、仁者”。

受事化指把及物动词变成名词，通过加“所”字于动词之前，如“所杀”指被杀的人，如果“所”字用于形容词之前，就可有使动或意动的意思，如“其所善”，可释为他所认为好的。

## 4.9 并列结构

名词并列时，常不用任何并列连词，如“人马”。有时则用“与、及”两个连词，成为“人与马”。并列的短语也可不用连词，如例(30)；而更常见的则用连词“而、则”。“而”联结得比较紧密、平顺，可以用作连词如英语的and，也可以表示转折语气如英语的but。“而”常用来造成一种气氛或另一个动作出现时的环境：

(61) 鸣鼓而攻之。

“而”也用作时间的顺序，如：

(62) 听其言而观其行。

“则”用来表示短语之间结局性的转接关系，有时可表示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例如：

(63) 学而不思则罔。

(64) 至则行矣。

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表示条件和时间句子，常不用什么标志，这不是说那些句子没法加以标志。条件句有时用“如”(中古音 *ńjwo*，上古音 *\*njag*)、“若”(中古音 *nźjak*，上古音 *\*njak*)、“苟”(中古音 *kəu:*，上古音 *\*kugx*)。表示时间的句子可以用“及、比”。例如：

(65) 子若欲战，则吾退舍。

(66) 及反，市罢。

#### 4.10 后代的文言文

在先秦古代汉语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书面语言比口语变化得慢得多，这种情况在世界上都属常见。如果认为后来书面语言无甚变化，当然是错误的。尽管多数作者竭力模仿古典范文，但肯定有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特点，因而有模仿错的地方；而且，社会的变化，也需要不断创造反映新事物、新思想的新词新语。所以，后代的文言文和东周时期的古代汉语就肯定不同。但在用语格式上，文言文更接近于古代书面语言，而不是更接近于不断在演变的方言口语。

吕叔湘(1944)指出，把后来的书面语言分作两种倾向是有好处的。一种倾向是尽力模仿古代散文，这种文言文也流露有少数当时的口语，不完全忠实于古汉语本来的用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接近于古代散文。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不那么严格遵循古典散文的规范，就是说，在基本上用传统书面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使用某些口语成分。这种通俗用语在非正式的文体如笔记、书信、日常公文、契约、宗教宣传文字及某些通俗文学作品中常见到。

即使在各种通俗文体中，你也看不到完全的或部分完全的当时口语的实录。这些俗语只是这里那里透露出来的一些非古典

的代名词用法，或某些方言语法结构。口语的特征，对研究汉语语法史的人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但不能根据这少量的材料来模拟当时口语的实际面貌。

一方面是口语成分流露在书面语言中，另一方面则是书面用语的成分被吸收到口语中来，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有几种途径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文人的日常用语很自然会受书面语言（特别是词汇方面）的影响。这种享有威望的文人用语，就被下层人士包括很多不认字和认字不多的人所模仿。另外戏曲、说书讲故事这类口头文学，本来以口语为基础，但也爱用文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这对广大下层人民也有一定影响，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阶层，很难在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即使在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无论词汇上还是语法上已有很大差距，也是很难办到的。

文言文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上半叶。20 年代初，白话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现在，文言文已不复存在，只有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才学它，这跟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西方国家的情形完全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文言文还没有完全灭绝，因为现代的白话文，虽以北京口语为基础，仍沿用不少文言中的书面用语及语法结构。而且，多数新词也主要用古代书面语言的成分去造成，而不是用现代口语成分去造。如古汉语的“足”，在口语中已不用，但在译外来词或造新词时，仍用“足”，如“足迹、足球、立足”等，又如常用的“忽然、虽然、即使、所谓、然而”等词，从来历上看完全是书面用语，现在不但书面常用，口头也常说。“以此为准”这个现代常用的短语，在语法结构和用词两方面，都是文言文体。古代书面语言的成分在现代的写作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很难设想一个人只掌握现代的汉语而不懂一点古代汉语。现在中学里还得教一些古代散文及文言文，大概也因为这个缘故。

现在只有少数人能写文言文，事实是越来越少了。尽管如

此，文言的影响还是到处都有，而且，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来说，熟悉中国三千年来的文学传统，也是必要的。古代书面语及后来的文言文的作用，很像拉丁语对现代欧洲语言的作用。拉丁文谁也不用它来写作了，但它的深刻影响，还在欧洲人及说欧洲语言的人的思想、言语、写作中起着作用。拉丁文、希腊文至今还是科技术语的重要来源。古代汉语像古典的欧洲语言一样，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语言在将来的发展，将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 阅 读 材 料

周法高。1959, 1961, 1962。中国古代语法。第一册造句编，第二册构词编，第三册称代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三十九号。台北。（该书是对古代汉语语法的全面叙述。列有大量中外参考资料。）

Kennedy, George A. 1964. *World-class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selected Works of George A. Kennedy*, ed. Tien-yi Li, pp. 323-433.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该文用结构原则对《孟子》语法试图作出分析描写。)

吕叔湘。1944。中国文法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重印，1982年。（该书对现代和较早时期书面语言的语法一起加以研究。其中对古代汉语的语法有很多深刻的见解。）

Yakhontov, S. E. 1965. *Drevnekitajskij azыk*. Moscow, Nauka. (该书对古汉语语法有很好的概述，俄文。)

## 第四章 注 释

① 参周(1962: 22-23)

② 参《论语译注》5·3及例(16)。

③ 关于词类划分有很多不同意见。例如 Henri Masper 这样的大汉学家，他认为汉语没有词类(1934)。其他如高本汉(1961)坚持相反的意见。

见。实际上,如对词类划分有个基本看法的话,就没办法写古代汉语语法或现代汉语语法。有关的讨论参赵(1968:496以后)。

- ④ 我觉得刘景农(1758)和雅洪托夫(1965)的说法很有用。
- ⑤ 雅洪托夫(1965)认为, A组用于上司对下级,但多数不认为这样。吕叔湘(1944)指出,汉以后文言中, B组用于对话,而 A组用于第一人称的叙述用法。
- ⑥ 不同的观点参黄盛璋(1963)。
- ⑦ 关于这些位置介词的解释可能有不同看法,参 Graharn(1978)和闻(1984)。
- ⑧ 比较 Emile Benveniste (1971: 169)的说法,他说法语“*Avoir*”(有)有一个及物动词的结构,但它不是一个及物动词。它是一个准及物动词。可能,在主语和 *avoir* (有)的宾语之间没有及物的关系,而可以认为是动作经过宾语、修饰宾语”。
- ⑨ 参吕(1944, §5.62)。“有、无”主要用作存在动词而不是占有这一点,从它们用作名词表示存在或不存在这点可以看到,比较《老子》“有生于无”这一句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 ⑩ 动词后接介词“于”及其指人的宾语,就可以看作是不带“见”的被动式,如“憎于人”。关于被动式的最近的研究,参唐和周(1985)。
- ⑪ 动词作名词的修饰法,常有歧义的危险。如“食客”,在某种情况下变成使动的意思,即使客食的意思,还有可能是吃客人的意思。造成这种歧义的情况更多地是属于词汇上的问题,而不是语法上的问题。古代汉语中这种歧义的情况,对初学者来说,是最感到头痛的地方。

## 第五章 白话作品的 兴起和发展

### 5.1 研究早期白话的资料

上一章已经说到，文言文是从东周和汉朝的古典散文发展而来，但绝不是永恒的、仅有的一种语言。在后来，口语，或称白话，对书面语言有明显的影响。白话的成分，在宗教典籍（特别是佛经），以及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中是特别明显的。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人，一般来说，就是从这些资料中发掘到很多东西的。

宗教文献在白话语言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传教士，由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在传教时都尽量用简单的、易于被人接受的语言来说明教义。所以，早在东汉时期，佛教文献（几乎包括所有的翻译，和对印度原文的解释）就具有强烈的白话味儿，这种白话性质，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宋代都是这样。流行的诗歌和短篇故事的集子也是研究早期白话的重要资料。保存有直接对话的文字段落，是研究早期白话的第三种重要资料，这种对话的记载，可以在历朝的正史实录、轶事趣闻及流行的传说故事中见到。

唐朝以前，很少看到完全是白话的文献，人们所能看到的都是以文言文为基础，夹杂某些口语成分的文献，这种白话的成分，因人而异、因著作而异，没有人能指出哪个著作是确凿无疑的纯粹白话文体。所有的著作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文言和白话的混合。这种情况使研究汉语句法和词汇历史的学者都感到难办。例如，在六七世纪有白话色彩的著作中，也用“其、之、非”等文言用语，但绝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其、之、非”等词仍然保留在六

七世纪时的口语中。如果在同一个作品中，用“不是”来指“非”，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非”在这个作品中只是文言的袭用，实际上当时口语说“不是”，代替了过去的“非”了。用这种检验方法，白话成分的一个大概的时代问题可以搞出来，但我们必须记住，汉语典籍浩富，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白话成分出现的时代，由于发现有更早的来历，因此得不断地往前推。

到了唐代，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已有很多特点，是和宋元时代的白话有关联。一般说来，唐朝的初期白话可以看作一种北方话（参第八章）。在不同的地方，存在有一些不同的方言特点，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个语言的基础仍是古代的汉语。很可能，各个阶段的白话作品，都和以首都的语言为基础的那种方言口语的发展有紧密的关系，而历朝的首都，从唐代起，除了几个时间短的朝代以外，都属于北方话区域。

下面，我们将考察早期白话的几个主要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属于初始阶段，即使是对一些最重要的白话作品的时代问题，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尽管如此，当时白话的一个概貌，还是比较清楚的。

## 5.2 名词、量词、位量词

在古汉语中，多数词，无论是动词还是名词，都是单音节词。由于整个汉语音韵系统趋于简化，声音不同的音节数目也就减少了。例如，大家都使用的《新华字典》，读 jiàn 音的就有 25 个字；而在《切韵》系统中，这 25 个字，代表了 18 个不同的音节；在更早的时期，很可能有更多的区别。由于不同音节数目的不断减少，本来不同音的字很多成了同音字，古代那种一字（词）一音节的模式有所减弱、双音节词开始增多也就很自然了。双音节词主要通过合成及加词缀两种方法构成。合成词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是合成词的数



目有限，另一个是结构上的凝固程度要比现代的合成词要差。关于名词合成词的历史还没研究得很详细，所以还很难对其发展作出清晰的勾划，而关于加词缀的构词方式相对来说要清楚得多。

最早见到并被大量使用的词头是“阿”。虽然“阿”这个词头在现代北京话中已不用，而在很多南方方言中，还被广泛用作亲属称谓及人名的词头。“阿”作为对人的一种亲近称呼的词头，可以追溯到汉代，三国时也一直沿用。“阿”这个字的本义指“山阿”，“阿”用作词头纯粹是同音假借而已。一些早期的用例如：“阿母”（汉代）、“阿斗”（蜀汉刘禅的小名）、“阿奴（指弟弟）”（晋代）、“阿翁”（晋代）等。“阿”早期也可用作人称的词头，如“阿谁”、“阿你”、“阿依”。宁波话复数第一人称的“阿拉”就是这种“阿”作人称词头的遗迹（赵 1928:95）。

“老”用作表示亲热称呼的词头，晚于“阿”。对待“老”字，我们必须小心区分其用作年老的本义，及用作词头的语法功能。“老”用作词头最初是加于姓氏前表示亲热的称呼。“老”明确用作词头的最早例子出现于唐代，在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几处这种用法。“老”用作某些熟悉的（常表示不喜欢、害怕的）动物及鸟类名称的词头，也最早见于唐代。“老鼠”、“老鸦”最早见于唐代，“老虎”似乎到宋代才见。

上述两个词头“阿”和“老”，只限于某些用法中，一般限于某些语义范畴的情况下才可用。而名词词尾“子、儿、头”在现在很多方言中都广泛使用。“子、儿”都指儿子、孩子，因此都用作表示“小”的词尾。词素“子”作为表小的标志还在南方方言中常用，广州话说  $tsai^3$ ， $to^1$  是泛指刀， $to^1 tsai^3$  指小刀；福州话儿子说  $kiaŋ^3$ ， $to^1$  泛指刀， $to^1 kiaŋ^3$  指小刀。对待“子、儿”尾时，就像对“老”这个词头一样，需要谨慎从事。现代汉语中的词尾“子”，由于读轻声，就可用来区别于合成词中的“子”。“儿”作为词尾，不只读轻声，而且不独立成为一个音节（参第七章7.3节）。而从唐代韵文、诗歌看，“子、儿”这两个词尾在当

时都被读作一个音节，即保留有完整的声调和音节。从最早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子”在合成词中用作第二个成分的例子；在古代汉语中，“子”或者用作孩子，或者用作孩子意义的引申，如“男子”、“虎子（小老虎）”、“舟子”（撑船的男孩，撑船人）。对这些用例，最好把它们看作合成词的成分，而不是词尾。而“子”作为小称的用法也开始得很早。“子”用来指小而圆的东西可以追溯到很早。如《孟子》中即有“眸子”的说法。“子”用作动物名称的词尾也起源很早，如“猫子”、“蚊子”、“貉子”在南北朝时即能见到。“子”用作各种工具的词尾，也很常见，如“刀子”、“笼子”、“瓮子”在唐朝以前就这么用。

唐以前，“子”作为名词词尾，大多有表小的意思，也偶尔有轻蔑意。到了唐代，“子”已可以用作各类名词的词尾，甚至一些很大的东西，也用“子”尾，如“车子、亭子、宅子”。唐时广泛运用“子”尾的其他例子如“茄子、袄子、獬子、燕子、妃子、笠子”等。

“儿”用作词尾要晚于“子”，虽然“儿”和“子”在语义上的发展很相似。一般来说，“儿”比“子”听起来更觉亲近一些。正如王力（1957）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难于判定“儿”在某些用例中是否具有完整的声调，因而也就难于区别“儿”是用作实词还是表示小称的词尾。尽管如此，到了唐代，“儿”作为词尾已广泛使用，例如“雁儿、蜂儿、鱼儿、瓶儿”等。在唐朝作品中，除了少数例外，“儿”只用作生物名词的词尾。到了宋代，包括非生物的各类名词都可用“儿”尾，如“小车儿、葫芦儿”。到后来，“儿”尾就用得更宽泛了。

词尾“头”比“子”尾、“儿”尾有更多的限制。尽管如此，“头”作为名词词尾也出现得很早，“头”用作位置词的词尾（参第七章），早在南北朝就可见到，如“里头、前头、后头”。到了唐朝，“头”已用作一般名词的词尾了，如“石头、枕头、骨头”。这些用法在今天的普通话中还在使用。

现代汉语的特点之一，是关于量词的使用，相反，在古代汉语中，量词的使用反而是一种例外，不像现代汉语非用量词不可，（这儿“量词”的概念限于赵元任[1968]所谓的和某些特殊名词相关的个体量词，表示数量和容量的“斤”、“桶”几乎是哪儿都用的，并非汉语特有，故不论。）在汉朝以前，数词和指示词总是出现在所指的名词之前，也就是说紧接着所指的名词，如“三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用量词，而且在名词之后，如“马三匹”。虽然数词和量词在很早就一起连用了，但这种数、量词的广泛使用，直到汉朝才开始；南北朝时就常见了。根据刘世儒（1956）的研究，今天用的很多个体量词在南北朝就用了。下面举例说明南北朝时的几个最常用的量词。

1. 枚。“枚”作为量词，《史记》及东汉的《吴越春秋》中已见到。“枚”本义为树干，“枚”作为量词，刘世儒（1956）认为是从“枚”作为木片、筹码的后起义发展而来。南北朝时，“枚”用作各类实体名词的量词，用得最广。今天的普通话已完全不用“枚”作量词，而日语则借用“枚”作量词，沿用至今。

2. 个。“个”是普通话中最普遍使用的一个量词，可和南北朝时的“枚”相匹敌。“个”的本义是指竹枝，后来变成很多种类名词的常用量词。南北朝时期，用法更加扩大，“个”甚至和名词“人”相连用，和其他指人的名词也可连用。到了唐代，“个”进一步可用作抽象名词的量词了（刘 1956:85）。

3. 头。“头”因为是指头、首的意思，用作量词时也多指有头的动物之类，如“铜兽一头”，“犊十头”等。现在，“头”用作量词限于家畜，而在南北朝时，“头”也可用于野生动物、鸟类、昆虫、鱼，如“虎三头”、“十二头鱼”。

4. 本。“本”原指树木的根本，最初用作量词时一般指各种植物：“五十本葱”。南北朝时，“本”常用作书籍的量词，这个用法一直沿用至今。“本”如何从指树木的本，变成书籍的量词，不太清楚①。

5. 条。“条”本义指枝条，后来用作长条物体的量词，如“一条绳”（东汉时），“条”用作抽象事物（如“事情、事业”之类）的量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词义发展的过程。在汉朝，文字都书写于长条儿的竹简上。一件事情写下来就是一“条”，这样“条”就成了长条竹简的量词，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由这点再转变为，写下来的一件事也成了一“条”。“条”作为文字记载的量词，在今天说的“一条新闻”中还留存着。

6. 隻。只有少数几个量词是从一开始就作为量词出现的，“隻”就是其中之一。《说文解字》就把“隻”释为鸟一隻。在汉朝以后，公元3~4世纪，“隻”常用作禽鸟的量词，如“鸡一隻”。“隻”由单个（和“双”相对）的意思，从而也用作指本来成双事物中的一个，如“羊腿一隻”。再进一步，凡是长的硬的东西都可用“隻”作量词，如“矢十隻”。到了唐代，“隻”用得更普遍，“船、椅子”之类都可用“隻”。今天普通话中，“隻”是最常用的量词之一，多数用法在南北朝时已能见到。福州话中，“隻”的常用程度和普通话的“个”相当；福州话“隻”甚至也可作为“人”[nɔiŋ<sup>2</sup>]的量词。

从上述几个量词的早期用法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量词的出现，一般都来源于名词，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第二点是，早期，数量结构多出现于所指的名词之后。由于汉语发展的趋向是修饰成分在被修饰的成分之前，所以，数量结构倒过来处于名词之前的词序，从南北朝起就越来越常见了。

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结构和被修饰的名词之间搭配是确定的，不是随意的，但很难看清，这种确定的搭配关系是从何时正式确立的。根据王力（1957）的意见，南北朝时量词的广泛使用已表明，那时的口语中，数量结构已确定置于名词之前，而那种数词直接冠于名词之前的用法，纯粹是模仿过去的书面词序。

在古代汉语中，位置词“上、下、内”等都是单音节词。而位置词加上词缀构成的双音节词也很早就有了。位置词加上词尾

“头”（见上文）在汉朝就已见到，并沿用至今。还有一个常见的位置词词尾“边”在唐代就可看到（Ohta 1958）。表示空间位置的常用语素变化很小（参4.3节），只有一个例外，即在当时口语中，“裏”完全取代了“内”。虽然“裏”在古代典籍中也能见到，但比“内”要少得多。到了晋代，“裏”已是一个常用的位置词了。双音节词“裏头”在唐代能见到。这说明，“裏”很可能在那时已取代了“内”。

### 5.3 代词

关于人称代词，从上古到唐代这段时间，有三方面的重要演变，那就是，一、“吾”和“我”的不同用法逐渐消失；二、第三人称代词“其”和“之”被一个新的代词所取代，这个新的代词无论处于什么位置，都没有什么形式上的变化；三、复数形式的形成。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上章已经看到，第一人称“吾、我”，第三人称“其、之”，在用法上有不同的分工，但到了汉代及以后，第一人称的不同分工逐渐消失了。到了南北朝和唐代，已看不出“吾、我”在用法上有什么不同。如何解释这种演变呢？在现代方言中，看不出“吾”还在使用的迹象。Gurevich(1974)已注意到，在一些早期的佛经翻译中，“吾”已完全消失了；另有些译经则喜欢用“我”。Gurevich由此得出结论，“吾”在汉、唐期间，已经不作为口语用词了。虽然后来书面也还见到“吾”，这只是文言而已。这样的解释，和现代方言中第一人称的分布情形能一致起来。

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在南北朝文献中，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语法位置，并无区别。唐以后，“你”就用得多了。“你”（中古拟音 *nĩ:*）实际上就是“尔”（中古拟音 *ńzje:*）的变体。据《广韵》，“你”原是西北方言，可能是从隋、唐的首都长安扩散到全国去的。现代方言中的第二人称，都是从“汝”或“你”发展而来；“汝”的后裔，好像限于闽语（参9.4节）。

在古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没有用作主语位置的，“其”作为所有格形式，“之”用作宾格。汉以后，“其”侵入到过去用“之”的领域，还可以出现在主语位置。这也反映了汉之前人称代词主、宾格不同用法的消失。“其”好像还留存在吴语中，作为一个普通的第三人称代词（赵 1928: 96）。还有“伊”（中古拟音 *ʔi*），原是一个指示词，在四五世纪也用作第三人称，到唐代就常见了。“伊”还留存在上海等地的吴方言中，以及沿海的一些闽语，并散见于其他一些地区<sup>②</sup>。还有一个差不多同时出现的第三人称是“渠”（中古拟音 *giwo*）。“渠”留存于南部和中部的方言，如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闽语、吴语。

“伊、渠”都没有什么语法作用上的限定，可随意用作主语、宾语和修饰语，不像上古的“其、之”只出现在不同的互相排斥的语法位置。这几个新的第三人称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汉语中人称代词体系的结束。

现代汉语官话区到处都用的第三人称“他”，比“伊、渠”的发展更为复杂。“他”原指其他，在古代汉语中，“他”可修饰人以外的所有名词，“他”单用时只指非生物的名词。到了南北朝，“他”才用来指他人。在唐之前，“他”是否用来作为纯粹的人称代词还有争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在唐之前，还没有看到“他”用作第三人称的毫无歧义的资料<sup>③</sup>。“他”用作第三人称的最早的无歧义的例子见于初唐（公元7世纪），到8世纪时就用得多了。

现代方言中的指示代词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只探讨最常用的“这、那”。“这、那”都是最早见于唐代<sup>④</sup>。“这、那”的最早用例都不带量词，而是直接冠于修饰的名词之前。关于“这、那”的来源，看法很不同。吕叔湘（1947）认为，“这”来自古汉语中表示动词名物化的“者”（参4.7节）。虽然“者”和“这”的语音能说得过去，但在语义和句法上都不合。正如王力（1957）指出的，“者”总出现在所指的成分之后，而“这”总在所饰的名词之前。当然，尽管在语义上、句法上说不通，但也不能排除有这种

来源的可能性。王力(1957)则倾向于古汉语中的指代词“之”是“这”的语源;从语义上、句法上看,是合适的,但在音韵上有个问题,“之”(中古拟音 tʃi)怎么成了“这”(中古拟音 tʃja:)?目前对“这”的语源问题好像还没有满意答案。

对远指代词“那”的语源,看法比较一致。古汉语中就有一个指代词“若”(中古拟音 ɳʒjak~ɳʒja:);汉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尔”(中古拟音 ɳʒje:).“那”(中古拟音 nâ-)和这两个词不只音韵上相合,语义和句法上也一致。

关于疑问代词,“谁”和“幾”从汉之前直到今天的官话方言,都没有什么变化<sup>⑤</sup>。而“什么、哪、争怎么”则是新出现的疑问词。

张惠英(1982)在《释“什么”》一文中,很有见地地指出,普通话的“什么”来自“什物”(中古拟音 ʒjəp mjuet)。从唐代开始,这个疑问词以其多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因而字形也不同)来出现。“什物”原指各种用具、物件。由指什物东西而变为疑问词“什么”,在现代意大利语中也能见到,意大利语 cosa 既指物件,也用作疑问词“什么”。类似的情况在一些闽方言中也能见到,有些闽语方言表示什物的词,在另一些闽方言中则用来表示“什么”,例如:厦门话 mi²⁸ kiã⁵ 指物件,建瓯话 mi⁴ ti⁶ 也指物件,潮州话 mi⁵ kai² 则表示“什么”;厦门话 mi²⁸ (物)同时就是疑问词 sim³ mi²⁸ 的一个成分<sup>⑥</sup>。

疑问词“哪”的用例,比相应的指代词“那”要早<sup>⑦</sup>。南北朝时,常见复合的“那得、那可”,都是为什么、怎可、怎能的意思,如“那得独饮?”。在那时的佛经中,“那”有时也问什么地方:“当那求之?”。要注意的是,“哪”作为疑问词,是用作副词,“哪”和名词、量词的连接用法,直到唐代才出现(Ohta 1958)。

疑问词“争”见于唐代的作品。与之相对应的指代副词是“能”(那样,如此)。在晚唐和五代时期,还出现了“作没、作物、作摩”,其中的“没、物、摩”都是上文讨论的“什么”(来源于“什物”)中

“物”的变体。五代时，在这些双音节疑问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合音词“怎”（较早的读音是 zěm）。从这个合音词“怎”发展为现代汉语中的“怎么”。而“这么、那么”很可能就是“怎么”的一种类推。

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之一，就是缺乏单数、复数的区别。在汉代及以后的作品中，人称代词开始带有“等、侪、辈”等复数标志。晚唐以前，人称代词数的区分是否是必须的，还值得怀疑。在发展的早期，只有在需要防止歧义时，有时加上人称复数形式。由于所有方言的人称代词都有数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复数形式，这也意味着，汉语人称代词数的不同是相当晚才有的。

普通话及几乎所有官话方言中用的复数人称词尾“们”直到宋代才出现。对于“们”的来历，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想，这很可能是“每”和“人”的合音。当然，书面还未见到就写作“每人”的，元朝的作品单用“每”作复数人称。“们”只用于人称代词及指人的名词复数，也说明这个假设是可能的。

复数第一人称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这一点在现代方言中并非普遍，而普通话则完全继承了宋元时代北方方言的这一区别：“我们”是排除对方的，“咱们”是包括对方的。“咱们”是怎么来的？说“咱”是“自（中古拟音 dzi-）家（中古拟音 ka）”的合音似乎没有太大疑问。“自家”称自己早见于唐代。到了宋代，“自家”用作单数第一人称及包括式复数第一人称（Ohta 1958）。合音形式“咱”也起于宋代。

其他人称代词和复数词尾“们”的合音也在差不多同时发展起来了。“您”（较早的读音 nīm）一开始是“你”的复数形式，后来是单数第二人称的敬称，这种用法在今天普通话中还有。“俺”（较早的读音为 ām，或 ǎm）是“我们”的合音。在宋朝，“俺”只用于单数，今天，有些方言中还用“俺”。“偕”，作为“咱们”的合音，用作单数第一人称及包括式复数第一人称，见于元



朝，而普通话中已不用了。

## 5.4 谓词

从古代到现代，谓语的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1) 几种动词合成词的发展；(2) 新的时态体系的出现；(3) 一套新的助动词的出现；(4) 新的系词的出现；(5) 否定式的变化；(6) 新的副词的出现；(7) 介词的大量增加；(8) 使役式和被动式的变化。下面逐个加以讨论。

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动词合成词；当两个动词在一个短语中紧跟着出现时，就得用动词性的连接词“而”把它们分开。到了西汉，没有“而”分开的紧连着的两个动词开始出现了（祝1958）。汉以后几个世纪，动词连在一起的用法越来越多了。Gurevich(1974)研究了3至5世纪的佛经中的这类动词合成词，Gurevich把它们分为三类：(1)同义或近义的合成词，(2)动词加上结果补语，(3)动词加上方向补语。第(1)类同义或近义的合成词，指这样的两个动词间不插入别的成分，并形成凝固的合成词，例如“喜欢、想念、死亡”等。（这几个词一直沿用至今。很有意思。）

Gurevich的第(2)类合成词，是由一个及物动词加上结果补语组成，如“打杀”，是打死的意思，“斫得”是砍下的意思。第(3)类是动词加上方向补语，如“流出、飞来”等。

动词合成词由于成了凝固的结构，所以如果动词带有宾语时，这宾语只能出现在整个合成词之后。而动补合成词、动向合成词的结合程度就比动词合成词来得松散。动补、动向合成词的宾语，虽然有时也在整个合成词之后，但多数是插在合成词的中间。所以，除了“烧杀长寿王”这样的词序外，也有“打缸破”的词序。这说明这类合成词的结合程度当时还不紧密。到了后来，动词合成词的两个动词之间，动词和补语之间，结合得紧密了，因此不能在中间插入别的成分了。而在动向结构中，仍然可以看到把动

词和表方向的成分隔开的情况，例如，南北朝时有“送食来”的用例，而现在还说“送东西来”。而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宾语在这种动向结构之后的另一种用例。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在时态体系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动词词尾“了、着”的出现。古代汉语中，在动词前加上“既”，就表示动作的完成；到了汉代，“既”被“已”所取代。Gurevich 就已注意到在佛经中，虽然“既、已”还在使用，但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已”已经移到从句之末。古汉语用“王既出”的句型，而早期佛经中就会用“王出已”这样的句型，表完成态的“已”置于句末。在带有宾语的及物动词的用例中，“已”置于宾语之后，如“王见贼已”。南北朝时期，这种“动·宾·完成式词尾”的句型很常见。除了用“已”表示完成外，还有“毕、意、讫”也可用来表示完成的意思。在流行的唐朝变文中，这种结构见得很多，而同时，“了”（中古拟音 lieu:）渐渐取代了上面提到的几个表完成的词的用法，于是“动·(宾)了”的格式，就成了最常见的表完成的句型<sup>⑨</sup>。到了10世纪。“动·了·宾”的格式也出现了。梅祖麟(1981)认为，这个新的词序，是受当时结果补语、可能补语置于动词之后的影响而致。这种把“了”置于动词之后的词序，无疑也是因为表示结果的补语本身，也是表示动作的完了。到了宋朝，这种至今还在使用的“动·了·宾”的结构，在白话作品中已完全确立了<sup>⑩</sup>。

关于表示动作持续状态的“着”(zhe)的历史发展，不像“了”那么清楚。根据吕叔湘(1940)、赵金铭(1979)的著作，在唐朝的诗和佛教文学中，“着”已常用于动词之后。“着”表示动作持续的意思，显然是从“附着”这个意思发展而来。南北朝时，“着”用作动词词尾，是表示所在的地方，如“坐着膝前”，是坐在膝前的意思<sup>⑪</sup>。吕叔湘(1940)、王力(1957)、赵金铭(1979)都认为，表动作持续的词尾“着”就是从这种早期的用法发展而来。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希望看到更多的证据。中古汉语中，这同一个

“着”（中古拟音 *djak*）很早就用作动词的结果补语，表示动作进行得很成功；这个用法至今还用，读作 *zháo*。

古代汉语中，表示过去曾有过的意思用“尝”，汉朝时出现了用在动词之前的“曾”（中古拟音 *dzəŋg*）<sup>⑫</sup>，南北朝时也常用。“曾”和“不、未”结合成“不曾、未曾”时，表示从未有过的意思。“曾”单用的情况，在现代口语中已完全消失了，而否定式“弗曾、未曾”仍活用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方言中，有些是以合音的形式，如苏州的 *fən<sup>1</sup>*（“弗曾”的合音），广州话的 *mei<sup>6</sup> tshaŋ<sup>2</sup>*。在普通话中，“曾”的意思已被词尾“过”的用法代替了。动词词尾“过”，在宋朝时就已出现，是从动词“过”发展而来。

汉语动词的情态，从来都是用助动词来表示的。只是“得”是个例外，“得”本来是个动词。在汉朝，已能看到“得”和动词用作合成词，如“采得”、“学得”、“买得”。有时候，这个后置的“得”只是表示头一个动词的成功结果。动词加“得”中间插入“不、未”时就构成否定式，“买未得”表示没能买到，从中也可看到，词尾“得”是用来表示可能的意思，唐朝时，动词词尾“得”表示可能状态就很常见了。今天也还这么用。

除了“得”这个例外，情态都由助动词来表示。其中“可以、能、敢”从古一直用到今，而“欲、必”则已在口语中消失而代之以别的新词如“当、要、解、须”。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1. 当（中古音 *tāŋ*）。在汉代，“当”用作应当的意思已很常见。在南北朝的资料中，据 Gurevich 的研究，“当”还常用作“将”的意思，表示将来。在现代汉语中，“当”已经不能单用，只出现在复合助词“应当”一词中。

2. 要（中古音 *ʔjiǝu-*）。在现代汉语中，“要”表示必须尽的义务、意志，表示将来。根据 Ohta (1958: 200) 的意见，“要”用作助动词，是唐朝时候就开始的用法。

3. 解（作为助动词今读 *xiè*，中古音 *ɣai:*）。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如“不解说”是不会说的意思。在较晚的白话文学中，多

数情况下，“解”被“會”（中古音 *yuai-*）所代替，“會”在唐代只是领会、懂得的意思。“解”作为助动词的用法在闽语中还保留着：福州音 *a<sup>6</sup>*，厦门音 *ue<sup>6</sup>*，建阳音 *hai<sup>5</sup>*。

4. 须（中古音 *sju*）。是表示义务的助动词。“须”在古代汉语中很少用，汉以后就常用了。另一个表示义务的助动词“得”（中古音 *tək*）直到唐五代时期才出现（Ohta 1958: 197）。

系词“是”的出现是汉以后的重要发展之一。古代汉语中，“是”基本不用作系词，系词句就以“X，Y也”的形式出现。X是主语，Y是谓语。相应的否定式是，“X非Y也”，“非”是名词性谓语的否定词。汉代时，原来用作指示词的“是”开始作为名词性谓语的标志。“是”作为系词的早期用例，如司马迁的《史记》：

其是我弟欤？

“是”原来是指示词，怎么变成系词了呢？一种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是”这个指示词用作主语时，由于不断被重复，于是变成了系词，犹如俄语的 *это*（这）用作强调名词性谓语的标志<sup>⑩</sup>。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而另一种因素可能也起到了促进这种发展的作用。那就是，在古代汉语中，“是非”常连用，这就是说“是”即“非”的对立面，由于“非”一直是名词性谓语的否定词，这样“是”就很自然被看作名词性谓语的肯定词，名词性谓语句中，原来空着的那个地儿就被“是”所填入<sup>⑪</sup>。南北朝时，“是”用作系词已属常见，说明口语中，这种新的系词结构已完全取代了古汉语中原来的用法。一开始，“非”用作和新的系词“是”相应的否定词，当“是”越来越变得像动词时，“非是”的用法就出现了，南北朝时常见。到了唐代，“非”被更一般的否定词“不”所取代，“非”在口语中就完全消失了。

古代汉语中众多的否定词到了后来的白话作品中就减少了很多。古汉语的“弗”和后来的“不”常被混而为一，也是得以留存，成为最常用的一个否定词（参 3.6）。

现代用的否定词“没”的来源，更是一个难题。“没”在中古

汉语中是沉没的意思，中古音是 *m(u)ət*。Ohta(1958:301) 认为现在的“没”是从沉没的“没”派生而来。虽然这从音义看是可能的，但我认为，“没”更像是源自古代汉语的“未”（中古音 *mjuəi-*）。犹如“不”原来有 *-t* 尾一样，“没”原来当也有个 *-t* 尾，很可能，是“未”和“之”（上古音 *\*tjəg*）的合音，这个合音 *\*mjuət* 就像“不”一样，失落舌面介音，而成为中古时的 *m(u)ət*。（据张惠英笔记，丁声树早在 1977 年 2 月谈到，“曰”是“谓之”的合音。这和“没”是“未之”的合音道理相同。）唐朝时，否定词有时写作“勿”（和禁止词“勿”同形），但更多见的是作“没”（吕 1955）。*m(u)ət* 失落韵尾 *-t* 后，本来是 *mə*，但因“没有”常连用，受连音感染作用而作 *méi*⑩。

中古时期，禁止词经历了很多变化。常用的禁止词。由于其过于直率和无礼，就被各种委婉的说法所取代，而当这些说法也被认为不太合适时，就又被更新的不那么生硬的说法所取代了。“莫”原指没人的意思，后来变作禁止词，显得婉转多了，汉朝已开始用，南北朝及唐代就常用了，现代只有少数南方方言还用。唐朝时还有其他几个婉转一些的禁止词，如“休”，原为休止意，用作禁止词如“休唱”。其他如“不要、不需、不用”。“不要、不用”一直沿用至今。

北京话中最常用的禁止词是“别、甭”。“甭”是“不用”的合音。“别”一般认为是“不要”的合音，但在音理上不够令人信服。如果是“不要”的合音，当是 *biáo* 这样的音，而不是 *bié* 这样的音⑪。另外，如果“别”是“不要”的合音，则“别要”就不该再有，事实上“别要”也说。Ohta Tetsuo(1958:303)认为，“别”本是另外、不同的意思，由于汉语发展中禁止词用婉转说法的情况，所以“别”这个禁止词就是来自婉转的说法，“别说”原来是指说些别的不同的什么，用作禁止之意。我觉得 Ohta 的说法比合音说更有意思⑫。

中古汉语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副词。下面对其中几个副词的

演变情况作一些简单说明。

都，最早见于后汉和南北朝时。“都”原指都城，可能来自集中于一处的意思，由此变为总的、一起的意思（李行健 1958）。如果是这样，南北朝时“都”已作“完全、一起”的副词用，如“都尽”。据 Gurevich 对南北朝佛经的研究，“猴众都病”的“都”指的是主语，即全体“猴众”。这种用法到唐宋更常见，沿用至今。

古代汉语中，严格说来，没有表程度的副词，表程度时常用谓形容词。而到了汉朝，程度副词“极、最、太”也常用了。现代汉语常用的副词“很”，是从形容词“狠”而来，“很”作为副词，见于元朝。表示最高程度的“顶”比“最”起得晚，但在宋朝已见。

便，作为副词，现代口语已不用了，但在早期白话中常见。东汉时已见“便”这个副词，南北朝以后常见。现代口语中，“便”已为“就”所替代。“就”原是动词接近意，元时起用作副词。

古代汉语中有“唯、独”表示仅有的意思。到了汉朝，出现了“但”，南北朝以后常用。现代汉语则用在复合词“但是、不但”等词中。现代常用的“只”（及其他同音写法）可追溯到古代汉语时期。副词“就”用作仅仅的意思，不知起于何时。

随着新的副词的增多，新的介词也增多了，原来用得较少的那些早期的介词，通过意义的引申，也被用得多了起来。中代时期用得较多的介词如“在、从、向”。这三个介词在古代典籍中也能见到，只是后来用得更多了。“在”几乎完全取代了古代的“于”，在口语中已经只用“在”了<sup>⑩</sup>。“在、从、向”在今普通话中也一直沿用。

介词“为”在古代汉语中是施惠的意思，后来也还用作这个意思，而现在的沿用大概来自书面语。口语中相应的用法是“给”，由动词派生而来，用作动词、介词的“给”起得很晚。清朝之前的作品中，给的意思仍用古语词“与”来表示。有意思的是，“与”用作介词表示给予之意也起得很早。这也可用来说明，“给”的动词、

介词两种用法之间也是早就有着联系的。

古汉语中表示工具的介词是“以”。后来则用“用”。佛经中出现了介词“持”（中古音 *dī*），如“持刀割肉”。后来又出现了“把、将”表示工具的意思，如“把钱买药”。

古代汉语和早期白话之间一个大的区别是被动式的表达法。南北朝时期，“被”之后开始出现动词的施事，这已跟现代用法很相似了，“被”的这个用法完全取代了早期的“见”（王力1957）。早期白话中，“被”好像是一种书面的袭用，较多用的是“叫”（也作“教、交”）或“让”。奇怪的是，这种新的用法中，表示被动的意义都是使役式动词<sup>⑨</sup>。Ohta(1958: 247)引了白居易和苏轼诗词中两个用例，如果这真是被动结构的话，那在唐宋时期也还属于少见<sup>⑩</sup>。值得注意的是，满语中被动式、使役式用的是同一个后缀。虽然“叫、让”用作被动式在清朝以前已出现，但还是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多数北方方言中，“叫、让”都有取代其他竞争者的趋势。

古代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可用作使动式，如“破之”是使之破。汉初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式，即及物动词后可加上不及物成分（动词或形容词），合成一个使动词的意思。如“破之”便成为“攻破之”这种新的形式了。这说明，那时口语中，这些合成的动词已取代了原来那种使动式结构了。最后发展为完全取代了过去的用法。

古代汉语中另用“使、令”构成使动式，如“使之来”。这种结构比较稳定。“使”的这种用法至今还用。有变化的只是新的使动词增加了，如“让、叫”，还有是出现了较婉转的说法，如“请”，“请他来”。

## 5.5 词序的改变

最近两千年来，汉语词序一直是很稳定的。主要的词序上的不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1）动词和代词宾语、疑问词宾语的位置，

## (2) 动词和表示地点、工具两种状语的位置。

第四章讲到，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置于否定词和动词之间，如“未之食”。到了汉代，就可看到很多，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置于动词之后，“莫知我夫”，南北朝时更多。王力(1957)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那时这种词序的改变已最后完成。

疑问词宾语也是这样，在古代汉语中置于动词之前。汉代就能看到疑问词宾语在动词之后了。以后这种形式更常见，当时口语大概早已把疑问词宾语置于动词之后了。

地点状语、工具状语在古汉语中都在主要动词之后。在介词“在”替代“于”同时，地点状语置于动词之前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工具状语在汉之前可以在动词之前或之后，表示动作的原因时，可以置于动词之前。在“以”让位于“用、持、把”同时，工具状语也移到动词之前了。如同地点状语一样，很难确切判断，何时这种词序的变更开始产生，但从这几个新的介词的广泛使用看，南北朝时已大量出现这样的词序了(Gurevich 1974)。

汉语句法史中最重要的发展，赵元任(1967:342 以后)称之为前及物结构，指用一个前及物介词把动词的宾语置于动词之前。常用来作前及物介词的“将”起得较早，“把”起得较晚，都从独立的动词演变为表示工具的介词。据王力(1957)、刘坚(1982)的观点，“把、将”用作介词时都表工具，初唐已见，中唐起，就有把动词宾语提前的明显标志。这两个介词表示工具的用法和它们的前及物用法并存，一直沿续到清代，清代以后，这两种不同的用法才分开了(王力 1957:414)。现代口语中，“把”依然用作前及物介词，“将”则只保留在书面语中。

现代普通话中，并非所有的介词结构都在动词之前。像“在、到、给”造成的介词结构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如果句子强调介词及其宾语而不是强调动词时，这几个“在、到、给”组成的介词结构就置于动词之后。而且，可以用这三个介词造成的介词结构的动词是很有限的。



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词序已由基本上是“主动宾”的词序演变为“主宾动”的词序，原因之一就是上面说到的前及物介词把宾语置于动词之前的这种新的词序。他们这种说法，虽和 Joseph Greenberg 1963 提出的一些词序规律相一致，但正如 Chauncy Chu(1984)指出的，支持这种汉语词序变更说的人，把 Greenberg 提的词序规律看作是一种既成事实，事实上这些规律只是一种初步的观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证实。如果是这样，称其为历史句法变更中的词序规律未免为时过早。另外，汉语中“主宾动”词序的出现，也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引人注目。在古代汉语中，介词结构就可以在动词之前，作地点、工具用的介词结构置于动词之前，可以看作古代汉语中介词结构前置的普遍化。如果再看一下现代汉语，介词结构仍有置于动词之后的某些情形，那我们更要怀疑，他们所谓的词序类型上的变更到底有没有发生，因为古今汉语中，介词结构都可以在动词之前或之后，尽管有些规则与今有所不同。至于直接宾语前置的情况，哪个时期的汉语都有这种现象<sup>②</sup>。在我看来，汉语是否发展了一个新的词序并非太重要，重要的是汉语各个时期宾语前置现象的经常发现，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 阅 读 材 料

Gurevich, I.S. 1974. *Očerki grammatiki kitajskogo jazyka III-IVvv.* Moscow: Nauka (该书是早期佛经语言的研究。而佛经是早期白话成分的宝库。)

Gurevich, I.S and I. T. Zograf. 1982. *Xrestomatija po istorii kitajskogo jazyka III-XV.* Moscow: Nauka (该书是汉末至明白话及半白话的集子，对各个时期的白话有所说明。)

Ohta, Tatuuo. 1958. *Chūgokugo rekishi bunpō.* Tokyo: Kōnan Shoten. (该书是日语著作中对早期汉语白话研究的好书。)

王 力 1957·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第二册谈词法、句法历史。）

## 第五章 注释

- ① 刘世儒(1965: 97)认为量词的“本”是从根本的意思变来，我觉得勉强。
- ② 看起来，第三人称的代词，包括古代汉语中的第三人称，都来自这类或那类的指示代词；其他语言，包括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都有相似的情形。
- ③ 当然很可能将来会有这样的例子，而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唐以前的例子，都是不确定的“其他”的意思(参唐 1980、郭 1980)。唐以前佛经中的“他”，参 Gurevich(1974)。
- ④ 指示词 *nà* 和疑题词 *nà* 虽然都写作“那”，但不该混同起来。疑问词“那”出现得要早。
- ⑤ 现代汉语中“幾”作为数词，后面当然得跟一个量词。
- ⑥ 厦门话 *sim<sup>3</sup> miŋ<sup>8</sup>*，如张惠英所指出的那样，非常可能是“什物”（演变为普通话的“什么”）的一种变体。
- ⑦ 《广韵》中，疑问词“那”只读平声。今读上声可能受“幾、怎么”的影响而致。有些南方方言如苏州、客家，读去声。
- 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在一些闽语中作为复数人称的标志：福州 *i<sup>1</sup>nŋiŋ<sup>2</sup>*（他们），*nŋiŋ<sup>2</sup>* 即人。吕叔湘认为“们”可能由“辈”变来，在音韵上说不通。
- ⑨ “了”在古汉语中不用。汉朝及南北朝时，常用作明瞭、聪明的意思，并引申为理解。用作“了结”的意思，是较后的事。
- ⑩ 只从书面的字形看，很难说清什么时候“了”读成轻声，并变成现代那样的 *le*。所有只作语法虚词用的成分，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变读轻声。
- ⑪ 福州话中“着” *tioŋ<sup>8</sup>* (<中古 *djak*) 仍用作表示处所的介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在”。
- ⑫ 在古代汉语中，“曾”还可用作没想到、居然的意思，这时候，后面常常有否定词。“曾”的这两种不同用法，不应混淆。

- ⑬ 王力(1957)引用俄语的例子 *deti-è o naše buduščee* (儿童是我们的希望)。
- ⑭ 高名凯(1957: 439)已看到,“是”显然最初是指示词,“非”最早可能也是指示词。他认为“非”可能和“彼”有关。如果是这样,“非”表示那个,而不是这个,于是发展为后来的否定作用。有意思的是,在闽语、客家、粤语中,没有非鼻音的唇音声母字。这表示, *p*-声母否定词(参 4.5 节)是古代某个北方方言所用。
- ⑮ 北京话“没”字声调属例外,古次浊入声字今当读去声。山东济南话古入声的去向和北京话相同,“没”就读去声(北京大学 1964: 343)。
- ⑯ 说“别”来自更早的 *biáo*,由于 *biáo* 这个音节在北话中不存在,才读作 *bié*,这么说,和“甬”就不一致。因为“甬”*béng* 这个音,在北京话中也属不可能的音节,但并不影响 *béng* 的存在。
- ⑰ “别”作为禁止词至少明代已见。“甬”则起得较晚。
- ⑱ 由于早期白话著作多多少少是文言和白话的混合,所以“于”和“在”也同时沿用至今。因而很难说“于”在口语中已消失了。从方言中不用“于”这点看,“于”的消失很早。
- ⑲ 北京话中,“叫、让”既是使动,也表允许。
- ⑳ 在 Gurevich 和 Zograf 编的白话作品集(1982)中从南北朝到明代,还没提到“叫、让”组成被动式的语法特点。
- ㉑ 关于这个问题,Chu(1984)的评论很有道理。关于词序问题的讨论文章,参 Tai(1973), Li 和 Thompson(1974), Light(1979)、梅广(1980)。

## 第六章 现代普通话(1)

### 6.1 现代普通话的形成

无论大陆、台湾，都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学校教学用它，政府、官方事务中也用它。这种情况是相当晚才有的，在最后一个皇朝清朝时，如果说有官方用语这个概念的话，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的语言，即通古斯语，因为清朝时，说“国语”指的是满文而不是汉语<sup>①</sup>。从历史上看，“国语”这个名称只为外族统治的那几个朝代所用，如拓跋魏、金、元时代<sup>②</sup>。但是，就是在那些朝代，大量的政府公文都是用中文而不是外族的语言。清朝时，政府公文用的是后代的文言文，官员讲的是带有各自口音的北京话，被称作官话。这种官话没有作任何规范，只是作为日常官场用语而自然发展。

本世纪初，在清朝衰亡的那些年代，很多人考虑中国进入世界文明的问题，于是认识到这种统一的官方用语的重要作用，这种统一的标准语，既用于教学和政府事务，也作为国家统一的标志。

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有两个方面：形成一种新的书面用语，把某一种口语作为全国各地人民的共同用语。在要改革的知识分子中间，都认识到传统的文言，即使加以现代的形式，也不能作为普及文化的工具，而且，一种新的口语也需要用来替代没作任何规范的官话。

早在1909年，教育部颁布计划：要在学校中进一步教学官话。第二年有了一个对教育部的提议，即用更为合适的说法“国语”来代替“官话”（刘复1925:14）<sup>③</sup>。在早期，国语主要作为学

校、政府用语，而不是作为文学用语，这是说，文言文还是要保留作为书面语言。

胡适(1891—1962)和陈独秀(1880—1942)领导了一场用基于早期白话如《水浒传》《红楼梦》中语言的新的白话来扫荡旧的文言文的运动。白话文献，如第五章已说的那样，从唐宋以来已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先是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后来很快就发展为要求文字革新、文化改革，白话很快就成了正式的书面用语。

由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取得一致，即口语是官话的继续，书面语以白话作品为基础，很快就出现统一读音的要求。官话本来就以首都北京的方言为根基，在作为不同地区之间共同用语和官方用语之后，去掉了不少北京土语，而用更广泛使用、都能理解的词语。遗憾的是，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的会上，为了统一读音，用不同方言的读音加以折衷，作为标准的读音，这实际上和哪个方言的读音都对不起来（刘复 1923: 19 以下），这种人为的读音标准，在1919年编的《国音字典》中就用上了。本来《国音字典》是用来正音的，但在出版后的两年中，由于其不实用而遭到激烈的批评。1924年，统一全国语言筹备委员会提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以北京语音为准的《国音常用字汇》的出版，至少暂时解决了读音标准的问题（Sofronov 1979: 103）。

在这同时，另一种设计一个全国共同语的活动也在进行。瞿秋白(1899—1935)和其他几位坚决主张废除汉字，而用拉丁字母拼音<sup>①</sup>。这是受苏联想把苏联的土耳其字母拉丁化的影响而致。瞿秋白提出标准共同语以新出现的无产阶级的语言为基础，是一种超方言的老官话。他称这种语言为“普通话”，以区别于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他认为这种上层阶级的官方用语不易被民众所接受。同样，他也不赞成五四运动以后的白话文，他认为书面语言要除掉文言成分，接近于普通话<sup>②</sup>。

1949年解放以后，瞿秋白等人的观点和“国语”派的意见很冲突。关于语言政策的一系列会议和激烈辩论就发生了。1955年，达成协议，中国全国的通用语正式定名为“普通话”，但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样，提“普通话”的那些人在名称上得胜了，而多数实质问题上“国语”派的人得胜了。现在看来，30年代“普通话”派和“国语”派之间，在最终目标上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来。

## 6.2 名称问题

上节谈到，在中国形成一个共同语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其结果是名称很多，每个名称都有其历史的社会语言学的含义。下面试加说明。

(1) 官话。指清帝国时用的超方言的共用语，现在这个名称已不用。“官话”和北京话关系不算紧密，有不同的地方特点，但属于轻微的不同。“官话”并没有确立一个标准音，完全为对付多语言多方言的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的语言。

英语把“官话”译为 Mandarin，指标准语以及这个标准语所属的大方言区。现在中国人不说“官话”，英语再用 Mandarin 就不太合适，当用 Chinese，或 Standard Chinese。有时因没有更好的称法，可以仍用 Mandarin 指北京、西安、成都、南京等方言所属的官话区。

(2) 白话。白话是对文言而说，唐宋以后的白话小说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原来只是作为白话文学的语言，到五四运动以后，成为日常所用的书面语言。在各个领域，已完全取代了文言。

现代白话文字中，还保留有不少的文言成分，想在现代书面语中完全清除文言成分这一点，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尽管现在文言对白话写作的影响逐渐减少，但书面的白话和口头的普通话还不能完全一致。

(3) 国语。国语很早就取代了官话这个名称。国语是全国的

语言，用来和外国语言、中国境内的非汉族语言，方言相对。正式的国语，实际上就是一种北京话，去掉一些土语，并加进一些其他方言的用语。大陆不说“国语”，台湾仍称“国语”。

(4) 普通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共同语的官方名称。普通话从名称上看是未加规范的意义不太明确的一种说法；从后来50年代规定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点看，和“国语”好像没什么不同。现在学校、政府部门都用普通话，是官方语言。

(5) 汉语。字面上看，汉语是汉族的语言。实际上，“汉语”已和“普通话”同样流行。在学术著作中，都用“汉语”这个名称。中国语言学家在指普通话时，也很少用这“普通话”的名称，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改成《现代普通话词典》会感到很不合适。“汉语”这个学术名称已进入口语，在国外，常会这么问：“你会说汉语吗？”

严格说来，“汉语”可指任何不同的口语或书面语，如“古代汉语”、“汉语方言”等。但现在越来越多地用来指标准共同语。“普通话”这说法很不明确，不像“汉语”能说明种族、文化这个实质。“普通话”可用来和非标准的地方用语相对，但用来和其他民族的语言、其他国家的语言相对，就太不显豁了。所以，现在“汉语”用得越来越多，也就不奇怪了。

(6) 中国话，是指汉语口语的一个老的说法、既可指方言，也可指共同语。完全是口语说法，现在已几乎不用了。

(7) 中文。“中文”既指口语，也指书面文字。“文”本指文字，日常说话时也指汉语口语。“中文”虽不作为官方用语，但实际上用得最广。有些情况下还非用“中文”这个词儿不可，如用来作为书籍、报纸、杂志、图片等印刷物说明用语，就只能用“中文”：“中文书籍、中文报刊”等。如果不用“中文”作定语，想不出更好的大家能懂的说法。

### 6.3 普通话语音

普通话只在语音方面有所规范，那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以，要描写普通话语音，实际上就是描写普通北京人的语音。当然北京话并非完全统一，但说话人之间种种细微差别毕竟不大，可以不予计较。一般说来，外地人讲普通话都有很明显的口音，但这并不改变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法定事实。

我们知道，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每个音节都和一个语素相对应。而从汉语语音学上看，也是以音节为单位，音节就是语音描写的基础。很可能，这种语音描写法，是受汉字的书写体系所影响，当然也还有别的影响。从历史比较来看，汉语的音节是最大的语音单位，而且汉语及各方言，也许还有其他单音节的语言，其可能有的音节数目都是固定的。尽管有新的外语音译借词，但也得用现有的音节去译，例如美国前总统 Nixon 的名字，就译为尼克松、尼克逊、尼克孙，不同的译音，都为汉语音节所固有，并没有新造音节。

中古语音学者对音节结构的基本思想，至今还有它的价值，尽管今天的语音分析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传统的方法是把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声调。声母指音节开始部分那个辅音，在中古和现代汉语中，声母都是单辅音。韵母分作介音、主要元音、韵尾，其中只有主要元音才是必须有的。声调和整个音节都相关，主要指音高，其他还有音长、音强、喉塞音这些特点，也起有一定作用。

下面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海外也用于教育的拼音方案来讨论普通话语音。



## 6.4 声母

表 I 是北京话声母<sup>③</sup>。

表 I 北京话声母

唇音	b[b]	p[p']	m[m]	f[f]	
舌头	d[d]	t[t']	n[n]		l[l]
舌尖前音	z[ts]	c[ts']		s[s]	
舌尖后音	zh[tʂ]	ch[tʂ']		sh[ʃ]	r[ʀ]
舌面音	j[tɕ]	q[tɕ']		x[ç]	
舌根音	g[ɣ]	k[k']		h[x]	θ[χ]

从发音方法上看，阻塞音（塞音、塞擦音、擦音）和响音（鼻音、边音、半元音）就很不同。所有阻塞音是清音，响音是浊音。多数方言也是这种情况，只有吴语和少数湘方言有所例外，塞音、塞擦音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不送气音（b, d, <sup>z</sup>等）是弱音，对没受过语音训练的人听来好像是浊音，送气音（p, t, c等）则是强音。

从发音部位看，b, p, m是双唇音，f是唇齿音。d, t, n, l发音时舌尖抵齿龈的前部，比英语的那几个字母略微往前些。z, c, s比d, t, n, l更前些，舌尖抵上齿背。

舌尖后音就是卷舌音。zh, ch, sh, r发音时，舌尖抵于硬腭后。在不圆唇元音前，发卷舌音时嘴唇放平，不像英语发卷舌音时嘴唇就略圆。汉语的r有时被看作[z]，实际上摩擦作用比较弱，因此和英语的r倒比较接近。如果把r看作和[ʃ]相对的浊擦音[z]，就等于承认普通话有清浊相对的语音特点，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舌面音，即由舌面抵腭，同时舌尖伸向齿龈。英语[dʒ][tʃ][ʃ]就在汉语的卷舌音和舌面音之间，所以说英语的学生学习区分“少”和“小”是很困难的。

根据赵(1968:21)的意见,我用舌根音这个名称来包括软腭音 g, k 和小舌音 h, ʁ。发 g, k 时舌根抵软腭, h 在后, 是小舌音, 零声母 ʁ 可有些不同的情况, 多数北京人发作带微弱浊音的小舌摩擦音 [x], 特别是跟在 -n 韵尾音节之后时, 如“翻案” fān àn, 在第一个音节韵尾 n 和第二个音节开头部分 a 之间, 不发生连音作用, 说明这个 a 不是纯粹的元音⑦。

很多方言不区分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所以这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 很难区分“山”和“三”, “迟”和“词”, “蒸”和“曾”等。上海、福州、台北、成都及其他很多地方都不能区别这两种音。能区别这两种音, 也就是说能发卷舌音, 就成为普通话讲得好的标志。

从音位的区别看, 上面所讨论的一些音都是各不相同的音位。而舌面音, 和舌尖前音、舌尖后音、舌根音都处于互补分配的关系中。舌面音只出现在前高元音 i, ü 前, 而其他三组则出现在 i, ü 以外的元音前。这就出现了音位分析这个老问题。Harman(1944)和 Hookett(1947)把舌面音看作是舌尖前音在舌面半元音之前的变体; Martin(1957)把舌面音看作是舌根音的变体, 赵(1968:21)认为 Martin 的说法最接近中国人自己的感觉。

西方人设计的汉语罗马字拼音, 都把舌面音和舌尖后音合在一起, 因为这对说英语的人来说, 这两组音很相近。现在官方所用的拼音方案及以前的注音字母, 都把舌面音单独分开。

## 6.5 韵母

先把北京话韵母列如表 II。

表 II 北京话韵母

a	o	e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i	ia	ie			iao	iou	ian	in	iang	ing	iong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ueng	
ü		üe					üan	ün			

从表中可以看到，第一排的元音主要是像 a 那样的低元音及各种央元音。一般说来，在 -i, -n 前的主要元音发得比较前，在 -o (国际音标的 [u] 和 -ng 之前的元音发得比较后。此外，央元音在唇音后就有点圆唇的样子。i, u, ü 既可作主要元音，也可作介音。

下面对韵母的发音作些语音上的说明③。

(1) i, ü, u。拼音方案中的 i 代表三个不同的声音。在舌尖前音后，是前面声母的延长，是弱的浊音 [ʒ]，同样，在舌尖后音之后，便是 [ʒ̥]，现在都标作 [ɿ ɿ̥]。从实验语音学看，卷舌音后的 i 比舌尖前音后面的 i 显得低些，前些 (Howie 1976:64)。i 在其他声母后，i 是前高不圆唇元音 [i̯]。普通话中，i 不出现在舌根音之后。ü, u 只在 n, l 声母后形成对立，ü 除此之外只出现在舌面音声母之后，u 则在其他声母之后。由于这种互补分配，ü 除了 n, l 声母之后，其他声母后就不用加上那两小点。xüe 写作 xue, yüan 写作 yuan, jü 写作 ju, 等等。u 发得很高很后，英语的 u 发得尖而低。ü 是个前高元音，圆唇很突出。

i, u, ü 既作介音又作主要元音，其中 i, u 还作韵尾。i 在唇音声母、舌面音声母后开口度比较紧，在舌头音声母后较松一些，如 tian 中的 i 比 pian 中的 i 就较松。ü 和 u 发音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声母同时发生的。

(2) e, ie, uo, üe。这四个韵母中，三个有介音。用传统的说法，没有介音的韵叫做“开口呼”，有 i 介音的叫做“齐齿呼”，有 u 介音的叫做“合口呼”，有 ü 介音的叫做“撮口呼”。e 作为单元音韵母，是不圆唇后元音，开始时较高后来有所降下，是 [ɤΛ]。e 在 i, ü 后发得较前，但 ie, üe 比起 ian 来，则多少发得后一些。uo 是央元音在唇音声母后变成圆唇音，最后是不圆唇的 o。拼音方案中，唇音后只拼 o，所以只有 bo po mo fo，其他声母后则作 uo。但唇音声母和 o 之间，还是能听到微弱的 u 介音。

(3) a, ia, ua。这三个  $\dot{a}$  都是央  $\dot{a}$ ，赵元任标作[A]。

(4) ei, uei, ei 中的 e 很接近国际音标的[e]，uei 中的 e 在上声、去声中比阴平、阳平中的来得突出。有些人还指出，舌根音后的 e 比其他声母后的也显得比较突出。

(5) ai, uai。其中 a 是个前[a]，甚至是[æ]。以前还有一个 iai，现在已不存在了。

(6) ou, iou。ou 中的 o 由于受 u 韵尾的影响而成为圆唇的央元音。iou 实际上是[io $\omega$ ]，o 在上声、去声中比阴平、阳平来得明显。

(7) ao, iao。其中的 a 是后[ɑ]。

(8) en, in, uen, ün。其中的 e 是不圆唇央元音[ə]，在上声、去声中比在阴平、阳平中来得明显，在舌根音声母后也被认为比较明显。ün 中的 ü 在接近韵尾 -n 时，几乎是不圆唇了。韵尾 -n 在 i ü u e 之后，发得更长些，更强些（李荣1963:33）。

(9) an, ian, uan, üan。其中的 a 都是很前的，ian 中的 a 处于[æ]和[ɛ]之间。ian 中的 a 是真正的前元音，不像 ie üe 中 e 要退向中央部位。

(10) eng, ing, ueng, ong, iong。这里的 e 要比 en 中的 e 发得后。有些北京人把 ing 中的 ng 发成小舌音。ong 中的 o 不像 ou uo 中那么开。iong 中的介音 i 实际是圆唇音。ong iong 中的 o 实际上同 u。ueng 韵只有“翁、喻、瓮、甕、魑”等几个零声母字。

(11) ang, iang, uang。ang, uang 中的 a 是很后的[a]，iang 中的 a 是中央的[A]。

(12) er。拼音方案没列为独立的一个韵。这是个卷舌韵母，和英语 birth 中的卷舌元音相似。er 在阴平、阳平中部位较高，是[əɹ]，在上声、去声中部位较低，是[ɐɹ]。这两种情况，舌头则同样只作卷起的样子。为便利起见，就在元音后加上 r。

有些人认为还有个 -m 尾韵，但这只出现在快速的语流中，

原来是双音节词，合成一音，如：“他们”作 tām，“那么”作 nèm，“什么”作 shém。

从音位的观点看，普通话只有5个对立的元音，即高元音 i u ü 和非高元音 e a。对立的5个音节如“利 lì、绿 lǜ、路 lù、乐 lè、辣 là”。拼音方案的 (u)o、ou, iou 在音位上最好看作是 ue, eu, ieu; ong, iong 则看作 ung, iung, 可以省却 e, o 的表面的对立。有些人企图否认高元音的存在，而解释为声母和半元音的合成，而元音韵母只是这复合声母的延长 (Harman 1944, Hockett 1947, Martin 1957)。这样，pi 就是 pj 的延续，同样 zhi 组和 zi 组也就是 zh 和 z 的延长。按照这样的分析，声调就是音节的决定性成分，元音就不是音节的主要组成成分了。这样一来，剩下两个元音，介音的作用也就没法解释了。应该承认，这种分析法，是一种人为的不尊重音节实际组成情况的方法。

普通话中还有一套儿化韵，从词形上看，就是主要元音加上 -r 尾 (参 7.3)。儿化后产生如下几种结果：(1)原来的 -i -n 韵尾失落，(2)前元音央化，(3)原来的 -ng 韵尾和 -r 合成鼻化卷舌元音。现把儿化后造成的变化列举如下：

ar air anr [Aɿ]	uir unr [uəɿ]
iar ianr [iAɿ]	üer ür ünrr [yɐɿ]
uar uair uanrr [uAɿ]	angr [ãɿ]
üanr [yAɿ]	iangr [iãɿ]
eir enr ir (舌头音、卷舌音后) [ɐɿ]	
ier inr ir (非舌头音、卷舌音后) [iɐɿ]	
uangr [uãɿ]	ongr [uẽr]
engr [ẽɿ]	iongr [yẽɿ]
ingr [iẽɿ]	

儿化韵是否算作单独的韵，一直争论得很激烈。很多非北方人不会发儿化韵，就尽量回避儿化，即使在“画画儿”这种情况下，还是说“画画”。所以，会不会儿化可以用来区别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 6.6 声调

汉语每个词，至少在单独发音时，都有声调，念错声调，就像念错了声母或韵母一样，就像英语念错了辅音或元音一样。

声调的不同主要通过音高来辨别，当然音强及音长也都起一定的辨别作用。所谓音高，也完全指相对的音高，因为不同的人，由于性别、年龄的差异都有不同，甚至情绪也起作用。

1930年，赵元任介绍了一种很方便而准确的标调法，这就是五度制标调法。就是用垂直线分作五度，1最低，5最高，3中间，4半高，2半低。一个声调，可以用它的起点和终点来标示，有时是降升调或升降调的，就还要标出中间那一点。简单说明如下：

44调，平调就是从半高调开始，一直延续下去。

35调，升调就是从中间开始，升到最高点。

52调，降调，从最高点降至半低。

242调，升降调，先从半低升至半高，再降至起点。

313调，降升调，从中间降到最低，然后升到起点。

赵氏标调法可以标调值，如55，或标调型7，51调可标作↓。为便利起见，本书只用数字标调值。

声调一般只指单念时的调值。单字调很多情况下和语流中的连读调相同，有时则不同。连读调出现的不同，有两种情况，一种只是声音上略有不同，是单字调的一种变体，另一种则读同别的声调。作为变体，只是语音上的变异；如变同别的声调，就是音位上的变更。普通话中，这两种变调都有。

普通话四个声调并不就是古代的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由于古调类发生了分合演变，只有少数方言的调类和《切韵》的调类一

一对应。这方面情况在第八、九两章再谈。

普通话四个声调简介如下⑨：

阴平调，是高平调。音强比较一贯，音长比阳平、去声略长，比上声略短。用赵氏标调法是55调。例如“歌、丁、东”。

阳平调，是高升调。从正常说话时的中间调升到最高点。升到顶点时比较强，音长则较短。是35调。如“拿、嚼、零”。

上声调，单念时是低降升调，从半低调降到最低再升至半高。开始时音强很弱，升起时才有所加强。音长是四个声调中最长的。是214调。如“买、马、懂”。

上声调连读时，出现在除上声以外三个调之前时，读半上调21，这是上声调中最常见的一种读法，因为单字调毕竟不常用到，出现在词末、句末也属少数。现代作品可以证实这一点。

上声调出现在上声之前时，读同阳平调。Hockett (1974)把这个变调称为升调(raised third)。后来 Dreher 和 Lee (1966)，王力(1967)提出，北京人并不能区别阳平调及由上声变来的所谓升调，他们不能区别“埋马”和“买马”。所以上声这个变调已属于音位上的变调，不仅仅是语音上的变异。

去声是高降调。从最高处直降至最低处，是51调。降至最低时音强减弱，音长也是四个声调中最短的。例如“六、嫩、去”。

连读变调除了上面谈的上声以外，还有三字组中也有变调现象。如果三字组的第二个音节是阳平调，或由上声变来的阳平调，第一个音节是阴平调或阳平调时，这第二个音节就变读阴平调。当然不快读，或第三个音节非重读而没声调时，就不出现这种情况。变调例子如：“联合国”，快读时“合”读阴平。“他买马”，快读时，“买”读阴平调。

## 6.7 重音和语调

有人认为，汉语是声调语言，就不可能像英语那样有语调。他们显然是想，音高不能同时对词和句子都起作用。实际上，汉

语除了声调，还有重音和语调。

关于重音，多数人都同意有三种情况（赵1965:35）：正常的、弱的、对比的。正常的重音就是能看到调型，但没有那种为了对比而强调的音长和音强。在正常重音音节连读时，最末音节是最重音，第一个音节是次重音，中间的音节最弱。这种正常重音的读法很有规则，可以预测，其不同重音的情况不过是些变体。

对比用的重音，比正常重音音域宽，音强也强，可以出现在语流中的随便哪个音节。例如“语言研究所”，正常情况下，最重音在“所”，次重音在“语”。对比用时，最重音可以落在“语”上。

弱音节，就是轻声字，英语有几个名称：neutral tones（中性声调）、atonic syllables（无声调音节）、weak syllables（弱音节）。说“中性声调”，意思是轻声算是汉语的第五个声调。从历史的、断代的观点看，这说法都不合适。轻声字不像其他四个声调，可以单念。当轻声字被引用时，例如语法老师讨论“了”或“罢”，一定得加上声调（一般读阴平调）。而且，轻声字的音值，完全决定于前一个字的声调。从历史上看，轻声字在中古时可能都有独立的声调；就是从现代看，轻声字出现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声调的表示一定意思的语素。

轻声字音长很短，**调域很小**，音高为前一个音节的声调所决定：在阴平后是半低调，在阳平后是中调，上声后是半高调，去声后是低调。在二字组中，后面是停顿时，调型有所降，在别的复杂的连调中，调型也会有不同。轻声字还有些别的语音特征，例如在正常重音或对比重音时读不送气的清音字母，读轻声时就变浊音了。在快速语流中，卷舌塞擦音、擦音声母会变作r，舌面会变作y，元音央化，以至e a不分。f c s ch sh后的元音，在去声之后有清音化趋势。

轻声是普通话及北方话的一个特点。由于轻声出现在具体的词上，非北京人就很难掌握。南方人说普通话只会说少数轻声字，限于那些后缀及助词。所以，外地人说普通话尽管别的方面



都说得很准，但轻声字没说好，北京人一下就能辨别出他不是本地人。

汉语的语调可以看作是带有声调的一种可升可降的音带。当语调音带上升时，原有的声调就会升到最高处，但其他有关的音节则保持不变。一般叙述句的语调，是到句末时稍降，这在长句中特别明显。这样，句首的阴平比句末的阴平就要略高。没有标志的问句，及由疑问词“吗”结尾的问句，总的来说，要比叙述句高。赵（1968：40—44）描写了普通话中其他几种语调，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详细的、全面的研究。

## 6.8 形态音位学 (Morphophonemics) (即连读音变)

我们已经谈过儿化韵所造成的韵母上的变化，这是成规则的变化，在某种环境内就一定会出现某种变化。也还有一种变化只影响到某个语素，不成一定的规则。

6.6 节谈到连读变调问题，上声出现在另一个上声之前，第一个上声自然变成阳平调，即使第二个上声读轻声，第一个上声也变阳平，如“小姐”、“走走”<sup>⑩</sup>。只有少数亲属称谓没有这种变读，如“宝宝”、“姐姐”、“婶婶”，第一个上声字仍读上声，第二个上声字读轻声。这些是例外，需要一个一个去学。

还有一些连读变调现象，还看不出有什么语音规则可以包括这些现象。如“一、不”，在阴平、阳平、上声之前读去声，在去声之前读阳平。如“一张、不难、不好”中的“一、不”都读去声，在“一寸、不去”中的“一、不”都读阳平。数词“七、八”在去声前也可读作阳平，如“七万、八号”中的“七、八”也可读阳平调。

有些字只在某种情况下才有特殊变调。如“骨”，在“脊椎骨”中读上声，在“骨头”中读阳平。又如“指”，就更复杂，在“指头”中读阳平调，在“指甲”中读阴平调。单念时作动词则读上

声。指的本词只在某些词中留存，如“大拇指、食指”的“指”就读上声。这种声调上的变读是一种偶然现象，还好这种情况很少有，否则学起来很难。

赵(1968: 45)指出，几个助词如“啊、呃、噯”，不像其他零声母字有微弱的喉擦音开头，它们没有这个喉擦音。由它们作为句末助词，前面那个音节的韵尾就可省略了，而这几个助词就出现了几个变体，如“啊”受前面音节的影响又可读作“呀、哇、呐”。例如：

你快来啊。(其中“啊”读“呀” ya)

您好啊。(其中“啊”读“哇” wa)

哪有人啊。(其中“啊”读“呐” na)

和别的语言比，汉语方言中这种连读音变的现象不多，只在连读变调中常见。很可能是因为汉语每个音节自成体系的缘故⑩。

## 阅 读 材 料

Chao, Yuen Ren. 1948.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对现代汉语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

De Francis, John. 1953.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该书对早期的文字改革历史和中国的语言政策介绍了很多情况。)

Kratohvil, Paul, 1968. *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 features of an emerging standard*.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该书是对现代普通话的总的介绍。)

Sofronov, M. V. 1979. *Kitajskij jazyk i kitajskoe obščestvo*. Moscow, Nauka. (该书对现代中国的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叙述。)

## 第六章注释

- ① 1768年的满汉字典《清文汇书》的序言中，“国语”显然指满州语。
- ② “国语”指北魏（公元386~534）拓跋语的用例参 Ligeti(1970)。
- ③ 当时选择“国语”这个说法，可能受日语用“国语”的影响（Sofronov 1979:94;95）。
- ④ 主张废除汉字的不只瞿秋白一人。钱玄同、胡适、傅斯年、赵元任在不同时期都有相似的观点（Sofronov 1979:231以下）。
- ⑤ “普通话”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最早提出，都不清楚，瞿秋白1930年用了这个名词（Sofronov 1979:251）。
- ⑥ 声母用官方批准的拼音方案，括号中的是国际音标。
- ⑦ fān àn（翻案）和 fā nǎn（发难）形成对立。少数北京人把零声母发作ŋ声母，多数则是发作喉塞音[ʔ]声母，特别是着重和强调的时候（李荣1963:31, Chao 1968:20）。
- ⑧ 韵母的描写主要根据赵元任（1968, 1948a）和李荣（1963）的说法。有些细节是赵元任与笔者私人交谈时所提供。
- ⑨ 声调的描写主要根据 Kratochvil（1968）。
- ⑩ 词尾“子、了”来自上声，但并不使前面的上声字读成阳平。从断代的观点看，应该把“子、了”这样的词尾看作无声调语素，已失去了原有声调的痕迹。
- ⑪ 福建东北部某些方言，如福州、福安、宁德等地，有一套复杂的连读音变规则，不只在声调上，也涉及声母和韵母。

## 第七章 现代普通话(II)

### 7.1 中国的语法研究

中国的音韵研究很有传统，而语法研究则是很晚才有的。在旧的注疏中虽也有关于语法的一些说明，但作为一种学科的系统研究，则到19世纪末年才开始。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是第一本语法著作，马氏以西方语法为模型来研究古代语法，这种古代的文言在当时还是最流行的书面语言。《马氏文通》对20世纪40年代前的语法研究一直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30年代后期，以陈望道(1890—1977)为首的一些学者，反对《马氏文通》套用西方语法，而主张建立更能反映汉语基本特点的新的语法体系。他们多少受西方语言学家如德·索绪尔(de Saussure)、叶斯柏森(Jespersen)、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三人的影响。于是在词类的划分、汉语语法的特点、白话与文言的区别、词序、语法范畴的确立等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要把汉语语法从西方古典语法中解放出来，走汉语自己的路(吕必松1980)。

40年代出版的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就是受这次讨论影响的两部重要语法著作。这两本书都吸收叶斯柏森、布龙菲尔德的思想，试图描写汉语语法的特点。吕氏书讨论白话兼文言，因为当时文言在学校中还教。王氏书讨论白话，主要引用《红楼梦》的例子。这两本书对汉语语法研究走一条新路都有重大作用。

赵元任1948年出版的《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是为美国学生写的汉语教科书。赵氏用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理

论。其语法导论部分后来由李荣译为《北京口语语法》，1952年出版。这个节译本对结构主义方法引入中国起了极大作用，当时有创新精神的语言学家都接受这些观点。丁声树等人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受这种影响特别明显。《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先作为单篇文章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这本书一直被看作是汉语语法的权威著作，使结构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

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之后20年，又出版了《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这本不朽著作是第一本用英语写的汉语语法的全面论述。它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及西方汉语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赵氏早期著作直接或间接的深入(徐、叶1979:170)。吕叔湘节译的《汉语口语语法》1980年于北京出版。

60年代后期，美国结构主义让位于转换生成语法。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夕，在朱德熙、吕叔湘的文章中，就有转换语法研究方法的试用，但后来没有能进一步发展(徐、叶1979:172)。最近20年，在美国，用转换语法及结构主义之后的语法研究汉语的文章很多，主要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上<sup>①</sup>。这些研究对中国的语法学家多少也会有影响，但这还只是对新的语言学所感到兴趣的一种象征，这些想法能否生根发展还得到将来才清楚。

下面对汉语语法作些概述，从中看看汉语语法的特点。主要观点还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结构主义观点，这些观点至今在中国还起作用，特别是在赵氏《中国话的文法》中，是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出现的。这不是为了反对后来的各家说法，而只是因为结构主义之后的分析法还处于初步的甚至是试验的阶段，几乎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中把这些思想条理化。

## 7.2 语素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是语法分析中最小的关联单

位。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绝大多数语素正好都是一个音节，或者反过来说，几乎每个音节都是一个独立的语素。因为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所以绝大多数汉字都代表一个语素。古今汉语的不同，就在于古代汉语的多音节词比现代汉语少得多。

从字典中可以看到，现代汉语有成千的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几乎所有这些词都可看作是一串单音节的语素。当然也有不少多音节的语素，但大概比古汉语中的多音节语素多不了多少。现代汉语中的多音节词如：薄荷、蟑螂、提溜、哈什蚂（中药用的一种满州青蛙）。作为次音节的只有 -r 卷舌儿化韵尾。-r 尾下文要讨论。

从语素的结合情况看，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可以单用，叫做自由语素；一种只能和别的语素联合在一起用，叫做粘着语素。这也不是绝对的两分法，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是粘着语素，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自由语素。所以，如果一个语素，在某种情况下可单用的，就是自由语素；如果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用的，就是粘着语素。例如“狗”，虽然在“母狗”中是粘着语素，但有单用的时候，所以是自由语素。而“猴”没有单用的时候，只能出现在“猴子、猴戏”等复合词中，就是粘着语素。

语素也可从另一方面去看，能和别的语素随便组合在一起的，叫做多能语素，如果只和少数语素才能结合的，叫做局限语素。所以，自由语素都是多能语素，而粘着语素多数是局限语素。赵元任（1968）就引“眠”这个例子，因为只在“蚕眠”这种情况下出现为自由语素，多数情况下则是局限语素。还有如指示词“这、那”、序数词头“第”、名词词尾“子”、位置词尾“里”等，都是粘着的多能语素。

### 7.3 词

汉语写起来是一个一个字，看不出词的界限，读者得自己加以判断。尽管凭直觉很容易判断，但要对词下个精确的定义却很

困难。因为汉语的书写单位不是词，不能像别的语言那样把书写单位当作词。丁声树等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对“词”释为“含有某种意义并能单独使用的”单位。这个定义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特别是传统的结构主义者都尽量回避用意义作为语言分析的标准，但这个定义表现了多数说汉语的人的直觉的标准。关于这个讨论赵书（1968：136—193）有详细的说明。

最简单的是一个词由一个语素组成，如“人、吃、我、很、重、跟、咱、哈喇、结巴”。这类词很多，是最基本的词汇。另一类词由一个语素加词尾组成。最常见的词尾是“子、儿”。“子”尾用以造名词，多由粘着语素加“子”尾，如“鼻子、桌子、炉子、蛮子、领子”等。“儿”尾也可用来造名词，但“子”尾多用来指日常熟悉的东西，“儿”尾名词则带有指小的意思，或者有点轻蔑的意思，如“杏儿、里儿衣服里子、画儿、子儿、球儿（和“球”不同）、官儿”等。“儿”尾只用于少数几个动词，如口语常用的“玩儿”。“头”尾的用法比较少，常见的是“木头、石头、骨头”等。

有些词通过改变声调来造成，如“买”和“卖”，“钉（名词，阴平）”和“钉（动词，去声）”，“量（动词，阳平）”和“量（名词，去声）”。这种方法只见于几组词，现在已不见再用这种方法造词了。

有几个准词头，如“老虎、老鼠、老鹰、老鹅”中的“老”，表示对有害动物的一种恭敬的熟悉。又如“第一、第三、第六”中的“第”。

重叠法也可用来造几种词。一是亲属称谓常重叠，如“爸爸、姥姥、哥哥”。还有如“猩猩、人人、痒痒、常常”。重叠法也表示一些语法作用，量词重叠如“本本”表示每一本的意思。动词重叠如“坐坐、看看”就带有赵元任所谓的临时的意思。不同动词的重叠常有些微妙的不同之处。

复合词是最多的，至少由非词尾的两个语素组成。“桌子”不

算复合词，因为由一个词根语素加上词尾构成。“桌布”就是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复合词。现代汉语中，复合法最便于用来造词，新的名词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都是复合词。现代复合词中有些成分用得很多，实际上已有作为词缀的资格了，如“心理学、地质学、生物学”中的“学”等。

对复合词加以分类很不容易。陆志韦(1964)和赵元任(1968)对不同类型的复合词作了详细研究。陆、赵发现，所有短语和句子中看到的语法关系，如主谓、并列、从属、动宾、动补等结构，在复合词中也都有这种结构。由于词和短语之间，缺乏明确的语音上的界限，因此对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之间加以区分也很困难。这是汉语语法中最麻烦的问题之一，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特别是进行文字改革而改用拼音连写时，在中小学教学中，以及词典编纂方面，都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 7.4 词类

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家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有具体意义，虚词的意义比较抽象，且主要用来表现语法关系。这和现代语言学家把词分为实义词(content)和功能词(function)的想法很相似。马建忠第一个把西方的词类划分系统地引入汉语，从那时起，词类划分一直是汉语研究中的中心问题。马建忠套用西方的词类划分标准，后来的语言学家则企图用句法功能来划分词类，而尽量不涉及词的意义。虽然其结果由于标准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主要的词类上，还是很一致的。下面的词类概述和几家所说也相接近，无大差异。

实词有六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名词可被指量复合词所修饰，如“这本书”，“书”是名词。动词前可受否定词“不”的修饰，后面可跟动词尾“了”（表完成）、“着”（表持续）。形容词可算作动词的一种（赵元任称它为不及物状态动词），因为形容词可以被“不”所否定，可以单独作为谓语。形、



动之间的不同在于，形容词可用“很”来修饰，动词则不能用“很”来修饰。

数词是表示数量的粘着语素，后面一般跟量词，量词是跟着数词或指示代词的粘着语素。数词、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时，中间必须有量词，如“一个人、那辆车”等。

代词是说话时所指称的人或事物。从句法上看，代词像名词，但不像名词那样前面可以有修饰语。人称代词见表 I。

表 I 人称代词

我	我们(排除式)	咱们(包括式)
你	你们	
您(敬体)		
他、她	他们、她们	

第三人称在书面有“他、她”之分，是关于性别上的人为的区分，因为口语中就是一个 tā。包括式、排除式的区别，在很多北方方言、多数闽语、一些吴语中能见到，别处则未见。普通话中，“我们”取代“咱们”，既用于排除式也用于包括式的情况并非少见。指示代词“这、那”常与量词连用，既用作代名词性，也用作形容词性。其他常用代词是“什么、哪、自己、每”。

虚词指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副词修饰动词、形容词，是粘着语素。如“只、渐渐、很、最”。中国语言学家一般把否定词“不、没、别”按其功用划作副词。从实词来的副词性修饰语（即“状词”）和副词不同，常有副词尾“地”跟随，如“慢慢地”。

介词都由动词变来。介词所表示的各种语法关系下文再谈。连词指“和、而且、所以”等。

助词一般是无声调的单音节词，用来表示几种不同的语法关系，或主观情态。中国语言学家把动词、名词的词尾都算为助词，

如“的、吗、啊、罢”都算助词。

叹词表示劝告、引起注意、表达感情状态等。在语音上，这些词常有些不规则的创新成分，如“啊”表疑问时音[hā]、“唉”音[ē]都非规则读音。象声词指模仿自然界声音的词，从句法作用看，是名词性的或状词性的，如“哗啦”指雨声，“咕隆”指雷声或大车声。

汉语和英语一样，词类上有交叉现象，如“犁”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很多双音节动词也可用作名词，如“批评、组织”等。这种词类交叉在古代汉语中更多见。现代汉语中的词类交叉大概没有英语多。

## 7.5 语法范畴的表现

汉语没有传统所说的词形变化，因而词缀在语法关系的表达上就起着很大的作用。词序、助词、介词也都用来说明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主要看看大家熟知的普遍的语法范畴及其在汉语中的具体表现。

(a) 数。只有代词才必须表示数的概念。代词复数词尾“们”可以用于所有指人的名词后，但和英语的复数名词有些不同。汉语带“们”的复数名词不能和数词连用；“们”并非总是非用不可；带“们”的复数名词指的是整个集合体，如“孩子们、老师们”。这种数的概念，在构词上很少明确标志，但在必要时，就用指示代词加上复数量词“些”来表示，如“那些人”。复数的主语、宾语或可用“都”来作标志，如：

(1) 书都在桌子上。

数的概念还可用表示量的词来表示，如“有的、一个、几个、很多”等。外国学生对汉语中“数”的概念并非必须表示这点不易习惯。

(b) 确定指和不定指。确定指和不定指，和数的概念一样，并非非表示不可。汉语没有冠词，但歧义的情况很少。确定指可

以由那些本身表确定意思的修饰成分如指示代词、领属代词来标志。缺乏这种确定意义的修饰语的名词，通过置于句首，或置于动词之前，也能达到确指的目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句：

(2) 我没给他书。(泛指任何书)

(3) 书我没给他。(确指某种书)

(c) 从属和修饰。汉语中所有修饰成分都在被修饰语之前，词尾“的”用来标志名词的从属语，包括领属语：

(4) 我的电视机。

(5) 今天上午的会

(6) 轻工业的发展。

“的”的这种用法和别的很多语言中的属格很相似。但是，汉语“的”还标志修饰用的短语：

(7) 你给他们的钱。

(8) 喜欢抽烟的人。

单音节形容词及指地理概念的名词作修饰词时，可直接冠于名词之前，如“好书、中国书”。赵元任(1968:285)认为这种没有“的”的词组是准复合词，就是说，更像词了。多音节形容词或被程度副词修饰的形容词就需要“的”，如“很好的书、有意思的书”②。

(d) 格。如果我们把“格”抽象地看作用来表现句中名词和动词之间关系的语法手段，那么汉语同英语一样，这种格的关系是用介词来表现的。从历史的观点看，汉语介词都来自动词，有些语法学家仍把介词看作动词的一类。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中把介词描写为在连动结构中处于前面的那个动词；到了《中国话的文法》，他把介词用列举方式算作过渡的范畴。即使从纯粹断代的观点看，介词的动词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常常是用作介词的词同时又用作动词。带着宾语的介词总出现在另一动词结构的前面。

及物动词的施事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都没有什么标志，都处于动词之前。泛指的直接宾语处于动词之后，也没有标志。确指

的宾语，特别是本身有确定性质的词，也可以在动词后。在某些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就用前及物介词“把”把宾语置于动词之前（赵元任 1968: 342）。例如：

(9) 我打了他。

(10) 你什么时候来。

(11) 孩子把饭吃完了。

例(11)中的把字结构在中外语法学家中讨论得很多。Henri Frei (1956, 1957)、王还(1959)、赵元任(1968)的研究是最为突出的。

某些表示存在、出现、消失意义的动词，其逻辑主语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如“下雨、走了一个人、出太阳了”。

受事（就是间接宾语或动作的受惠者）既可以在动词之后，也可以用介词“给”提到动词之前。如：

(12) 我给了他一本书。

(13) 给他打个电话。

(14) 他爱人给他理发。

普通话中，间接宾语总在直接宾语之前，在上海话、广州话中，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后。有些方言是两可。

用作工具的介词是“用”和更口语化的“拿”。如“用它切肉”、“拿尺量”。表示随同关系(comitative)的介词是“跟”：“跟妹妹去”。

上述介词（就是“格”）都用来表示语法作用（Lyons 1968: 295）。另一类介词表示位置作用，“在”就专门用于表示位置，如“在客厅睡觉”。“在”及别的位置介词总跟有名词及各种简单的或复合的位置词，简单的位置词如“里、上”是粘着语素，跟在名词后表示空间位置：“屋里”、“桌上”。复杂位置词是由表示位置的几个粘着语素合在一起，如“上头、下边、外面”等，如“书在报纸上边儿”，“他在门外边儿”。其他还有“里边、下边、后边、前边、右边、左边”等。

表示起点用介词“从”，如：

(15) 张同志从上海来。

表示目的地用介词“到”：“到北京去”。“从、到”都跟有表示位置的词和词组。

介词及其语法作用归纳如下：

把	(宾格)	跟	(协同)
给	(施与, 受惠)	在	(位置)
用	(工具)	从 <sup>⑧</sup>	(起点)
拿	(工具)	到	(终点)

(e) 体和态。汉语和很多东亚语言一样，有体而没有时，就是说汉语有关于动作完成与否、持续与否的表示，但没有动作时间的表示。

动作的完成体用词尾“了”：

(16) 我看了那本书，觉得不错。

(17) 你吃了饭再去吧。

例(17)的“了”指将来，例(16)则指过去，所以“了”表示体而不表示时。未完成体没有标志。

(18) 昨天晚上我看书。

例(18)动作没有完成体标志，但这并不就是说动作没有完成，这只是说昨晚所做的事，而不是说动作完成了没有。只有完成体的标志才说明动作是否完成，未完成体则不作任何标志。

动作的持续，可以用“在”置于动词之前：“他们在吃饭”，也可用“着”置于动词之后，这种用法较少些，如：

(19) 他们正开着会呢。

“着”更多用来把动作定型下来，如“穿衣服”是动作，“穿着衣服”就是定型下来的状态。“着”的另一作用是造成状语从句，如：

(20) 冒着大雪上山。

汉语动词本身不区别主动态和被动态。赵元任(1968:75)就

引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鱼吃了”，这个“吃”既可理解作主动的，是鱼吃了别的东西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被动的，是鱼被吃了的意思。汉语的被动态也可以用介词引入施事来明确表达。最常用的介词是“让、叫”，“被”显得更正式一些。被动态例子如下：

(21) 小玲让爸爸打了。

(22) 他被大家批评了。

口语中，被动式多限于意思不好的动词，或者表示安排、分配的意思。现代书面语中，被动式用得很广，各种语义环境中都可以，这主要是受西方语言如英语、俄语的影响而致。

(f) 否定。从句法看，否定词和副词一样，置于动词之前并修饰动词。“不”可以和任何动词结合，除了“有”以外，“有”用“没”来否定。如“不去、不好”。“没”否定存在：“没(有)书”。“没”也用来否定动词的完成体和持续体。“没来、没(有)坐着”。否定的命令就是禁止，用“不要、别”来表示，如“你别去”。

(g) 情态。情态涉及的方面很广，这里只是择要谈一谈。英语中必须用情态助词来表达情态，汉语也是用助动词来表达。汉语中的情态助动词有多种作用，因此语义上有交叉，特别是表示可能、允许的助动词。情态助动词只用“不”来否定。

表示意志常用动词“要”来表示，如“要去”。意志的否定可以是“不要”，更多的则说“不想”或“不愿意”。“想、愿意”也用作表示意志的助动词，如“想来”、“愿意看书”。

表示应尽的职责，可用“得”，口气很重；否定式是“不用、不必”。还可以用较缓和的说法“应该、应当”，否定式是前面加上“不”。

助动词“会”(否定式是“不会”)用于表示可能，如：

(23) 他今天会来。

“会”作为助动词还可以用作懂得怎么做的意思，如“会开车”。在北京话中，表可能时，“能”比“会”用得更多，如“他今天能来”(吕叔湘等 1980: 369)。

“可以”表示允许:

(24) 这儿不可以游泳。

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能”也表示许可的意思,如“不能抽烟”,“能参加吗”。

表示能力上的许可与否,情况比较复杂些。最常用的是“能”:“能走路”、“不能实现”。在动词带有趋向补语(如“拿上来、走进去”)以及动词带结果补语(如“打死、吃饱”)这两种结构中,表示可能时,就插入“得”(表示肯定)和“不”(表示否定),如“拿得上来、拿不上来”、“吃得饱、吃不饱”。

## 7.6 汉语句子

汉语句子,从总的一般的平面看,可分为大句和小句两类。大句由主语、谓语组成,如“我去”。小句只由谓语组成,如“去”。由于经常省略代词性主语,汉语中的小句比英语的小句要常见得多。大句可再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两种。简单句就是一主一谓构成,复合句有两个以上句子(可以是大大句,也可以是小句)组成。如果复合句的成分是并列式,就叫联合句,如“我去,张三也去”。复合句的成分不是并列式的,就叫做复杂句,如“要是你去,我就不去”。

很多语法学家都指出,汉语主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很松散。赵元任(1968:69 以下)就把主语谓语看作是话题(topic)和评论(comment)。主语就是要说明的事,它和谓语之间有几种不同的逻辑关系,一种是,主语是及物动词的施事,如“我打他”;另一种是,主语是动作的受事,如“工作做完了”。还有一种,主语是具有某种性质的事物,如“他的书法好”。还有,主语只是一种工具,如“大碗喝汤,小碗吃饭”。

很多中国语言学家,把句首的地点词、时间词看作主语,如“明天会下雪吗”,“屋里很冷”。很多语言学家也许不同意这种分析,而把句首的时间词、地点词看作状语。必须承认,汉语中如

何区分这种时间、地点词是主语还是状语，比英语中的这种情况要困难得多。“北京没有棕树”这个句子，译成英文，可以是：Beijing has no palm trees. 这样译，“北京”就是主语。还可以译作：In Beijing, there are no palm trees. 这么译，“北京”就是地点状语。但是这种区别只是根据不同的翻译而造成的。看来，汉语这种句子本身是否就是歧义，包含几种语义结构，似乎大可怀疑，因为，即使能把这种句子的主语和时间、地点词分开，那种区分的界限肯定不会像英语中那么明确。

从谓语方面看，汉语句子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些和英语的基本结构相似。上文我们已谈了一些动词、宾语、主语的有关情况。下面就看看汉语和英语之间的重要不同。

汉语系词句可以不用动词，如“今天五号”，“我爱人广东人”。这种句子更常见的格式是用系词“是”。“是”只起系词作用，虽然可被“不”直接否定，但不能像其他动词那样有体的表示。系词句中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有多种情况，最常见的是等同关系和成员关系：

(25) 张三是他父亲。

(26) 这些学生都是中国人。

有时，系词句谓语对主语的解释看不出多少明显的联系。例如，有时问人怎么白天待在家里时，他可能回答：“我是晚上的课。”主谓之间关系很松，这种类型的句子在口语中常用。

存在句动词“有”（否定式是“没有”）和“是”不同，可以带有表示体的各种后缀。存在句可以带地点状语，也可以不带地点状语，如：“有饭吗”，“这儿没有人”。

汉语和很多东亚语言一样，表示占有时，就用存在性的谓语，如“我有书”。这种句型和满语很相类，满语 *minde bithe bi* 字面上就是“我书是”。John Lyon (1968: 393) 指出，例(27)(28)之间的转换关系，和例(29)(30)间的完全一致：

(27) 书在桌子上。



(28) 桌子上有书。

(29) 书是我的。

(30) 我有书。

例(27)(29)中的“书”是确指，(28)(30)中的“书”是泛指。(28)(30)之间的区别，“桌子”无生命，“我”有生命。如果译作英语，例(28)用 *there is* 译“有”，例(30)用 *have* 译“有”，因而以为是动词的不同，实际上是有生命、无生命的不同。如果把“我有书”不自然地译作 *There is a book by me*，就会看到(28)(30)之间非动词上的区别。有意思的是，“我有书”，译作俄语是 *u me-nja jest kniga*，字面上和英语 *by me there-is(a) book* 一致。所以，我们要说，把“有”看作表示存在和占有的两个词，会歪曲汉语的实际结构。

所有语法学家都把句子分作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三种。赵元任(1968: 58—59)认为，叙述句有真实的价值，可以判断它们的真和假。疑问句有信息的价值，它们要求信息。命令句有依从的价值，句中的要求，命令可以服从，也可以拒绝。

叙述句可以看作是没有标志的句子。疑问句则有一定标志。问具体信息的，常用“多少、怎么、为什么、哪儿、什么时候”等疑问词。疑问词组成的疑问句，词序和回答时的叙述句词序相同。如“你要什么？我要那本书。”

是非问句有两类。一类是简单的是非问，用疑问助词“吗”，如“你去吗”。另一种是并列的选择问，如“你喝水喝茶？”一种是特别常见的选择问，是用“不”插入重叠的动词之间，如“你去不去？”如果动词前有副词修饰时，就不能用这种选择问，只能说“你也去吗”，不能说“\*你也去不去？”

命令句常单用一个动词造成，如“去！”汉语命令句中常出现第二人称：“你去！”英语不大用这种带第二人称的命令句。命令句可用劝令助词“吧”来缓和语气，如“你们来吧”。命令句的否定式加“不要、别”。有人认为“别”是“不要”的合音，我们认

为不一定(参 5.4)。汉语中很难区别命令(对第二人称)、希望、要求(对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因为都用“吧”，否定句都用“别、不要”：

(31) 咱们走吧。                      咱们别走。

(32) 张三去吧。                      张三别去。

尽管“吧”常用来对第一、第三人称，当命令显得紧急的时候，也可不用，如“咱们快走”。

## 7.7 传统的汉语字典

虽然汉语没有语法研究的传统，但字典编纂一直是汉代以来小学家所重视的一个方面。最早的字典是《尔雅》，是古经典注释的集合，因而比较古老。根据现代的观点，这类较为古老的资料是由汉代经师收集整理的，《尔雅》就是其结果(刘 1963: 81)。《尔雅》根据意义排列，每一条先列同义词(或近义词)，然后用汉代通用的一个词加以解释，没有注音④。

汉朝还出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完成于公元 100 年，121 年呈献给皇帝(刘 1963: 6)。《说文解字》对后代汉字演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第三章)。从字典编纂法来看，当然有很多不足。下定义时对两个读音有关的字或字形构造常带有玄妙的思考。可以看出，许慎对词的玄学意义更感兴趣，而并不是更重视词在上下文中的实际运用。《说文解字》按部首排列，这种排列法，至今还沿用。可惜许慎的部首体系太精细，不能前后一致，如果没有索引，就很难查阅。公元 1 世纪时，中国人还没有好的方法来注音，要注音时，都是一种近似的方法。虽然有这些缺点，《说文解字》仍是研究古代汉语音、义的最重要的资料。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第三种字典，即韵书。这是第一次按照语音来排列。最重要的韵书《切韵》的结构参第二章。从词典学来看，韵书是用反切来注音，清晰、明确，比过去《尔雅》《说文解字》来得高明。但到后来，反切越来越盲从前人所注，也就越来越

越保守，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读音。韵书的释义很简单，很少引用原文出处加以说明。

公元6世纪时，字典的三种排列法都在使用：《尔雅》一类著作根据意义，分类显然比较武断，缺乏严格的次序原则，读者不易查找。这种方法一直沿续到近代。

《说文解字》按部首排列。许慎的体系很臃肿，不严密；后来的字典就有所改进，把许慎的540部首减到214部首。从明朝《字汇》起，以后的字典都用这减少了的部首，同一部首的字，又用部首以外的笔划数目来查字，这就简便多了。这种部首和笔划的排列体系至今仍用得最多。

从早期韵书开始的按语音来排列的方法也延续至今，自从19世纪西方按字母排列法引入中国以后，这种字母排列法就成了最通行的排列法，即使是汉语字典也用这个方法了。

除了《中原音韵》以外，6世纪到17世纪期间，汉语字典上的进步很小，新字典不过是老字典的修订和扩充。梅膺祚的《字汇》（1615年左右完成）是长期以来字典编纂上的一个进步。《字汇》精简了部首，并以笔划的多少来排列，并用当时流行的楷书字体作为标准来算字的笔划（过去的字典根据已不实用的篆书作为标准）。这样，《字汇》就易于被一般文化水平的人所查阅。梅氏注音除了反切以外，还用常见的同音字注音，因为一般人用唐朝时候的反切来切出当时的读音，是不可能的。不同的读音也都细致地记录下来。《字汇》释义一般很简要，但能使人明白，举例时并指出引文出处。

梅氏《字汇》创新的重要性，从后来别的字典立即模仿这点也能得到证实。清朝康熙皇帝勅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编修的康熙字典，经过5年的工作，于1716年完成，是以《字汇》为基础的最重要的一本字典，《康熙字典》比《字汇》以后的一些字典都来得全面，后来就成为标准的汉语字典，并沿用至今<sup>⑥</sup>。同样，《康熙字典》对后来字典的编写也起着很大的影响。

上述这类传统的字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解释古书上的字义，极少考虑口语中的用法，而且连白话作品中的用法也不加考虑。只有到了西方传教士及政府官员来到中国以后，字典才开始注意各种白话口语。

## 7.8 双语字典的兴起

外国人从明末来到中国，就感到了学习汉语口语和文字的必要性。这就导致了语法研究和双语字典的产生<sup>⑥</sup>。这一章就介绍几本早期的汉英字典。

西方人在早期编的汉英字典，和传统汉语字典的不同（用外语释义这点不计在内），就是用拉丁字母标注读音。由于西方人在中国要学说学读学写，所以这些字典一般不加区别地把白话用语及文言用语混在一起，这是迄今为止这类字典的一个严重缺点。1819年 Robert Morrison 编的和 1843年 Walter Medhurst 编的两本字典，在注音上都有很大的问题。Morrison 那本不区别送气和不送气声母。Medhurst 那本，认识到送气不送气的不同，但常把不送气声母标作送气声母 (Giles 1912: VII)。Samuel William 1874年的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汉语音节字典)则是第一本正确区分了送气不送气音的字典。这些早期字典对北京话中已不存在的入声考虑太多，这显然受清初樊腾凤编的在北方话区域广泛流传的《五方元音》影响而致。

Herbert A. Giles 的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汉英字典) 是第一本好的汉英字典。1912年的修订本有 13848 字并很多复合词和词组。注音根据北京读音，总的来看已摆脱了过去那种人为的读音。Giles 还修订了 Thomas Wade 的标音法，创造了 Wade-Giles (中国简称威氏) 罗马字标音法。多少年来威氏标音一直是用英语写的汉学著作的标准注音法，最近才慢慢为新的拼音方案所取代。Giles 和他的前人一样，对口语和文言不作区别。

虽然 Giles 的字典是 19 世纪北京口语的丰富库藏，其他方面则已被后来的字典所超过了。

R.H.Mathews 1931 年出版的《汉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到 70 年代为止，一直是讲英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字典。Mathews 曾在上海传教。从词典编纂看：Mathews 的字典并不比 Giles 那本更好，只是更为严密，更现代化而已。他也把早期文言用语和现代新词新语混而不分。最严重的还是注音问题。赵元任在那本字典的 1943 年版引言中指出，这本字典用三种不同的读音：北京音、《国音字典》(1919 年)用的只有一年寿命的法定标准音、中国内地传教会用的拼音。结果是，虽然字典按字母排列，但很难查到要查的字，除非你对这三种注音都很熟悉。

二次大战后，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出现了两本小字典。赵元任和扬联陞的 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国语字典) 有很多词典编纂上的重要创新。字典按传统的部首笔划排列。文言用字，除非用在口语词组或常见的书面用语中，否则一概不收，而且标出 L (书面用语 Literary 的第一个字母)。其他字都分别标明 F (自由语素 Free 的第一个字母) 和 B (粘着语素 Bound 的第一个字母)。量词被称作助名词，标作 AN (助名词 Auxiliary Noun 的第一个字母)，并列这个量词所搭配的名词。复合词用例，凡读轻声的，就在字前加一圆点表示区别。

赵、扬的字典，除了标出助名词 AN 以外，其他词类一概不标。他们相信，大多数词，用英语注释时可以看清它所属词类，另标词类就显得多余了。例如“吃”，英语注为 to eat，这就很明白是动词。只有在释义不易看清时才加以标志，如“脂肪”，是名词，英语释为 fat，而英语 fat 也可以用作形容词，这时，就加上 n. 表示是名词。

赵、扬字典注音用 1928 年官方法定的罗马字拼音，罗马字拼音的特点是，声调也用字母来表示，例如“头”，阴平作 tou，

阳平作 tour, 上声作 tooou, 去声作 tow。这套拼写法, 当时有不少热心人坚持用了多年, 现在已基本不用。字典中把威氏注音加于括号中, 排在罗马字拼音之后。字典还提供有关历史语音的信息; 例如对有些字注上 -p -t -k 古韵尾以及浊声母。从断代的观点看, 这些语音现象还留存在一些大的方言中, 了解这些历史知识对学习方言很有利。

另一本无名氏的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中文口语字典), 1945 年由美国战争部出版; 编者很有气魄, 既有汉英部分, 又有英汉部分。汉英部分, 不像过去的字典用汉字排列, 而写成单音节的或多音节的, 全用字母次序, 虽然也写出汉字, 但置于次要地位, 所以这是一本真正的口语字典。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过去的字典主要是汉字的字典, 而这本本是口语的字典。这本字典用一种新的罗马拼音法, 后来就演变为耶鲁(Yale)拼音法。对口语读音特别是重音这方面, 标注得非常细致。

这本字典很重视词在实际口语中的运用, 这一点和别的双语字典很不同。别的字典重在注释书面用语。词的功能通过 12 个大的词类来表明: 形容词(A)、指示词(Dem)、副词(H)、不及物动词(I)、连词(J)、副动词(K)、量词(M)、名词(N)、数词(Num)、代词(Pron)、结果补语(RC)、及物动词(V)。多数词类还分有小类, 如名词中还有时间名词(Ntime)、及物动词中还有双宾语动词(V2)等。每个词条都有一个或几个用例, 名词下还注明搭配的量词。

这本字典的英汉部分主要提供数量相对较少的英语基本词汇。词条选择很精, 用汉语的对等词和例子来表明英语词与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赵、扬和战争部所编的这两本字典, 都反映了从重视书面语到重视口语的转移, 而这是美国结构主义的一大特点, 他们不只用英语加以注释, 而且通过语法上的划分及用例来说明其实际应用。回头看起来, 赵、扬的处理更实用一些, 战争部那本字典的

分析词类方法，虽也根据某种语言学分析理论，能流行一些年，但迟早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作为工具用的字典，若要成功，在语法处理时必须简单，并能超脱各种语言学流派，另外，赵、扬的简要原则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因为语法处理越复杂，词类的分析越不易确切，而汉语的词类划分是特别不好对付的，编词典的人都会感到举棋难定。

战争部那本字典流传不广，而对后来的两本有名的字典影响极大，耶鲁大学远东语言学院1966年出版的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汉语字典)，以及稍后Fred Fangyu Wang的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中文标准字典)都是在这本字典的基础上编成的，这些字典出来以后，美国人编写中文字典的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

## 7.9 中国现代的字典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一个确立新的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白话作品就是新的书面语，清末的官话就是新的口语，对语言改革的积极分子来说，编字典作为正音的标准就是一件迫切的工作，1913年颁布的标准音实际上是混合南北读音的人为语言（参6.1）。1919年的《国音字典》就根据这个短命的人为语音，1932年，北京音被确定为全国的标准音。

教育部中国大词典编纂处编的四卷本《国语词典》于1936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大型的现代口语词典，其目的是对古今字音加以规范，并第一次列举词条，按注音字母次序排列，并用此注音。注音字母多少是受日语假名的影响而造成，既是字母又是音节，于1919年规定为正式拼写法，台湾至今还用它，《国语词典》也注出罗马字拼音，每个词条下，都按注音字母次序列有复合词条，并标出轻声读音及儿化韵尾。

《国语词典》虽以现代口语为主，但也包括有大量的文言，

而且对书面和口头用语，也未加任何区别。释义简洁，因为目的在正音而非详细释义。也不作语法上的分析，但从释义和举例中能推断出一些词的词类，引例来自文言及较早的白话，但未注出处。大量的专门名词也都列入了，因为人名地名的读法常有分歧，为了正音，就都列入并加以明确规范。

《国语词典》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正音方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由于抗日战争及接着的国内战争，一直到50年代，这方面工作没多少进展，1947年出了一卷本《国语词典》简本，这个简本在大陆和台湾都重印了几次。

1953年初版的《新华字典》在北京出版，这本小字典，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用来取代《国语词典》的正音字典，到1976年为止，已印行了三版。

《新华字典》从名字看，只是一本主要是单字的字典⑦。复合词及词组只在说明不同意义时所举用例中才看到，字典按拼音方案的次序排列，但也附有注音字母，以便于熟悉注音字母的人查阅，1971年修订本有8500字，说明中有3200复合词及词组，文言及白话用字都收入，虽然不加标明，但释义及举例中可以看到属于哪个类型。释义简明，例子也很少，除非是只在复合词中出现的字才举出例子。带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也只从举例中能看出。名词的子尾、儿尾标得比较清楚，从口语用例中，可以判断这个字是自由语素还是粘着语素。这样，有经验的人从《新华字典》中也能得到像赵元任、扬联陞字典中所提供的语法分类情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有几项重要的词典工作接近完成。由于《新华字典》太简单，不能满足学生及一般文化水平的人的需求，于是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开始编写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收单字，也收复合词，试用本印于1960年及1965年，以广泛征求批评建议。原定1966年正式出版，由于文化大革命就推迟了。1973年准备出版的试用本，遭到“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而再次推迟。直到1978



年才正式出版及发行。

《现代汉语词典》是政府指令编的，用来规范读音及词语的使用。收有 5.6 万词条，按拼音次序排列，每个字下，列有复合词、成语、词组，都按音序排列。《现代汉语词典》和《国语词典》一样，很重视词的界线，成词的连在一起，如“中国、语法、学习”拼作 Zhōngguó, yǔfǎ, xuéxí。结合不紧的，加入横杠，如“等腰三角形”拼作 děngyāo-sānjiǎoxíng 如果是可以分开的复合词，如动宾式的复合词，中间就用斜写的等号连接，如“过节”就拼作 guò"jié, “吃饭”拼作 chī" fàn。

《现代汉语词典》用拼音方案注音，必须读轻声的，就在字前加一圆点（赵元任的《国语入门》最早使用），并不标出字调，如“我们”拼作 wǒ·men, “喇叭”作 lǎ·ba。可以读轻声也可不读轻声的，同样在字前加一圆点，但仍标出声调，如“因为”拼作 yīn·wèi。可加儿化的，在括号内标出 -r。不同的读音都注明有几读。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在读音上都和《国语词典》《新华字典》相一致，但在释义上要超过前两本，这从词类的区分及词条的文体划分上都可看到。

《现代汉语词典》明显地把词分为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虚词（名、动、形以外各类词）两大类。对实词不进一步作具体分类，编者相信释义及用例能使人清楚这一点。虚词则分作 11 类：代词、指示词、疑问代词、数词、量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叹词、象声词。这种分类和教学用语法的分类很接近。

除了词类上的区别以外，也有文体上的划分。多数词条不作标志，是属于中性的普通用体，标出“书”的是书面用语，“口”指口语。（当然这种区分并非绝对清楚的，某些书面用语也可用于正式的谈话中；口语用词则可常见于非正式的书写中，特别是对话记录中。）“方”用来指方言词，可以是北京方言，也可以是别

的方言。“古”则指古典用字。标出“凶”的是用得很少的意思。例句前标的“◇”表示比喻用法。

《现代汉语词典》是词典编纂中的杰出榜样，可与别的国家好的字典相媲美。它为词典编纂者树立了一个高标准，因而对以后的词典编纂肯定会有长期的影响。现在，中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很受重视，各种字典都在编写，虽然不一定都有《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高水平，但那种靠着几本质量不高的字典学习汉语的时代可以告終了。

## 阅 读 材 料

Chao, Yuen Ren(赵元任)。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国话的文法)。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该书是用英语写的最全面的现代汉语语法。)

丁声树等，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该书是50年代中国语法分析的简明扼要的一本好书。)

Hashimoto, Anne Yue (余霭芹)。1971.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 (汉语句法结构)。Unicorn(麒麟) 8. Princeton, 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 (该书是用转换语法分析法研究现代汉语的一种概述。)

## 第七章注释

- ① 要了解结构主义之后几家对汉语的分析，参 W. Wang (1963, 1965), A. Y. Hashimoto (1969, 1971), Y. Li (1971), Li and Thompson (1973, 1974), Teng (1972, 1975), Tai (1975)。
- ② 汉语 de 这个音节在汉语语法中表示很多关系。除了这里说的情况以外，还可以(1) 作为名词的标志，写作“的”。“红的、煮的、不懂英文

的”(2)作为副词的标志,写作“地”:**“快地跑,非常地不满意”**。(3)作为可能的标志,写作“得”:**“吃得、跑得快”**。详细的分析参朱德熙的几篇文章(1961, 1966, 1978)。

- ③ “从”在现代口语中是否用作独立的动词固然值得怀疑,但在书面表达时,有用作动词跟从的意思。
- ④ 最近的研究参 Coblin(1972)。
- ⑤ 《康熙字典》能沿用至今的原因之一,是它收的字多。共 47035 字,只有《集韵》能超过它,共 53525 字(刘 1963)。这两本字典所以字那么多,是因为把异体字也算在内的缘故。
- ⑥ 清朝有很多满汉双语字典。这是否受外国字典的影响而致,还不清楚。
- ⑦ 字典以单字为主,解释时才用到复合词和词组。词典以词作为对象,包括单字及词(包括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

## 第八章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各种方言

### 8.1 汉语方言的划分

1937年，李方桂第一个对汉语方言进行了科学的划分。他分了9种，其中三种(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北方话)显然属于官话的次方言，只是地理位置不同罢了，最后一种只是一些不能加以恰当归类的方言的混合。李方桂的划分法普遍都同意，就成了现在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据。1961年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把方言区分成7个：1. 北方话，2. 吴语，3. 湘语，4. 赣语，5. 客家话，6. 粤语，7. 闽语。下面我将逐个加以讨论，但在说明各个具体方言之前先看一下方言区分的总的情况，会对具体的讨论有帮助。一个很自然地会提出的问题是：这些方言区之间又是什么一种相互关系呢？一般都趋向于认为，这七个方言区是不同程度的独立方言，除了赣、客语关系紧密一些以外，其他方言之间关系都差不多疏远(罗1950)。

传统的方言区分标准就是看中古音全浊声母在今方言中的演变情况。这个标准一般说来能管用，但也有些小的困难，下文我们会看到这些具体的困难。因为浊音声母在中国北部至少保留到10或11世纪，所以用浊音声母的演变作为区分标准只适用于较晚的时期。

我并不反对这传统的区分标准，我只是提一套新的标准，既照顾到历史的深度，也反映现在方言之间的关系。这套标准包括有音韵、词汇、语法三方面，我选了10条，直接用于各种方言并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这10条标准是：

- (1) 第三人称是“他”或“他”的同源词。
- (2) 领属助词是“的”或“的”的同源词。
- (3) 常用否定词是“不”或“不”的同源词。
- (4) 表示动物性别的词序在前，如“母鸡”。
- (5) 只有平声才分阴阳。
- (6) 古舌根音在i前腭化。
- (7) 用“站”或“站”的同源词。
- (8) 用“走”或“走”的同源词。
- (9) 用“儿子”或“儿子”的同源词。
- (10) 用“房子”或“房子”的同源词。

这10条标准应用于从北到南12个方言中的情况见表I。

“+”表示肯定，“-”表示否定。

表I 汉语方言按10条标准的区分情况

	他	的	不	母鸡	阴阳平	腭化	站	走	儿子	房子
北京	+	+	+	+	+	+	+	+	+	+
西安	+	+	+	+	+	+	+	+	+	+
昆明	+	+	+	+	+	+	+	+	+	+
苏州	-	-	+	+	-	+	-	+	+	±
温州	-	-	+	+	-	+	-	+	+	-
长沙	+	-	+	-	-	+	+	+	-	±
双峰	+	-	+	-	-	+	?	-	-	?
南昌	-	-	+	-	-	+	+	+	-	-
梅县	-	-	-	-	-	-	-	-	-	-
广州	-	-	-	-	-	-	-	-	-	-
福州	-	-	-	-	-	-	-	-	-	-
建瓯	-	-	-	-	-	-	-	-	-	-

从表 I 可以看到, 根据这 10 条标准, 可以把汉语方言分作三大区。都是“+”号的是北方话区, 这和传统的北方话区的区分完全一致。都是“-”号的, 是南方方言区, 包括客家话、粤语和闽语。剩下的是既有“+”号, 又有“-”号, 是过渡地带, 既有北方话的特点, 又有南方话的特点, 我们叫它为中部方言, 除了浙江省的某些方言以外, 所有扬子江南岸的吴语、赣语、湘语, 都属于这中部方言。

这三大区方言中, 虽然北方话区域最大, 人数最多, 而方言内部一致性则最大。相反, 南方方言、中部方言, 它们内部的方言差别很大, 在语音和词汇上显得最为明显。下面我们对这三大方言区将逐个加以讨论。

## 8.2 方言演变的历史因素

公元前 2000 年, 现代汉语方言的祖先语言就是黄河流域北方大平原地区的汉语, 这种汉语扩散到多远, 我们已无法知道详情, 我们也不清楚古代方言的不同种类。但在以后的几千年中, 汉语向南方北方扩散, 一直沿续到今天, 这一点我们是能看得清楚的。在春秋时期 (公元前 770—前 476), 我们第一次从经典古籍中看到有不同方言的说法, 并且经籍本身所用语言也反映了不同的方言用法。同时,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时有一种经过加工的共同语, 用于吟诵诗文如《诗经》《书经》以及举行典礼时。这种共同语叫做雅言, 基于周王国的方言, 方言区之间交际时可能也用 (袁 1960)。这种共同语直到战国时期 (公元前 475—前 221) 还在使用, 并作为秦汉共同语的基础 (周、吴 1956: X)。所以, 从很早开始, 汉语中就有两种相反的势力: 一是向外扩张到很远地区的离心力, 造成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方言; 一是共同语这种向心力, 使各地不同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在各个时期都能看到。

在政治稳定的时期, 政府所用共同语的影响就特别明显, 秦

汉帝国时，各方面都要统一的严格措施，包括统一语言文字，都实行起来了。就在这统一语言的压力的同时，由于新的广大地区划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国文化，也就种下了今天众多方言的种子。随着领土的扩张，也把汉语传布到了岭南（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和江西南部。于是形成了上面提到的南方方言。

汉代出现了第一本方言词汇的著作，即杨雄（公元前58年至公元18年）的《方言》。“方言”这个词也就沿用至今。杨雄的著作是一些相当杂乱的方言词例，有些取自早期的典籍，有些是他从当时方言口语中得来，这些词都用汉代共同语加以解释，当然都用汉字记录。我们可以从《方言》这本书看到汉代方言总的分布地区，但因为汉字不标音值，所以没法推断那些方言的语音系统。而且，只有少数方言词，能和今天的说法对应起来。

从汉末到隋初，除西晋这一段时期（公元265—316）以外，中国政治上都处于分裂局面。南方是几个很弱的短命的王朝，北方则被几个外族所统治。将近4个世纪的政治、文化的分裂，对汉语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很晚被征服的南方地区的方言，就有可能不受当时共同语的影响而比较独立地发展自己。在北方，就更少语言统一的可能，而且，显然受非汉族语言的强烈影响。这段分裂时期，必须看作不同方言区形成的开始。

社会的因素，在南北朝分裂时期也起着作用。西晋在公元316年灭亡时，贵族、官僚大批移居扬子江以南，和当地的贵族一起组成南朝几代的统治阶级。西晋的移民带去了具有优越地位的北方方言，成了南部书面共同语的基础，这和当地的口语大概有很大不同（陈1936）。江南地区上年纪的人使用的是汉朝时定居下来的人的那种语言，甚至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语言。说北方移民的语言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方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当地方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北方方言对扬子江流域，特别是南朝首都金陵（今南京）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我们甚至可以猜想，江南地区原来的方言更接近于现在的南方方言闽语，现在这

个中部方言的过渡性质主要由于北方方言输入的缘故。

隋代于 581 年统一中国后，时间很短，接着就是中国文化上的黄金时代唐朝(618—907)。唐朝时，在首都长安方言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共同口语和书面语。我们可以假定，当时方言之间已有很大不同，而这种共同语口语已推广为政府、商业、佛教道教教堂用语。其书面语，也就是读书音，也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方言，以至现在各方言的读书音都可追溯到唐代的读书音，只有少数零散的几个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唐代这种新的共同语，肯定取代了更早的一些方言；另外也有些情况是，只对别的方言的词汇和语法有深刻影响，但还没能完全取代。总的来说，唐代共同的口语、书面语的影响是极大的，整个中国方言的分布已改变了很多。

第二章已谈到，在外族统治的辽金元时代，新的共同语也产生了。这种共同语用于白话文学的写作及政府事务。这种新的共同语以北京地区方言为基础，对别的方言的口语也有很大影响，但从读书音看，多数情形看，书面音仍然是唐朝标准音的继续②。

这些不同时代的共同语造成了在方言影响上的不同层次，这种复杂的不同层次正好可用来理解汉语的历史。

### 8.3 汉语方言间的差别程度

人们常说，汉语方言是不同的语言。确实是这样，有些大学中，亚洲语言系得把普通话和广东话分开教，就像德语系把德语和荷兰语分开教一样。但是，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方言，没法绝对分清。不管怎么说，只要明白汉语方言区别很大就是。对历史语言学家来说，汉语更像一个语系，而不像有几种方言的单一语言，汉语方言的复杂程度很像欧洲的罗马语系。秦汉帝国在公元前后的那段扩张领土、传布汉语的情况，和欧洲的罗马帝国相似：军队定居在征服了的领土上后，一方面传布汉语，一方面又受当地方言的一些影响。新起的白话口语和古老文字并存，并为



这种文字所影响。所以，由于这些相似的情形，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类似于罗马语系之间的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我想就是这个道理。打个比方，北京话和广州话之间的差异，同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异一般大；海南岛的闽语和西安话之间的差异，同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差异一般大③。

汉语方言间很多不能互相听懂。这在中部方言、南部方言中常有这种情形。北方方言内部比较一致，最北部的哈尔滨人和西南端的昆明人，相隔 3200 公里左右，通话没问题（袁 1960: 23）。中部方言区，如上海一带广大地区，大家都能讲得通，而在湖南南部一些地方，方言之间不能通话。南方方言差异最大，福建省多数是闽语，但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方言。甚至不同的村子，就有互不相通的不同方言。靠近澳门的中山县内，就有闽语、客话、粤语三种方言。

#### 8.4 方言地理

全国的方言调查还未完成，三四十年代赵元任曾领导过分省的调查。由于时间短，只了解那些地区的一般情况，所以搞得比较简单。1948 年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剩下的调查材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杨时逢编辑出版，1959 年出版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 年出版《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81 年出版《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其他小范围的调查，有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这是一本方言研究的奠基作品。白滌洲和喻世长在 1934 年出版了西北方言的调查。1930 年出版了一本《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3 年潘茂鼎等人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关于福建方言的调查。潘等的调查不完全注重记录字音，而着重在口语词汇的记录。

1956 至 1958 年间，全国有些地区在教育部领导下作了方言普查（李荣 1963）。这次普查目的在了解方言概况，来推广普通

话。重点跟以前一样还在语音，找出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可惜出版的只有少数，为普通话教育服务，对方言研究价值不大。

迄今为止，我们关于汉语方言地理的认识是概略的、不全面的。有人批评这种调查偏重语音而忽略方言日常用语 (Grottaers 1943)。这种方法是从高本汉继承而来，这在早期对中国方言茫然无知时是一种有效的好方法，方言的粗略分布从中可一下有所明白，而到了今天，就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像潘茂鼎等人那样着重于日常词汇，最后，只有在日常用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看到方言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

## 8.5 方言的界线

关于中国方言的分界，我们所知很少，得等全面的详细的方言地图出来以后才能清楚。对少数地区，我们有一些初步的观察，要谈谈一些方言间比较明确的或不那么明确的界线，还是有可能的。例如，吴语和闽语间的界限很明确，闽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很显著的特点。例如柘荣，在吴语和闽语的边界地区，和浙江南部的温州话就有很大不同，见表 II④。

表 II 温州话、柘荣话比较

	我	你	他	什么	不	走	锅	狗	头	铜	鼻	薄
温州	ŋ <sup>4</sup>	ni <sup>4</sup>	gi <sup>2</sup>	ga <sup>2</sup> ni <sup>2</sup>	fu <sup>3</sup>	tsau <sup>3</sup>	ho <sup>8</sup> ŋ <sup>4</sup>	kau <sup>3</sup>	diu <sup>2</sup>	doŋ <sup>2</sup>	bi <sup>3</sup>	bo <sup>3</sup>
柘荣	ŋua <sup>3</sup>	ny <sup>3</sup>	i <sup>1</sup>	ni <sup>1</sup> no <sup>2</sup> ʔ <sup>7</sup>	ŋ <sup>6</sup>	kiaŋ <sup>2</sup>	tiaŋ <sup>3</sup>	khen <sup>3</sup>	thau <sup>2</sup>	tæŋ <sup>2</sup>	phi <sup>5</sup>	po <sup>2</sup> ʔ <sup>8</sup>

从表中可以看到，两种方言的基本词汇很不同，这个表可以无限地扩展下去。最后四个“头、铜、鼻、薄”是古浊声母字，在温州及整个吴语中保留浊音，在闽语中根据不同的词语而变为送气或不送气的清音。

闽语和客家话的区别，不像闽语和吴语之间来得明显。福建西部及西南部地区，是客家话和闽语的过渡地段，详见第九章。

湘语和北方话之间的界线就不太明显，叫做弱界线吧。湘语边界地区受北方话的影响很大。很可能，西南官话原来也属湘语，后来渐渐同化于北方话。从现有的材料看，突变的和渐变的方言界限都能看到，但还不能把方言区划得很精确。方言界线问题的研究是汉语方言学中的一个难题。

## 8.6 北方方言

有70%的汉族人讲北方方言，整个长江以北，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都讲北方方言；还有西南部，邻近藏语、壮语、苗语的地方，都讲北方话。在东南地区，主要讲其他方言，可也有零星的讲北方话的语言孤岛，如福建西北部的南平（潘1963）。二次大战末以来，讲北方话的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多起来了，因而在欧洲和北美都能看到讲北方话的中国移民区。

中国语言学家把北方话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北方官话，指河北（包括北京）、河南、山东、安徽北部、东北地区、内蒙古部分地区；（2）西北官话，指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西部一些地区；（3）西南官话，指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部；（4）下江官话，指安徽中部、苏北地区、南京一带。其中，西南官话最一致，西北官话，特别是山西省，内部差异很大。

北方方言所以重要，不只讲的人多，地域广，还因为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作为普通话，不只汉族人要学，少数民族也要学，由于这种重要地位及广泛使用，因而它对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方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很有特点。除了闽语，其他方言区都没有这么整齐的特点。先看语音特点。

中古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浊擦音在北方方言中全部清化，

所以古浊音清化是北方方言语音上的一大特点。古浊塞音浊塞擦音，逢平声今读送气音，逢仄声今读不送气音，这是北方方言的普遍特点，但也有少数北方方言，不论平声、仄声，都读送气音。如陕西潼关（黎 1944），河南灵宝（Yang 和 Ching 1971）。还有一点不好办的是，广东话对古浊音的今读，与北方方言一致（参第九章）。所以，只用浊音清化来识别北方方言还不能完全有效，但结合其他标准，就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起作用的条件。古浊声母字由于平仄不同声调而在北方方言中读送气或不送气清音的例子见表 III⑤。“头、长、茶”是平声字，“鼻、豆、白”是仄声字。

由于北方方言内部比较一致，因而北京话的声母基本上可代表整个北方话的声母⑥，这里略而不列，参第六章。

表 III 中古浊声母在今北方方言中的演变

	中古	北京	扬州	西安	成都	灵宝
头	dəu	thou <sup>2</sup>	thy <sup>2</sup>	thou <sup>2</sup>	thəu <sup>2</sup>	thou <sup>2</sup>
长	dʒang	tʃhaŋ <sup>2</sup>	tʃhaŋ <sup>2</sup>	tʃhaŋ <sup>2</sup>	tʃhaŋ <sup>2</sup>	tʃhaŋ <sup>2</sup>
茶	ɕa	tʃha <sup>2</sup>	tʃha <sup>2</sup>	tʃha <sup>2</sup>	tʃha <sup>2</sup>	tʃha <sup>2</sup>
鼻	bjet	pi <sup>2</sup>	pieʔ <sup>7</sup>	phi <sup>2</sup>	pi <sup>2</sup>	phi <sup>2</sup>
豆	dəu-	tou <sup>5</sup>	ty <sup>5</sup>	tou <sup>5</sup>	təu <sup>5</sup>	thou <sup>5</sup>
白	bək	pai <sup>2</sup>	poʔ <sup>7</sup>	pei <sup>2</sup>	pe <sup>2</sup>	phie <sup>2</sup>

关于北方方言的声母，需要以下几点说明：（1）很多方言在圆唇元音 u 前，x 和 f 不分，而北京话 xu 和 fu 分得很清楚，成都话则只有 fu。（2）有些方言有唇齿音 v 声母，相当于北京话的 u(w)-。（3）北方方言也有很多 n l 不分，如兰州 n l 可互读，南京只有 l，重庆只有 n。（4）大多数北方方言古舌根音在 i y 元音前腭化，尖团不分，但在少数北方方言中，能分尖团，如胶东地区黄县、海阳一带。（5）多数北方方言有卷舌不卷舌声母

的区别，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则没有这种区别，都读不卷舌音。在西北方言如西安等地，卷舌声母在 u 元音前，变成唇齿音声母，如 t<sub>ʂ</sub>u > p<sub>f</sub>u, t<sub>ʂ</sub>huan > p<sub>f</sub>han, ʂuei > fei。(6) 北京话的卷舌声母 ʂ, 在有些方言中完全失落，成都方言读 z, 扬州读 l, 汉口读 n。(7) 北京方言中的零声母字，有些方言读成 ŋ 声母。这是原来读零声母时自然加上上去的一个开头音。

北方方言的韵母，比起中古音来，已大加简化。主要是两套辅音韵尾的减省。中古音有一套鼻音韵尾 m n ŋ, 还有一套塞音韵尾 p t k。今北方话只有 n ŋ 两个鼻音韵尾。《中原音韵》时还有 m 韵尾，可以知道 m 尾很晚才消失。塞音韵尾 p t k 的演变比较复杂。西南官话中多数已完全失落，下江官话则合为喉塞韵尾 ʔ。在北部及西北的方言中，这两种情况都有。中古辅音韵尾在北方方言中的演变情况见表 IV⑦。

北方方言多数有 i u y 三个介音，分别叫做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不带介音的叫开口呼，只有西南官话、山西东部、南京地区三个介音不全有。圆唇介音在各地读法不全相同，舌尖音后失落 u 是特别常见的现象。

表 IV 中古辅音韵尾在今北方方言中的演变

	中古	北京	扬州	西安	成都	灵宝
三	sâm	san <sup>1</sup>	sæ <sup>1</sup>	sā <sup>1</sup>	san <sup>1</sup>	sā <sup>1</sup>
伞	sân:	san <sup>3</sup>	sæ <sup>5</sup>	sā <sup>3</sup>	san <sup>3</sup>	sā <sup>3</sup>
桑	sâng	saŋ <sup>1</sup>	saŋ <sup>1</sup>	saŋ <sup>1</sup>	saŋ <sup>1</sup>	saŋ <sup>1</sup>
腊	lâp	la <sup>5</sup>	næʔ <sup>7</sup>	la <sup>1</sup>	na <sup>2</sup>	la <sup>1</sup>
辣	lât	la <sup>5</sup>	næʔ <sup>7</sup>	la <sup>1</sup>	na <sup>1</sup>	la <sup>1</sup>
落	lâk	luo <sup>6</sup>	naʔ <sup>7</sup>	luo <sup>1</sup>	no <sup>2</sup>	luo <sup>1</sup>

先不看介音和单元音韵母中的高元音，多数北方方言有 a 和 ə 两种开口度不同的对立；尽管也有其他非高元音，但和 a ə 不造

成音位上的对立。而中部方言的非高元音则有三个音位的对立。

舌尖前元音 [ɿ] 和舌尖后元音 [ʮ] 是很多方言，特别是北方方言和中部方言的一个特点。除了这两个不圆唇的 [ɿ ʮ] 以外，有些方言还有圆唇的舌尖前元音 [ʉ] 和圆唇的舌尖后元音 [ɯ]。

北方方言有很多复合元音和三合元音韵母，这和吴语形成鲜明对照，吴语很多复合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可以看作是保留了中古韵母的这个特点，所以北方方言在这一点上有保守的一面。

北方方言的声调比别的方言区少。有些方言如河北的临城只有三个声调。一般是四个声调，北京就是四个调。江淮地区的下县官话五个调的常见，有六个调的是靠近中部方言的少数地区。调类也多数像北京方言那样，古平声按古声母的清浊而分阴平、阳平。也有地方阴、阳平不分，如河北的张家口，山西的太原，上声都不分阴阳，古全浊上声变去，古次浊上声并入阴上，成为上声。去声分阴阳的极少，只有靠近中部方言的地区才有，如湖北的黄梅和麻城，江苏的南通。古入声的走向很不同。保留入声的有南京、扬州、太原、张家口等地。多数则并入其他调类，成都话中，古入声全读阳平。其他方言，如北京话，只有一部分入声的走向有规律可寻。北方方言中轻声的读法很普遍，但轻声不限于北方方言，别的方言区也有。古声调在北方方言中的演变见表 V⑧。方言的调值极不相同，见表 VI⑨。

从词汇和语法上看，北方方言和别的方言区有很大不同⑩。最突出的是代词体系。所有北方方言的代词都和普通话一致。“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典型的北方方言，如果中部方言也用“他”时，一定是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北方方言的复数人称词尾，普通话是“们”，别的方言根据其音韵结构而有不同的读音，这是北方方言的又一个特征。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在人称代词上的分界线正好是那条扬子江。

北方方言另一特点是用“的”作为领属助词。Demiéville

表 V 古声调在今北方方言中的演变

中 古	阴平阳平	阴上阳上	阴去阳去	阴入阳入	
北 京	1 2	3	5	$\begin{smallmatrix} 1 & 2 \\ 3 & 5 \end{smallmatrix}$	2 5
扬 州	1 2	3	5	7	
西 安	1 2	3	5	1	2
成 都	1 2	3	5	2	
太 原	1	3	5	7	8

表 VI 北方方言的调值

调类	1	2	3	5	7	8
北京	55	35	214	51	—	—
扬州	21	35	31	55	24	—
西安	31	24	42	55	—	—
成都	44	31	53	13	—	—
灵宝	31	35	55	22	—	—
太原	11	—	53	55	221	254

(1950) 已经指出, 这个“的”来自“之”(中古音 tsī, 上古音 \*tjəg)。南方方言则用舌根音声母(或零声母)字作领属助词。一般说来, 用“他”作第三人称代词的, 就用“的”作领属助词; 不用“他”的, 领属助词就是舌根音声母或零声母字。这个分界线又是那条扬子江。这两条分界线看来是最古老的, 也是最重要的, 北方方言的人称代词见表Ⅳ。

北方方言的指示代词也很一致, 近指是“这”, 远指是“那”, 和普通话一致。西安及其他西北方言用“兀”及其有关形式作指示词。

表 VII 北方方言的人称代词

	我	你	他/她	我的	我们
北京	uo <sup>3</sup>	ni <sup>3</sup>	tha <sup>1</sup>	uo <sup>3</sup> tə	uo <sup>3</sup> mən
扬州	o <sup>3</sup>	li <sup>3</sup>	tha <sup>1</sup>	o <sup>3</sup> fi	o <sup>3</sup> məŋ
西安	ŋə <sup>3</sup>	ni <sup>3</sup>	tha <sup>1</sup>	ŋə <sup>3</sup> ti	ŋo <sup>3</sup> mē
成都	no <sup>3</sup>	ni <sup>3</sup>	tha <sup>1</sup>	ŋo <sup>3</sup> ni <sup>1</sup>	ŋo <sup>3</sup> mən
灵宝	ŋɿ <sup>3</sup>	ni <sup>3</sup>	tha <sup>1</sup>	ŋɿ <sup>3</sup> ti	ŋɿ <sup>3</sup> mē

否定词，北方方言否定一般动词的用“不”，否定存在的用“没”。“没”否定一般动词时，指还没有干的意思，这在其他方言中也能看到。

词汇方面，很难说哪些词只限于北方方言用。这一方面因为北方方言和其他方言区的基本词汇来源相同，所以很多词汇大家都用；另一方面，北方方言中的词汇，几百年来一直被中部方言及南方方言所借用。下面只举少数典型的北方方言词汇加以说明。

动词“来、去”全国通用。而“走、跑”各方言就有不同用法。北方话的“走”，在古代汉语是跑的意思。南方方言的“走”保留古代跑的意思，而“行”则是现在走路的意思。北方话的“跑”用来与“走”相对。又如古代汉语用“立”，北方话用“站”，南方方言用“倚”，中部吴语方言也用“倚”，所以，北方话是“走、跑、站”，南方方言则是“行、走、倚”。

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汇，方言分歧一般不大。但“儿子、媳妇”的说法就很不同。“儿子”在中部和南方方言中的说法留待下文再说。这里先说“媳妇”，在南方方言中，不说“媳妇”，而说“新妇”。吴语也说“新妇”。上述讨论的这些词的方言用法见表 VII ⑪。



表 VIII 方言特殊用词

	北京	扬州	成都	温州	长沙	南昌	梅县	广州	厦门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行	行	行
跑	跑	跑	跑	zei <sup>8</sup>	跑	跑	走	走	走
站	站	站	站	倚	站	倚	倚	倚	倚
儿	儿子	伢仔	儿	儿	仔	仔	lai <sup>5</sup> c	仔	𠵿
媳	媳妇	媳妇	媳妇	新妇	媳妇	新妇	新 khiu <sup>1</sup>	新妇	新妇

## 8.7 中部方言

中部方言是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过渡地区，具有北方和南方两大区方言的一些特点。我们把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传统地看作是汉语的两个分支，但中部方言是否也是这样一种汉语的分支，就很难说了。在我看来，中部方言原来也属南方方言，由于几百年来北方方言不断南侵，于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考察它目前的情况，很难判断它原来就是这样，还是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中部方言在对待古浊音声母上，吴语是全部保留；赣语都变作送气清音；湘语都变为不送气清音，有些地方保留有不同程度的浊音。由于别的方言区也有类似的浊音清化现象，所以不能据此判断为中部方言。中部方言在古咸、山两摄有 a 和 o 的对立，但湘方言没有这种现象<sup>⑫</sup>。

中部方言声调比北方话复杂，去声都分阴阳两类。多数保留入声。声调数目有五个（湘方言较多）到八个（指那些比较保守的吴方言）。

中部方言人称代词和南方方言一致，受北方话影响而输入“他”这个第三人称的少数地区是例外。领属助词是舌根音“个”。常用的否定词和北方话的“不”同源（我想苏州的“弗”，温州的“不” fu<sup>3</sup>，及其他方言 p 声母否定词，都来自中古汉语的 pjuet）。值得注意的是，中部方言没有和南方方言同根的否定词

(以 m 为声母)。

中部方言除几处以外，资料还很单薄，要从历史语言学的观点解释好还很难，上述的这些说法还只能是尝试的性质。

## 8.8 吴语

吴语用于除南京地区以外的江苏南部，长江口的崇明岛及江北的启东、海门几处也讲吴语，浙江省除了西南的庆源、龙泉等地以外，都讲吴语<sup>⑩</sup>。江西东北部的玉山、广丰也属吴语。吴语流传海外也是较晚才有。

吴语一般分为北部的江苏吴语和南部的浙江吴语两种 (Chao 1967:100)，但这种划分的标准还不清楚。根据袁家骅 (1960) 的意见，浙江南部如温州、金华、永康、衢州在词汇上和北部的吴语很不同。袁认为这可能受别的方言所影响。赵元任 (1957) 认为，浙江的吴语在口语音和书面音之间分歧不大，比较纯，不像北部吴语受北方话影响较大。吴语的进一步令人满意的划分，还得等更全面的语音描写及词汇调查以后才能做到。

吴语在语音上的最大特点是保留古塞音声母的三分法：除了送气清音、不送气清音之外，还有一套各地程度不同的浊音。这种浊音，多数地区是，处于句首时，由清音开始，然后带出浊流；处于别的词之后，就自始至终都是浊音。在浙江南部，浊音自始就有，没有只是浊流的感觉。吴语的不送气清塞音较北方话要强，显得硬、脆。现在把上海话声母列如表 IX<sup>⑪</sup>。

表中可以看到，吴语和北方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套浊音。造成整套的清浊对立。有些方言比上海方言还多个 dz，有的有舌叶的（或说卷舌的）塞擦音和擦音，古舌根音在 i y 前顎化。

从历史的观点看，吴语声母比北方话来得保守。除了有清浊对立之外，中古的 ŋ 声母也还保留作一个独立的声母。古微母字很多方言读唇齿音，吴语有保留读双唇音的，如“问” mən<sup>2</sup>（书面音 vən<sup>2</sup>），“无” m<sup>2</sup>（书面音 vu<sup>2</sup>）。参赵元任 (1967: 95)。吴

语元音对立较多，上海话的元音见表 X。

表 IX 上海话声母

唇音	p	ph	b	m	f	v	w
舌头	t	th	d	n			l
舌尖	ts	tsh			s	z	j
舌面	tɕ	tɕh	dʒ	ɲ	ʃ	ʒ	
舌根	k	kh	g	ŋ			
小舌					h	ɦ	

表 X 上海话元音

	前		央	后
高	i	y	ĩ	u
半高	e	ø		o
半低	ɛ		ə	ɐ
低			ä	

元音 i, e, ɛ, ĩ, ə, ä 都是不圆唇元音，其他元音多少有些圆唇。上海话及其他吴语都缺少前响复合元音，所以普通话的 ai, ou, 上海话相对作 ɛ, ø。介音有 i, u, 有的还有 y。上海话韵母分元音尾韵母、鼻音尾韵母 ŋ 及鼻化韵尾、喉塞音韵尾。ŋ, ʔ 之前的元音限于 i, ə, a, u, o, ɔ。舌尖元音在吴语很普遍（卷舌元音则很少见）。总之，吴语的元音对立比较丰富，而北方话的复合元音或三合元音比较多。

古咸、山摄的 -m, -n 韵尾，在吴语多已失落，如“三” sām > sɛ, “南” nām > nɐ 等。古 -ŋ 韵尾，只东韵仍保留，其他韵的或鼻化（如“当” tɕɔ̃），或并于深摄、臻摄而合为 ŋ 或 n（如“今斤睛”都音 tɕiŋ）。从历史的观点看，吴语只有鼻尾韵与非鼻尾

韵的一种对立，鼻音韵尾实际为前面的元音所决定，如苏州话中，*ŋ* 只出现在后低元音后，*n* 出现在前元音或央元音后。

今上海话声调只五个，吴语多数有七个或八个声调，见表Ⅺ。

表Ⅺ 吴语调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上 海	1	2	3	2	3	2	7	8
苏 州	1	2	3	6	5	6	7	8
杭 州	1	2	3	6	5	6	7	8
绍 兴	1	2	3	4	5	6	7	8
永 康	1	2	3	4	5	6	3	4
温 州	1	2	3	4	5	6	7	8

显然，吴语声调各分阴阳。这和声母分清浊相对应。阳调类都是带浊流的声母，响音读阳调类的也带有浊流。北部吴语中古上声的演变有点像北方话，次浊上归阴上，全浊上则并入阳去。浙江除了杭州，上声仍分阴阳。入声都由喉塞音结尾。吴语调值见表Ⅺ。阳调类的调值都低于阴调类的调值。

连读变调是吴语的一大特征。这是说，单字调在词组中连读时就要发生变化。整个中国的东南部，北起扬子江，南到广东潮州，都属于变调地带。这些变调规则非常复杂，而各个方言又都有不同的变调规则<sup>⑭</sup>。

表 Ⅲ 吴语的调值

调类	1	2	3	4	5	6	7	8
上海	42	24	35	—	—	—	<u>55</u>	<u>23</u>
苏州	44	24	41	—	513	31	<u>44</u>	<u>23</u>
杭州	44	213	41	—	445	11	<u>54</u>	<u>12</u>
绍兴	51	231	335	113	33	11	<u>45</u>	<u>12</u>
永康	44	22	35	13	52	24	—	—
温州	44	31	<u>45</u>	<u>24</u>	42	11	23	12

吴语的基本词汇，特别是指示词、人称代词，各处方言很不同。吴语人称代词见表 Ⅳ⑥。

表 Ⅳ 吴语人称代词

	丹阳	苏州	上海	杭州	绍兴	永康	温州
我	ŋou <sup>3</sup>	ŋəu <sup>3</sup>	ŋu <sup>2</sup>	ŋo <sup>3</sup>	ŋo <sup>4</sup>	ŋoi <sup>4</sup>	ŋ <sup>4</sup>
你	ŋ <sup>3</sup>	ne <sup>3</sup>	noŋ <sup>2</sup>	ni <sup>3</sup>	noŋ <sup>3</sup>	n <sup>4</sup>	ni <sup>4</sup>
他她	tha <sup>1</sup>	li <sup>1</sup>	ji <sup>2</sup>	tha <sup>1</sup>	ji <sup>2</sup>	gou <sup>2</sup>	gi <sup>2</sup>
我的	ŋou <sup>2</sup> keŋ <sup>7</sup>	ŋəu <sup>3</sup> keŋ <sup>7</sup>	ŋu <sup>2</sup> keŋ <sup>7</sup>	ŋo <sup>3</sup> tiŋ <sup>7</sup>	ŋo <sup>4</sup> geŋ <sup>3</sup>	ŋoi <sup>4</sup> ke <sup>1</sup>	ŋ <sup>4</sup> gai <sup>3</sup>
我们	ŋou <sup>2</sup> dzi <sup>2</sup>	ni <sup>2</sup>	ni <sup>2</sup>	ŋo <sup>3</sup> men	ŋa <sup>4</sup> laŋ <sup>3</sup>	ŋoi <sup>4</sup> le <sup>3</sup> noŋ <sup>2</sup>	ŋ <sup>4</sup> le <sup>2</sup>

吴语第一人称代词可以看作来自中古的“我”。第二人称的共同来源不太看得清。第三人称说法较多，丹阳、杭州的“他”，显然是受北方话的影响。上海、绍兴的ji<sup>2</sup>当和“伊”同根，闽语也用。永康、温州则是“渠”，南方方言也多用“渠”作第三人称。从第三人称的不同说法看，说吴语是一个方言集合体，主要从类型上看，而不是从历史的根源看。

吴语内部的分歧，从指示代词也可看出。丹阳、杭州、绍兴近指用keŋ<sup>7</sup>或keŋ<sup>7</sup>，苏州ke<sup>1</sup>，温州ki<sup>7</sup>。远指分歧更大，丹阳、

永康是 kou<sup>5</sup>，苏州 kue<sup>1</sup>，上海 i<sup>1</sup>（和第三人称 ji<sup>2</sup> 有关？），杭州 la<sup>4</sup>，绍兴 haŋ<sup>5</sup>，温州 hi<sup>3</sup>。

吴语的否定词比较一致。和北方话的“不”相当，吴语都作唇齿音。表示存在的否定，与表示还没有干的意思，用法不同，表示没有干，用否定词加上“曾”，即“弗曾、未曾”。在白话小说中常见“不曾”，今北方话则完全不用。吴语否定词见表 X IV。

表 X IV 吴语否定词

	一般否定	存在否定	还没有
丹阳	fəʔ <sup>7</sup> (弗)	ŋ <sup>2</sup> tsəʔ <sup>7</sup>	fəʔ <sup>7</sup> dzəŋ <sup>2</sup> (弗曾)
苏州	fəʔ <sup>7</sup> (弗)	ŋ <sup>2</sup> pəʔ <sup>7</sup> (无不)	fən <sup>1</sup> (曾勿)
上海	vəʔ <sup>8</sup> (勿)	ŋ <sup>2</sup> məʔ <sup>8</sup> (无没)	vəʔ <sup>8</sup> zəŋ <sup>2</sup> (勿曾)
绍兴	veʔ <sup>8</sup> (勿)	ŋ <sup>1</sup> iou <sup>1</sup>	veʔ <sup>8</sup> ziŋ <sup>2</sup> (勿曾)
温州	fu <sup>3</sup> (不)	ŋ <sup>5</sup> nau <sup>4</sup>	mei <sup>6</sup> (未)

表中温州表示还没有的意思比较特别，用 mei<sup>6</sup>，这和南方方言相似，广州用 mei<sup>6</sup>，厦门 be<sup>6</sup>，福州 mui<sup>6</sup>，都从古代汉语“未”（中古音 mjuei-）而来。

杭州话在吴语中很特别。语音上是吴语：有三套塞音、七个调、有喉塞音韵尾。在词汇语法上则像北方话：第三人称用“他”，领属助词用“的”，复数人称词尾用“们”，否定存在及还没有都用“没有”。赵元任(1967)说杭州话有吴语的语音、北方话的词汇是很合适的。从历史上看，杭州是南宋(1127—1279)的首都，北宋的官僚贵族移居杭州时带去了北方方言，就像八百年前晋朝流亡贵族南移金陵时一样，我们可以设想，杭州本地人接受新移民带来的有特权的北方话并非整个儿的，而是用原来的语音来说新的词汇，而词汇的吸收也不是一下就全部更新，而是一条一条渐渐地吸收进来。从本质上看，这种从词汇上取代吴方言的过程和某些克里奥耳语言 (Creole) 的情况相似 (Whinnom 1965, 1971)。

## 8.9 赣语

由于对赣语方言了解不多，所以现在所谈都属尝试而已。赣语用于江西省及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的方言好像也是这种类型。古浊塞音浊塞擦音，赣语都读送气清音，客家话及一些北方话及少数闽语也这么读。由于这一种共同现象，罗常培(1950)就提出赣语和客家话属同一组方言。袁家骅(1960:128)根据赣语词汇接近于吴语湘语而反对这种说法。我们这里把赣语属于中部方言，是过渡方言，根据袁的意见，把赣语和客家话分立。如何区分等问题，下章再谈。

赣语一般有六至七个声调，少数只有五个调(扬1971)。有六七个调的，去声入声都分阴阳。比较保守的临川方言(罗1958)，保留有中古所有辅音韵尾。赣语的代表方言南昌话，古韵尾 -m -n 相混，-p -t 相混(扬1969)。其他赣语古韵尾减少得更多。

赣语中，古舌根音在前高元音前都腭化，舌根鼻音 ŋ 保留作一个独立的声母。总之，赣语和失落了古浊音的其他方言，在声母上无大区别。

赣语韵母很像北方话，只是有 a o 的对立，如 an/on, am/om, ai/oi。赣语和北方话一样，有复合元音、三合元音。罗常培曾指出，赣语和客家话都把中古音 əu 发作 eu (或 eu)。但这种发音在西部闽语也能见到，不能作为赣、客是一种方言的有力根据。

赣语的代词体系属南方方言类型。第三人称和“渠”同根；在客家、闽、粤、湘交界地区，都用“渠”的各种同源词。领属助词也用舌根音声母字，复数人称词尾各地不同。赣语人称代词见表 Ⅺ，并附上安徽绩溪话供比较。

表 X VI 赣语和绩溪话的人称代词

	我	你	他她	我的	我们
南昌	ŋo³	li³, ɲ³	təhiɛ²	ŋo³ko	ŋo³tuŋ
临川	ŋo³	li³	ke³	ŋo³ko	ŋo³koi¹ to¹ ɲir
凤新	ŋo⁶	ɲi⁶	tɕi⁶	ŋo⁶ko	ŋon³li
绩溪	a³	ɲ³	ke²	a³ne	a³mæ⁴

赣语指示词也不同于北方话。南昌近指是 ko³, 远指是 he³。临川近指 koi¹, 远指 e¹。凤新近指 hi³, 远指 he³。一般否定词是 pət (南昌、凤新) 或 put (临川)、都与“不”同根, 存在的否定是 mau⁶ (南昌、凤新), mau² (临川), 这和南方方言一致。但赣语否定存在和表示还没有这意思, 在形式上完全一致。这不像吴语或南方方言, 而像北方话。

赣语走路用“走”。“站、倚”南昌都用,“站”是北方话借词。临川只说“倚”。

赣语处于南北交通要道地区, 流经全省的赣江自古就是联系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一条主要通道。这个地区比吴语更易于受北方话影响, 从某些方言北方话词汇色彩上可以看到, 袁家骅(1960)指出, 赣语和邻近方言无大的不同, 这是有根据的。这和北方话易于进入这个中间地带的情形有关。

据现有的材料, 还很难对赣语进一步分区, 如果把古浊音今读送气清音这点作为标准, 那么这个方言区域就非常之大。所以只据这个标准是不可靠的。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方言的归属就是个典型的问题。赵、杨(1965)在绩溪方言的描写中就指出, 绩溪方言有几种不同方言的特点。古浊音都读送气清音, 这很像徽州南部的赣语。绩溪第三人称 ke² 和临川话一致。因此把绩溪话划入赣语问题不大。不同的是, 绩溪话因更近于北方话区域, 因而受北方话的影响就更大。



## 8.10 湘语

湘语把古浊塞音都读不送气音，保守一些的方言读不送气浊音，演变得快的方言读不送气清音。袁家骅（1960）称这种情况为老湘语、新湘语。新、老两种湘语用于湖南中部和西南部。

从《湖南方言调查报告》（杨 1974）看，只有少数湘语保留古浊塞音，多数湘语已受到北方话的很大影响，有些地方已很难看到湘语的原有特点了。因而如何划分这些方言也已成了问题。为了看典型的湘语，我们以西南部的城步话为例子来说明。

城步话保留有全部古浊音，而且不像吴语只带有浊气流而已。有六个调，平声去声各分阴阳。上声入声不分阴阳（湘语多数六个调，四个调五个调的也能看到）。韵母和西南官话相似，古辅音韵尾只留下 -n -ŋ。新湘语的代表长沙，除了把古浊音读为不送气清音以外，其他都和城步话相同。古浊音的不同读法见表ⅩⅧ。

表ⅩⅧ 古浊音在湘语中的演变

	蛇	桃	坐	共	洞	十	白
中古	dʒje	dâu	dzuâ:	gjong-	dung	ʒjəp	bək
城步	dzie <sup>7</sup>	dao <sup>2</sup>	dzo <sup>8</sup>	goŋ <sup>8</sup>	doŋ <sup>8</sup>	zi <sup>7</sup>	ba <sup>7</sup>
双峰	ɣio <sup>7</sup>	də <sup>2</sup>	dzu <sup>8</sup>	gaŋ <sup>8</sup>	daŋ <sup>8</sup>	ʂi <sup>7</sup>	piɛ <sup>2</sup>
邵阳	ze <sup>2</sup>	dav <sup>2</sup>	tsu <sup>8</sup>	koŋ <sup>8</sup>	toŋ <sup>8</sup>	si <sup>7</sup>	pe <sup>8</sup>
长沙	sv <sup>2</sup>	tav <sup>2</sup>	tso <sup>8</sup>	koŋ <sup>5</sup>	toŋ <sup>5</sup>	si <sup>7</sup>	pv <sup>7</sup>

从表中可看到湘语和吴语不同。吴语保留古浊音最完全，在湘语就已经清化了。另外从入声看，吴语还有喉塞音尾，湘语不保留古入声韵尾的痕迹。

湘语的词汇，从总的来看，已经北方化了。有些方言受北方话影响之大，和吴语区的杭州有相似之处。很可能，有些方言正

在经历着更新词汇的过程。像城步那样的保守性的方言，在基本词汇方面仍保留有非北方话的成分。湘语的代词系统受北方话影响很大，但还是有些方言保留湘语特点，见表 X VII ⑩。

表 X VII 湘语人称代词

	我	你	他她	我的	我们
城步	ŋo <sup>3</sup>	ŋi <sup>3</sup>	tɕi <sup>3</sup>	ŋo <sup>3</sup> kə	ŋo <sup>3</sup> ni
祁阳	ŋo <sup>3</sup>	ŋi <sup>3</sup>	ki <sup>1</sup>	ŋo <sup>3</sup> ti	ŋo <sup>3</sup> næ̃
双峰	aŋ <sup>3</sup>	n <sup>3</sup>	tho <sup>1</sup>	aŋ <sup>3</sup> kə	ŋu <sup>3</sup> nin <sup>2</sup>
长沙	ŋo <sup>3</sup>	ŋ <sup>3</sup> , ŋi <sup>3</sup>	tha <sup>1</sup>	ŋo <sup>3</sup> ti	ŋo <sup>3</sup> mən

从表中可以看到，只有城步方言没受北方话代词的影响，其他几处方言都有不同程度的北方话影响。

湘语在其他词汇方面，也表现了南北混合的现象。指示词即使在新湘语中，也没受北方话影响。长沙近指是 kei<sup>7</sup>，远指是 lai<sup>5</sup>，城步近指 ko<sup>5</sup>，远指 ni<sup>5</sup>。受北方话影响大的方言说“站”，保守些的说“倚”的同源语。湘语存在的否定和赣语一样，长沙是 ɕay<sup>6</sup>，双峰是 mæ<sup>8</sup>，城步是 mao<sup>6</sup>。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说明还没有这个意思是否和存在的否定用同一个形式。湘语的一般否定词是“不”。

从《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看，湘语正在逐渐失落其原有的非北方话的特点。有的方言跑得快一些，有的慢一些，多数当然是中间状态。我们在考察湘语这方面特点的同时，不能不想，湘语以后会不会失却所有原来的特点而并入西南官话？

## 阅 读 材 料

Chao, Yuen Ren. 1967. Contrastive aspects of Wu dialects.

Language 43.92-101(该文是关于吴语的最精简的全面叙述,)  
 Egerod, Søren. 1967. Dialectology. I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II, ed Thomas A sebeok, pp.91-129. The Hague, Mouton. (该文是对汉语方言的很好的导言。)  
 Li, Fang Kuei. 1939. Language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book*, 1938-1939 issue, 44-46. 重修后发表于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3, 1.1-13, (该文是关于中国方言的传统的划分法。)  
 袁家骅。1960. 汉语方言概要。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该书是汉语方言的教科书。)

## 第八章 注 释

- ① 双峰的材料来自袁(1960), 建瓯的材料根据 J. Norman 的调查。其他材料引自《汉语方言概要》(北京大学 1964)。
- ② 现在只有少数学生仍学传统的方言字音, 一般只学普通话读音。方言的书面音只保留在那些学问深的典雅的词语中。从普通话借来的新词并非就读北京音, 而是折合成当地方言。这样, 尽管学校已不教方言读音, 实际上方言读音还会保留下去。
- ③ 我承认方言和语言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我这儿说的只是一种印象, 说明汉语方言分歧之大。
- ④ 温州的读音引自北京大学(1964)。柘荣读音据 J. Norman 的调查。
- ⑤ 北京音用宽式标音, 调类用数码标。灵宝音引自杨和 Ching (1971)。其他材料引自北京大学(1964)。
- ⑥ 参袁 (1960: 24 页以下)
- ⑦ 引自北京大学(1962), 杨和 Ching(1971)。
- ⑧ 北方话中, 古全浊上都并入去声。北京话古全浊入声今读阳平, 古次浊入声今读去声。西安话古全浊入声今读阴平, 古次浊入声今读阳平。
- ⑨ 调值用赵元任五度制数字标调法。
- ⑩ 说语法, 指的是代词和否定词。

- ⑪ 材料引自北京大学(1964)。
- ⑫ 吴语赣语“探、炭”有别。苏州“探” $th\phi^5$ 和“炭” $the^5$ 不同，温州“探” $th\phi^5$ 和“炭” $tha^5$ 也不同。
- ⑬ 这是J. Norman从庆源人语音中得出的看法。
- ⑭ 上海话材料据Sherard(1980)。
- ⑮ 吴语的连读变调，上海(Sherard 1980)，苏州(袁1960)，丹阳(吕1980b)，温岭(李荣1979)，永康(袁1960)。
- ⑯ 材料引自Chao(1929)和北京大学(1964)。
- ⑰ 南昌音据杨(1969b)，临川据罗(1958)，凤新据Yú(1975)，绩溪据Chao和杨(1965)。
- ⑱ 城步、邵阳据扬(1974)，双峰据袁(1960)，北京大学(1962)，长沙据北京大学(1962，1964)。
- ⑲ 城步、祁阳据扬(1974)，双峰，长沙据袁(1960)。

## 第九章 南方方言

### 9.1 南方方言的共同特征

第八章我已指出，南方方言指闽语、客家话、粤语。我觉得这三种方言很相近。可以认为来自同一祖先。我把它们的祖先叫做古代南方汉语，这种古代南方话从某些材料看，要比现在的分布范围要广。很可能，汉代、三国、西晋时候的吴语也属于古代南方话，这从汉代杨雄的《方言》及晋代郭璞(276—324)对《方言》的注释以及佛经翻译中可以看到(Pulleyblank 1979)。这种古代的吴语和今天的吴语是两回事，不可混淆，今天的吴语不属于南方方言。

当时广东、福建归入中国版图时，北方去的移民带去了古代的汉语。由于处于遥远的边疆，为山水所阻，这种古代汉语很自然就会以自己特有的方言形式来发展，同时也免不了要受周围语言的影响。有些地区从地理形势看，更易于受北方话影响的，就从每次新的移民中吸收北方话成分；而更边远的山区如福建，就不易受北方话的影响，由于两千年来的这些外部影响，原来的古代南方方言已逐渐趋于消失。现在，从表面上看，闽、客、粤语之间有很多不同，但如果注意它们的那些古老方言成分，就会发现有很多共同点。我相信，这种共同点，说明有共同的来源。下面看看它们的共同特点。

《切韵》时，只有双唇音声母，没有唇齿音声母。到了宋代的韵图，唇齿音出现了，很多原来是双唇音的，变为唇齿音了。这一点，从北方方言到中部方言都无一例外地反映出来了。而闽语保留有很多双唇音，客家话保留的双唇音数量和闽语差不多，

粤语保留得要少些。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认为，闽、客家、粤三种方言，是从还没唇齿化的古老的南方方言而来。古双唇音的保留情况见表 I①。

和保留双唇音相关的一个特点，大概就是保留古舌根音而不腭化。汉语的腭化音问题，可以看作有两次。《切韵》之后舌根音在北部和中部方言中的腭化是比较晚的一次，较早的一次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中古汉语的腭化音“枝”*tšje*、“齿”*tšhī*、“指”*tši*都是从上古的舌根音腭化而来。到底那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腭化还不太清楚，有争议，但有这个事实这一点是用不着争议的。闽语仍保留着一些较早的没腭化的舌根音。如厦门“枝”*ki¹*，“齿”*khi³*，“指”*ki³*。客家只保留一个字：“枝”*ki¹*。粤语还未见这个现象②。从唇齿音、腭化音这些情况看，南方有些方言从来不爱读塞擦音。

表 I 南方方言对古双唇音的保留

	中古	北京	广州	客家	厦门
浮	<i>bjəu</i>	<i>fu²</i>	<i>phou²</i>	<i>feu²</i>	<i>phu²</i>
斧	<i>pju:</i>	<i>fu³</i>	<i>pou</i> (阳江)	<i>pu³</i>	<i>pə³</i>
妇	<i>bjəu:</i>	<i>fu⁵</i>	<i>phou¹</i>	<i>fu⁵</i>	<i>pu⁶</i>
斛	<i>bjəu-</i>	<i>fu⁵</i>	<i>pou⁶</i>	<i>phu⁶</i>	<i>pu⁶</i>
缚	<i>phjuk</i>	<i>fu⁵</i>	<i>phuk⁷</i>	<i>phuk⁷</i>	<i>phak⁷</i>
肥	<i>bjuei</i>	<i>fei²</i>	<i>fei²</i>	<i>phui²</i>	<i>pui²</i>
蜂	<i>phjwong</i>	<i>fəŋ¹</i>	<i>fəŋ¹</i>	<i>phuŋ¹</i>	<i>phaŋ¹</i>

古歌部字在闽、客、粤三种方言中的今读，也可看出它们之间的深层关系。李方桂(1971)把上古歌部拟作\*(u)ar。到了中古，歌韵的韵母是单元音*â*，合口是*uâ*。北方和中部两大方言区的今读可以看出是从中古发展而来。在南方方言中，发展就不同：上古的\*ar变成\*âi，上古的\*uar读成\*oi，这在越南语和瑶语的借词中也可看到这种现象。广州话“舵”读*thaai¹*，“螺”

读  $ləy^1$ 。台山话“我”读  $ŋoi^1$ ，“个”读  $koi^1$  (Wong 1970)。客家“我”读  $ŋai^2$ ，“个”读  $kai$  (同上)。粤语和客家话这种读音只属少数遗迹。闽语中歌韵这个读法是大量的，例如福州话“舵”读  $tuai^6$ ，“螺”读  $loi^2$ ，“我”读  $ŋuai^3$ ，“破”读  $phuai^5$ ，“坐”读  $soi^6$ ，“磨”读  $muai^2$ ，等等。越南语借词“(蚕)蛾”读  $ŋai$ “磨”读  $mài$ 。粤语、客家话中歌韵多数字已读成相当于北方方言及中部方言歌韵字的读法，但还是有少量遗迹，足以说明这些方言最早的读法。

南方方言总的说来，有相似的音节结构。声母很简单，浊音完全清化，少数方言有舌面音和舌尖前音的对立，多数则没有这种对立，即只有舌尖前音。保留古舌根音而没腭化。古韵尾全部保留，这一点是最突出的特征。在非南方方言中，只有赣语还保留有中古音的辅音韵尾。

在词汇、语法方面，南方方言区别于北方和中部方言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用否定词“不”。南方方言否定词用自成音节的鼻音，构拟作  $*m$ 。粤语、客家读平声，闽语读上声或去声。上古汉语有很多否定词，可以分作  $*p$  组和  $*m$  组。北方和中部两种方言的否定词，来自  $*p$   $*m$  两组，南方方言只有  $*m$  组。南方方言存在的否定词可以拟作  $*māu$  (中古时期)。粤语是  $mou^1$ ，客家梅县是  $mo^2$ ，闽语或是平声，或是去声。赣语、湘语这个否定词和闽语的声调相同。

闽、粤、客家在词汇语法上的另一特点，就是有一对名词和动词，就是“毒”这个词，用作名词是入声，这个用法来源很明确，每个方言都一致。但另一个动词用法，读去声，来历不明③。见表 II。

	中古	福州	粤	客家
毒(名词)	duok	tɔik <sup>8</sup>	tuk <sup>8</sup>	thuk <sup>8</sup>
毒(动词)	—	thau <sup>5</sup>	tou <sup>6</sup>	thau <sup>5</sup>

这种名、动相对的不同读法并非每个小方言都有，而北方和中部的方言根本没有这种不同的读法，可以用来确证闽语、粤语、客家话来源相同。

我在第一章提到来自南亚语中表示巫师意思的一个词。粤语、客家也有这种说法。中山话是 *thuŋ<sup>2</sup> kuŋ<sup>1</sup> tsai<sup>3</sup>* (童公仔)，客家是 *thuŋ<sup>2</sup> sin<sup>1</sup>* (童身)<sup>④</sup>。这不只可用来证明确有共同的古代南方方言，而且可以说明南亚语言是古代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

南方方言昆虫的名称也很一致。如蟑螂这个词，厦门 *kā<sup>1</sup> tsua<sup>2</sup>*<sup>⑤</sup>，粤语 *kaat<sup>6</sup> tsaat<sup>6</sup>*，客家 *tshat<sup>6</sup>*。这大概来自古代的 \**dzât* (\**kât* 是可有可无的词头)，这个词只用于南方方言，来历不明，蚂蝗这个词，厦门 *gə<sup>2</sup> khi<sup>2</sup>*，粤语 *khei<sup>2</sup> na<sup>3</sup>*，客家 *fu<sup>2</sup> khi<sup>2</sup>*<sup>⑥</sup>。虱这个词，虽然各方言都说，语源明确，但南方方言构词法很有特点，都加上表示雌性动物的词尾：厦门 *sat<sup>7</sup> bu<sup>3</sup>* (虱母)，粤语 *sat<sup>7</sup> na<sup>3</sup>* (虱𧈧)，客家 *set<sup>7</sup> ma<sup>2</sup>* (虱嫲)。

南方方言除少数方言以外，第三人称都用中古的“伊”或“渠”。这两个说法中部方言也用。中部方言这种说法，可能是过去属于南方方言的一个遗迹。也可用以说明，南方方言和中部方言，在深层有共同的一些特点。但总的来说，中部方言是后汉时北方人迁居扬子江流域的结果。

总之，现在扬子江南岸的方言，是在古代南方方言的基础上结合北方方言的结果。这种混合物已淹没了原来北方方言的成分。在更远的南方山区，闽语保留有古代南方方言的成分最多，客家次之，粤语则只是一些遗迹了。

## 9.2 粤语

粤语是广东、广西境内内部比较一致的一组方言。平常说的广东话实际是指广州话，而不是整个粤语。袁家骅(1960:179)认为两省有近100个县说粤语。O.Y. Hashimoto(余霭芹, 1972)根据她自己的调查，提出是50个县左右。实际上，现在对粤语的调查还很



不够，很难说个确切的界限。另外，粤语区存在有多种方言，一个县内常有粤、闽、客家三种方言。已发表的调查报告常不说明那个地区有几种方言。尽管粤语的方言地理还只是梗概，可以明确的是，粤语用于珠江和西江两个流域，西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也讲粤语。广东广西南部一直向西，都可以看到粤语的流传。

海外说粤语的人很多。O.Y. Hashimoto (1972: 12) 估计，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有 200 万以上人讲粤语，北美有几十万人讲粤语，随着移民的增多，讲粤语的人会继续增长。

广州话是粤语的普通话，广东境内的讲闽语、客家话的人，也以广州话为当地的普通话。在香港、澳门，也以广州话为交际用语。广州话有很多民间文学创作，就发展了很多广州话俗字，但在正式写作上一般不用。

粤语的区分标准也很难说好。从古浊声母看，凡平声及少数上声字，今广州话读送气清音，其他声调则读不送气清音。其他方言不一定和广州话一致。广西博白古浊声母今读一律是送气清音。广西的藤县和苍梧都读不送气清音 (O.Y. Hashimoto 1972: 32)。还有，粤语保留中古的辅音韵尾，有 8 至 10 个声调，最后，粤语入声根据元音的长短分为 3 个或 4 个入声。这些都可作为粤语的特点。

广州的声母比吴语、湘语简单，见表 III。

表 III 广州话声母

双唇	舌头	舌尖前	舌根	圆唇舌根	喉音
p	t	ts	k	kw	(ʔ)
ph	th	tsh	kh	khw	
m	n		ŋ	ŋw	
f		s			h
	l	j		w	

广州话的舌尖前音因人而异，有的是舌尖，有的是舌面或舌叶，多数在前高元音前有腭化音（袁 1960:183）。圆唇舌根音有的赞成分为舌根音加上圆唇介音；有的从简化考虑就作圆唇舌根音（O.Y. Hashimoto 1972:138）。喉塞音在零声母前可有可无，有的人在零声母前发作 ŋ。有些人 n l 不分，有些人则分得很清（袁 1960:183）。

虽然广州话只有一套舌尖前音，但从周围的方言读音看，古代粤语有不同的两套舌尖音，和北方话的卷舌音和不卷舌音相当，见表 IV④。

表 IV 粤语的舌尖音

	北京	广州	阳江	中山	台山	滕县
早	tsau <sup>3</sup>	tsou <sup>3</sup>	tsou <sup>3</sup>	tsou <sup>3</sup>	tou <sup>3</sup>	tou <sup>3</sup>
菜	tshai <sup>5</sup>	tshoi <sup>5</sup>	tshoi <sup>5</sup>	tshoi <sup>5</sup>	thoi <sup>5</sup>	thoi <sup>5</sup>
死	sɿ <sup>3</sup>	sei <sup>3</sup>	ɬei <sup>3</sup>	si <sup>3</sup>	ɬei <sup>3</sup>	ɬi <sup>3</sup>
针	tʂən <sup>1</sup>	tsam <sup>1</sup>	tsəm <sup>1</sup>	tsam <sup>1</sup>	tsim <sup>1</sup>	tsəm <sup>1</sup>
吹	tʂhuei <sup>1</sup>	tshoy <sup>1</sup>	tshui <sup>1</sup>	tshøy <sup>1</sup>	tshui <sup>1</sup>	tshøy <sup>1</sup>
石	ʂi <sup>2</sup>	sek <sup>8</sup>	sik <sup>8</sup>	sia:k <sup>8</sup>	siak <sup>8</sup>	sek <sup>8</sup>

表中不同读音并非发音部位的不同，而是把古舌尖前音作舌头音，把古心母读作边音，把古舌面音读作舌尖前音。这是一种保留区别的方法。

粤语元音的对立，随方言而异。滕县有 9 至 10 个不同元音（Yue 1979），台山只有 5 个元音（Chao 1951）。除滕县外，粤语无圆唇介音。复合元音 uâ 或者单元音化（如 \*puân > pun），或者把介音算作声母的一部分（\*kwan > kwan）。i 介音多数方言有，广州话中单元音化了 \*io > œ，\*ie > i。因此，广州话是少数几个没有介音的方言之一。广州话 8 个元音，有 7 个可作主要元音：i y e œ u o aa[a:]。a [ɐ] 则必须跟元音尾(i 或 u)，或者

辅音尾。广州话有长短元音之别 (O.Y. Hashimoto 1972: 152 以下) 主要元音是短元音的, 元音尾或鼻音尾就长, 主要元音是长元音的, 韵尾就短。有塞音韵尾的就全由主要元音的长短来决定。元音的长短和入声的演变有关, 虽然阳江、滕县、台山等方言已无元音长短的区别, 但古粤语一定有元音长短的区别。

粤语在保留中古辅音韵尾这点上显得最保守。有些闽语及客家话虽也有 6 个辅音韵尾, 但并不和中古的韵尾确切对应, 常被前面的元音所同化, 如  $in > in$ ,  $ek > et$  等。粤语除了少数例外音外, 和中古韵尾完全对应。

粤语的声调数目很多。古阴入字据今元音的长短分为 2 个阴入调。这在别处还未见。于是 2 个阴入再加 1 个阳入共 3 个入声, 见表 V。

表 V 粤语的声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sub>I</sub>	阴入 <sub>II</sub>	阳入
广州	1	2	3	4	5	6	7 <sub>a</sub>	7 <sub>b</sub>	8
阳江	1	2	3		5	6	7 <sub>a</sub>	7 <sub>b</sub>	8
中山	1	2	3		5		7	8	
台山	1	2	3	1, 3	1	6	7 <sub>a</sub>	7 <sub>b</sub>	8
滕县	1	2	3	4	5	6	7 <sub>a</sub>	7 <sub>b</sub>	8

很多书面用的阳上字, 多数方言都已读阳去, 表 V 所表现的, 只是口语词的情况。调值见表 VI。

广州话声调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是阳调类调值比阴调类低。其他粤方言并非都如此。滕县平声上声都有两种读法, 可能受广州话影响而致 (Yue 1979: 10)。

表 VI 粤语调值

调类	广州	阳江	中山	台山	滕县
1	53	33	55	33	42/44
2	21	443	51	11	231/11
3	35	21	13	45	55/35
4	24	—	—	—	24/35
5	44	24	22	—	33
6	33	454	—	42	22
7 <sub>a</sub>	<u>55</u>	<u>24</u>	<u>55</u>	<u>55</u>	<u>55</u>
7 <sub>b</sub>	<u>44</u>	<u>21</u>	—	<u>33</u>	<u>33</u>
8	<u>33</u>	<u>454</u>	<u>22</u>	<u>32</u>	<u>22</u>

粤语有些方言有所谓变调。如广州、台山，有些词，主要是名词，用于日常口语中，就和原来的单字调不同。如“贼”，正式阅读时 [tshaak<sup>33</sup>]，口语中读同 [tshaak<sup>35</sup>]。用来表示日常熟悉的事物，这不是连读变调，和北方话中的儿化相类。

粤语和闽语、客家话等方言一样，有些特殊的词汇。O. Y. Hashimoto (1972: 15-19) 列有很多这些词。例如(1)表示给的意思，写作“畀”，广州 pei<sup>3</sup>，中山 pi<sup>3</sup>，台山 i<sup>3</sup> (< \*pi<sup>3</sup>)，滕县 ʔbi<sup>3</sup>。(2)表示东西、事物，写作“嘢”，广州 ie<sup>3</sup>，中山 ia<sup>3</sup>，阳江 ie<sup>3</sup>，台山 ie<sup>3</sup>，滕县 ie<sup>5</sup>。(3)表示男性的词尾“佬”（略带贬意），广州 lou<sup>3</sup>，中山 lou<sup>3</sup>，阳江 lou<sup>3</sup>，台山 lo<sup>3</sup>，滕县 lou<sup>3</sup>。(4)表示雌性动物的词尾“𧸛”，广州 na<sup>3</sup>，中山 na<sup>3</sup>，阳江 na<sup>3</sup>，台山 na<sup>3</sup>，滕县 na<sup>3</sup>。(5)进行体动词词尾“紧”，广州 kan<sup>3</sup>，中山 kan<sup>3</sup>，台山 kin<sup>3</sup>，滕县 kan<sup>3</sup>。用这些词，大概就可以判断是否粤语了。

粤语的人称代词是“我、你、渠”，见表 VII ①。

表Ⅷ 粤语人称代词

	我	你	他她	我们
广州	ŋo <sup>4</sup>	nei <sup>4</sup>	khəy <sup>4</sup>	ŋo <sup>4</sup> tei <sup>6</sup>
中山	ŋo <sup>3</sup>	ni <sup>3</sup>	khy <sup>2</sup>	ŋo <sup>3</sup> ti <sup>5</sup>
阳江	ŋo <sup>3</sup>	nei <sup>3</sup>	kei <sup>2</sup>	ŋok <sup>7a</sup>
台山	ŋoi <sup>1</sup>	ni <sup>1</sup>	khui <sup>1</sup>	ŋoi <sup>*</sup>
滕县	ŋo <sup>4</sup>	ni <sup>4</sup>	ky <sup>4</sup>	ŋo <sup>4</sup> ti <sup>6</sup>

复数人称代词多数用词尾“哋”tei<sup>6</sup>及其同源语，如广州、中山、滕县。台山、阳江用变调来表示。领属格用名词所用量词嵌于人称代词和物体之间，如“渠本书”即他的书。这种用法很特别。指示词用法不太一致，见表Ⅸ。

表Ⅸ 粤语指示词

	广州	中山	阳江	台山	滕县
近指	ni <sup>1</sup>	ko <sup>1</sup>	ko <sup>3</sup>	khoi <sup>*</sup>	ko <sup>5</sup>
远指	ko <sup>3</sup>	nu <sup>1</sup>	na <sup>3</sup>	niŋ <sup>*</sup>	a <sup>5</sup>
复数指代词尾	ti <sup>1</sup>	nai <sup>1</sup>	nai <sup>5</sup>	nai <sup>3</sup>	?di <sup>1</sup>

初看起来，广州话用ko<sup>3</sup>作远指很特别。一种解释是，ko本来用作一般的指示词，既可近指，也可远指，如法语的ce (cette)既是近指也可远指一样。在粤语方言形成近指、远指对立的时候，ko在有些方言被用作近指，在广州方言则用作远指。复数指代词尾是两类，鼻音声母那一类用于西江以南，舌头音声母用于西江以北。粤语的否定词和闽、客相似，见表Ⅹ。

表Ⅹ 粤语否定词

	广州	中山	阳江	台山	滕县
一般否定	m <sup>2</sup>	m <sup>2</sup>	m <sup>2</sup>	m <sup>2</sup>	n <sup>2</sup>
存在否定	mou <sup>4</sup>	mou <sup>3</sup>	mou <sup>3</sup>	mo <sup>1</sup>	nau <sup>1</sup>
还没有	mei <sup>6</sup> (tshaŋ <sup>2</sup> )	mi <sup>5</sup>	mei <sup>6</sup>	mei <sup>6</sup>	m <sup>2</sup> thəŋ <sup>2</sup>

粤语存在否定词是上声，东部闽语和客家话是平声，西部闽语、赣语、湘语则是去声。粤语上声读法可能是受“有”的上声调所影响。滕县  $m^2 \text{ then}^2$  的说法和吴语“弗曾”相类，闽西有的方言也属这种类型。

粤语在句法上很有特点。量词可单独用作确指，如“隻鸡”就和泛指“一隻鸡”相对立。有些副词用于动词之后，如广州话的“去先”，就是北京话的“先去”。粤语和吴语一样，直接宾语在间接宾语前，如“畀书我”（即“给书我”），北京话是“给我书”。粤语没有把宾语提前的把字句，用这种句型时，就用  $ts\ae\eta^1$ （将）来提前宾语，用得很少，可能是北方话句型的借用。

总之，在南方方言中，粤语给人的印象是受很多北方话的影响。我所谓受北方话影响的成分，并非现代的一些借词，而是指可追溯到晚唐时期的成分。从粤语的音韵系统看，是从晚唐的中古音发展而来。直到现在，讲粤语的人在海外仍称他们自己是“唐人”。

### 9.3 客家话

“客家”就是客人，是讲广东话的人对后来移居去的人的称呼。广东人对客家人一开始有反感，错误地以为客家人是非汉族的野蛮人。这样，客家的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开始，写很多文章和书，证明客家和贬低他们的闽、粤语人一样，都是中国北方来的汉人移民。根据这些文章，客家原居山西南部及河南、安徽，西晋灭亡时，迁居到现在的徽州和江西北部。唐末战乱时，有些客家又移到福建西南部和广东北部（罗香林 1933，罗常培 1958）。他们列举出客家祖先的原籍，来说明这种情况，从客家的家谱看，客家的一部分是从北方移来，但我认为不能把人口来源和客家方言的来源混淆起来。因为人口的组成及人种的背景是一回事，方言的所属又是一回事。客家话属于南方方言，南方方言从汉朝、三国时代就已形成基础，西晋移民去后就最后定型。客家

话和闽语粤语的区别，是接受北方话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另外客家有些特殊的词汇。

下面我们会看到，客家话和闽语很接近，如果不是同一个来源，就不好解释。闽语中《切韵》之前的一些特点，得追溯到公元二三世纪的时候。客家和赣语的相似已是表面现象。我前面已指出，把古浊音读为送气清音这个最显著的特点，不只客家、赣语有，粤语、闽语也有。客家和赣语的词汇比较见表 X。广东梅县、四川华阴代表客家，南昌、临川代表赣语<sup>⑧</sup>。

从表中可以看到，客、赣基本词汇很不同。(1) 从第一人称看，上古歌部的发展，客家话中是 \*ar>ai，赣语则是 o 或 ɔ 了。(2) 客家话否定词同闽、粤、赣语否定词和北方及中部的方言相近。(3) 客家话动物性别标于词尾，赣语则可标于词头，也可标于词尾。《汉语方言概要》(袁 1960) 载南昌方言动物性别标法，5 个词标于词头，4 个词标于词尾。显然，标在词头是受北方话的影响，所以，南昌话、临川话受北方话影响大得多。(4) 儿子的说法，赣、湘、粤一致，客家显得独特。(5) “鼻”字，赣语来自入声，客家和粤、闽都来自去声。(6) 系词，客家用中古的“係”，赣语用“是”。

表 X 客、赣词汇比较

	梅县	华阴	南昌	临川
我	ŋai <sup>2</sup>	ŋai <sup>2</sup>	ŋo <sup>3</sup>	ŋo <sup>3</sup>
一般否定	m <sup>2</sup>	m <sup>2</sup>	pət <sup>7</sup>	put <sup>7</sup>
公鸡	ke <sup>1</sup> kuŋ <sup>1</sup>	kai <sup>1</sup> kuŋ <sup>1</sup>	tɕi <sup>1</sup> kuŋ <sup>1</sup> ~ ioŋ <sup>6</sup> tɕi	hau <sup>2</sup> tɕi
儿子	lai <sup>5</sup>	nai <sup>5</sup>	tsai <sup>3</sup>	tsai <sup>3</sup>
鼻	phi <sup>5</sup>	phi <sup>5</sup>	phit <sup>7</sup>	phit <sup>3</sup>
系词	he <sup>5</sup>	xie <sup>5</sup>	si <sup>6</sup>	si <sup>6</sup>

认为赣、客属同一类方言而指出的多数共同点，其实别的方言

也有这些特点。但很难看到只有赣、客才有的语音或词汇的特点。除非以后发现更重要的材料证明赣、客同类，否则从现有的资料看，我想赣、客属于不同的方言。

由于多数关于客家地区的资料并不严格根据语言学的标准，所以这个方言的地理区域还很难确定，而可靠资料的缺乏更使这个问题变得困难。一般都认为，客家分布于广东北部北江以东，这儿的梅县被认为是客家的代表。还有福建西南部及江西最南部。还有广东其他地区，有粤、客混合的现象。四川有零散的客家话孤岛，海南、台湾也有讲客家话的。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国，都有客家的移民。

梅县是客家话的代表，其声母见表 XI

表 XI 客家（梅县）话声母

双唇	舌头	舌尖前	舌面	舌根	喉音
p	t	ts		k	(ʔ)
ph	th	tsh		kh	
m	n		ɲ	ŋ	
f		s			h
v	l		(j)		

梅县的 v 声母摩擦性不强，所以最好看作是流音，如果把 v 看作浊擦音，就得承认 f v 之间不正常的清浊对立。有些客家方言有舌头和舌面音的对立，有些则是舌尖音和舌叶音的对立。ian 音节可以看作半元音声母 jan，海陆话这个音很强，发作 ʒan。桥本万太郎(M. Hashimoto 1973)认为 ɲ 实际是 ŋ 的变体，只在前高元音前出现。

客家话韵母，介音可以有 i 或 u（新界的沙头角就缺少 u），主要元音有 i i̯ u e (ə) a o（华阳虽有 e ə，但不造成音位对立）；韵尾分元音尾 i u，辅音尾 m n ŋ p t k，华阳可能受北方



话影响，韵尾 -p -t -k 合为喉塞音韵尾，-m -n 也合为一个 -n，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话没有前圆唇元音作介音或主要元音。

客家话声调系统不像是简单地由中古音发展而来(O'Connor 1976: 52)。一般地看，客家的调类和中古一致，但有时要假设更多的声母区别，用来解释阴阳调类的演变。客家话声调比较一致，下面从声调的对应上加以讨论。

古平声一般按声母的清浊分为阴阳两个调类。客家话和其他语言（闽语除外）的不同之处是：很多次浊阳平字也都读阴平调类。北方话、粤语等方言中，只有象声词等次浊声母字才读阴平，这些字常来历不明。客家话次浊阳平字读作阴平的是这些意义很具体的常用词，如梅县的“毛、蚊、篮、狼”都读阴平。O'Connor(1976)提出，这些清鼻音、清边音声母是更早时期的发展。

古上声在客家话中的演变比较复杂，古清上字客家话仍读上声。常用的古全浊上字客家话已并入阴平，书面音则读阳去。如海陆话“弟”，口语 *thai<sup>1</sup>*，书面音是 *thi<sup>6</sup>*。古次浊上字则不以口语音书面音来区分，变为阴平的也有，变为上声的也有；而且，不同方言的反映很一致。M. Hashimoto(1973)认为古次浊上读阴平调是客家话的一大特点。这说明，传统的客家话标准（把古浊音读送气清音）是不太合适的。

古去声，在较保守的海陆方言中，仍按古声母清浊而分为阴去阳去。少数次浊去声字如“骂、面”则读阴去。这和上文说的次浊平读阴平的道理一致。有些客家话没有阳去调，梅县阳去并入阴去，四川的华阳也如此。

古入声多数字在客家话中也以古声母清浊而分阴入阳入两类。少数次浊入声字读为阴入的情况，也可用来说明客家的祖先语言，次浊音有清浊两套。下文讨论闽、客关系时再详谈。

海陆声调的古今演变见表Ⅻ。据 O'Connor(1976: 12)，这个声调系统和构似的原始客家话声调系统一致。客家话调值见表

# XII.

表 XII 海陆声调的演变

	平	上	去	入
古清音声母	1	3	5	7
古全浊声母	2	1(6)	6	8
古次浊声母	2	1, 3	6	8

表 XIII 客家话调值

	1	2	3	5	6	7	8
海陆	53	55	13	31	22	<u>55</u>	<u>32</u>
梅县	44	12	31	42	—	<u>21</u>	<u>44</u>
华阳	55	12	31	53	—	<u>32</u>	<u>55</u>
沙头角	33	11	32	53	—	<u>33</u>	<u>55</u>

客家话的词汇在讨论赣、客是否同属一大方言区时谈了一些。由于客家话和其他方言区混处一起，所以很少客家话特有的词汇，梅县的 *lai<sup>5</sup>*（儿子意）就是一个特有的例子。从基本词汇看，客家和闽、粤关系紧密，在某种程度上，客家是连接闽、粤的纽带。客家受北方话，中部方言影响很大，如名词词尾（梅县 *e*，海陆 *l<sup>2</sup>*）。和北方话的儿化同源。客家话和北方话表面上的相似，有些人（特别是台湾）就以为客家话和北方话关系密切。这种看法根据不足。客家话与北方话的关系，没有和广东话来得密切。

客家话人称代词很一致，见表 XIV。

表 XIV 客家话人称代词

	我	你	他她	我们
梅县	<i>ŋai<sup>2</sup></i>	<i>ŋi<sup>2</sup>, n<sup>2</sup></i>	<i>ki<sup>2</sup></i>	<i>ŋai<sup>2</sup>teu<sup>1</sup>ŋin<sup>2</sup></i>
海陆	<i>ŋai<sup>2</sup></i>	<i>ŋi<sup>2</sup></i>	<i>ki<sup>2</sup></i>	<i>ŋai<sup>2</sup>teu<sup>1</sup>~ŋai<sup>2</sup>lit<sup>7</sup></i>
华阳	<i>ŋai<sup>2</sup></i>	<i>ŋi<sup>2</sup></i>	<i>tɕi<sup>2</sup></i>	<i>ŋai<sup>2</sup>nien<sup>1</sup></i>

第三人称读阳平调，但不送气，这个读法很特别。 $ki^2$ ,  $tai^2$ 可能是从“渠”而来。第一第二人称读阳平调也很特别，这是受第三人称阳平调同化的缘故。这种同化现象在汉语方言中常见。表示领属或者用词尾  $ke^6$  (梅县)、 $kai^6$  (海陆)、 $kie^7$  (华阳)，或者就用代词和词尾的缩略形式：梅县  $\eta a^1 \sim \eta ai^1 ke^6$ ，海陆  $\eta ai^1 kai^6$ ，华阳  $\eta a^1 (kie^7)$ ，都表示“我的”这个意思。

指示词在不同方言也有共同之处。近指，梅县是  $li^3$  或  $ke^3$ ，海陆  $li^3$ ，华阳  $ti^3$ 。远指，梅县  $ke^6$ ，海陆  $kai^2$ ，华阳  $kai^6$ 。看起来客家的指示词和粤语相近。

客家的否定词已指出是南方方言型。还没有的意思是  $m^2$  加上“曾”组成。合音时，梅县、海陆读为  $maŋ^2 < *m^2 tshaŋ^2$ ，不合音时，梅县是  $m^2 tshen^2$ ，华阳  $m^2 \eta ien^2$ 。西部闽语也这么造词。

从发表的多数材料看，客家话比较一致。但是，我们对客家话的调查还远远不够。从潘茂鼎(1963)的文章看，福建西南部的长汀方言，也属客家，就和其他客家话很不同。可能我们已了解的客家话只是更大的客家语族之一。

## 9.4 闽语

整个福建省及广东东南角，都讲闽语。这个地区在古代是边远地区，广大的山区中，没有大河，来往很不方便。这个方言因此而远离汉语发展的潮流，也就不奇怪了。闽语中，既有古代汉语的很多遗迹，又有很多限于这个地方的创新，由于交通不便，孤立独处，因此闽语的内部分歧也很大，尽管如此，闽语仍是最具特点的一组方言。

中古全浊声母在闽语中的读音很特别。现以古  $d$  声母为例，其今读音见表 XV④。

从表中可见到，古  $d$  声母在闽语有三种读法，看不出分化的条件。这就是说，中古  $d$  声母是更早的三个不同声母的混合，闽语读音是这种遗迹。闽语古  $d$  声母的今读主要是  $t$ ,  $th$  的送气与否

的不同，这在闽语各处都能见到。而不送气读法 t，进一步分为塞音和边音的不同。这一点只在西北部的建阳方言中看到。根据这一点，Norman(1973)指出，原始闽语相当于中古浊声母的有三种不同的音；再从声调上的反映看，这三种不同的音都是浊音，拟作 \*d<sup>1</sup>，\*d<sup>2</sup>，\*d<sup>3</sup>。其演变见表 X V。

表 X V 中古 d 声母的闽语今读

	中古	福州	厦门	建阳	永安
蹄	diei	te <sup>2</sup>	tue <sup>2</sup>	tai <sup>2</sup>	te <sup>2</sup>
弟	diei:	tie <sup>6</sup>	ti <sup>6</sup>	tie <sup>6</sup>	te <sup>4</sup>
豆	dəu-	tau <sup>6</sup>	tau <sup>6</sup>	teu <sup>4</sup>	tø <sup>6</sup>
断	duân:	touŋ <sup>3</sup>	tɿ <sup>6</sup>	tun <sup>5</sup>	tũm <sup>6</sup>
啼	diei	thie <sup>2</sup>	thi <sup>2</sup>	hie <sup>2</sup>	the <sup>2</sup>
糖	dāng	thouŋ <sup>2</sup>	thŋ <sup>2</sup>	hoŋ <sup>2</sup>	tham <sup>2</sup>
叠	diep	thak	thaʔ <sup>8</sup>	ha <sup>8</sup>	tho <sup>4</sup>
头	dəu	thau <sup>2</sup>	thau <sup>2</sup>	heu <sup>2</sup>	thø <sup>2</sup>
袋	dai-	toi <sup>6</sup>	te <sup>6</sup>	lui <sup>6</sup>	tue <sup>6</sup>
脰	dəu-	tau <sup>6</sup>	tau <sup>6</sup>	lo <sup>6</sup>	—
毒	duok	tøik <sup>8</sup>	tak <sup>8</sup>	lo <sup>8</sup>	tau <sup>4</sup>
铜	dung	tøiŋ <sup>2</sup>	taŋ <sup>2</sup>	loŋ <sup>2</sup>	tāu <sup>2</sup>

表 X VI 原始闽语浊塞音的今读

	厦门	福州	建阳	永安
*d <sup>1</sup>	t	t	t	t
*d <sup>2</sup>	t	t	l	t
*d <sup>3</sup>	th	th	h	th

我们可以给闽语下定义：闽语是对古全浊音读作送气和不送气清音非常一致的方言，如“啼、糖、叠”各地基本上都是送气

清音，“头”则是不送气清音。

福建西部少数方言，如邵武、将乐，用声调上的不同（指平、去、入）来反映声母的送气与否，见表 X VI。

表 X VII 闽语不同声母在邵武、将乐声调上的反映

	中古	福州	建阳	邵武	将乐
长	djang	touŋ <sup>2</sup>	loŋ <sup>0</sup>	thoŋ <sup>2</sup>	thoŋ <sup>2</sup>
糖	dâŋ	thouŋ <sup>2</sup>	hoŋ <sup>2</sup>	thoŋ <sup>7</sup>	thoŋ <sup>0</sup>
(巫医)	---	tœiŋ <sup>2</sup>	loŋ <sup>0</sup>	thuŋ <sup>2</sup>	thuŋ <sup>2</sup>
虫	djung	thœiŋ <sup>2</sup>	hoŋ <sup>2</sup>	thuŋ <sup>7</sup>	thuŋ <sup>0</sup>
住	djo-	tiu <sup>0</sup>	tiu <sup>0</sup>	thy <sup>6</sup>	thy <sup>6</sup>
树	zju-	tshiu <sup>0</sup>	tshiu <sup>6</sup>	tshy <sup>5</sup>	tshy <sup>6</sup>
薄	bâk	poʔ <sup>8</sup>	vo <sup>8</sup>	pho <sup>0</sup>	pho <sup>8</sup>
雹	bâk	phœik <sup>8</sup>	pho <sup>8</sup>	phau <sup>7</sup>	phio <sup>5</sup>

邵武、将乐声调上的异常反映，只能解释为闽语原来声母的不同。

邵武、将乐对鼻音声母的读法，也有类似的情形，即分为两种不同的声调。这说明闽语原来有两套不同的鼻音（清和浊）声母，见表 X VIII。

表 X VIII 闽语鼻音声母的演变

	中古	福州	建阳	邵武	将乐
磨	muâ	muai <sup>2</sup>	moi <sup>2</sup>	mœi <sup>2</sup>	mai <sup>2</sup>
麻	ma	muai <sup>2</sup>	moi <sup>2</sup>	mœi <sup>7</sup>	mai <sup>0</sup>
认	ńzjen-	neiŋ <sup>6</sup>	noiŋ <sup>6</sup>	nin <sup>0</sup>	ŋiŋ <sup>0</sup>
让(想要)	ńzjang-	nioŋ <sup>6</sup>	nioŋ <sup>6</sup>	nioŋ <sup>5</sup>	ŋioŋ <sup>5</sup>
月	ngjwət	ŋuok <sup>8</sup>	ŋye <sup>8</sup>	ye <sup>8</sup>	ŋe <sup>8</sup>
肉	ńzjuk	nyk <sup>8</sup>	ny <sup>8</sup>	ny <sup>7</sup>	ny <sup>6</sup>

中古音只有一套鼻音，所以我们又要假设，闽语保留了和中古音不同的另一种方言的重要特点。

闽语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特点，就是保留舌头音声母，这在中古音已变作舌上音了。今北京话读卷舌音，别的方言则读这样那样的塞擦音。古舌头音在闽语中的读法见表 XIX。

表 XIX 古舌头音的闽语今读

	中古	福州	厦门	建阳	永安	邵武	将乐
竹	tjuk	tøik <sup>7</sup>	tek <sup>7</sup>	ty <sup>7</sup>	ty <sup>7</sup>	ty <sup>7</sup>	ty <sup>9</sup>
转 <sup>3</sup>	tjwän:	tioŋ <sup>3</sup>	tj <sup>3</sup>	lyeŋ <sup>3</sup>	tē <sup>3</sup>	thien <sup>3</sup>	thǎ <sup>9</sup>
箸	djwo	øi <sup>8</sup>	ti <sup>8</sup>	ty <sup>8</sup>	ty <sup>8</sup>	thy <sup>8</sup>	thy <sup>8</sup>

保留重唇音常被看作是典型的闽语特征；但正如我前边指出的，并不是闽语才这么读。因此只凭这一点并不足以确证闽语。

闽语的词汇很有特点，有些是闽语所特有，有些则在其他方言中很少有。例如：

(1) 囡（儿子，小孩）。厦门 kiā<sup>3</sup>，福州 kian<sup>3</sup>，建阳 kyeŋ<sup>3</sup>，永安 kyē<sup>3</sup>，邵武 kin<sup>3</sup>，将乐 kien<sup>3</sup>。唐朝诗人顾况第一个指出这是闽语词。这个词可能来自南亚语：越南 con[kən]，孟语 kon，巴那尔 kon(Pinnow 1959:111)。

(2) 鼎（锅）。厦门 tiā<sup>3</sup>，福州 tiaŋ<sup>3</sup>，建阳 tiaŋ<sup>3</sup>，永安 ti<sup>5</sup>，邵武 tiaŋ<sup>8</sup>。汉朝时，“鼎”只指典礼用的铜鼎，闽语用的是最初的意义。

(3) (稻)田、厦门 tshan<sup>2</sup>，福州 tsheŋ<sup>2</sup>，建阳 thaiŋ<sup>2</sup>，永安 tshī<sup>2</sup>，邵武 tshən<sup>7</sup>，将乐 tshāi<sup>9</sup>。从语音上看，这个词和“田”的古音今音都不协。

(4) (穿着)。厦门 tseŋ<sup>8</sup>，福州 sœiŋ<sup>8</sup>，建阳 tseŋ<sup>8</sup>，永安 tsem<sup>5</sup>，邵武 juŋ<sup>8</sup>，将乐 jiun<sup>8</sup>。这个词来历不明，别的方言也不见有同源的用法。

(5) 𪗇（淡）。厦门 tsiā<sup>3</sup>，福州 tsiaŋ<sup>3</sup>，建阳 liaŋ<sup>3</sup>，永安

tsi<sup>3</sup>, 邵武 tshien<sup>3</sup>, 将乐 tshian<sup>3</sup>。“糞”见于《集韵》, 音义都合, 只见于闽语。

以下一些例子闽语用, 别的方言也有用的。

(6) 治(杀)。厦门 thai<sup>2</sup>, 福州 thai<sup>2</sup>, 将乐 hoi<sup>2</sup>, 永安 thi<sup>2</sup>。邵武、将乐不用, 客家(梅县)也用, 音 tshī (Norman 1979)。

(7) 戍(房子)。厦门 tshu<sup>5</sup>, 福州 tshio<sup>5</sup>, 建阳 tshio<sup>5</sup>, 永安 tɕhu<sup>5</sup>, 邵武 tɕho<sup>5</sup>, 将乐 tɕho<sup>5</sup>。“戍”在中古除用作动词卫戍以外, 也用作名词哨所的意思。可能, 闽语用“戍”指房子, 因为汉人定居福建时, 当时的房子实际上就是哨所。除闽语用“戍”外, 浙江庆源也用。

闽语除了福建、广东东北部以外, 潮州地区、广东沿海及岛屿、雷州半岛、海南岛也都讲闽语。台湾绝大多数人也讲闽语。浙江南部、江西、广西、四川也有讲闽语的(袁 1960:241)。

闽语在海外集中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主要是讲闽语的人。在南亚, 除泰国的华侨多数讲潮州话外, 其他国家华侨多数讲厦门话(他们叫做客家)。马来西亚等地, 也能看到讲福州话、莆田话、海南话的华侨。

过去都把闽语分为闽南语和闽北语两种(袁 1960)。潘茂鼎等人(1963)认为是东部和西部的不同, 潘等人的纠正是对的, 但他们认为邵武和将乐是客家话。我上文已讲了, 它们也是闽语。

东部和西部闽语有个很重要的分界线。闽语有两套鼻音, 也有两套边音: \*l(浊音)和 \*lh(清音)。东部闽语, 两套边音已相混, 西部闽语 \*l 保留为 l, \*lh 则变为 s 或 ʃ (Norman 1973)。闽语的边音读法见表 XX。

闽语的人称代词和指示词也有东部、西部的不同。第一人称都用“我”。第二人称东部用“汝”, 西部用“你”。第三人称东部用“伊”, 西部用“渠”。邵武话用的人称来历不明。西部闽语的人称代词和客、粤及中部一些方言相近, 只有这一点表现了过渡的特征。闽语的人称代词及指示词见表XX⑩。

表 XX 闽语的两套边音

	中古	厦门	福州	建阳	永安	邵武
来	lâi	lai <sup>2</sup>	li <sup>2</sup>	le <sup>2</sup>	la <sup>2</sup>	li <sup>2</sup>
落	lâk	lo? <sup>8</sup>	lo? <sup>8</sup>	lo <sup>8</sup>	law <sup>4</sup>	lo <sup>8</sup>
流	ljəu	lau <sup>2</sup>	lau <sup>2</sup>	lau <sup>2</sup>	lø <sup>2</sup>	lou <sup>2</sup>
绿	ljwok	lek <sup>8</sup>	lio? <sup>8</sup>	ly <sup>8</sup>	ly <sup>4</sup>	ly <sup>8</sup>
螺	luâ	le <sup>2</sup>	loi <sup>2</sup>	sui <sup>2</sup>	sue <sup>2</sup>	soi <sup>7</sup>
篮	lâm	nã <sup>2</sup>	lan <sup>2</sup>	san <sup>2</sup>	sã <sup>2</sup>	san <sup>7</sup>
卵(蛋)	luân:	nŋ <sup>8</sup>	laun <sup>8</sup>	sun <sup>5</sup>	sũm <sup>4</sup>	son <sup>8</sup>
六	ljuk	lak <sup>8</sup>	ləik <sup>8</sup>	so <sup>8</sup>	(ly <sup>4</sup> )	su <sup>7</sup>

闽语的否定词，东部西部也有不同，东部用“未”，表示还没有的意思，西部则有多种不同说法。见表 XX。

表 XXI 闽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

	厦门	揭阳	福安	福州	建瓯
我	gua <sup>3</sup>	ua <sup>8</sup>	ŋo <sup>3</sup>	ŋuai <sup>3</sup>	ue <sup>4</sup>
你	li <sup>8</sup>	lu <sup>3</sup>	ni <sup>3</sup>	ny <sup>3</sup>	ni <sup>4</sup>
他她	i <sup>1</sup>	i <sup>1</sup>	i <sup>1</sup>	i <sup>1</sup>	ky <sup>4</sup>
这	tsit <sup>7</sup>	tsek <sup>7</sup>	tša-	tsi-	ioŋ <sup>7</sup>
那	hit <sup>7</sup>	hek <sup>7</sup>	ha-	hi-	u <sup>7</sup>
	建阳	崇安	永安	邵武	将乐
我	ŋue <sup>8</sup>	ŋuai <sup>8</sup>	ŋuo <sup>1</sup>	haŋ <sup>3</sup>	ŋai <sup>9</sup>
你	noi <sup>9</sup>	nei <sup>1</sup>	ŋi <sup>1</sup>	hien <sup>1</sup>	ne <sup>9</sup>
他她	ky <sup>2</sup>	heu <sup>1</sup>	ŋy <sup>1</sup>	hu <sup>3</sup>	ky <sup>3</sup>
这	i <sup>7</sup>	i <sup>7</sup>	tʃo <sup>3</sup>	tʃoŋ <sup>7</sup>	tʃia <sup>3</sup>
那	u <sup>7</sup>	u <sup>7</sup>	uo <sup>3</sup>	oŋ <sup>7</sup>	va <sup>9</sup>



表 X Ⅲ 闽语否定词

	一般否定	存在否定	还没有
厦门	m <sup>6</sup>	bo <sup>2</sup>	be <sup>6</sup>
揭阳	m <sup>6</sup>	bo <sup>2</sup>	bue <sup>6</sup>
福安	m <sup>6</sup>	mo <sup>2</sup>	mui <sup>6</sup>
福州	ŋ <sup>6</sup>	mo <sup>2</sup>	mui <sup>6</sup>
建瓯	eŋ <sup>5</sup>	mau <sup>3</sup>	naŋ <sup>3</sup>
建阳	oiŋ <sup>5</sup>	mau <sup>3</sup>	naŋ <sup>3</sup>
崇安	ŋ <sup>5</sup>	mau <sup>5</sup>	naŋ <sup>5</sup>
永安	ãu <sup>5</sup>	mau	ãu <sup>5</sup> ko <sup>7</sup>
邵武	ŋ <sup>6</sup>	mau <sup>6</sup>	mau <sup>6</sup>
将乐	ŋ <sup>6</sup>	mo <sup>6</sup>	ŋ <sup>6</sup> ŋaŋ <sup>2</sup>

从代词和否定词两个表中可看到，东部闽语比西部闽语来得一致。可能因为，西部交通不便，互不往来。东部来往便利，接触就频繁，奇怪的是，西部闽语内部虽互相不常往来，各行其是，接受外部影响反而容易，因而有很多非闽语的外来成分。

邵武、将乐在西部闽语中占很重要地位，它们在保持闽语核心的同时，接受了赣语或客家话的影响，因而在闽语中显得很特别。我把这两种方言叫做极西部的闽语，建瓯、建阳、崇安及附近地区的方言，都有特别的调类演变(Norman 1973)。永安，从边音有 s 或 ʃ 读法这一点看，显然是西部方言，而在其他方面很特别，可以看作中部闽语。

东部闽语可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如厦门、潮州、台湾、海南，特点是有鼻化韵（由中古的鼻尾韵而来）及在元音前 m n ŋ 声母的弱化或消失；北区指福建东北部，包括福州。北区内部比较一致，福安、宁德比较保守，保留了全部古辅音韵尾，福州话则已只有 -ŋ 和 -ʔ 了。

闽语声母和别的南方方言没什么区别，见表 X XⅢ。

表 XXIII 闽语声母

厦门	福州	建瓯	建阳	永安	邵武	将乐
p	p	p	p	p	p	p
ph	ph	ph	ph	ph	ph	ph
m(b)	m	m	m	m	m	m
			v			
t	t	t	t	t	t	t
th	th	th	h	th	th	th
n(l)	n	n	n	n~l	n	n~l
	l	l	l		l	
ts	ts	ts	ts	ts	ts	ts
tsh	tsh	tsh	tsh(th)	tsh	tsh	tsh
dz	s	s	s	s	s	s
				tʃ	tʃ	tʃ
				tʃh	tʃh	tʃh
				ʃ	ʃ	ʃ
k	k	k	k	k	k	k
kh	kh	kh	kh	kh	kh	kh
ŋ(g)	ŋ	ŋ	ŋ	ŋ	ŋ	ŋ
h	h	x	x	h	h	h
(ʔ)	(ʔ)	(ʔ)	(ʔ)	(ʔ)	(ʔ)	(ʔ)

关于闽语的声母说明如下。(1) 厦门等南区闽语，鼻音声母在元音前消失：mi>bi, ni>li, ŋia>gia，只在鼻化元音前才保留鼻音声母（但厦门话是例外），如潮州有 naŋ，厦门就是 laŋ，建阳的 v 是很弱的唇齿音。(2) 建阳话中，别处读 th 的，变为 h，这种移位在台山、海南闽语中也可看到一些。(3) 永安、将乐话中，n l 可随意读，在厦门及附近地区，n l 是有条件的异读。(4) 厦门 dz 和潮州 z 是从古 \*n 声母演变而来，只出现在前

高元音前，但从断代描写看，得作为一个音位，因为书面语一直这么读。建阳话的 tsh 只在前高元音前，别的元音前读 th。(5) 只有少数边远地区的闽语才有舌尖前音和舌叶音的对立。(6) 所有闽语在零声母前，都有一个非音位的喉塞音，特别是发单字音或慢慢咬准字音的时候。

闽语不同方言有不同数目的对立元音。厦门话有 6 个元音，4 个鼻化元音。永安有 10 个元音，4 个鼻化元音，一般有 8 个元音左右，比别的方言要多。南区闽语没有前圆唇元音，西部和东北部的闽语一般有 1 个或 2 个前圆唇元音。东部闽语介音有 i, u, i 在圆唇元音前就读作 y，如福州 kioŋ，实际上读作 kyoŋ。西部有 i u y 三个介音，有 i u 作韵尾的前响复合元音，永安则还有后不圆唇元音结尾的 au。舌尖元音只见于永安和将乐。

古辅音韵尾的保留情况各地也不同。宁德及东北部有些方言保留得最多。厦门及附近地区也保留有 6 个辅音韵尾，但鼻尾韵一般已鼻化，如 \*sâm>sā, \*tân>tuā, \*kioŋ>kiū。潮州 -n、-ŋ 相并，也有鼻化韵。厦门和潮州话中，-p -t -k 在开元音后，都合为 -ʔ，如 \*sāp>saʔ, \*tāt>tuaʔ, \*kiok>kioʔ。在其他元音后，潮州话 -t -k 相混，厦门话不混。福州话只剩有 -ŋ 和 -ʔ，有些人能分 -k 和 -ʔ。

西北的建瓯、建阳只有 -ŋ，其他塞音韵尾只能从调类上有所反映。永安失落所有塞音韵尾，鼻音韵尾合为 -m，其过程大概是：\*oŋ>\*ǎu>am, \*aŋ>\*ũ>ũm。

将乐塞音韵尾已失落，鼻音韵尾视元音而有不同，元音 e, ai 鼻化为 ě āi，元音 ə y ø 后接 -n 尾，其他元音后接 -ŋ 尾：aŋ iŋ uŋ oŋ。邵武话 -m -n 尾相并，-ŋ 尾保留。邵武话一个特点是 -p>-n, -t>-i, -k 完全失落。韵尾演变见表 XIV。

闽语的声调不能简单地用中古的调类来对待。闽南和永安声调发展的线索比较简单，但闽北、闽西的调类演变，只能解释为声母体系不同于中古音。东北及西端的闽语声调最复杂，由于牵

表 XXIV 闽语的韵尾

	中古	厦门	福州	宁德	建阳	将乐	邵武	永安
三	sâm	sā <sup>1</sup>	saŋ <sup>1</sup>	sam	saŋ <sup>1</sup>	saŋ <sup>1</sup>	san <sup>1</sup>	sō <sup>1</sup>
深	sjəm	tshim <sup>1</sup>	tshin <sup>1</sup>	tshim <sup>1</sup>	tshin <sup>1</sup>	tʃhiuŋ <sup>1</sup>	tʃhin <sup>1</sup>	tʃhã <sup>1</sup>
鸭	ʔâp	aʔ <sup>7</sup>	aʔ <sup>7</sup>	ap <sup>7</sup>	a <sup>7</sup>	a <sup>3</sup>	an <sup>7</sup>	o <sup>7</sup>
肝	kân	kuã <sup>1</sup>	kaŋ <sup>1</sup>	kan <sup>1</sup>	xueŋ <sup>1</sup>	kuãi <sup>1</sup>	hon <sup>1</sup>	hũm <sup>1</sup>
新	sjen	sin <sup>1</sup>	siŋ <sup>1</sup>	sin <sup>1</sup>	soiŋ <sup>1</sup>	siŋ <sup>1</sup>	sən <sup>1</sup>	sā <sup>1</sup>
(蟑螂)	dzât	tsuaʔ <sup>8</sup>	saʔ <sup>8</sup>	sat <sup>8</sup>	lue <sup>8</sup>	tsha <sup>8</sup>	tshai <sup>8</sup>	tsuo <sup>4</sup>
七	tshjei	tshit <sup>7</sup>	tshei <sup>7</sup>	tshe:t <sup>7</sup>	thoi <sup>7</sup>	tshi <sup>1</sup>	tshi <sup>7</sup>	tshi <sup>7</sup>
长	djang	tŋ <sup>2</sup>	touŋ <sup>2</sup>	to:ŋ <sup>2</sup>	loŋ <sup>9</sup>	thoŋ <sup>2</sup>	thoŋ <sup>2</sup>	tam <sup>2</sup>
冬	tuong	taŋ <sup>1</sup>	tøiŋ <sup>1</sup>	tøŋ <sup>1</sup>	toŋ <sup>1</sup>	tun <sup>1</sup>	tun <sup>1</sup>	tãu <sup>1</sup>
落	lâk	loʔ <sup>8</sup>	loʔ <sup>8</sup>	loʔ <sup>8</sup>	lo <sup>8</sup>	lo <sup>8</sup>	lo <sup>8</sup>	nau <sup>4</sup>
北	pæk	pak <sup>7</sup>	poik <sup>7</sup>	pe:k <sup>7</sup>	pe <sup>7</sup>	pa <sup>3</sup>	pə <sup>7</sup>	pa <sup>7</sup>

涉的问题多，而篇幅有限，我在这儿不详谈这些方言的声调①，只列五个方言的声调演变，见表 XXV。

表 XXV 闽语声调的演变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厦门	1	2	3	6	5	6	7	8
揭阳	1	2	3	4	5	6	7	8
福州	1	2	3	6	5	6(5)	7	8
福安	1	2	3	6	5	6(5)	7	8
永安	1	2	3	4	5		7	4

古次浊上声有的并入阴上，有的随全浊上归阳上或阳去，看不出有什么条件，福州、福安的古送气声母阳去，今并入阴去。上述五个方言的调值见表 XXVI

表XXVI 闽语调值

	1	2	3	4	5	6	7	8
厦门	55	54	51	—	11	33	<u>32</u>	<u>55</u>
揭语	33	55	53	35	213	11	<u>22</u>	<u>55</u>
福州	55	41	22	—	13	342	<u>24</u>	<u>55</u>
福安	43	21	51	—	35	212	<u>43'</u>	<u>21</u>
永安	53	32	<u>21</u>	<u>43</u>	35	—	13	—

闽东，从浙江边境开始一直到潮州，有复杂的连读变调，而福建内地及海南岛的闽语，则没有连读变调，或者只有一两种变调现象。除了变调，东北闽语还有声母、韵母上的连读音变，如福安“心” $\text{sem}^{43}$ ，“肝” $\text{kan}^{43}$ ，“心肝”连读时则是 $\text{sim}^{53}\text{man}^{43}$ 。

## 9.5 闽语和客家话

我前面已说了，闽语、客家话关系密切，这儿我们进一步提出论证。

除了前面说的南方方言共有的语音特征以外，闽、客有至少三方面的共同特点。中古舌上音，闽语仍读舌头音，客家也有这种遗迹。如“知”，梅县  $\text{ti}^1$ ，厦门  $\text{ti}^1$ ，福州  $\text{ti}^1$ ，建瓯  $\text{ti}^1$ 。“追”，梅县  $\text{tui}$ ，厦门  $\text{tui}^1$ ，福州  $\text{tui}^1$ ，建瓯  $\text{ty}^1$ 。“黠”，梅县  $\text{thi}^1$ ，厦

门 thi<sup>1</sup>, 福州 thi<sup>1</sup>, 建瓯 thi<sup>1</sup>。“啄”, 梅县 tuk<sup>7</sup>, 厦门 tok<sup>7</sup>, 福州 tauk<sup>7</sup>, 建瓯 to<sup>7</sup>。

另一共同特征是鼻音边音很多字读阴调类。闽语的邵武、将乐次浊声母读阴调类在各个声调都有, 福州限于去声。闽、客次浊声母读阴调类现象见表 XXVII, 梅县阴阳去已合并, 海陆则分。

表 XXVII 闽、客阴调类次浊声母字

	中古	海陆	梅县	邵武	福州	揭阳	建阳
骂	ma -	ma <sup>5</sup>	ma <sup>5</sup>	ma <sup>5</sup>	ma <sup>6</sup>	mē <sup>6</sup>	
毛	mâu	mo <sup>1</sup>	mau <sup>1</sup>	mau <sup>7</sup>	mo <sup>2</sup>	mō <sup>2</sup>	
面	mjiän	mian <sup>5</sup>	mien <sup>5</sup>	min <sup>5</sup>	meiŋ <sup>5</sup>	meŋ <sup>6</sup>	
目	mjuk	muk <sup>7</sup>	muk <sup>7</sup>	mu <sup>7</sup>	mōik <sup>8</sup>	māk <sup>8</sup>	
额	ngək	niak <sup>7</sup>	niak <sup>7</sup>	nia <sup>7</sup>	nie? <sup>8</sup>	hia? <sup>8</sup>	
肉	ńzjuk	niuk <sup>7</sup>	niuk <sup>7</sup>	ny <sup>7</sup>	ny? <sup>8</sup>	nēk <sup>8</sup>	
篮	lɛm	lam <sup>1</sup>	lam <sup>1</sup>	san <sup>7</sup>	laŋ <sup>2</sup>		saŋ <sup>2</sup>
鳞	ljəm	lin <sup>1</sup>	lin <sup>2</sup>	sen <sup>7</sup>	liŋ <sup>2</sup>		saŋ <sup>2</sup>
六	ljuk	liuk <sup>7</sup>	liuk <sup>7</sup>	su <sup>7</sup>	lōik <sup>8</sup>		so <sup>8</sup>
露	luo-	lu <sup>5</sup>	lu <sup>5</sup>	so	lou <sup>5</sup>		so <sup>6</sup>
聋	lung	luŋ <sup>1</sup>	luŋ <sup>1</sup>	suŋ <sup>7</sup>	lœiŋ <sup>2</sup>		soŋ <sup>2</sup>

次浊声母分阴阳两类, 《切韵》音系不是这样, 只能解释为更早的闽、客祖先语有这两套次浊音, 从中可知闽客来源一致。

闽客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限于这两种方言使用的词汇来说, 我挑 10 个词列表如 XXVIII。

表 XXVIII 闽、客共同用词

	海陆	梅县	将乐	建阳	福州	厦门
漱口	lan <sup>1</sup>	lan <sup>1</sup>	lāi <sup>9</sup>	lueŋ <sup>5</sup>	lan <sup>3</sup>	nuā <sup>8</sup>
健未下蛋的母鸡	lon <sup>6</sup>	lon <sup>5</sup>	juāi <sup>5</sup>	—	—	nuā <sup>6</sup>
笏竹盘	—	liak <sup>8</sup>	lia <sup>8</sup>	—	lie <sup>2</sup>	lia <sup>2</sup>
雌动物	ma <sup>2</sup>	ma <sup>2</sup>	ma <sup>2</sup>	ma <sup>2</sup>	—	—
乳	nen <sup>5</sup>	nen <sup>5</sup>	—	naŋ <sup>1</sup>	nei <sup>2</sup>	leŋ <sup>2</sup>
(小米)	—	tai <sup>1</sup>	—	—	tai <sup>1</sup>	tai <sup>1</sup>
(脚跟, 肘)	tsaŋ <sup>1</sup>	tsaŋ <sup>1</sup>	tsaŋ <sup>1</sup>	tiaŋ <sup>1</sup>	taŋ <sup>1</sup>	tŋ <sup>1</sup>
(鸡虱)	—	tshi <sup>2</sup>	—	loi <sup>9</sup>	tai <sup>2</sup>	tai <sup>2</sup>
治杀	tʃhī <sup>2</sup>	tshī <sup>2</sup>	—	hoi <sup>2</sup>	thai <sup>2</sup>	thai <sup>2</sup>
(女阴)	tʃi <sup>2</sup>	tsi <sup>1</sup>	—	—	tsi <sup>1</sup>	tsi <sup>1</sup>

福建西端闽语和客家话最接近, 所以潘茂鼎等人(1963)把它们划入客家。我把它们看作闽语, 作为闽、客的过渡语, 就像把西北闽语看作是闽东语和西端闽语的过渡一样。

## 9.6 方言划分上的困难

我们所了解的多数汉语方言, 都可以归入以上谈到的某个大方言区, 但还有很大地区, 我们调查了解得很少。待调查清楚以后, 很可能有新的次方言, 或者改变我们现在的划分。

福建北部的蒲城城关方言就很难加以划分<sup>②</sup>, 和周围的闽西北方言都不同, 和哪儿都不同。对照第八章开头提出的划分方言区的十条标准, (1) 第三人称是 ke<sup>4</sup>, (2) 领属助词 ke<sup>5</sup>, (3) 一般否定词 ŋ<sup>1</sup>, (4) 动物性别标于词末, “公鸡”词序例为: kie<sup>1</sup> ku<sup>7</sup>, (5) 上声去声都分阴阳, (6) 古舌根音不腭化, (7) 站着

意思用 kue<sup>4</sup>, (8) 用“走” tsiau<sup>3</sup>表示走路意, (9) 儿子意作 kiāi<sup>3</sup>, (10) 房子意用 tshye<sup>5</sup> (戌)。从这些情况看, 蒲城总的属南方方言, 只有“走”这词是北方特点。那么是哪个南方方言呢? 蒲城不是客家话, (1) 因为古全浊音今读不送气清音, (2) 保持阳上调, (3) 儿子这词和客家的 lai<sup>5</sup> 不同。从上面列举的方面看, 足以说明蒲城话非客家方言。

蒲城话也不是粤语, 因为入声只有一个, 不分阴阳, 也没有 9.2 节所列粤语词汇。

蒲城话也不太像闽语, 古全浊音的读法不同于闽语, 见表 XXIX。

表 XXIX 古全浊音在闽语、蒲城话中的演变

	长	糖	铜	虫	住	树	薄	雹
中古	djang	dāng	dung	djung	dju-	zju-	bāk	bāk
福州	touŋ <sup>2</sup>	thouŋ <sup>2</sup>	təiŋ <sup>2</sup>	thəiŋ <sup>2</sup>	tiu <sup>9</sup>	tshiu <sup>5</sup>	pəʔ <sup>9</sup>	phəik <sup>9</sup>
建阳	loŋ <sup>9</sup>	hoŋ <sup>2</sup>	loŋ <sup>9</sup>	hoŋ <sup>2</sup>	tiu <sup>6</sup>	tshiu <sup>9</sup>	vo <sup>8</sup>	pho <sup>8</sup>
蒲城	tsiaŋ <sup>2</sup>	taŋ <sup>2</sup>	toŋ <sup>2</sup>	toŋ <sup>2</sup>	tsye <sup>6</sup>	sye <sup>6</sup>	pau <sup>7</sup>	pau <sup>6</sup>

蒲城话古全浊声母的读法和闽语不同, 是直接从《切韵》演变而来。

蒲城话中, 只有“腹” pu<sup>7</sup>, “冯” poŋ<sup>2</sup> 这两个字保留重唇读法, 只有“虫” toŋ<sup>2</sup> 保留舌上读法。所以其语音特点和闽语相同的太少。

蒲城话词汇则很多与闽语相同:

	冏	戌房	骹脚	箬叶	(跌倒)	短
福州	kiaŋ <sup>3</sup>	tshio <sup>6</sup>	kha <sup>1</sup>	nio <sup>2</sup> <sup>8</sup>	—	təi <sup>3</sup>
建瓯	kyeŋ <sup>3</sup>	tshio <sup>5</sup>	khau <sup>1</sup>	nio <sup>8</sup>	tueŋ <sup>3</sup>	to <sup>3</sup>
建阳	kyeŋ <sup>8</sup>	tshio <sup>5</sup>	khau <sup>1</sup>	nio <sup>8</sup>	tueŋ <sup>1</sup>	tui <sup>3</sup>
蒲城	kiāi <sup>3</sup>	tshye <sup>5</sup>	khau <sup>1</sup>	ŋiau <sup>1</sup>	luāi <sup>3</sup>	lue <sup>3</sup>



蒲城话“短”缺少鼻音尾，这只有闽语才这样。蒲城话古端母读  $l$  是一个特点。

我们暂时还不能解释好这种词汇上的共同性，显然蒲城话与闽语有一定关系，但只在词汇方面。蒲城话人称代词像吴语：“我” $a^4$ ，依你  $noŋ^4$ ，渠也  $ke^4$ 。一般否定用  $ŋ^4$ ，还没有的意思用  $mo^2$ ，也表存在否定。

因为把蒲城话划入南方方言不合适，也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自成一组。进一步调查中可能会发现蒲城话的同组方言。

## 阅 读 材 料

Boorman, Nicholas. 1955, 1958. *Spoken Amoy Hokkien*, vols 1, 2. Kuala Lumpur: Charles Grenier and Co., Ltd. (该书对闽语方言作了很好的介绍。)

Hashimoto, Man'aro (桥本万太郎)。1973. *The Hak'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是对客家话的全面描写。)

Hashimoto, Oi-kan Yue (余霭芹)。1972. *Phonology of Canto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是对广东方言最详细最切合当代情形的描写。)

## 第九章 注释

- ① 粤语引自 O. Y. Hashimoto (1972)，客家话引自 MacIver (1926)，厦门引自 Douglas (1899)。
- ② 中山话“荔枝”读  $lai^5 ki^1$ ，可能属于例外读法。(Chan 1980: 203)。
- ③ 粤语材料由 Ann Yue-Hashimoto 提供。
- ④ 中山话由 Marjorie Kit Man Chan 提供。

- ⑤ 《说文》和郭璞的《尔雅》注有这个来历，郭注为江东方言，即南方话。  
《广韵》gjei，写作“𧈧”。
- ⑥ 广州话引自 O.Y.Hashimoto(1972)，阳江引自北京大学(1964)，中山引自 Chao(1948 b)、Chan(1980)，台山引自 Chao(1951)、Wong(1970)，滕县引自 Yue(1979)。
- ⑦ 台山话第一人称复数是变调 21，用星号 \* 表示。下同。
- ⑧ 梅县材料引自北京大学(1964)、MacIver(1926)、M. Hashimoto(1973)，海陆引自杨(1957)，华阳引自(董 1948 b)，长汀引自潘(1963)，沙头角引自 O'Connor(1976)。
- ⑨ 福州话引自北京大学(1964)、Chen and Norman(1965)，厦门引自北京大学(1964)、Bodman(1955, 1958)，潮州引自北京大学(1964)，揭阳引自 Choy(1976)，崇安、福安、将乐、建瓯、建阳、宁德、永安引自 J. Norman 调查笔记。
- ⑩ 福安和福州的指示词不单用，只有连读调，没有单字调。
- ⑪ 关于闽语声调的演变，参 Norman(1973)。
- ⑫ 莆城音据 Norman 的调查。

## 第十章 语言和社会

### 10.1 汉语的各种等级

本世纪初，所用的汉语形式和现在很不同。那时，文言最重要，是超方言的全国语言，是汉民族及其文化的标志。用的是孔子孟子时代的古典语言，有文化的人才能读、写。当时多数文学、历史、科学著作都用文言写作，行政公文也用文言，属于最高等。

文言纯是书面语言，和西方的书面语言不同，它不能用于口语。各地方言不同，同一个词发音不同，也没法听懂。即使语音统一，这种古典语言，那么多单音节的同音词，是否能完全互相听懂，也是很成问题的<sup>①</sup>。

由于文言和各地口语差别太大，学起来困难、费时，只有少数有钱人如地主、商人才能掌握。这种局限更使人觉得文言高不可攀。

还有一种书面语是白话，当时一般文人都不赞成，但白话文学却因这种白话语言而繁荣起来，当然一些文人学士瞧不起它。五四运动之前，白话文学只是普通民众的消遣，而不用来表达高深、严肃的思想。至于方言戏曲中的土语俗字，当然是更下等的了。

口语也有各种级别，当然没有书面语那么明显。最高等的是首都的方言，过去的“官话”就是以首都方言为基础的。这种官话，虽然只有少数官僚和商人才说，但要升官晋级，就必须使用这种语言。

北京在近几百年来一直是首都，清朝官话就以北京话为基础。六朝时的金陵，也因为首都而有重要地位，《切韵》的音系基础

和金陵话很有关系。唐朝首都长安话，在当时也有今天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历来如此，根据周祖谟（周和吴1956），甚至春秋时期，晋国的方言也享有这种特权。

各个省会处于首都方言和地方方言之间。广州、厦门、苏州等城市，都因为是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其方言也就显得重要，外地的人都学它，把它们作为那个地区的共同语。现在的广州话，整个广东及广西一部分地区都通用。

各地的方言属于最低一等，只用于当地人交际。由于过去各种来往不多，一般人很少离开家乡，也就不需要学习别的方言。

现在中国的情况已完全不同，文言已完全不用。二三十年代，还用少量文言文，在报刊、公文中都能见到，到了40年代，白话完全取代了文言。现在，文言文已像拉丁文、希腊文一样，用得很少，学生在中学里学一点儿皮毛。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当然都要学好文言，但也只要读懂，并不需要用文言写。

现在大家都用白话来写作<sup>②</sup>。大陆和台湾都一样，从小学中学的教育开始，到文学、报纸、公文、科技、个人书信的写作，都用白话。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的现代标准语如英语、法语、俄语、日语一样。

现在口语则用普通话，不像过去官话只用于官场，普通话则用于全国各阶层。普通话语音、词汇在字典中虽有所规范，但除了北京及近郊以外，很少人能讲标准的普通话。一般人所讲都是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一种变体。任何地区，各人对普通话掌握的程度都不同，有地区远近的因素，文化教育程度的因素，社会地位、个人工作性质等因素都起着一定作用。

在城市，人口集中，教师的素养高些，因而普通话水平就高些。政治、文教、科技中心，由于其工作性质所决定，普通话说得好些。工人农民，由于和外面交流少，对普通话的要求就不高。在某些地区，由于某种社会环境，即使知识分子中，普通话程度也不高。这种不同地区普通话的推广程度，还没有调查得很多，

这在今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项目。

政府一面在努力推广普通话，但也没有禁止说方言。在上海、广州，只在学校、会议、广播、电视中用普通话，日常生活、街头、商店，难得听到普通话。如果这种大城市是这种情形，那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方言的势力可能更强。台湾也是这样，1948年，大陆很多人移居台湾，普通话（国语）的地位就很突出，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主要讲普通话，在较小的城市或广大农村，则主要讲闽南话、客家话，尽管40岁以下的人实际上也都会讲普通话。看来，大陆、台湾这种方言的习惯势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所改变。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但并不等于普通话。这在词汇上最明显，语法次之。现在列举20个词，说普通话的人不一定能懂这些北京话：

- |              |                   |
|--------------|-------------------|
| 1. 爷们（男人）    | 11. 鸡子儿（鸡蛋）       |
| 2. 娘儿们（女人）   | 12. 脑瓜儿（头）        |
| 3. 公母俩（夫妇）   | 13. 哈喇子（口水）       |
| 4. 今儿（今天）    | 14. 眊目糊（眼屎）       |
| 5. 昨儿（昨天）    | 15. 脓 néng(nóng)  |
| 6. 擦黑儿（傍晚）   | 16. 脏土（垃圾）        |
| 7. 多咱（什么时候）  | 17. 取灯儿（火柴）       |
| 8. 曲亲（蚯蚓）    | 18. 棒子（玉米）        |
| 9. 蚰蚰儿（蟋蟀）   | 19. 碎（馐）cèi(suǐ)  |
| 10. 逮耗子（捉老鼠） | 20. 剋架 kēijià（打架） |

普通话教育不只推广了普通话，也去除了一些特殊的方言词语，而方言也很自然地去接受普通话词语。上述20个词，即使是北京人，现在一般也说普通话，不用这些字眼了。胡明扬(1978)讲到上海话词汇，由于受普通话影响，一些方言色彩强的词语已为普通话词语所取代<sup>③</sup>。这种共同语影响方言的现象，从来就有，只要国家一强盛，就要把共同语推行到全国各地。

## 10.2 口语书面语的分歧(Diglossia)、双方言(Bidialectalism)、双语言(Bilingualism)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在口语书面语方面的分歧很像 Ferguson 说的那样:

在共同口语之外,还有一种不同的更为高级的规范的书面语(语法可能更复杂),这种书面语只有通过正规教育才能学到,并用于正式的书面或讲话中,而不适用于日常口语中。(Ferguson 1964: 435)

中国文言和口语之间的分歧很像这种情况,只是文言在语法上不见得比口语更复杂。因为文言是用各种方言去阅读的,没有自己确定的一套读音,而各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复杂的连读变调。另外,方言虽有自己一些语法助词,一些特别的词序,但比起方言口语来,很难说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另外,文言不像别的情况,它的地位更加突出,从来不适用于口语。其他方面,文言很像阿拉伯国家的古典阿拉伯语,或希腊的书面语(katharévusa)。

传统的口语书面语的分歧后来变成标准语方言的分歧(Ferguson 1964: 435)。但标准语也用于日常口语,在某些地区,标准语和方言并不存在差异。中国的普通话和北京话虽不能等同,从实用看基本上没差别,那么多北京市的人都用普通话作日常口语。别的大城市中,也有一些人都用普通话作日常用语。在台北,40岁以下的人都会说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这些人出生在由大陆移去的各种方言的家庭中,小时在家说方言,上学以后就不说方言而说普通话了。现在台湾年青人的家里,小孩从小就学普通话,这样,普通话就成了他们的母语了。

台北的例子很有意思,既可看到普通话推广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台湾离北京那么远,却能以遥远的北京话作普通话。台北人口来源很杂,主要讲闽南话,大陆移去的主要是非北方话的各

种南方方言区的人。但他们原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及军队中工作，因此都会普通话。台湾政府看到这种不能通话的方言分歧，一开始就强调普通话教育。虽然官方要求以北京话为基础，实际上只有少数教师发音比较标准，这样，台湾普通话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标准的普通话，当然这和各不相同的方言背景也很有关系。在词汇上，台湾普通话既有北方话词汇，也有很多是明显来自南方的词语。语法上，闽南话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尽管如此，台湾的普通话仍然是标准语的地方变体，不同地区的人，包括北京人，都能听懂。

台北现在可以说是双方言的城市，就是既说普通话，也说闽南话。这种情况大概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④。

上海的情况和台北不太相像。上海的人口虽然也来自四面八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于江浙地区。胡明扬(1978)估计，上海有2/3是外地人，主要来自江苏南部、浙江北部这些吴语区，非吴语区来的人很少。这样，上海话依然是日常交际用语，而普通话只在学校中学到，也只用于学校、政府、广播、电视等方面。上海话和台湾的普通话一样，也经历了语音语法上的一种变化，以适应共同交际的需要。

中国本来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原来只有少数官员、商人才会讲外地一种或多种方言，而现在很快变为人人会讲双方言的国家。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学了普通话，并继续使用他们的本地方言，主要在家里及某些社交场合。这样，普通话很容易影响他们的方言，特别是词汇方面，长期下去，如果没有别的干扰，这两种方言会互相靠近。这么说，以后是否就没有方言，而只有一种全国语言呢？这当然不好说绝，但从现在看，这种讲两种方言的情况会稳定一段时间，方言还得在相当长时间内起着作用。

中国有大约94%的人口讲汉语各种方言，其余6%讲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有些少数民族语言，讲的人不少⑤。

壮族 1219万

维吾尔 548万

苗族 392 万

藏族 345 万

蒙古族 266 万

朝鲜族 168 万

上列少数民族都有其民族语及文字，学校正式教。少数民族也学汉语，干部及学生都能说汉语。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能讲邻近民族的语言，即互相能说对方的语言，懂两种以上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很常见。如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近 2 万人，除了讲汉语外，还会讲维吾尔语（李 1979）。民族语和方言一样，都受普通话很大影响，常有一些新词新语，完全是汉语的借词。

在少数情况下，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也起着很大的影响，如青海方言，就有一些藏语的特点，而且不只在词汇上，还有语法方面的，如“主宾动”的词序及后置介词等（程 1980）。这一情况说明，汉语的语法在早期曾有可能受非汉语的影响。

### 10.3 语言政策

20 世纪以前，清朝没注意过语言问题。书面用文言，口头讲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一直沿用下来。出现什么问题时，就临时解决一下，如 18 世纪的雍正皇帝，下令在广东福建办专教官话的学校，就因为那儿的人讲官话水平太低。鸦片战争以后，对教育问题有所重视，但对汉字难的问题还未注意。到了开展群众性教育、学习西方文明之后，语言文字的改革才提到日程上来。本世纪初，一些改革家认识到，汉字不合国家改革的需要：方言的复杂，阻碍人们的交流；汉字的难学，文盲就多。这些是不利于国家的现代化的。

清朝末年虽下令在中学教官话，但还是太晚，收效不大。到辛亥革命以后，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用以规范国语读音，还让这些读音统一会的成员创造拼音字母。1913 年，他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标准音取自北方的几个方言，国音字母也造了，



1913 年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一直沿用下来，台湾至今还用。用来注音的《国音字典》也于 1917 年正式出版（刘复 1925：19 页以下）。由于所定标准音不切实际，后来被新的北京音所取代。

1919 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研究有关全国语言问题（刘复 1925：47 页以后），1923 年成立国语辞典编纂处，后来负责编纂 4 卷本的《国语辞典》（参 7.9 节）。

用白话取代文言开始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五四时期的一些主张改革的人提出的。20 年代初，教育部规定在小学一二年级教白话，白话由此而得到法定的地位。但文言在其他政府、文教、商业方面仍用到 40 年代。

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期间，语言文字改革停顿了一段。还有一些守旧的看法，如把文言、汉字看作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反对这种改革。

1949 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进行改革，支持以北京话作为基础方言，用白话取代文言。1955 年 10 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提出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1956 年，国务院命令当年秋天学校就教普通话，并在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宣传推广普通话。另外要求创造拼音文字，编写新的词典。这项工作到文化大革命时被中断了（Yú 1979：460）。

汉字简化，是改革中最大的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国务院所属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汉字简化工作。1956 年第一批简化汉字 515 个字，有 29 个字完全取消，其余则减少笔划，少数字减得比较多。1964 年，第二批简化字表颁布，对一些偏旁作了简化，因此有这些偏旁的字都给简化了（Lehman 1975：46）。1977 年又有 200 个试用简化字。有些报纸杂志就开始用新的简化字，当时还有很多自造的简化字也在社会上流行。由于受到各界批评（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那些试用的新简化字于 1978 年宣布作废。（Norman 1980：494）。

汉字的简化，以后怎么下去，还看不清楚。小范围的简化是有

可能的，但多数人认为汉字的简化得稳定一段时间。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限制使用的字数。第三章谈到，中学毕业生大约认3500到4000字。从印刷所用及书刊抽样调查看，一般用5000个字。《辞海》1.5万字，很多字只用于古代书面语。从70年代的调查看，把用得少的汉字和同音字合并起来，可减少到3500字（关和田1981:150）。如果这样的削减可行，那会减轻印刷及计算机使用中文的问题。还不清楚这个问题是否在考虑，或加以实行。

#### 10.4 现状和展望

现在普通话的地位很稳定。大家都赞同。汉字也比较稳定，拼音文字得在遥远的将来才使用。简化汉字以后是有可能的，但目前也处于稳定时期。

经过几乎1个世纪的争论，中国的语言概貌已经明确。中国将继续是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普通话将越来越推广，方言会继续存在，但会越来越多地受普通话影响。现在的汉字，如何更便于机器及计算机使用，是一个问题。用拼音输入机器当然和以前讨论的拼音文字完全是两回事。暂时还看不到向拼音文字转化的可能（日语就是一个例子），但拼音文字在电传交际及信息取存方面确有优越性。从这方面考虑，用拼音作为帮助，可能会用得多起来。

### 阅 读 材 料

Barnes, Dayle. 1974. Language Planning in Mainland China: standardization. In Fishman, Joshua A. (ed.)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 Hague: Mouton (该文是关于现代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讨论。)

黎锦熙，1934，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该书是早期

国语运动的真实历史。)

黎锦熙。1957.文字改革论丛。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该书关于语言问题的广泛讨论。)

Milsky, Constantin.1973.New developments in language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 53:98-133. (该文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政策资料。)

倪海曙。1948.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

(该书是1947年前拼音化运动的最好的历史记载。)又见第六章所列阅读材料。

## 第十章 注释

- ① 减少音节数量的趋势从古就有，这样同音字就越来越多，过去不同音的后来变为同音了。为了避免歧义，造成了很多复合词。文言中很多字过去不同音，现在是同音字。要念出来，很多同音字，就不便听懂，难于辨别。文言中的典故、引喻也使人不易明白。
- ② 现在方言拼写法已不存在了。
- ③ 南方话和上海话有类似情况，参鲍(1980)
- ④ 台北的语言情况据笔者观察所得。
- ⑤ 人口数引自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1980 年出版的地图：The peoples of China。

## 参 考 文 献

- Allen, W. Sidney 1953. *Phonetics in ancient India* (古印地语语音学).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白滌洲、喻世长 1954. 关中方言调查报告. 语言专刊6. 北京: 中国科学院.
- 鲍明炜 1980. 六十年来南京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中国语文》4期 214—5页
- Barnes Dayle 1974. *Language planning in Mainland China: standardization* (大陆中国的语言规范化). 收入 Joshua A. Fishman 编的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 Hague: Mouton.
- 北京大学 1962. 汉语方音字汇.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北京大学 1964. 汉语方言词汇.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Benedict, Paul K. 1942.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傣语、卡傣语、印度尼西亚语: 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 576—601页.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汉藏语大纲).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南傣语言和文化, 附根词词典).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6. *Rhyming dictionary of writing Burmese* (书面缅甸语押韵词典).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

Byrman area, Vol.3, no.1.

Benveniste, Emile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普通语言学中的某些问题).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原题为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66.)

Bhat, D.N. Shankara 1968. Boro vocabulary (Boro 词汇). B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Bodman, Nicholas 1955. Spoken Amoy Hokkien (福建厦门话), 第1册. Kuala Lumpur: Charles Grenier.

Bodman, Nicholas 1958. Spoken Amoy Hokkien (福建厦门话), 第2册. Kuala Lumpur: Charles Grenier.

Bodman, Nicholas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原始汉语和汉藏语: 建立关系的资料). (收入 Frans Van Coetsem 和 Linda R. Waugh 编的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Leiden: E.J. Brill.

Boltz, William G. 1986. Early Chinese writing (早期汉字). *World Archeology* 17, 420—36页。

Chan, Marjorie Kit Man 1980. Zhong-shan phonology: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is of a Yue (Cantonese) dialect (中山语音: 粤方言的现状和历史分析). 硕士论文,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hang, Kun (张琨) 1947. On the tone system of the Miao-Yao languages (苗瑶语的声调系统). *Language* 29, 374—8页。

Chang, Kun (张琨) 196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Yao tone system (瑶语声调系统比较研究). *Language* 42, 303—

10页。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28.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dialects* (现代吴语的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一套标调的字母). *Le Maître Phonétique*, troisième série, 30, 24—7页。重刊于《方言》1980, 2, 81—3页。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4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古代汉语特征).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203—33页。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48a. *Mandarin primer* (国语入门).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48b. 中山方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 49—73 页。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51. 台山语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25—76 页。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67. *Contrastive aspects of the Wu dialects* (吴语的对比特点). *Language* 43, 92—101 页。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国话的文法).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and Yang, Lien Sheng (杨联陞) 1947. *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国语字典).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and Yang Shih-Feng (杨时逢) 1965. 绩溪岭北方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6, 11—113 页。

Chao, Yuen Ren et al (赵元任等)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上海: 商务印书馆。

陈光尧 1956. 简化汉字字体说明。北京: 中华书局。

- Chen, Leo and Norman, Jerry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ochow dialect (福州话导论).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 陈澧 1842. 切韵考。重印在《音韵学丛书》中。台北：广文书局，1966。
- 陈士林 1963. 彝语概况。《中国语文》4，334—47页。
- 陈寅恪 1936. 东晋南朝之吴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4页。
- 程祥徽 1980. 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中国语文》2，142—9页。
- 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汉语：构词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39。
- 周春明 1976. A dictionary of the Chao-chow dialect (潮语字汇)。台北：三民书局。
- Chu, Chauncey C. 1984. 汉语的词序及其变迁。《语言研究》1，127—51页。
- Coblin, Welden South 1972.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extual and linguistic problems in Erhya (《尔雅》的版本及语言学问题概论)。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 道布 1964. 蒙古语概况。《中国语文》3，240—53页。
- Demiéville, P. 1950. Archaismes de prononciation en chinois vulgaire (中国口语古音). *Toung Pao* 40, 1—50页。
- 丁声树 1953. 释否定词“弗”“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967—96页。
- 丁声树等 1963.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Dobson, W.A.C.H. 1959. Late Archaic Chinese (晚期古汉语).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Dobson, W.A.C.H. 1962. Early Archaic Chinese (早期古汉语).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董同龢 1948a. 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8, 1—249 页。
- 董同龢 1948b.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 81—201页。
- 董同龢 1954. 中国语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社。
- Douglas, Carstairs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中英厦门话字典). Lond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Downer, G.B. 1959. Derivation by tone 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古汉语中的声调别义).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2, 258—90页。
- Downer, G.B. 1963. Chinese, Thai and Miao-Yao (汉语、傣语和苗瑶语). 收入 H. L. Shorto 编的 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Downer, G.B. 1967. Tone change and tone-shift in White Miao (白苗语中的声调变化和声调转移).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0, 589—99页。
- Downer, G. B. 1973. Strata of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Mien dialect of Yao (瑶语勉方言中汉语借词的层次). Asia Major 18, 1—33页。
- Dragunov, Aleksandr A. 1930. The hP'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八思巴字和古代汉语). Izvestija Akademii Nauk SSSR, Otdelenije Gumanitarnyx Nauk 9, 627—47页。
- Dreher, John J. and Lee, Pao Chen 1966. Instru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ingle and paired Mandarin tonemes (汉语单音和双音词声调的仪器检测). Douglas Paper 4156. Huntington Beach, Advanced Research Laboratory, Dou



glas Aircraft Company (research communication no. B).

Egerod, Søren 1967. Dialectology (方言学)。收入 Thomas Sebeok 编的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2. The Hague: Mouton.

Ferguson, Charles A. 1964. Diaglossia (口语和书面语的分歧).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rei, Henri 1956. 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唯动格结构), 第一部分。Gengo Kenkyū 31, 22—50页。

Frei, Henri 1957. 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 (唯动格结构), 第二部分。Gengo Kenkyū 32, 83—115页。

高明 1980. 古文字类编。北京: 中华书局。

高名凯 1957. 汉语语法论。北京: 科学出版社。

Giles, Herbert A. 1912.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中英词典) 第二版。上海: Kelly and Walsh.

Graham, A. C. 1978. A post-verbal aspectual in Classical Chinese, the supposed preposition *hu* (古汉语中后置于动词的状态词: 所谓的前置词“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1, 314—42页。

Greenberg, Josep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ing of meaningful elements (语法中特别是意义成分排列次序上的一些普遍规则)。收入 Joseph Greenberg 编的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Grottaers, Willem A. 1943.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nécessité d'une nouvelle méthode pour l'étude linguistique du chinois (中国的语言地理—研究汉语语言学需要一种新方法). *Monumenta Serica* 8, 103—66页。

关尔佳 田林 1981. 如何实现汉字标准化。《中国语文》2,

147—53页。

郭锡良 1980。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6, 64—93页。

Gurevich, I. S. 1974. Očerki grammatiki kitajskogo jazyka (论中国话语法) III-V vv. Moscow, Nauka.

Gurevich, I.S. and Zograf, I.T. 1982. Xrestomatija po istorii kitajskogo jazyka (古汉语构拟) III-XV vv. Moscow, Nauka.

Hartman, Lawton M. 1944. Segmental phonemes of the Peiping dialect (北平话的切分音位). Language 20, 28—42页。

Hashimoto, Anne Yue 1969. The verb 'to be' in modern Chinese (现代汉语动词“是”)。收入 John W. M. Verhaar 编的 The verb 'be' and its synonyms, philosophical and grammatical studies, part IV, Twi, Modern Chinese, Arabic.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supplementary series, Vol. 9. Dordrecht, Reidel.

Hashimoto, Anne Yue 1971.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s (汉语句法结构). Unicorn 8. Princeton, 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

Hashimoto, Mantaro 1967. The hP'ags-pa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 plosives (汉语爆破音的八思巴文转写). Monumenta Serica 26, 149—74页。

Hashimoto, Mantaro 1969. Observations on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被动结构研究). Unicorn 5, 59—71页。

Hashimoto, Mantaro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客家方言: 语音, 句法和词汇的语言学研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himoto, Oi-kan Yue 1972. Phonology of Cantonese (广州音系).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udricourt, André 1954a.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越南语声调的起源). *Journal Asiatique* 242, 68—82页。
- Haudricourt, André 1954b.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 (怎样构拟上古汉语). *Word* 10, 351—64页。
- Haudricourt, André 1954c. Introduction à la phonologie historique des langues miao-yao (苗瑶语历史语音学导论).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 Orient* 44, 555—76页)
- Haudricourt, André 1966. The limits and connections of Austroasiatic in the northeast (东北部南亚语的界限和联系). The Hague, Mouton.
- Hirth, Friedrich and Rockhill, W.W. 1911.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Chau Ju-kua, 他的关于 12、13 世纪中国阿拉伯贸易的著作, 题名为 Chu-fan-chi). St. Petersburg, Printing Offic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正文出版公司重印, 台北, 1970。
- Hockeff, Charles F. 1947. Peiping phonology (北平音系).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7, 253—67页。
- Howie, John Marshall 1976. Acoustical studies of Mandarin vowels and tones (普通话元音和声调的声学研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胡明扬 1978. 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3, 199—205页。
- 黄盛璋 1963. 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中国语文》6, 443—72

页。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1966.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汉语口语词典).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cob, Juidth 1968. Introduction to Cambodian (柬埔寨语概论).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äschke, H.A.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藏英词典). London. 由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重印, London, 1965.

Jäschke, H.A. 1954. Tibetan grammar (藏语语法). New York, Ungar.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 1960.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Karlgren, Bernhard 1915-23.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中国音韵学研究). 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vol. 15 (in 4 parts). Leiden: E.J. Brill; Uppsals: K. W. Appelberg.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中文和日文汉字分析字典).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Karlgren, Bernhard 1940. Gramata seir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汉文典, 中文和日文汉字的字形和字音).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2, 1—471页。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中古上古汉语语音概论).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3, 211—367页。

Karlgren, Bernhard 1961. The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Chi-

nese language (汉语词类). 收入 *Language and Society, essays presented to Arthur M. Jensen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Copenhagen, Berlingske Bogtrykkeri.

Kennedy, George 1964. *Selected works of George A. Kennedy* (乔其·阿·肯尼迪选集).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Kratochvil, Paul 1968. *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 features of an emerging standard* (今日汉语: 正在形成标准的特点).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Laufer, Berthold 1919.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中国—伊朗: 中文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201,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15, no. 3. Chicago.

Lehmann, Winfred P. 1975.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和语言政策).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Lewis, M.B. 1947. *Malay* (马来语).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i, Charles N. and Thompson, Sandra A. 1973. Co-verbs in Man darin Chinese, verbs or prepositions (汉语普通话的副动词: 动词还是介词)?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57—78页。

李方桂 1937. 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上海: 商务印书馆。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 新9卷, 1—61页。

李方桂 1976. 几个上古声母问题。收入钱思亮编《总统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

李方桂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比较傣语手册).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黎锦熙 1934. 国语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黎锦熙 1944. 潼关县志。潼关：潼关县政府。

黎锦熙 1957. 文字改革论丛。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Li, Paul Jen-kuie 1973. Rukai structure (鲁凯语结构). 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64. 台北：中央研究院。

李 荣 1952. 北京口语语法。北京：开明书店。

李 荣 1956. 切韵音系。语言学专刊4. 北京：科学出版社。

李 荣 1963.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李 荣 1979. 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 1—29页。

李淑兰 1979. 锡伯语概况。《民族语义》3, 221—32页。

李孝定 1977. 汉字史话。台北：联经。

李行健 1958. 《世说新语》中副词“都”和“了”用法的比较。《语言学论丛》2, 73—83页。

李学勤 1985. 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

Li, Ying Che (李英哲) 1971. Interaction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in Chinese (汉语中语义和句法的交互作用).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6, 58—78页。

Ligeti, Louis 1970. Le tabgh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r-pi (塔昂法特, 一种鲜卑语方言). 收入 L-Ligeti 编的 Mongolian Studies. Amsterdam, Gröner.

Light, Timothy 1970.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in Chinese (汉语的词序和词序变换).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 149—80页。

刘 复 1925. Les mouvements de la langue nationale en chine (中国国语运动). Paris, Société d' Editions "Les Belles Lettres".

刘 坚 1982. 《大唐三藏取经史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

5, 371—80 页。

刘景农 1958。汉语文言语法。北京：中华书局。

刘 璐 1964。景颇语概况。《中国语文》5, 407—17 页。

刘世儒 1956a。被动式的起源。《语文学习》8, 32—3 页。

刘世儒 1956b。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刘叶秋 1963。中国古代的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刘泽先 1980。谈谈文字现代化。《中国语文》2, 155—9 页。

陆志韦 1946。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31, 35—70 页。

陆志韦 1964。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

吕必松 1980。现代汉语语法史话, 2。《语言教学与研究》3, 63—75 页。

吕叔湘 1940。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收入吕1955。

吕叔湘 1941。论毋与勿。收入吕1955。

吕叔湘 1944。中国文法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重印。

吕叔湘 1947。“这”“那”考原。重印在吕1955。

吕叔湘 1955。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吕叔湘 1980a。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译赵元任的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吕叔湘 1980b。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2, 85—122 页。

吕叔湘等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常培 1931。知微澄娘音值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 121—57 页。

罗常培 1942。The Trung language of Kung Shnn. (贡山俅语)。昆明

罗常培 1950。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

罗常培 1956。汉语音韵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

罗常培 1958。临川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

罗常培 1963。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 罗常培、蔡美彪 1959。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北京：科学出版社。
- 罗香林 1933。客家研究导论。广东：Shi-shan 图书馆。
- Lyons, John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理论语言学导论).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Iver, D. 1926.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客家话中英词典). 上海: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artin, Samuel E. 1953.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古汉语音位).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supp. 16.
- Martin, Samuel E. 1957. Problems of hierarchy and indeterminacy in Mandarin phonology (普通话语音中的层次和不明问题).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9, 209—29 页。
- Maspero, Henri 1912.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安南语历史语音研究).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 Orient 12, 1—127.
- Maspero, Henri 1934. La langue chinoise (中国话). Conférences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année 1933. Revue des Cours et Conférences, 481—502, 591—606.
- Mathews, R. H. 1931.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中英字典). 上海: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1970. Glottal dissimilation and the Lahu high-rising tone: a tonogenetic case study (声门音的异化和拉祜语的高升调: 声调生成研究).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 13—44.
- Matisoff, James A. 1972. The Loloish tonal split revisited



(傈僳语声调分化再探). Research Monograph no. 7,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tisoff, James A. 1978.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  
Burman; 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  
(藏缅语的变异语义学: 语言比较的“器官的”入门).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Medhurst, Walter H. 1842-3.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中英字典). Batavia. 印于 Parapattan.

梅 广 1980. Is Modern Chinese really an SOV language,  
(汉语真是 SOV 语吗)?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  
entale 7, 23—45.

梅祖麟 1970. Tone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中古汉语的声调和韵律 以及上  
声的来源).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86—  
110.

梅祖麟 1980.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6, 427—  
43 页。

梅祖麟 1981a. 明代宁波话的“来”字和现代汉语的“了”字。  
《方言》1, 66 页。

梅祖麟 1981b.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了”的来源。《语  
言研究》1, 65—77 页。

苗语队 1962. 苗语概况。《中国语文》1, 28—37 页。英译载 Purnell,  
1972。

Miller, Roy Andrew 1967. The Japanese Language (日本語).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ller, Roy Andrew 1971. Japanese and other Altaic  
languages (日语和其他阿尔泰语).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Roy Andrew 1975. The Far East(远东). 收入 T. A. Sebeok 编的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3,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 Milsky, Constantin 1973. New developments in language reform (语言改革的新发展). *The China Quarterly* 53, 98—133.
- Morrison, Robert 1815-23.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文字典), 三部分.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55 年重印于上海和 London Mission Press.
- 倪海曙 1948.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 上海: 时代书报出版社.
- Norman, Jerry(罗杰瑞)1973: Total development in Min (闽语的声调演变).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38 页.
- Norman, Jerry (罗杰瑞)1979. The verb chí—a note on Min etymology (闽语里的“治”字).《方言》, 3, 179—81 页.
- Norman, Jerry (罗杰瑞) 1980. Linguistics. (语言学). 收入 Leo A. Orleans 编的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and Mei, Tsu-lin (罗杰瑞、梅祖麟)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古代中国南部的南亚语: 某些词汇证据). *Monumenta Serica* 32, 274—301.
- O'Connor, Kevin A. 1976. Proto Hakka (原始客家话).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1, 1—64.
- Ohta Tatsuo 1958. Chūgokugo rekishi bunpō (中国语历史分布). Tokyo: Kōnan Shoten.
- 欧阳觉亚, 郑贻青 1980. 黎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潘茂鼎等 1963. 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中国语文》6, 475—95 页.

- Park, B. Nam 1968. Korean basic course (基础朝鲜语).  
Washingto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 Pinnow, Heinz-Jürgen 1959. Versuch einer historischen  
Lautlehre der Kharia-Sprache 试论朝鲜语历史语音学.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icholas 1957.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  
pa script (八思巴文中的蒙古语遗迹).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icholas 1960.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  
chen Sprachen, Teil 1, Vergleichen de Lautlehre (阿尔泰语比  
较语法, 第一部分, 比较语音学).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ulleyblank, E. G. 1962a.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古汉语声母系统), 第一部分. Asia Major 9,  
58—144.
- Pulleyblank, E. G. 1962 b.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古汉语声母系统), 第二部分. Asia Major 9, 206—  
65.
- Pulleyblank, E. G. 1970. Late Middle Chinese (晚期中古汉  
语), 第一部分. Asia Major 15, 197—239.
- Pulleyblank, E. G. 1971. Late Middle Chinese (晚期中古汉  
语), 第二部分. Asia Major 16, 121—66.
- Pulleyblank, E. G. 1978.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中古汉语声调的性质及其演  
变).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 173—203.
- Pulleyblank, E. G. 1979. Some examples of colloquial pro-  
nunciation from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AD 502—  
556) (南梁口语音的一些例子). 收入 Wolfgang Bauer 编的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 Pulleyblank, E.G.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中古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Punell, Herbert C. 编, 1972. Miao and Yao linguistic studies; selected articl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苗瑶语言学研究: 英译选集).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钱玄 1980. 秦汉帛书简牘中的通假字。南京师范学院学报3, 44—8页。
- 裘锡圭 1978.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3, 162—71页。
- Ramstedt, G.J. 1952.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2; Formenlehre.(阿尔泰语言学引论, 2; 词法学)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Ramstedt, G. J. 1957.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1; Lautlehre.(阿尔泰语言学引论, 1; 语音学)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语言).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Schaank, S. H. 1897-8,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古汉语语音). T'oung Pao 8, 361—77, 457—86; 9, 28—57.
- Sherard, Michael 1980.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odern colloquial Shanghai (现代上海话语音).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monograph series, no. 5. Tokyo; National Inter-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Shorto, H.L. 1962. A dictionary of modern spoken Mon (现代孟语字典).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orto, H. L. 编, 1963. 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东南亚太平洋地区语言比较).

- Collected papers in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Sofronov, M.V. 1979. Kitajskij jazyk i kitajskoe obščestvo. (中国语和中国社会) Moscow; Nauka.
- Solhem, William G. 1964. Pottery and the Malayo-Polynesians (陶器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 *Current Anthropology* 5, 360, 376—84.
- Sitmsen, Hugh M. 1966. The Jong Yuan In Yunn ---a guide to Ol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中原音韵——早期官话发音指南).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 Tai, James H.Y. 1973. Chinese as an SOV language (中文是一种主宾动次序的语言).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9, 659—70.
- Tai, James H.Y. 1975. On two functions of place adverbials in Mandarin Chinese (论普通话地点副词的两种功能).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 154—79.
- 唐钰明、周锡禄 1985. 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中国语文》4, 281—5 页。
- 唐作藩 1980. 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语言学论丛》6, 55—63 页。
- 邓守信 1973. Negations and aspects in Chinese (汉语的否定和动词体).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4—27.
- 邓守信 1975. A se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se (汉语及物关系的语义研究).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mpson, Laurence C. 1965. A Vietnamese grammar (越南语语法).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Thompson, Laurence C. 1976. Proto-Viet-Muong phonology

- (原始越南语蒙语语音).收入 Philip 等编的 *Austroasiatic Studies*, part 2.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Ōsō, Akiyasu 1957. *Chūgokugo on'in ron* (中国语音韵论). Tokyo: kōnen Shoin.
- Volpicelli, M. Z. 1986. 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ymes of China (汉语音韵, 去发现古代语言的声音, 恢复失去的韵律). 上海: China Gazette.
- Wang, Fred Fangyu 1966.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汉英普通话字典).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Fred Fangyu 1971.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English-Chinese*. (英汉普通话字典).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 王 还 1959. 把字句和被字句.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 王 力 1937. 中国现代语法. 重庆: 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57. 汉语史稿.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5. Two aspect markers in Mandarin (普通话中两个表示体的标志). *Language* 41, 457—70.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3. Some syntactic rules for Mandarin (普通话的几个句法规则).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192—202.
- Wang, William S.-Y. and Li Kung-pu 1967. Tone 3 in Pekinese (北京话第三声). *Journal of Speech and Hearing* 10, 629—36.
- War Department (USA) 1945.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中国话字典). Washington, DC.
- 闻 宥 1984. “于”“於”新论. 《中国语言学报》2, 44—8页.

- Whinnom, Keith 1965. The origin of European-based pidgins and creoles (欧洲地区洋泾浜英语及克里奥耳法语的起源). *Orbis* 14, 509—27.
- Whinnom, Keith 1971. Linguistic hybridization and the “special case” of pidgins and creoles (语言混合和洋泾浜英语、克里奥耳法语这两种特殊情形). 收入 Dell Hymes 编的 *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Samuel W. 1874.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文单音字典). 上海: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Wong, James Poy 1970. A study of the T'ai shan(Hoi san) dialect(台山话研究). 中文 299 课程 春季 学期 论文.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San Francisco.
- 新华辞书社 1953. 新华词典.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从 1957 年起,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熊正辉 1960. 光泽、邵武话里的古入声字。《中国语文》10, 310 页。
- 徐通锵、叶蜚声 1979. “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中国语文》3, 166—73 页。
- Yakhontov, S. E. 1960. Fonetika kitajskogo jazyka v tysjačiletije do n.e. Problemy Vostokovedenija 6, 102—15 由 Jerry Norman 译出, 刊 *Unicorn* 6 (1970), 52—75.
- Yakhontov, S. E. 1965. Drevnekitajskij Jazyk. (古代语) Moscow: Nauka.
- 杨时逢 1957. 台湾桃源客家方言。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 A 卷 22 号。台北: 中央研究院。
- 杨时逢 1969a.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56 号。台北: 中央研究院。

- 杨时逢 1969b. 南昌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152—204 页。
- 杨时逢 1971. 江西方言声调的调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3, 403—32 页。
- 杨时逢 1974.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66 号。台北：中央研究院。
- 杨时逢 1984.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82 号，台北：中央研究院。
- 杨时逢 Ching, Eugene 1971. 灵宝方言。清华学报新 9 卷, 106—47。
- 瑶语队 1962. 瑶族语言概况。《中国语文》3, 141—8。英译刊 Purnell 1972。
- Yates, Warren G. and Tryon, Absorn 1970. Thai basic course(基础泰语)。Washingto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 于根元等 1979.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几点认识。《中国语文》6, 459—63 页。
- Yú zhī fū 1975. 凤新音系。台北：Yee Wen 出版公司
- 袁家骅 1960. 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Yue, Anne O (余莺芹) 1979. The Tengxian dialect of Chinese (中国)广西(藤县方言).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Monograph Series, no. 3. Tokyo: National Inter-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n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张朝炳 1980. 毛泽东选集用字的字数，词数按音节分布情况。《中国语文》3, 196—205 页。
- 张惠英 1982. 释“什么”。《中国语文》4, 302—5 页。
- 张惠英 1984. “何”与“何物”。《方言》4, 51—6 页。
- 张清常 1978. 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3, 196—8



页。

赵 诚 1979。中国古代韵书。北京：中华书局。

赵金铭 1979。敦煌变文中“了”和“着”。《中国语文》1，65—9 页。

赵荫棠 1936。中原音韵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936。国语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78。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祖谟 1956。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1，127—35 页。

周祖谟 1966。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收入《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周祖谟、吴晓铃 1956。方言校笺及通检。北京：科学出版社。

朱德熙 1961。说“的”。《中国语文》12，1—15 页。

朱德熙 1966。关于《说的》。《中国语文》1，37—46 页。

朱德熙 1978。“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1，23—7 页；2，104—9 页。

朱居易 1956。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印书馆。

祝敏彻 1958。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语言学论丛》2，17—30 页。

祝敏彻 1982。《朱子语类》中“地”“底”的语法作用。《中国语文》3，193—7 页。

朱志宁 1964。维吾尔语概况。《中国语文》2，153—71 页。

Zograf, E.T. 1962. Očerki grammatiki srednekitajskogo jazyka. (中古汉语语法概论) Moscow, Vostočnye Literatury.

## 译 后 记

我原来只知道罗杰瑞先生是方言研究专家。1985 年秋他应邀来北大讲学，把他 Chinese 一书的第三、四、五章手稿给我看，这令我大吃一惊，原来他不只是方言研究专家，而且是包括方言在内的汉语研究专家。我怀着惊喜的心情读完了这三章手稿，把我的有关意见都告诉了他，并决定翻译此书，以饷国内同行。

无独有偶，蒋绍愚先生读了罗先生的 Chinese 一书以后，也想为它翻译。罗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蒋先生也有此打算，他说既然你已译了，正好让蒋先生写序。所以我们就劳驾蒋先生写了序。

项梦冰同志告诉我，朱德熙先生生前在给他的研究生、博士生上课时，就把罗先生这本书列为必读书。我还是要谢谢责任编辑的辛劳编辑。

最后，我要感谢语文出版社的同志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

译者

1992 年 12 月于北京